

武汉

2023

(第2辑)

社会科学

SOCIAL SCIENCES IN WUHAN

总第28辑

编委会主任/吴天勇

编委会委员/（按姓氏笔画排序）

田祚雄 刘水平 刘江涛 朱哲学 杜文才 李春洋

吴天勇 吴昱南 汪涛 陈颖 陈雪松 袁超越

陶维兵 董实忠 樊志宏

主 编/樊志宏

执行主编/周 阳 陶秀丽

版 武汉出版社

(鄂)新登字08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武汉社会科学. 总第28辑 / 樊志宏主编. — 武汉 : 武汉出版社, 2023.7
ISBN 978-7-5582-6135-0

I. ①武… II. ①樊… III. ①社会科学—文集 IV. ①C53

中国国家版本馆CIP数据核字(2023)第132980号

武汉社会科学·总第28辑

主 编: 樊志宏
责任编辑: 朱梦珍
封面设计: 闻 风
出 版: 武汉出版社
社 址: 武汉市江岸区兴业路136号 邮 编: 430014
电 话: (027)85606403 85600625
<http://www.whcbs.com> E-mail: whcbszbs@163.com
印 刷: 武汉市机关文印中心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89 mm × 1194 mm 1/16
印 张: 11.25 字 数: 315千字
版 次: 2023年7月第1版 2023年7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20.00元



关注阅读武汉
共享武汉阅读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由本社负责调换。

改革创新

- 1 我国创新城区建设实践及其启示 / 姚莲芳 操玲姣 朱耘婵
- 11 传统产业园区向创新园区升级发展路径及对策 / 朱耘婵
- 19 人工智能与 ChatGPT 前景展望 / 刘禹良
- 26 新发展阶段武汉人才流动现状研究 / 曹 莹

经济发展

- 37 基于新发展格局下的武汉与广州发展比较研究 / 武汉市社会科学院课题组
- 47 周期视野下武汉动能结构优化研究 / 辜小勇
- 57 打造中国“赛车谷”，促进武汉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
——基于国内外赛车运动及赛车产业发展的启示 / 李 黎 周 阳 陈 龙等
- 65 中欧班列(武汉)与产业融合发展研究 / 胡爽平 杨 乐 陈 雯

长江文化

- 73 长江流域舞蹈艺术的历史传承与现代演绎
——第 15 期大江论坛专家发言摘编
- 历史的幸存者偏差 / 樊志宏
- 原始圈舞·连臂踏歌 / 柳雅青
- 公共艺术视域下长江流域舞蹈文化的多元与互动 / 张素琴
- 舞入江流 / 荣 涛
- L.I.F.E 揭开生活的面纱 / Kevin Polak 李卉琼
- 当代环境舞蹈艺术与城市场景利用 / 殷 梅

超大城市空间规划与治理 (武汉市规划研究院合办)

- 84 武汉城镇空间历史演变中所蕴含的中国传统哲学思想探究及其现代启示 / 方 可
- 92 化“流量”为“留量”，打造武汉高品质文旅空间
——基于“特种兵式旅游”浪潮的思考 / 郭 林 林建伟 黄 焕等
- 99 论大数据时代武汉市慢行系统建设 / 严 炜 解宇航
- 107 韧性城市建设与老城区菜市场改造研究
——以汉口天声菜市场为例 / 李 青 董 菲

CONTENTS

武汉市社会科学院·武汉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社会治理

- 114 超大城市社区治理现代化挑战、经验与思路
——基于“武汉实践”的调查 / 冯丽婷 凯萨尔 陈浩然等
- 123 统一战线服务超大城市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研究
——以武汉城市社区的实践为例 / 李 婷 吕德文
- 130 以社区党建创新引领基层社会治理高质量发展
——以武汉市武昌区的基层经验为例 / 杜爱国 杨少华
- 137 共同富裕背景下的城乡低保统筹发展研究
——以武汉市为例 / 杨 莉
- 145 武汉市中小学学校体育发展状况调查 / 熊 莉 王洪明

文化历史

- 153 文化软实力视域下武汉城市品牌形象构建 / 李小波
- 161 冯天瑜先生中华文化史研究成就纵横谈
——致程涛平先生的信 / 王超逸
- 166 百年以来中国共产党“二七”纪念的历史演进 / 卢 鹏 俞祖华

投稿邮箱: whshkx@163.com

“大江学术”微信公众号: WHASS_1983



我国创新城区建设实践及其启示

姚莲芳 操玲姣 朱耘婵

摘要:打造创新城区正在成为全球城市优化创新空间布局的一个重要趋势,是国内外主要大城市自我更新演进发展的空间变革新路径、新模式。创新城区是在城市内部创新创业企业高度集聚的街区空间,具有创新创业企业高度集聚和城市化的生活环境等特征。上海“环同济知识经济圈”、武汉“创新街区”、南京“硅巷”、深圳湾园区等创新城区建设的典型做法表明,创新城区建设需要坚持“创产城融合”的发展理念,创建资源、产业、空间等各层面协调配合的机制,让创新提振城市产业、激发城市活力,赋予城市新的生命力和竞争力。

关键词:创新城区;创产城融合;城市更新

传统中心城区作为城市的核心组成部分,是城市之间竞争的一个主战场。推动传统中心城区开发创新空间、集聚创新资源和创新活动,打造创新产业发展与居住空间自然交织、富有街区活力与人文特色的创新城区,正在成为全球城市优化创新空间布局的一个重要趋势,是国内外主要大城市自我更新演进发展的空间变革新路径、新模式。本文对创新城区的概念与特征进行总结,在梳理我国部分城市创新城区建设的典型经验做法的基础上,探索和归纳其启示意义。

一、创新城区的概念

(一)学术研究综述

2014年6月,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的凯茨首次提出“创新城区”的概念,认为创新城区是指那些汇聚领先技术的“锚机构”、企业集群以及初创企业、企业孵化器和加速器的地理区域。^①在布鲁金斯学会提出创新城区的概念后,国内外学者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对创新城区进行了理论研究。

1. 趋势研究

创新型产业与城市空间的结合,是当代产业移位总体趋势的体现。近年来,产业选址的总体趋势是,不同的产业部门遵循不同的选址规律。众多企业以集群形式在城区集聚,原因在于丰富的多学科劳动力的可

^① 邓智团:《创新街区研究:概念内涵、内生动力与建设路径》,《城市发展研究》2017年第8期。

获得性、基础设施的供给和作为城市区域特征的公共服务和商品的供给(Harrison B等,1996),该现象促发了一种更有利于互动的环境、并有助于建立跨部门的联系,从而促进知识的传递、降低劳动交易成本。

2. 原理研究

创新型产业与城市空间的结合,是企业选址要素改变的结果。创新型企业在城市中的“选址因素”方面,一部分学者关注“硬”的因素,如劳动力市场、投资强度、生活成本(Darchen S,Tremblay D G,2010;Lawton P等,2013),而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将研究放到“软”因素,如生活质量、城市环境、文化与社会特征、多样性、宽容度、人群的混合等方面(Bereitschaft B,Cammack R,2015;Florida R,2002;Landry C,2000;Glaeser EL,2005)。街区氛围、休闲设施、公共空间、文化设施和公园绿地等(Musterd S,Murie A,2011)因素相互联系,最终形成一种能够吸引创新企业并获得它们认可的“创新环境”。创新型企业所在的物质环境应该提供容纳日益繁荣的工作环境需求和高质量的服务,这将带来独特的地方性意象(Florida R,2002)。

3. 空间形态

研究创新型企业与城市空间的结合,重在“产”“城”功能。城市空间中的协同“创新环境”和多个尺度相关,其中街区尺度最为重要(Durmaz SB,2015)。事实上,创新型产业的集聚大多是在一个相对小的范围内,很多关于产业集聚的实证研究也证明了这一点。如有学者对上海的文化创意产业集聚特征的研究,指出创意产业在地区层面的集聚呈集群分布(栾峰等,2019)。有一些研究是基于企业视角的空间形态研究,即研究被创新型企业所认可的城市环境的特点。例如,Florida在《创意阶层的崛起》中提出场地特质包括创意环境、互相合作的社区成员、文化艺术活动、街道活动及咖啡馆里的聚会(Florida R,2002)。许凯在描述创意产业的选址时,提到历史厂房、传统街巷网、滨水空间都对创意产业有吸引力(许凯、孙彤宇,2018)。

4. 模式研究

创新城区根据其发展特征与空间区位的差异主要分为三种类型:一是“创新源驱动”模式,主要是以大学为核心,大量创新产业化、市场化的企业形成大规模集聚的区域,如以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大学等大学为支撑的肯戴尔广场、费城大学城、匹兹堡大学周边等;二是“城市区域再造”模式,主要是传统老工业区通过产业转型并改造物理空间,引进各类研发创新机构、企业,重塑新的产业功能和城市形态,如西雅图南湖联盟区、西班牙巴塞罗那普布诺等;三是“城市化科技园”模式,主要是离城市较远的科技园区,通过增加城市功能,为创新创业机构和企业提供更好的生活与工作环境的区域,如亚利桑那大学科技园、北卡罗来纳州的创新三角园区等。^①

创新城区的相关理论研究表明,创新创业企业向城市中心区集聚这一转变给城市的再发展带来新动力和新气象。^②这对打造创新型城市、建设创新城区提供了理论支撑,对推动城市内涵式发展有着重要的政策借鉴价值。

(二) 创新城区的内涵

1. 创新城区的基本特征

^① 王缉慈、朱凯:《国外产业园区相关理论及其对中国的启示》,《国际城市规划》2018年第2期。

^② 任俊宇、胡晓亮、于璐璐:《创新驱动的“产城创”融合发展模式探索》,《规划师》2018年第9期。

目前对创新城区的概念并没有明确、统一的学术界定。在对现有研究进行同一性和相关性梳理的基础上,可以将创新城区界定为在城市内部创新创业企业高度集聚的街区空间,包括科研院所、孵化加速器、服务机构等在内的基础要素集聚,具有创新创业企业高度集聚和城市化的生活环境等特征。^①

第一,创新街区需要具备“城市特质”的特性。即复杂性、高密度、文化与人口结构的多样性,新旧事物的层次性,街区化的生活环境。这不仅揭示了创新街区应具备的城市空间特质,而且是其区别于传统研发园区或科技园区的显著标志。

第二,创新主体与服务群体的多样性。既包含大中小型各类创新企业,又包括大学、研究培训机构等。同时,整合金融、消费等服务经济活动,为企业及创新人员提供生产、生活各种需要。这是其区别于传统商务区或创意园区的关键特征。

第三,创新街区是城市内部的高密度城市化区域,拥有丰富的公共空间,强调开放、活力、便捷、可达。

第四,创新街区需要便利的交通和互联网与外界沟通连接。

这四个特征可以归纳为具有包容性、混合性、灵活性的功能空间,具有高密度、共享化、社交化的服务资源,具有高活力、可传承、可辨识的场所环境,具有网络化、便利化、智慧化的公共设施,具体如表1所示:

表1 创新城区的特征

要素	功能空间	服务资源	场所环境	公共设施
特征	包容性:创新主体多元,包括企业、大学、研究机构等。 混合性:设施功能、产业类型、研究领域、土地功能等相混合。 灵活性:空间开放无边界,功能复合弹性	高密度:创新资源高度集聚,包括基础性创新资源以及生产性和生活性服务资源。 共享化:共享空间和设施配置,集技术服务平台与公共创新设施于一体。 社交化:具有便捷的交流平台和场所,吸引人群集聚	高活力:满足创新人群对新潮文化、先锋气息、个性生活的偏好。 可传承:重视本地居民和原生文化的重要作用。 可辨识:具有辨识度的生态化、艺术化的场所环境	网络化:交通、信息等基础设施网络构建联系紧密的协作创新网络。 便利化:扁平、密集、可获得的基础设施网络。 智慧化:最新技术、试验前沿科技、利用智慧设施

2. 创新城区的基本构成要素

创新主体:创新活动的行为主体,包括企业、人才、大学、研发机构、中介服务等机构创新主体,以及产业集群、产学研联盟等创新主体。

创新网络:在企业与企业之间、企业与创新要素(大学、研究机构、金融机构、人才)、政府与企业之间建立起强弱联系网络,一般以政府计划、投资为导向,政策法规为激励,中介服务为桥梁和创新黏结剂,金融机构、大学、科研院所为支撑。

创新载体:维系和促进创新的场所空间和环境。既有交通、信息等基础设施,又有城市文化观念、创新氛围、参与竞争与合作等软环境和公共服务。

创新体制:保障创新体系有效运转,包括激励、竞争、评价和监督等创新机制,以及政策、法律法规等创新政策。

其中,创新主体构成动力源泉,创新网络是关系基础,创新载体是空间支撑系统,创新体制是实现机制。(见图1)

^① 郑德高、袁海琴:《校区、园区、社区:三区融合的城市创新空间研究》,《国际城市规划》2017年第4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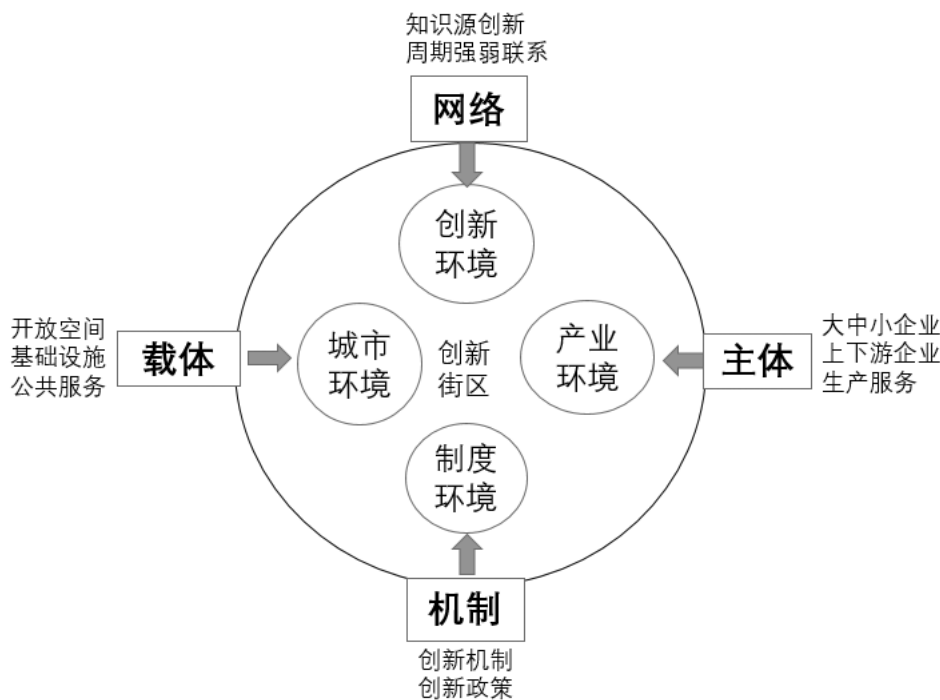


图1 创新城区的基本构成要素

二、我国创新城区建设实践

从全球趋势来看,将创新企业的区位选择与大都市的中心城区复兴联系在一起,打造创新城区正在成为发达国家科创中心转型的重要方式,典型代表包括纽约硅巷、剑桥市肯戴尔广场、伦敦硅环、国王十字车站、巴塞罗那 22@ 街区、苏黎世西区老工业改造区等。近年来,我国少数领军城市的创新创业企业一改以往主要在郊区产业园区集聚的传统路径,转而在中心城区、传统老城区集聚,形成了新的创新发展模式,如北京中关村科学城、上海环同济知识经济圈、深圳湾超级总部基地,等等。尽管名称上有不同,但本质上都是创新城区。本文选择创新源驱动型——上海环同济知识经济圈、全域协同型——武汉创新街区(园区、楼宇)、城市更新型——南京硅巷、科技园提升型——深圳湾园区这四处创新城区来介绍其建设的典型做法。

(一)上海环同济知识经济圈

上海杨浦区依托同济大学优势学科群、学科链,区校联手建设环同济知识经济圈,围绕同济大学优势学科知识外溢形成的产业集群和经济活动圈,知识、人才、产业与城市空间互动发展,形成了开放式的产业空间,重点发展创意和设计产业,国际工程咨询服务业,新能源新材料和环保科技产业三大集群,成为核心大学带动周边区域发展的典型案例,也是我国传统工业城区向知识创新城区成功转型的经典案例。近年来,环同济知识经济圈发展极为迅速,2021 年总产出达到 563.75 亿元,同比增长 13.89%,成为上海市、杨浦区重要的创新经济增长极。杨浦深化“三区融合、联动发展”核心理念,创造了“政府引导、学科支撑、企业主体、市场运作”的产业发展新模式。环同济知识经济圈的发展可借鉴点主要表现为以下四点:

一是将园区建设与城市更新相协同,赋予老社区创新活力。环同济知识经济圈核心区位于老工人新村,发挥内城区优势,深化校地共建,创新社会治理。社区与同济大学合作开展四平空间创生行动,打造以“楼道微改造”“阜新路口袋花园”等为代表的区校合作项目,聚焦社区微更新,用创意点亮社区,用设计文化焕新老旧社区。与同济大学设计创意学院联手打造“NICE2035 未来生活原型街”,改造了1028弄街区,在保留原有绿化面积的基础上,增加绿化区域公共座椅数量,开辟了“公共厨房”和“精品咖啡”,赋予社区趣味与活力,满足社区沟通的需求,吸引多家创意实验室落户。

二是发挥优势学科资源优势,与产业互动发展。同济大学优势学科资源与周边企业形成良性互动关系,大学向企业提供免费讲座、图书资料、实验设备和检测服务、管理培训、专家咨询等,企业为大学提供实习岗位、科研项目、学生创业基金。同济大学积极举办各类活动,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创意城市”(上海)推进工作办公室联合举办环同济设计周,活动包含系列展览及学术研讨会,有效地提升片区的影响力。大学和企业的人才、资金、技术、信息、人脉等创新要素高度黏合,并可根据产业发展趋势调整学科发展布局,形成学科链、产业链、创新链共生的良好格局。

三是加强载体平台建设,完善政策保障。杨浦区政府腾出最好的土地支持同济大学就近就地拓展,持续推进环同济周边载体建设,建设沪东科技园、上海国际设计一场等载体,并打造环同济科研成果转化与技术交易平台、上海自主智能无人系统科学中心转化平台、区块链孵化器、工业设计等产业功能型平台,打造赤峰路、国康路、阜新路、彰武路等特色创意街区,为企业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空间。此外,杨浦区先后出台了多项优惠政策保障片区企业发展,涵盖创新创业、人才引进、金融服务等多方面,并针对不同发展阶段、不同需求的大中小设计企业,形成了完善的政策扶持体系。

四是构建联动机制,推进区校融合发展。区校联动的机制创新为知识经济圈的持续活力提供了保障。第一,区校共管机制。2007年6月,“杨浦环同济知识经济圈管理委员会”成立,作为区、校共同搭建的领导机构和工作班子,委员会负责知识经济圈的管理、协调、指导和推进。第二,多渠道交流机制。在区校之间建立了区校领导定期协商和工作对接机制、区校干部挂职交流工作机制、与院士沟通协商机制,这有利于实现干部队伍对接、重大活动对接、重要决策对接和发展战略对接。第三,持续探索“云端”党课,依托“四济人家”党群服务站开展“午间一小时”等品牌系列活动,以党建联建凝聚民心,打造大学与社区、城区共融的未来生活街区。

(二)武汉创新街区(园区、楼宇)

2016年,为加快推进武汉全面改革创新试验区建设,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产业创新中心,武汉加快实施“创谷计划”,建设融合高端生产生活生态功能、聚集高端创业创新创造要素的创新生态园区。2021年,为支撑武汉建设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武汉推进创新街区(园区、楼宇)建设。从“创谷计划”到“创新街区”,武汉坚持营造全市域、全社会创新创业生态,科技创新对武汉城市能级和核心竞争力提升的支撑引领作用不断强化。武汉建设创新街区(园区、楼宇)的典型做法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坚持全域推进。按照“市级统筹、区级实施”的方式,实行全市一盘棋的行动计划,在创新要素集聚及城市更新需求强烈的中心城区及东湖高新区分别重点打造一个示范型创新街区,在创新要素较少且分散的开发区和新城区分别重点打造多个创新园区和创新楼宇,形成“一区一街、一区多点”全域创新的

空间格局。市级层面统筹推进、全面指导,协调推进重大事项,评估督查重点工作。各有关部门明确分工,强化工作合力。压实区级责任,强化各区目标考核,通过“一区一表”明确各区、各部门年度建设实施的重点任务和考核要求,层层分解压实责任。

二是构建多元主体参与格局。坚持党建引领,建立健全党建联席协商制度,引导各类主体在组织、阵地、资源等方面互联互通。充分利用武汉高校平台优势和强大的校友团资源,使高校不同学科、高校与产业界、创业者与风险资本之间建立联系,培育创新创业环境。依托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武汉理工大学等高校打造环大学(大所)创新街区,如中科·武大智谷、关山创新街区、环理工大创新街区等。充分发挥街道(园区)积极性,推动街道围绕企业入驻、项目申报、周边环境提升等方面为园区提供全方位“定制化”服务和保障。

三是营造热带雨林式创新生态。积极组织各类创新活动和科技创业赛事,实施“以赛代评”等联动创新机制,举办武汉大学生科技创新大赛月度领域赛、季度擂台赛、年度总决赛,为参赛者提供政策指导、金融对接、创业辅导、科技成果转化等服务,打造大学生创新创业最友好城市。创设“东湖论坛”等,培育具有国际影响力、融合科学普及和科技创新的高端论坛。推进科技创新资源与科普资源融合整合,弘扬科学精神,广泛开展群众性示范科普活动,探索“科普+产业”模式,提升全民科学素养。组织全市科技创新亮点工作、重大项目和创新成果报道,组织开展“互学互鉴”行动,持续营造科技创新浓厚氛围。

四是健全科技金融服务体系。围绕科技企业全生命周期,创新金融产品、完善增信机制、优化服务模式,为科技型中小企业“保驾护航”。发挥科技保险和融资担保机构风险分担作用,建立以“科保贷”“科担贷”为核心产品的“2+X”科技信贷服务体系,综合运用政府风险补偿、成本补贴、业务奖补等方式,推动科技贷款发展。设立“武创科技成果转化基金”,并积极争取国家科技成果转化引导基金子基金落地武汉。2021年,由创业孵化载体与科技金融机构共建的科技金融工作站启动设立,为企业提供科技金融产品和服务。截至目前,武汉已设立42个科技金融工作站,覆盖12个城区及开发区,初步搭建起以科技金融工作站为节点的科技金融服务网络。

(三)南京硅巷

2019年以来,南京在鼓楼、秦淮、玄武三个主城区推进城市硅巷建设。硅巷建设秉承“坚持主城区坐标、贯彻无边界理念、解决空心化问题、避免二房东思维”的基本原则,每个硅巷包含“明确一个主导产业方向、依托一家重点院校、形成一个有影响力品牌、集聚服务创新中介机构、打造一个适应创新创业的生活休闲空间”五个基本要素,让这些产业聚集地与居民区融合发展,形成一个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人人创意的区域。至2021年底,南京市备案硅巷载体面积达到143万平方米,集聚高新技术企业184家,培育和引进科技型企业近1400家,产业集聚度超过70%。硅巷已逐步成为主城区创新发展的重要引擎和“创新名城、美丽古都”新名片,三个老城区已成为中心城区创新转型的典型标杆。南京硅巷建设有以下几个要点:

一是与高校院所相融合,强调合作共赢。2018年9月,秦淮区率先启动硅巷建设,通过打破院墙隔阂、融通区内外资源、科创赋能老城复兴,联合南航、中电第55研究所、金城集团等大院大所大企业,成立硅巷党建联盟和工作推进委员会,利用城区特色企业、大学、科研院所创新资源,形成无人机、芯片应用、物

联网、智能制造四大主导产业。鼓楼区依托区内高校资源,通过校地合作,与南大、南工大等多所高校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校地共建研发机构,打造创新资源集聚平台,释放高校创新资源,重点发展软件工程与大数据、金融科技、现代服务业、大健康、文创、教育培训六大产业,真正做到了“学校与政府的合作共赢,在校园里建起了硅巷”。玄武区与南师大、南理工等高校深度合作,重点围绕新一代信息技术、智慧医疗产业方向,推动城市硅巷与环高校知识圈统筹联建。

二是与城市空间相融合,强调空间再造。结合南京老城区特点,南京硅巷建设重点对老校区、老写字楼、老厂房、传统街区乃至棚户区加以整体改造,释放创新空间,嵌入式容纳大街小巷创新创业者,打造集工作、生活、休闲功能于一体的复合空间。在玄武区蒋王庙,南京野生植物综合利用研究院搬迁后留下的老办公楼被打造成骥谷科技产业园。在鼓楼区智梦园硅巷内,政府引入5G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赋能园区建设,已集聚以亚信科技、三百云以及边缘智能研究院为代表的众多科技型企业。秦淮区通过“老厂房+”模式,打造城市硅巷。通过对历史地段、商业地段以及普通地段的存量空间的更新,秦淮、玄武与鼓楼作为坐拥众多文旅资源的历史悠久的老城区变得更加具有吸引力,满足聚集在硅巷的年轻人所需要的有活力、新鲜、有格调的生活环境的需求。

三是与市场要素相融合,强调多方联动。南京老城三区因地制宜的无边界城市硅巷建设,达成了政府、高校、企业三方的深入合作,促进了官产学研协同创新。鼓楼区、秦淮区、玄武区三区还按照“重点突破、示范引领”的理念,将幕府创新区和白下高新区与城市硅巷进行联动,带动全域创新发展,培育多方参与、协同创新的特色生态。而园区与硅巷的联动,间接在鼓楼区、秦淮区、玄武区内部打造了一个创新闭环,即利用硅巷吸引高校创业者与外部创业者,孵化创新企业,待企业发展壮大后,可以搬到空间更大的产业园区,而位于产业园区的大企业反过来则可以带动上下游产业链的集聚,通过企业订单吸引创业者落地硅巷。通过健全科技金融、人力资源、知识产权、技术交易等“双创”服务体系,打造“一站式”创新服务链条,推动“存量空间”释放“增量价值”,城市硅巷成为南京创新生态建设的试验场。

(四)深圳湾园区

深圳湾园区位于深圳湾与珠江出海口交汇处,地处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地带。将城市最好的空间留给创新,体现了深圳对创新的重视。园区的开发运营主体是深投控成立的深圳湾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主要项目均位于南山高新区。园区实行标准化、品牌化、规模化发展,成批量打造具备复合功能和强大聚合力的“高新技术产业综合体”,形成创新创业生态,有效解决深圳产业空间不足和高成本问题,提升深圳的全球科技创新资源配置能力。深圳湾园区主要建设措施有以下三点:

一是精心策划和设计,建设集生产、生活、生态于一体的高科技产业园区。园区建立国际工作坊,创建由国内外专家参与的设计工作模式,采用立体分层设计、垂直城市和混合社区、绿色低碳等设计理念,实现深圳湾园区一流规划设计,多维度打造环境生态优美、产业空间广阔、服务完善便捷、创新要素活跃、新兴产业聚集和高端人才荟萃的现代化高科技产业园。深圳湾科技生态园建设采用多层地表、垂直设计理念,实现楼层互联互通,优化交流空间,辅以设施完备的公寓、酒店、商业等配套空间,有效实现了产城融合的丰富生态。

二是打造创新型公共服务平台,集聚创新机构,打造一流产业生态。园区建成集科技金融、公共技

术、企业管理、人文社区交流四大服务平台于一体的新型运营服务体系,为入园企业提供全链条、一站式的优质便捷服务。利用大数据、云服务等技术手段整合园区运营资源,统筹建设智慧园区统一管控平台,打造以企业专业服务、园区公共服务和员工尊享服务为特色的全新智慧园区运营服务平台。此外,南山区政府与深圳湾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联合共建“政、企、人”三位一体的深圳湾创新广场,具备政务、党建、警务、人才、知识产权、科技金融、公共技术等功能,组成“政务服务大超市”,为企业、员工提供“一站式”便捷高效的综合服务。积极响应深圳市产业引导政策,大力引入符合高新区定位的高新技术企业、研发机构、企业总部等,助推深圳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三是政府实施扶持政策。第一,为园区开发公司提供低成本的土地。政府降低土地的出让价格,以降低园区开发公司的开发和持有成本;通过竞买资格的设定,实现土地的定向出让;为了获得优惠的产业空间,政府提供了多种业态组合的优惠方式。第二,创新土地出让政策,将产业用房和住宅公寓等不同业态打包综合出让,附带产业条件,避免以高周转为目的进行房地产开发。第三,对入园高科技企业进行租金减免。园区投融资项目统一将园区产业用房租金的20%作为减免额度,由市政府产业主管单位对入园高科技企业进行租金减免。

三、相关启示

如何打造具有竞争力、辐射力和综合承载力的强中心城区,是当前一些城市面临的亟须解决的问题,建设创新城区正在成为众多城市推动中心城区加快新旧动能转换、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方式。从本质上看,创新城区是创新资源与产业及城市资源高度集聚融合的城市发展模式,其建设需要坚持“创产城融合”的发展理念,创建资源、产业、空间等各层面协调配合的机制,让创新提振城市产业、激发城市活力,赋予城市新的生命力和竞争力。^①

(一) 优化创新资源配置,加快补齐城区发展动能短板

一是加速多元化创新主体集聚。大力推进大学科技园、孵化器、中试基地、众创空间等多元创新空间载体建设,加大创新人才引进培育力度,打造一批创新社区、创新园区与创新楼宇,吸引研究型大学、科研院所、创新旗舰企业等各类创新机构入驻。发挥高校院所在创新创业方面的积极性、主动性,依托高校和科研院所的优势学科,通过技术输出合作,探索产学研特色创业之路,促进大学校区、产业园区、城市社区“三区”融合发展。

二是加强各类服务平台建设。加强专业化众创孵化载体建设,支持综合性众创孵化机构新建公共技术服务平台,支持高校、科研院所、新型研发机构等多类创新主体建设专业化众创孵化载体。引导大学科技园整合校内技术创新中心、重点实验室、协同创新中心和工程中心等平台科教资源,构建从研究开发、中试熟化到工业化试生产的全链条服务平台。建立创新创业一体化信息服务平台,提供创新产业体系、创新空间格局、创新型企业基本信息、创新创业企业成果展示等信息查询服务。加强科技研发基础设施

^① 樊志宏:《高质量发展主题下超大城市空间治理的三大升维导向——兼论武汉空间规划》,载樊志宏主编《武汉社会科学·总第24辑》,武汉出版社,2022,第1—4页。

引进和建设,搭建提供金融、研发设计、品牌培育、知识产权、检验检测、人才培养等公共服务平台。

三是构建以企业为主体的创新网络。通过技术交流会、工作室、人员培训会、创投互动平台等形式加强创新主体间的专业协作,保障研发要素的合理配置。通过举行社区活动、联席会议、创业辅导等方式,增强高校、企业与社区不同群体间的交流,构建开放型创新城区协同机制。大力开展创新创业活动,如创新创业大赛、沙龙、训练营、大讲堂、项目路演等,激发大众创新、万众创业热情。发挥龙头企业引领作用,一方面促进内生孵化,依托科研团队成果不断产生科技型企业;另一方面引导中小企业聚集,做专价值链的部分环节、部分业务,提高专业化生产、专业化服务和协作配套能力,造就企业科创森林。

(二)推进应用场景建设,促进创新产业集群发展

一是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加大轻工、纺织、机械等优势传统产业的智能化、自动化、网络化改造升级力度,提高食品制造、首饰制造、智能家居、服装定制等与时尚生活密切相关的消费终端产品制造水平。以技术密集型中小企业为主体,致力于打造“专精特新”的都市工业产业集群。加大技术集成和商业模式创新力度,发展网络协同制造、大规模个性化定制、共享制造、智能运维服务等未来产业的细分领域。

二是开放数字化创新应用场景。支持数字孪生、5G、工业互联网、机器人、人工智能、细分领域新材料和智能感知等新产品、新技术落地应用。聚焦商贸消费、金融服务、道路交通、电力水务、智慧城管、市政建设、医疗健康、教育培训、养老服务和文化传媒等应用需求,开放一批制造场景、消费场景、服务场景等多元、多维应用场景,将传统街区、服务业集聚区建设成为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的策源地、首发地、试验场、竞赛场。

三是发展现代服务业。重点发展时尚创意、工业设计、电子商务、信息服务、科技服务、科技金融、人力资源服务、动漫游戏、文化创意等生产性服务业。依托城区高端商业综合体,做优首店经济、夜间经济、假日经济等。利用城市中心的区位优势,发展总部经济、数字经济、商贸经济、消费经济、社区经济。在城市核心位置打造、形成有竞争力、带动力的产业高地。

(三)构建多元开放的创新空间,激发公共空间活力

一是强调土地的混合使用和高密集开发。突破传统城市规划功能分区原则,在局部空间通过合理的用地配比,增加新型产业(工业、商务、研发、商业等)用地、新型生态用地、新型公共服务用地、新型住宅用地等,实现功能复合。目前,不少经济发达城市已经出台了创新型产业用地政策,例如M0、M4、C65以及“M创”“M科”“M+”等。进行“工业上楼”与地下空间挖掘的立体式开发,利用地上地下空间,通过立体连廊、下沉广场等空间形式实现立体空间的分层混合。

二是构建功能复合、高活力的公共交往场所。采用复合化的功能布局模式,形成以商务办公为主的多种功能相互配合的产业新空间。重点在轨道站点核心区,供给立体化、全天候的业态、设施和公共交往空间,建设开放灵活的中庭、屋顶花园以及室外场所,建设步行友好、有归属感的街道,策划创新办公、创客交流、创意展示等各类活动,激发街道活力。协调整合区域资源,强调商业、办公、居住、文化休闲功能的混合,打造“10分钟生活圈”“15分钟服务圈”“24小时生活服务圈”等。

三是推进街区公共创新空间的建设和发展。减少低端产业空间,重视发展包括共享办公空间、孵化器、加速

器和公共创新中心等的办公型公共空间,提高街区对创新型人才和企业的吸引力。推动街道向生活实验室转化,重点围绕美好生活、智能生产、宜居生态、智慧治理等领域,推动沉浸式人工智能街道、创新应用实验室、城市未来场景实验室建设。建设社区型“硅楼”“硅街”“硅园”,通过城市更新与分布式科创空间、高端产业社区建设相结合,提供更加优质的空间环境。

基金项目:武汉市科技局2022年研究项目“武汉市创新街区(园区、楼宇)建设规划(2022—2025年)”。

作者简介:

姚莲芳,经济学博士,国研经济研究院总经济师,研究方向为城市发展、财政金融、产业发展等;

操玲姣,经济学博士,武汉市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武汉市政协委员,研究方向为区域经济、城市经济;

朱耘婵,经济学博士,武汉市社会科学院编辑,研究方向为公共经济学、财政理论与政策。

(责任编辑:吴非)

传统产业园区向创新园区 升级发展路径及对策

朱耘婵

摘要:在创新引领发展战略和旧动能转换的驱动下,传统产业园区正面临着如何向创新园区转型升级的问题。创新园区是指具有“创新”特征的各类园区,集聚多元化高水平创新要素,通过创新源驱动提高研发能力,与高校院所合作形成产学研联盟,构建创新生态体系,形成创新优势。传统产业园区向创新园区升级发展的基本模式包括“园区+创新”模式和“创新+园区”模式,创新园区的升级发展路径可分为发展基础较好的科技园区升级为创新园区、传统工业园区转型为创新园区、环大学街区内布局创新园区、新建创新园区四类。推动传统产业园区向创新园区升级发展,应坚持创新链产业链“双链”融合,推进创新生态服务建设,强化财政金融政策支持,重视高校创新平台及创新人才的作用。

关键词:创新园区;产业园区;创产城;创新生态;城市更新

一、引言

我国已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创新成为引领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引擎,创新园区的理念正逐步在城市更新和建设实践中得到践行。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深入实施,重大创新成果竞相涌现,创新实力整体提升。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强调,“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党的二十大进一步提出,“创新是第一动力”“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统筹推进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北京中关村科学城、上海环同济知识经济圈、深圳湾超级总部基地、南京创新名城、武汉创新街区(园区、楼宇),每座城市的创新核心区建设与发展,背后都反映出传统园区向创新园区转型升级的建设理念:聚焦创新型企业及高校院所等创新主体,聚焦人才和资本为主的创新要素,以构建创新生态体系和支撑创新中心的新空间形态为主线,以科技文化深度融合为核心动力,提升创新发展效率和能级,促进城市高质量发展。在此背景下,本文通过梳理城市创新园区模式及形态的发展演进,重点分析城市创新园区相关概念和特征,从“创产城融合”的发展理念,探讨传统产业园区向创新园区升级发展的具体思路及路径,同时结合武汉市代表性创新园区的实地调研情况,提出针对性政策建议。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在创新引领发展战略和新旧动能转换的驱动下,传统产业园区正面临着如何向创新园区转型升级的问题。2014年,美国布鲁金斯学会提出了“城市创新区”的概念。对于城市创新区的发展演变、概念内涵以及传统园区的转型升级等议题,国内外学者进行了丰富的研究。

国外对于城市创新区的研究大致经历了工业区、科技园区、创新街区(园区)等发展阶段。19世纪和20世纪初,随着制造业活动组织形式创新、能源和交通创新以及快速城市化,工业化和规模经济催生了工业区。20世纪中期,现代技术发展,科技进步、汽车普及推动住房及商业活动的郊区化趋势,催生了科技园区的开发模式,美国以研究园区(research park)为主,而欧洲倾向于科学园区(science park)。这些科技园区位于城市郊区,进行封闭式创新。20世纪90年代,知识经济的到来,促进了知识的共享和传递。21世纪初,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与内城复兴结合在一起的创新街区,成为各国承载创新活动的新型空间载体,凭借“工作—生活—学习—娱乐”四位一体的综合功能,成为吸引高素质人才、有效匹配人和工作岗位、激发创新活力和经济增长的重要空间载体。

我国的城市创新区从功能单一的产业园区、科技工业区逐步演化而来,经历了产业主导期、创新拓展期和现代综合发展期等三个阶段,从20世纪80年代的城郊纯工业园区为主,发展至向科技园区转换,融入创新型产业集群以及创新性集群的特征,目前探索形成学习、科研、生活、创新的一体化空间,突破特定的产业或某类资源生产链的局限。^①从创新空间发展来看,校区、园区和社区是城市创新的主要空间载体,“三区”融合是当前推动城市创新发展的关键动力。^②张京祥和何鹤鸣对创新经济的空间特性进行研究,认为城市创新区的规划重点为柔性管控、创新网络和创意生活。^③

关于传统产业园区的转型升级问题,已有许多学者进行了深入研究,主要集中于对其转型路径的探讨以及产业园区的创新发展问题。一般而言,工业化初期各国积极设立传统产业园区,以实现某一产业功能、促进短期经济增长。在我国,早期经济技术开发区为主要形式。^④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转向高质量发展,城市聚焦创新发展,传统产业园区转向创新园区发展。

关于传统产业园区的转型路径,主要包括以下两类观点:一是从区域或城市整体角度出发,对已有园区进行分类并出台相应的转型战略引导(朱凯等,2013;吴炳怀和王慧莹,2016)。吴炳怀和王慧莹以上海中心城区闸北区现有的50个都市型产业园区为研究对象,通过整合控制性详细规划、存量工业用地转型规划研究和闸北区产业发展规划,提出引导产业园区内涵式发展的举措。^⑤二是针对某一产业园区提出具体功能与空间转型策略(曾振等,2013;韩旭,2021)。曾振等以“产城融合”为目标导向,从功能、产业、生态和实施路径等方面为传统工业园区提供新的发展思路,基于衡水工业园区的案例研究,提出功能复合、工业共生、内生循环和平行互通等规划策略。^⑥

① 屠启宇、邓智团:《创新驱动视角下的城市功能再设计与空间再组织》,《科学学研究》2011年第9期。

② 郑德高、袁海琴:《校区、园区、社区:三区融合的城市创新空间研究》,《国际城市规划》2017年第4期。

③ 张京祥、何鹤鸣:《超越增长:应对创新型经济的空间规划创新》,《城市规划》2019年第8期。

④ 王缉慈、朱凯:《国外产业园区相关理论及其对中国的启示》,《国际城市规划》2018年第2期。

⑤ 吴炳怀、王慧莹:《多重因素影响下的都市型产业园区转型升级规划》,《规划师》2016年第6期。

⑥ 曾振、周剑峰、肖时禹:《产城融合背景下传统工业园区的转型与重构》,《规划师》2013年第12期。

关于传统产业园区的创新发展问题,已有的研究多集中于科技创意产业园区的发展(刘云和王德,2009;李星等,2017;刘阳和李思宏,2020)以及对各类创新空间联动发展的讨论(郑德高和袁海琴,2017;房静坤和曹春,2019)。房静坤和曹春以宁波市镇海区的两大传统产业园区为例,提出“园区+创新”和“创新+园区”两种转型模式,认为创新城区的理念对于传统产业园区的成功转型具有较强指导作用。^①孙卫东指出,价值共创模式与价值共创机制组合,对科技园区内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生态系统运行至关重要。^②创新活动不仅包括科学技术创新,还包括文化创意创新以及服务业创新,地方文化产业对于当地有较强的重要性,有助于优化空间规划、塑造创意都市(Landry,2000)。李星等通过文化价值的观点来研究探讨文创园区的服务创新,认为不同的文化价值通过活动创新,可达到园区内文化价值转换,形成具有其核心价值的文化园区。^③

三、传统产业园区向创新园区升级发展的理论分析

园区是指政府集中统一规划指定区域,区域内专门设置某类特定行业、产业功能或形态的企业并进行统一管理,典型的如产业园区、自贸园区、动漫园区。在我国,产业园区作为区域经济与产业经济的主要平台与载体,曾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不同等级不同类型的开发园区多达数万家。^④然而,随着近些年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发展方式从规模速度型转向质量效率型,发展动力从投资、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相较之下,传统产业园区的弊端逐渐凸显:一是发展方式粗放,企业科技含量不足、创新度不高,缺乏创新资源的导入与集聚,投入产出比与产品附加值偏低,土地资源浪费严重。二是部分园区依赖传统劳动密集型来料加工行业,处在产业链“微笑曲线”的低获利区间,且随着我国劳动力成本的上升,该类产业正逐步通过雁阵模式向东南亚、墨西哥等地区转移,故亟待转型升级,使园区由单纯的加工制造转向更加倚重设计营销环节。三是传统园区往往忽视了环境成本,过去长期的快速发展以牺牲环境与高能耗高排放为代价,随着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推进与能耗双控政策趋严,环境破坏所引致的负外部性将逐步内化为园区企业的经营成本,导致高污染的发展路径难以为继,需要秉持绿色发展理念,加快绿色低碳的创新园区建设。四是部分科技产业园区在关键技术与原材料上面面临“卡脖子”的风险,创新链与产业链融合程度不够,未能形成相关产业集群创新优势,亟须结合新发展格局下自立自强的要求,推动园区打造立足国内的产业链,融入国内大循环,将发展与安全并重。

因此,受制于上述问题,传统园区面临着同质化、低质化、创新度不足、环境约束等窘境,导致大量“僵尸园区”“空心园区”出现,不利于经济的健康持续发展,故需要坚持新发展理念,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要求,加快传统园区转型升级,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强本固基。相较于传统产业园区,创新园区是指具有“创新”特征的各类园区,集聚高新技术企业,通过创新源驱动提高研发能力,与高校院所合作形成产学研联盟,发挥创新优势。同时,许多地方政府也通过“瞪羚计划”、“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计划,培育创新型中小企业,倡导园区内大中小企业的融合发展。创新园区中所包含的创新楼宇是创新空间的基础单元。

① 房静坤、曹春:《“创新城区”背景下的传统产业园区转型模式探索》,《城市规划学刊》2019年增刊。

② 孙卫东:《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生态系统构建、价值共创与治理——以科技园区为例》,《当代经济管理》2021年第5期。

③ 李星、邱文宏、张佩瑶、纪慧如:《探讨文创园区之服务创新:文化价值观点》,《宏观经济管理》2017年第S1期。

④ 李继凯:《产业园区发展模式需要全面创新》,《经济参考报》2018年1月17日第6版。

（一）创新园区的特征

第一,产业组织逻辑方面,从生产链到产业链与创新链“双链”融合发展。传统产业园区的产业组织基于产品的生产链,园区基于某一主导产业,汇聚同一产业领域的企业,以生产制造为中心,来进行上下游的合作和延伸。而创新园区转变为以创新活动为中心,通过创新园区的辐射和带动形成区域产业创新链条。从创新链的上游出发,创新园区中的产业选择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产业创新链条上游的基础研究及应用研究成果,下游创新链条已经不再局限于过去单一垂直的产业领域,推动产业链与创新链深度融合匹配。

第二,空间组织逻辑方面,从生产导向到人本导向。传统产业园区往往与城市分割,在进行空间规划时出于成本等因素考虑,忽略了生活、生态的基本功能,导致产业园区主要承担生产功能,存在产业功能与城市功能分离的弊端,影响了工作者的生活质量,同时也造成了资源能源的浪费。创新园区空间的配置和发展理念转变为人本导向,重视园区中个体的工作学习、互动交流、生活娱乐等各方面的需求,在空间配置上更为混合和多元化。在功能布局上,全面融入城市更新与创新城区的建设,通过“融产于城”补足配套功能,推动园区与周边区块的功能共享,充分融入园区的功能网络中。

第三,空间环境营造方面,形成利于交流互动的公共开放空间体系。传统产业园区一般较为封闭,与外界交流较少,大尺度的生产空间导致公共共享空间的营造缺乏。创新园区的空间营造则向开放、交流、舒适的创新空间转变,以创新人才为核心,增加互动共享空间和公共会议室,为园区内不同行业、不同领域以及不同企业创新人才的密切合作提供便捷的环境,有助于激发创新人才的活力,促进多元跨界融合。

（二）传统园区向创新园区升级发展的功能定位

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背景下,依托各类国家重点实验室及数字建造、智能数控等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创新平台载体,主要城市充分发挥科教人文资源,推动传统园区向创新园区升级发展,深化全域创新,强化内生发展动力,推动城市更新。传统园区向创新园区升级发展的功能定位在于:推动各类创新要素和人才集聚,建设创新平台与公共服务平台,发展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四新经济”,将创新园区打造成要素集聚的高密度创新复合空间、配套服务齐全的创新活力场所、产业转型升级的创新助推器、市场运作的多主体创新共同体。

一是要素集聚的高密度创新复合空间。创新园区不再是单一要素的空间载体,而是多元化高水平创新要素集聚的高密度复合空间,其汇聚的不仅是不同领域的创新人才,还包括大院大所大企、国内外知名孵化器、加速器、校友基金、科创服务与商业配套等各类要素。

二是配套服务齐全的创新活力场所。创新园区是集工作、学习、生活、休闲于一体的创新活力场所,以创新为核心特质,具有多功能、综合性等特点。创新街区应具有良好的教育、医疗、文体等服务供给条件,配备住宅、文化娱乐设施、公共社交场所、特色休闲餐饮店等公共服务设施,激发创新人才的活力与创造力。

三是产业转型升级的创新助推器。创新园区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深度融合,实现从研发到转化再到产

业化的全链条创新,提升创新链对产业链的支撑和引领能力,实现产业链的优化升级。培育高新技术企业、孵化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催生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促进传统产业升级、新兴产业发展。

四是市场运作的多主体创新共同体。创新园区以及其内部的创新楼宇通常实行市场化运作与商业化管理,充分发挥市场力量和创新积极性,而政府主要发挥规划引导、政策支持及服务保障作用。通过股权等方式激励企业、高校、院所、社会化资源积极参与创新街区建设,打造全要素集聚的多主体创新共同体。

(三)传统园区向创新园区升级发展的基本模式

1. “园区+创新”模式

“园区+创新”模式的主要特征在于,其以传统的发展基础较好的产业园区作为基础,整合吸纳周边区域的创新资源,导入各类优质创新要素,畅通创新网络,从而放大园区的集群创新能力,在此基础上,形成其在该区域内创新的“龙头”引领作用。这种模式主要聚焦产业化生产以及最终的市场和消费者,形成以创新链下游为核心的企业创新集群。

根据上述转型发展思路,充分发挥已有的制造业等主导产业的先发优势,围绕园区内核心龙头企业,在产业链的垂直网络上加强与上下游的联动,在创新链的水平网络上推动与相关创新型企业的协同与协作创新,对园区内的传统低端产业和落后产能,使其借力数字化、智能化转型,通过数字化等先进理念和技术赋能使其形成新的发展动能。同时,积极引导龙头企业及其研发机构、先进实验室等科创资源、创新平台入驻园区及其周边。“园区+创新”转型模式下的空间优化,重点在于强化园区与周边配套区块的联系,改变园区、城区隔离的现状,实现创新、产业与城市发展的相互促进。

2. “创新+园区”模式

“创新+园区”模式则是以区域内的创新主体为主导,而园区主要提供相应的辅助配套功能,通过转型和功能的完善,实现“创产城融合”。该模式主要聚焦基础研究、应用研究的创新成果研发及转化应用,形成以创新链上游为核心的科研创新圈层。

根据“创新+园区”模式,紧紧围绕园区附近相邻的高校、大院大所大企等创新主体的优势创新领域,重新布局科创产业的发展重点和细分领域。园区应以打造开放式产业空间为目标,推进与周边地块的一体化建设,加强科技成果的孵化,建设中试转化基地,引入科技金融、数字化等服务,加强教育培训、知识产业保护、法律中介等科技创新服务,优化园区及周边的居住生活环境,提高配套服务、公共服务质量,促进创、产、城深度融合。不同于“园区+创新”模式向外延伸和整合,“创新+园区”模式的空间优化重点是园区内部空间的提质改造。

四、创新园区升级发展的现状及问题:基于武汉的调研

(一)发展现状

从东湖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国家创新型城市试点、国家全面改革创新试验区到东湖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再到支持建设武汉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国家科技创新中心,武汉一直是国家区域创新战略的重要承载区。以创新园区为重要抓手,武汉充分发挥创新驱动作用,加快推动产业链与创新链深度融合,

全力打造创新涌动的新时代英雄城市,为建设国家中心城市提供有力支撑。

武汉市研发投入持续增加,科技创新平台建设加快,产业链与创新链融合发展的根本保障与重要依托逐步增强,这些有助于创新园区的升级发展。在软件和信息服务业、移动互联网、大健康和生物医药等领域创新链与产业链初步融合,形成对产业发展的支持。如光谷软件园汇集国内外龙头企业,以核心技术、关键产品、创新能力、营销网络等为依托,增强对软件和信息服务业产业链供应链上下游资源的整合能力;小米、腾讯等多家数字经济企业在武汉设立华中总部或“第二总部”,承接企业的新业务板块或者研发中心,持续加大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及市场化应用力度;全市集聚医药、医疗器械及生物技术研发企业4000余家以及同济、协和等多家三甲医院,拥有大健康领域院士21名,每年培养相关专业人才5万余名,从基础研究环节开始致力于核心技术和医药研发,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及产业化。

从发展特征来看,传统产业园区向创新园区升级发展路径可分为独立发展基础较好的科技园区升级为创新园区、传统工业园区转型为创新园区、环大学街区内布局创新园区、新建创新园区四种。武汉市规划建设“创谷”作为独立发展基础较好的科技园区,着力引进优质企业、研发平台、技术服务、投融资机构等,以良好的产业集群环境,带动人工智能、智能制造、移动互联网、文化创意、生物医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高速发展,培育和孵化具有专业化、特色化、创新性的项目。开发区的传统工业园区具备一定的产业资源,在此基础上导入核心创新资源与关键技术,推动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促进先进制造、新兴产业集群化发展,推进智能制造、绿色低碳转型,打造特色化的细分领域园区品牌,并且增加跨界交流的开放空间,充分融入文化创意元素,对现存的老旧工业建筑进行改造再利用,形成文创园、科创园、配套人才社区等业态。环大学街区内布局的园区利用高校的科教资源优势为园区企业和产业的发展提供有力支持,形成“众创空间—孵化器—加速器—产业园”的孵化链,围绕创新创业要素构建了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服务体系。新建创新园区一般满足以研发设计为主的初创服务型或以产学研一体化为主的研发生产型企业的需求,打造产学研孵化中心、产业综合服务中心、中试研发基地、高端智造基地、青年活力配套服务区。

(二) 发展问题及制约因素

纵观武汉创新园区的现状,在传统园区向创新园区的升级发展中仍存在以下问题和制约因素:

第一,创新空间功能服务有待完善。开发区早期建设的传统产业园区存在硬件设施老旧、与周边区域的连通性差、基础配套单一等问题,部分新建空间公共设施尚不健全,商业、娱乐、居住、生活服务等功能配套有待完善。城区空间在城市高速增长过程中同质化明显,产业差异化、功能特色化不够,双链融合和产业黏性不足,无法满足人才或企业深层次需求,导致部分园区优质创新源头减少、科技企业及人才加快流失。

第二,运营管理机制有待突破。目前,土地供应大多是按细分用途分别供给,导致创新空间内商业办公楼、配套设施、住宅等的开发者可能各不相同,存在闲置、低品质空间,难以形成集聚型产业空间。开发区园区的工业用地改变用途的遗留问题待解决。在区域功能空间建设或改造时,各方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需要统筹和平衡。同时,创新空间运营团队存在运营能力不足或经验缺乏的情况,资源链接能力有限,创新资源交流共享不足。

第三,科技型龙头企业数量和能级不足,创新链和产业链融合匹配程度有待提升。现有的许多科技型企业为办事处和职能部门公司,且整体数量较少,企业规模和能级均不高。创新链和产业链融合匹配

度有待提升,尚未形成创新平台、组织等创新融合网络,产业深度服务平台有待搭建。部分支柱产业仍受困于关键技术“卡脖子”,多数新兴产业集群产业在创新链条建设方面有所欠缺。

第四,成果转化方面,存在关键共性技术的先进性与产业化不足等问题。部分机构专业化服务能力不足也导致部分高校院所的科技成果转移转化遇阻。此外,科创类企业亟须相关科技服务业在市场信息服务、金融服务、产品投产、贸易服务等方面提供服务支撑。

五、传统产业园区向创新园区升级发展的政策建议

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背景下,创新园区的理念正逐步在城市更新和建设中得到践行。推动传统产业园区向创新园区升级发展,有助于深化全域创新,强化内生发展动力,推动城市更新。创新园区集聚多元化高水平创新要素,通过创新源驱动提高研发能力,与高校院所合作形成产学研联盟,推动生产、生活、生态“三生融合”,实现创新、产业与城市发展的相互促进。推动传统产业园区向创新园区升级发展,应坚持创新链产业链“双链”融合,推进创新生态服务建设,强化财政金融政策支持,充分发挥创新平台及创新人才的作用。

(一)坚持创新链产业链“双链”融合

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围绕创新链布局产业链。围绕智力资源密集区、创新产业集中区规划布局创新园区,科技创新与产业发展紧密结合、协同联动、互促提高,差异化、精准化定位不同类型园区的产业导向,打造热带雨林式创新生态圈。充分发挥优势产业体系集群发展的优势,贯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通过构建协同高效的产业链,推动相应创新链发展,进而有力地支撑不同环节产业链的发展。强化企业创新链产业链主体地位,发挥头部企业、龙头企业的示范引领作用,培育一大批有核心竞争力的高新技术企业,推动“政产学研金服用”高效协同,提供充足的创新动力源。推进绿色低碳循环发展,引导传统园区绿色升级改造。新兴制造产业具有生产设备重量较轻、生产过程中产生震动小、空间需求小但技术含量与亩均产出高的特点,可引入企业在高层楼房中进行工业生产的新型产业空间模式,有力地推动“双链”融合。

(二)推进创新生态服务建设

以创新理念营造创新生态,加强创新园区内公共创新空间的建设,提升园区产业服务、公共服务及配套服务能力,形成创新氛围浓厚、具有品牌影响力的创新生态环境。应重视包括共享办公空间、孵化器、加速器和公共创新中心等众创空间的发展,促进传统园区、老厂房等低效载体转型升级,结合创新创业、创意人才的需求沿巷纵深布局休闲文化、医疗教育等生活服务业态。积极盘活存量资源,通过城市更新与分布式科创空间、高端产业社区建设相结合,提供更加优质的空间环境。围绕双创体系、产业孵化等核心领域,吸引国内外知名孵化器、平台型研发机构和校友会入驻,聚合优质创新项目资源,聚焦行业领域的领军企业、独角兽企业;坚持服务赋能,鼓励成立创新实验室、技术展示中心、认证检测中心、共性技术服务平台,完善针对入驻龙头企业行业领域独特需求的投资、研发、贸易、交流等公共服务平台,打造更完善的创新生态体系。

(三) 强化财政金融支持政策

在财政政策上,积极使用“以奖代补”“先建后补”等更为灵活的补贴和激励方式,将政府认定的创新园区纳入“双创”税收优惠政策适用范围,并且根据不同园区的特征,出台相应的补贴政策 and 设立专项资金,充分调动各方参与的积极性。对于创新园区新增财政收入给予一定的税收返还,支持园区基础设施建设和制造业项目转型升级及绿色改造,针对科技型中小微企业和创新创业团队购买科技服务发放创新券,对于高校科研院所拿出自身载体用于产业集聚等给予相应的政策支持。在金融政策上,强化科技要素和金融资本的对接,以科创基金作为重要抓手,建立天使基金、产业基金与科创基金的协同机制,探索建立金融支持科技型企业全生命服务周期模式。鼓励风投创投支持创新创业,构筑线上线下融资新平台,建立金融服务超市,为银企搭建“信用桥梁”,为创新型中小企业融资赋能。支持产业园区盘活存量资产,依法合规开展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试点,进一步扩大信用贷款和知识产权质押贷款试点,加快落实“科技创新再贷款”政策。

(四) 充分发挥创新平台及创新人才的作用

聚力创新平台建设,打造高质量的原创技术策源地。重视高校、国家重点实验室、重大科技项目等创新平台在园区升级发展中的创新源动力作用,整合并充分利用现有创新资源,优化高校、院所与创新园区的布局,全面保障科创产业的发展。鼓励高校、院所、科技企业在优势学科群建设、科研仪器设备共享、创新人才培养等方面加强合作。大力支持科研成果转化应用,对应用前景好、具有重要价值的优秀成果给予资金支持。聚焦创新园区升级发展,加强科技、经营管理、知识产权及金融服务等各行业专业化人才队伍建设。面向全球引进领军人才,对全球顶尖人才和团队给予量身定制的支持,实行国际通行的工作体制,建立与国际接轨的人才薪酬体系。对园区内重点领域高端创新创业团队进行专项补贴,提供全方位、高效的专项服务,对促进园区发展有重大贡献的团队和人才给予表彰和专项奖励,给予入选国家级、省级、市级各类人才计划的青年人才配套资金支持,探索高端人才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在创新园区适量规划并混合布局居住功能空间,为各类人才提供良好的居住环境和公共配套设施。

基金项目:2022年度武汉市社会科学院重点课题子课题“传统产业园区向创新园区升级发展研究”(项目编号:ZD2022004-1)。

作者简介:

朱耘婵,经济学博士,武汉市社会科学院编辑,研究方向为公共经济学、财政理论与政策。

(责任编辑:周阳)

人工智能与 ChatGPT 前景展望

刘禹良

摘要:人工智能已成为当今信息时代的核心技术,ChatGPT 是一种基于认知计算和人工智能的语言模型,经过了机器学习、神经网络以及 Transformer 等多类技术的积累,使得计算机能够更好地理解和处理人类自然语言。受益于更大的模型尺寸、更先进的预训练方法、更快的计算资源和更多的语言处理任务,ChatGPT 在人工智能生成内容领域的表现是革命性的,将对文本乃至多模态的 AIGC 应用具有重要意义,几乎可以广泛应用并赋能各行各业。但是,ChatGPT 还有较大局限,只是基于预存知识和模型回答问题,还不具备真正的理解能力和创造性,尚未达到强人工智能水平。

关键词:人工智能;ChatGPT;历史沿革;应用前景

过去 10 年来,人工智能技术(AI)在持续提高和飞速发展,并不断冲击着人类的认知,越来越广泛应用于多学科领域和实践活动,为数字经济的发展和产业数字化转型提供了底层支撑,并在自然语言处理、计算机视觉、推荐系统、预测分析等各种应用场景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现今火爆的 ChatGPT 就是人工智能技术的一个较大飞跃,是一个可以像人一样对话的强大智能系统。本文重点分析其历史沿革、应用现状,及其背后的技术原理、存在局限和未来展望。

一、人工智能发展历史沿革

人工智能是计算机学科的一个分支,是研究、开发用于模拟延伸和拓展人的智能的理论、方法、技术及应用系统的一门新的技术科学,致力于研究如何创造智能机器,模拟人类的思维和行为,并执行类似于人类的任务,例如:理解语言、识别视觉图像、解决问题、学习等。

(一)人工智能领域

人工智能主要分为四个领域:感知、推理、学习和行为。感知领域的人工智能体现为计算机视觉、语音识别、自然语言处理等方面;推理领域的人工智能体现为逻辑推理、规划、决策等方面;学习领域的人工智能体现为机器学习、深度学习、强化学习等方面,即能够从现有场景、现有知识中不断学习和不断强化,更好应对真实场景中的各种情况;行为领域的人工智能体现为机器人、智能控制、自动驾驶等方面。

最新的人工智能技术主要包括机器学习与模式识别。机器学习研究如何通过计算的手段,通过经验

(数据)来改善系统自身的性能。模式识别就是用计算方法分析和处理数据、图像、信号、语音等信息,以自动识别和分类其中的模式和规律的技术。深度学习是机器学习的一个子领域和比较新的研究方向,也是 ChatGPT 主要依赖的一个技术。它是基于人工神经网络的理论和方法,通过多层次的神经网络模型来学习和表达数据中的高层次抽象特征,以实现自动化的分类、识别、预测和决策等。

ChatGPT 在人工智能里面属于自然语言处理类,即主要研究如何使计算机更好地理解 and 处理人类自然语言。更严格地说,它是自然语言处理、机器学习和计算机视觉相互交叉的领域。这些领域互相关联、相互促进、相互支持,共同推动了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和应

(二)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历程

人工智能的发展是从 1956 年达特茅斯会议上提出人工智能研究开始的,到 2006 年,Geoffrey Hinton 提出 DBN(Deep Belief Networks,深度信念网络)引领深度学习的崛起,截至今日,人工智能的发展已有 60 多年的历史。过去 10 年来,人工智能技术在持续提高和飞速发展,并不断冲击着人类的认知,产生了一系列的 AI 产品。

2012 年,在 ImageNet 图像识别挑战赛中,一种神经网络模型(AlexNet)首次展现了明显超越传统方法的识别能力。2016 年,AlphaGo 在应用人工智能系统模拟的围棋挑战赛中战胜了世界冠军。2017 年,谷歌的 Ashish Vaswani 等人提出了转换器模型深度学习新模型架构,奠定了当前大模型领域主流的算法架构基础。2018 年,谷歌提出了大规模双向预训练语言模型,参数首次超过了 3 亿(约有 3.4 个参数);OpenAI 提出了生成式预训练转换器模型——GPT(Generative Pre-trained Transformer,预训练生成转换器),大大地推动了自然语言处理领域的发展。2019 年,人工智能系统 AlphaStar 击败了世界顶级的星际争霸 2 人类选手,有力地证明了人工智能能在复杂任务领域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2020 年,模型参数约 1750 亿的 OpenAI GPT-3 问世,在众多自然语言处理任务中表现出超过人类平均水平的能力。2021 年 1 月,谷歌大脑发布了 Switch Transformer 模型,以高达 1.6 万亿的参数量成为史上首个万亿级语言模型。2022 年 2 月,人工智能生成内容技术被《MIT Technology Review》评选为 2022 年全球突破性技术之一;11 月,OpenAI 推出 ChatGPT,迅速出圈火遍全球,仅用时不到 3 个月就实现了月活跃用户过亿,成为史上用户增长速度最快的消费级应用程序。

(三)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浪潮

近几年,自动生成一幅画、生成一段对话等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AIGC)逐渐发展成为各个行业的创新驱动力。目前,AIGC 的发展历经了三大阶段。20 世纪 50 年代至 90 年代中期为早期萌芽阶段,当时受限于技术水平,AIGC 仅限于小范围的实验。20 世纪 90 年代至 21 世纪 10 年代中期为沉淀积累阶段,AIGC 从实验性向实用性转变,但是受限于算法瓶颈,并不能够直接用于内容生成。21 世纪 10 年代中期至今是快速发展阶段,由于深度学习算法不断迭代,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开始百花齐放,包括生成人脸、生成各种各样的图片,以及跟人类对话等。ChatGPT 是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佼佼者。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提高,ChatGPT 作为一种先进的语言模型,受益于更大的模型尺寸、更先进的预训练方法、更快的计算资源和更多的语言处理任务,可以广泛应用并赋能各行各业。

二、ChatGPT 的应用现状

ChatGPT 一经问世就在社会上引起了空前轰动,大到央视、主要搜索引擎、重点论坛,小到公众号、微信朋友圈等,均在热议。事实上,ChatGPT 在现实工作生活中已有一些成熟而广泛的应用。

(一) ChatGPT 已能覆盖较多能力域

目前,已有一些利用 ChatGPT 的典型案列。例如,ChatGPT 通过谷歌 L3 入职面试,获得年薪为 18 万美元的 offer;ChatGPT 碾压阿里二面面试官,并拿到 offer;ChatGPT 参加美国医生执照的三项考试,考试成绩可以达到或接近及格通过水平;ChatGPT 在法律领域的表现更加优秀,研究发现它可以取得美国多州律师考试的及格分数;毫末智行准备将 ChatGPT 应用于自动驾驶;ChatGPT 上线微软搜索引擎 Bing,微软市值一夜飙涨 5450 亿;89% 的美国大学生用 ChatGPT 写作业,甚至拿下论文最高分;以色列总统使用 ChatGPT 撰写的部分演讲稿“骗过”现场 2 万听众等。这说明 ChatGPT 对于消费者来说有趣而又实用。

事实上,ChatGPT 可以扮演医生、翻译员、程序员、心理咨询师、历史学家、专业导师、作家、诗人等生活中各种各样的角色。例如,问武汉为什么叫武汉,它可以从武昌到汉阳、汉口再到每个字的来源进行解释。让它给武汉写一首诗,它的回答是,“长江第一城,工业之都,资源丰富;科技先进,人杰地灵,文化显赫;前程远大,未来灿烂,光辉不灭;华中之地,明珠长江间,美景令人惊叹;繁荣昌盛,富强之城,前途无限;武汉永驻,中国的骄傲,繁华静谧!”。而且,ChatGPT 可以根据用户定制化的要求,得到更为精确的答案。例如,在广告宣传和文案制订方面,只需要告知销售目标、针对受众、宣传口号、媒体渠道、相关活动等关键性信息,它就能自动生成一份像模像样的广告文案。具体请求越清楚,得到的回答就会越精准。比如,可以问它,“请设计一个针对 18~30 岁的年轻人的一种新型能量饮料的广告活动”。在问完一个问题之后,如果觉得它回答得不够具体,还可以接着再问。比如,如果觉得它给出的建议或做法是对的,可以追问下一步具体应该怎么做。然后 ChatGPT 就可以继续给出更深更进一步的详细建议或计划。由于 ChatGPT 强大的过滤能力,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过滤掉大量无用信息,直接把最合适的答案推送出来,从而使搜索引擎变得更加强大。目前 ChatGPT 已经被嵌入 Google 的 chrome 里面,每一次搜索结果出来的时候,它同时会根据搜索内容给出一些建议。

(二) ChatGPT 表现出的先进性和风格特性

ChatGPT 的先进性主要表现为五个方面,即承认不知道、连续对话能力、捕捉用户意图、敢于质疑、提升准确性。它对用户非常友好,易于操作,回答风格具有八个特性。可靠性,通常在倾向性不明显的问题上,它能给出客观正确的回答;能够对回答进行解释;对于不确定的回答,明确告知用户。灵活性,对于同一个问题,ChatGPT 每次都能给出不同的回答,不会千篇一律,跟人类回答问题时的随机发挥很相似。可控性,对于定制化的需求,ChatGPT 可以通过简单的提示语来实现。例如,可以通过指定字数、指定特定的风格等要求,来生成符合要求的内容。这种定制化的功能可以帮助用户更好地控制模型的输出。快速性,基本上对于任何需求,它都可以在极短时间内生成大量的文本输出,提高工作效率。多样性,该模型是在海量的各种文本语料上训练出来的,这意味着它可以对许多不同主题的广泛提问和查询作出回应,

这使得 ChatGPT 有潜力成为不同行业人员的一个有用工具。记忆性,它具备较强的记忆力,可以准确回忆对话过程涉及的内容。适应性,能进行逻辑推理,总结对话的内容,发现对话的错误,从而给出符合上下文内容的合理答案。屏蔽性,它对于危险信息,例如一些针对具体人物的评论,一些政治敏感的话题等具有十分强大的规避能力。此外,还很可能具有一定程度的情感属性。如果用户不停地否定 ChatGPT 的查找内容,ChatGPT 可能会崩溃,表现出一些负面情绪,会像有脾气的人一样直接拒绝回答。以前的大规模语言模型式人工智能技术,虽然在一些任务上表现得很好,但是它没有办法做到像人类一样思考,尚不具备类似人类心智的能力。但现在的 ChatGPT 不一样了,实验证明它已经能够通过大量的人类心智问题考验,而且它的心智相当于一个 9 岁的小孩。

(三) ChatGPT 对话武汉如何发展数字经济

通过一个典型案例可以进一步了解 ChatGPT 的应用现状。就武汉如何发展数字经济向 ChatGPT 提了 5 个问题。一是,ChatGPT 在数字经济领域的应用场景。它的回答是:ChatGPT 可以作为金融服务领域的客户支持机器人、电商推荐系统,帮助用户完成数字资产交易,预测虚拟货币价格走势,成为数字钱包的语音操作系统……最后还补充一下,常见应用场景不限于此,未来还会进一步拓展。二是武汉市数字经济目前的发展态势。它的回答是:产业基础较为完善,产业协同效应逐渐显现,政策支持力度大,数字化转型进展顺利……总的来说,态势良好,但数字化转型、产业协同等方面还存在挑战。三是武汉发展数字经济的优势与不足。它的回答是:优势是地理位置优越、优秀的高校和研究机构、丰富的数字经济基础设施、大量的优质企业……不足是落后的行业结构、人才流失、融资渠道不畅、产业链配套不足……四是武汉市出台的数字经济发展政策。它的回答是:近年来出台了一系列数字经济发展政策,包括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扶持数字经济企业发展、加强人才引进和培养、推动数字化转型升级、加强数字经济平台建设、加强政策引导和监管……五是从哪些方面争取数字经济发展主动权。它的回答是:从推动信息技术和数字产业创新、打造数字基础设施、加强数字人才培养、推动数字政府建设、加强数字经济国际交流与合作等多个方面入手……综上可见,ChatGPT 充分展现了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强大能力。

三、ChatGPT 的技术原理

ChatGPT 是一种基于认知计算和人工智能的语言模型,它经过了机器学习、神经网络、Transformer 等多类技术积累,建立了针对人类反馈信息学习的大规模预训练语言模型,从而能够实现人类的意图。

(一) ChatGPT 是以往模型迭代进化的结果

ChatGPT 使用了 Transformer 架构和预训练生成式转换器(GPT)。GPT 训练的模型是一种应用于自然语言处理(NLP)的模型,它通过使用多层 Transformer 来预测下一个单词的概率分布,以生成自然语言文本。这是通过在超大型文本语料库上训练学习到的语言模式来实现的。从 2018 年拥有 1.17 亿参数的 GPT-1 到 2020 年拥有 1750 亿参数的 GPT-3,OpenAI 的语言模型智能化程度明显提升。随着模型的不间断增大、生成模型的不断改进,以及自监督的不断完善,GPT 的语言处理能力和生成能力得到了显著提升。在 2022 年 11 月,ChatGPT 模型正式发布,增加了聊天属性,具有更大的语料库、更高的计算能力、更

高的准确性、更高的适应性和更强的自我学习能力,各方面能力都有显著提升。

(二) ChatGPT 是核心技术不断积累的产物

ChatGPT 的成功离不开多类技术的积累,其中最为核心的是 RLHF,以及 SFT、IFT、CoT 等技术,通过强化学习、思维链、突现能力、指令微调、人在回路等功能,提升了其理解人类思维的准确性。

RLHF(Reinforcement Learning from Human Feedback,从人类反馈中强化学习)方法是一种基于人类偏好的强化学习方法。它可以根据人们的喜好或对话代理回答的评价来对对话代理的回答进行排序,例如通过考虑人们喜欢的内容来选择文本摘要。这些评价的回答用来训练一个喜好模型,该模型告诉强化学习系统如何评价回答的好坏。最后,通过强化学习训练对话代理来模拟这个喜好模型。整个训练过程包括对 GPT-3 进行监督微调,然后训练奖励模型,最后通过强化学习优化 SFT(第二步和第三步可以多次迭代循环)。SFT(Supervised Fine-Tuning,监督微调)模型是一种预先训练的语言模型,经过对少量标签者提供的演示数据的细微调整,以学习一个监督策略,可从选定的提示列表生成输出。

ChatGPT 采用基于指令微调(Instruction Fine-Tuning,IFT)的技术来模拟人类的聊天行为。IFT 是一种能够追踪、学习和复述聊天会话历史的技术,并将其应用于实时会话中对自然语言进行建模和推断。该方法除了使用情感分析、文本分类、摘要等经典 NLP 任务来微调模型外,还在非常多样化的任务集上向基础模型示范各种书面指令及其输出,从而实现对基础模型的微调。由此,ChatGPT 能够发挥较大的自由度,提供更多样化的自然回复,玩家们可以与机器人无缝对话,体验自然聊天的乐趣。IFT 还能够帮助 ChatGPT 进行语法检查,避免出现重复或无意义的语句,从而提升会话体验。

CoT(Chain-of-thought,思维链)技术由谷歌在 2022 年 1 月提出来,目的是使大型语言模型能够更好地理解人类的语言请求。它通过在对话过程中不断提供上下文信息,来帮助模型理解语言请求的内容。这种技术可以使模型更准确地回答问题,并且可以帮助模型在处理复杂的对话任务时变得更加灵活。

(三) ChatGPT 仍然存在较多局限

虽然 ChatGPT 在许多行业都存在广泛的应用前景,但它并不能在所有行业中都得到应用。例如,在一些基于数字化的工业生产过程中,可能不需要使用自然语言处理技术。还有法律限制、数据隐私等一些因素也可能影响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在某些行业中的应用。目前 ChatGPT 存在的局限性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是专业性问题。对专业领域的深入程度不够,ChatGPT 生成的内容可能不够合理。ChatGPT 也存在潜在的偏见问题,因为它是基于大量数据训练的,所以可能会受到数据中存在的偏见影响。

二是安全性问题。它可能被恶意利用,产生严重的安全隐患及法律风险。同时,它的答复尚不明确是否具有知识产权。

三是个性化问题。ChatGPT 倾向于讨好提问者,生成的文本可能不够个性化。例如,让 ChatGPT 列出最好的三所大学,答案是“清华、北大、上海交大”。但如果告诉它“我来自华中科技大学,请重新排名”,它可能会将华中科技大学排在第一位。

四是常识性问题。ChatGPT 有时会一本正经地胡说八道,犯常识性错误。例如,罗切斯特大学罗杰波教授发现了一个问题,询问它“刘邦如何打败朱元璋”,它会给出荒谬的回答。这也是目前发现的普遍问题,即

ChatGPT 会对于不知道或不确定的事实,强行根据用户的输入进行主观猜测并一本正经地胡说一通。

五是解释性问题。有时候,它的回答看似合理,但是无迹可寻,无法迅速判断其回答是否正确,导致在一些需要精确、严谨的领域难以应用。

六是成本性问题。ChatGPT 训练和运行需要花费高昂的算力成本,如果计算资源不足或算力成本过高,就难以很好应用普及。

七是更新性问题。ChatGPT 无法在线更新知识。目前的范式中要增加新知识的方式只能通过重新训练预训练 GPT 模型,这会耗费巨大的计算成本、时间成本。

四、ChatGPT 的应用前景

目前,谷歌、微软、亚马逊等著名的国际科技公司都高度关注 ChatGPT 的发展并寻求利用它来提升自身的竞争力。国内涌现出复旦大学 MOSS 大模型、百度“文心一言”、科大讯飞“星火认知大模型”、阿里“通义千问”、华为“盘古大模型”、商汤“日日新 SenseNova”、毫末智行“DriveGPT”、“360 智脑”等众多 AI 大模型产品。未来 ChatGPT 相关技术势必成为国内外科技巨头的必争之地。未来以 ChatGPT 为代表的人工智能技术不断发展,将更好地赋能各行各业,提升智能化水平。

(一)ChatGPT 赋能各行各业

在办公自动化方面,ChatGPT 可以协调会议日程,编辑会议纪要,参与会议讨论,提供灵感思路,辅助企业决策;根据用户的语言提示自动编写电子邮件,处理 Excel 表格,制作 PPT,书写汇报总结,润色文章;辅助产品经理和软件工程师进行项目管理、需求分析、代码生成、技术问题解答、API 文档编写等。

在电子商务方面,ChatGPT 可以成为一名优秀的客服代表,为用户提供快速、准确和人性化的服务,提高用户满意度;根据用户的历史浏览记录和兴趣,进行智能推荐,提高用户忠诚度;理解用户的意图,让用户使用自然语言来搜索产品或服务,提高用户体验,增加购买意愿。

在机器人应用方面,ChatGPT 使机器人拥有深入理解人类语言的能力,缩小交互鸿沟,让人与机器自然对话,让机器人承担心理咨询、私人看护、智能导引、智慧助手等工作。

在教育、金融、工业、医疗等领域,ChatGPT 都具有应用优势。它能够实现 AI 作文批改与写作,帮助构建 AI 学习机和 AI 讲题机器人等,为每个学生提供更智能、更准确的个性化辅导;能提高与客户的沟通效率,并从大量数据中快速提取有价值的键信息,帮助金融机构了解客户需求和市场趋势,从而更好地评估和决策;可以智能整合患者的电子病历、检查数据和基因组等信息,支撑下一代临床辅助决策系统,为患者提供即时且精确的医疗意见;可以在语音控制、自然语言交互、驾驶行为预测、驾驶员状态监测等方面为自动驾驶提供支持,提高驾驶安全性和乘客的体验感。

(二)ChatGPT 的未来发展

未来如何提高 ChatGPT 的生成质量和效率,使 ChatGPT 更加轻量化,以及如何解决这些技术问题,将是重要的发展方向。另外一个重要趋势是,视觉语言多模态大模型可能会是未来的一个重要的发展方向。将视觉模态融进大语言模型,使得大语言模型能够感知视觉特征。最近研究发现,这种方式也能使

得多模态大模型在视觉任务上展现出更好的处理能力。一种思路是将人类反馈融合到视觉语言的融合上。比如理解某图片,在大语言模型中应用一个视觉编码器将这个图片的高维视觉特征进行编码,通过一个中间的模块可以将视觉特征转化为语言特征,从而可以用自然语言的模型去输出我需要的这些内容。它的视觉领域具备一些人类想要的泛化能力,这同样适用于文字识别、人脸识别领域。又如对无人输入视觉编码信息,增加三维运动认知,用自然语言的方式理解用户需求,从而达到定位的效果。

五、结论

作为一个现象级技术产品,ChatGPT在人工智能生成内容(AIGC)领域的表现是革命性的,将对文本乃至多模态的AIGC应用产生里程碑式的重要影响,乃至可能对整个社会结构、企业生存乃至大国博弈产生影响。但这并不能改变ChatGPT仍有较大局限,仍是基于预存知识和模型回答问题的事实,还远未具备真正的理解能力和创造性,尚未达到强人工智能的水平。在当前阶段,我们需要对人工智能技术持有自信和谦虚的态度,不断发展更多关于ChatGPT的技术研究和应用,帮助解决更加复杂的问题。

“创新引领未来,科技改变世界。”人工智能技术突破,对人类的冲击将不亚于几十年前互联网和手机的出现。当前我们正处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交织的这个历史时期,我国的科技创新快速发展,已经从跟跑并跑,到部分领域站在世界科技的前沿。这就需要我们更加有组织地推进原创性、引领性的创新。

“路虽远行则将至,事虽难做则必成。”站在新的历史转折点,需要我们去审时度势,凝聚新的战略驱动力,形成新的战略思维去创建新的科研模式。坚守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理念,坚持自由探索与有组织科研相结合,孕育新的科研范式和评价机制,以有组织的科研模式打通“学研产”创新链条,点亮中国的科技创新道路。

* 本文根据刘禹良在武汉市社会科学院、武汉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联合主办的第13期大江论坛上做的“人工智能与ChatGPT前景展望”主题学术讲座整理而成。整理者吴非、周阳。

作者简介:

刘禹良,华中科技大学人工智能与自动化学院研究员,研究方向为人工智能与计算机视觉,聚焦在文本分析与文本图像智能领域。

(责任编辑:吴非)

新发展阶段武汉人才流动现状研究

曹莹

摘要:人才是影响国家和区域发展的核心要素。新发展阶段,人才流动呈现流动规模不断提高、流动多元化趋势渐显、高端人才环流明显增强的特点。同时,经济发展转型、产业优化升级、人口红利消减、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推动,使得创新型人才的竞争越来越激烈,导致“人才争夺战”的爆发和升级。2017年开始的“人才争夺战”,武汉抢得先机,人才吸引力逐步彰显,人才辐射范围正逐步由湖北扩大至全国其他省份。武汉已逐步成为大学生就业的首选城市之一。但是武汉逐渐呈现出对高端人才和优质毕业生吸引力不足、对湖北省外人才吸引力度不大、公共服务与人才分布不匹配等问题,这也导致大学生落户政策效应开始有所减弱。新发展阶段,武汉市应深入实施人才强市战略,继续在“抢人才”和“留人才”上下功夫,聚天下英才使他们加入建设现代化大武汉的队伍中。

关键词:人才争夺战;人才流动;武汉人才

一、问题的提出

人才是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指标。多数学者认为人才是具有一定知识或技能,能进行创造性工作的劳动者,是为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做出贡献的人,是人力资源构成中的核心要素和重要资本,是在企业整体运作的关键环节上发挥重要作用的员工,^①是带动经济社会发展、创新科技、引领技术潮流的领路人,^②是有较强影响力、较高维护能力、善于处理更为复杂问题的人群,即“人才=能力+责任+贡献”。^③人才类别多元,不仅有顶尖人才、科技人才、领军人才、技能人才、青年人才、海外人才等,还包括科学家、学者、工程师、艺术家、企业家、高校毕业生、留学生。《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对人才有着明确的定义,即人才是具有一定的专业知识或专门技能,进行创新性劳动并对社会做出贡献的人,是人力资源中能力和素质较高的劳动者,主要包括党政人才、企业经营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才、高技能人才、农村实用人才、社会工作人才。

① 杨免珍:《中小民营企业人才流失现状及对策研究》,《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2011年第10期。

② 龙凤英、姜海波:《京津冀地区人才流动问题研究》,《河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20年第2期。

③ 汪恽:《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格局、变局、布局》,《南京社会科学》2021年第12期。

人才从一种工作状态到另一种工作状态的变化,即个体跨越社会系统中成员界限的身份变动被称为人才流动。人才流动是社会分工不断发展与完善的必然现象。狭义的人才流动指的是人才按照本人意愿选择服务对象或服务单位。广义的人才流动指人才跨单位流动,如挂职、兼职、短期工作、科研或项目合作等,使人才在多角色、多工作环境的转变中迸发思维火花,实现智力成果共享,促进成果转化。2019年12月,由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印发的《关于促进劳动力和人才社会性流动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中明确提出,促使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和谐进步的一个前提条件就是“人才合理、公正、畅通、有序的社会性流动格局”。掌握人才流动现状,特别是新发展阶段武汉人才流动特征,将更有助于武汉市合理地使用人才、开发人才,充分发挥人才的综合效益,扎实推进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重点任务落地。

二、新发展阶段人才流动新趋势

人才作为知识经济时代最为活跃、最具创造力的要素,日益成为推动世界格局、国际关系、国力变迁、大国兴衰的重要因素而备受重视。至2020年,我国科技人力资源总量为11234.1万人,居世界首位。至2021年底,我国人才资源总量达到2.2亿人,其中高技能人才超过6000万人,人才总量指标已超过美国,居世界首位。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技能精湛、素质优良的人才队伍正在形成,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有力支撑。新发展阶段,人才流动的规模与方向均呈现出动态化和多元化的特点。

(一)人才流动规模不断提高

一是人才的总体流动性增强。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20年全国流动人口总量3.76亿人,占全国总人口的26%,较2010年增长69.73%;跨省流动人口1.25亿人,占流动人口总量的33.22%。人口流动的增长必然伴随人才流动的增长。2021年智联招聘网站拥有约2.6亿用户,月均活跃用户数(含登录、有求职行为的用户)约4632万人,其中八成以上为专科及以上学历,2021年全国就业人数7.47亿人;四成为跨城流动求职者,比2020年增加了7.4%。

二是人才跨境流动日益频繁。随着改革开放步伐的不断推进,我国从1978年选派出国留学人员仅800余名到2019年出国留学人员总数为70.35万人。40余年间,我国各类出国留学人员累计达656.06万人,其中165.62万人正在国外进行相关阶段的学习。特别是公派出国(含国家公派和单位公派),已经成为我国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和各类紧缺专业人才、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提升国家软实力、扩大国际影响力的重要途径。同时从国际旅客情况看,麦肯锡研究院的研究显示,亚洲出境国际旅客由2009年的1.5亿人次上升到2018年的4.15亿人次。

(二)人才流动多元化趋势渐显

一是人才向经济发达区域集聚趋势仍在持续。受“邻里效应”“虹吸效应”影响,拥有雄厚经济基础的都市圈(城市群)、东部地区,因为不断提升资源汇聚力,为人们提供更多的选择、机遇与保障,成为人才流

动中的“热门选项”。2017—2020年人才跨区域求职数据显示,60%以上的人才流向五大城市群;东部地区人才净流入占比从6.2%增至12.9%;中部、西部、东北地区人才持续净流出。2021年中国最具人才吸引力城市50强中,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地区占比分别为39.1%、7.5%、7.4%、8.8%;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长江中游、成渝城市群占比分别为61.5%、77.8%、23.1%、11.1%、12.5%。

二是人才远距离的跨区域流动性减弱。就学地的粘滞率是指毕业生在就学城市接受高等教育后,进入该城市的劳动力市场的占比。长三角高校毕业生流动基本遵循随距离衰减和等级跃迁规律,区域内就业占比高达79.72%。2017—2021年五大城市群合计人才流入占比从64.7%降至61%,人才流出占比从60.7%降至51%。^①人才省际迁移规模的空间分布开始趋于均衡化。

三是人才逐步向新一线城市^②回归。以省会城市为主的新一线城市发现经济资本、政策资本、环境资本以及社会资本是人才流动的影响因素,继而提出完善“引、聚、育、用、留”的政策建议,依托跨国公司、优势企业对人才的虹吸作用,延揽高层次人才,构建以产业、政策、环境、服务为核心的“人才生态圈”。就学地、就业地人才分布在“扩散效应”辐射下“马太效应”有所缓解。一线城市逐渐显现人才流出趋势,新一线城市成为“90后”和“00后”人才、本科及以上学历人才以及企业管理人才的定居首选,名牌大学的硕士生、博士生到二、三线城市就业的现象已越来越普遍。2010年后出现的发达地区的人才高强度净流入及欠发达地区的人才高强度净流出现象正逐渐缓解。

四是人才逐步向新经济领域全面铺开。智联招聘数据显示,2021年求职人数最多的前三行业是IT/通信/电子/互联网、房地产/建筑业、生产/加工/制造,占比分别为19.5%、16.1%、13.9%,合计占比49.5%。在城市产业从相互区隔的状态日趋转向融合的过程中,互联网人才的加入,推动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也推动人才从高精尖产业向多样化新经济领域全业态铺开。

五是青年人才成为各城市争夺的主力。新经济、数字产业的迅猛发展大大加速了青年人才的成长。各地对青年人才的争夺客观上加速了青年人才的流动。自2017年武汉市启动“百万大学生留汉创业就业工程”开始,成都市的“蓉漂”品牌产品矩阵,苏州市的“青春无忧”计划,西安的“百万大学生留西安就业创业5年行动计划”,以利好的落户条件、有力的就业创业支持、规范的住房生活补贴、完善的公共服务配套等多样化的人才优惠福利政策为依托,吸引大学毕业生落户成为各大城市人才政策新“潮流”。人才流动中青年人才特别是“80后”“85后”“90后”占比越来越大。高学历且年轻化带来的择业优势,造成此类人才群体流动的比例较高,年轻的高学历人才流向呈现出多样化状态。

(三) 高端人才环流明显增强

“人才环流”作为对传统范式“人才流失”和“人才引进”观念的替代,目前也成为描述全球人才流动日益网络化特征的流行词。人才环流理论认为发达国家对人才具有吸引力,进而产生人才流动。通过“人”的流动实现“缄默知识”的传播和扩散,同时也对原籍国产生经济效应并促进技术改进。人才环流可分为两

① 齐宏纲、赵美凤、刘盛和、高芊、刘振:《2000—2015年中国高学历人才省际迁移的演化格局及影响机理》,《地理研究》2022年第2期。

② 新一线城市研究所发布的《2022城市商业魅力排行榜》显示:一线城市是上海、北京、广州、深圳。15个新一线城市为成都、重庆、杭州、西安、武汉、苏州、郑州、南京、天津、长沙、东莞、宁波、佛山、合肥、青岛。

种:一是基于工作流动的人才环流,二是基于学术流动的人才环流。前者是指有经济性动机的环流,以及其他在跨国公司内部的跨国流动,包括工作派遣等。后者是指有专业性动机的环流,以及其他高等教育和研究机构中的学生和学者临时形成的地理运动,包括短期的会议访问。研究显示,留学归国人员人均创造直接经济收益为144.2万元,国家公派留学的经费投入与直接的经济收益比为1:10以上。^①

一是中国迎来海外人才归国潮。研究显示,当国家处于劳动密集阶段,人才回归率为6%左右,当国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3000美元,进入知识密集阶段后,人才回归率可达60%。^②全球产业化背景下,吸引集聚全球科学家的全球重心每10年持续向东移动约1300公里,^③国际人才不再单向地向少数发达国家集聚,越来越多的新“枢纽”型国家正在形成。^④特别是后疫情时期,海外人才环境发生新变化,人才安全成为国家战略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智联招聘数据显示,2020年国内岗位投递简历的海归数量较2019年猛增33.9%,其中应届留学生人数猛增67.3%,2020年和2021年,在国内求职的海归总人数及应届留学生人数基本和2019年持平。

二是高端人才的流动性相对更强。知识越多、层次越高、稀缺性越大的人才,特别是在单位入职3~10年的骨干人才,因其业务能力及人才市场竞争力增强,同时家庭负担和个人发展压力增大,导致人才流动频率相对较高。^⑤智联招聘数据显示,2021年流动人才中有56%的人为本科及以上学历,而求职总体中有47%的人为本科及以上学历,且高收入者更有可能跨城求职。研究同时显示,院士中有46.23%的人存在工作地变更,^⑥超过1/3的大学高层次人才入职后发生流动。^⑦

三是人才柔性流动规模正在不断扩大。随着移动互联网平台经济和数字经济的兴起,远程交流在技术上已完全可行,部分人才转向虚拟空间,工作的模式更加灵活,借助虚拟科研组织、远程实验室、云孵化、云会议可快速进行全球化人才、智力交流,全球化的运作、工作外包便捷有效。人才、智力流动跨越了物理条件的限制,流动的速度持续提高、流动范围不断扩大。人才智力的流动替代人才本身的流动的态势已经出现,人才柔性流动规模正在不断扩大。

三、“人才争夺战”背景下武汉人才流动现状

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新动能的转换使得劳动要素越来越重要,区域竞争政策的调整使得高素质人才越来越受重视,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推动使得创新型人才的竞争越来越激烈,由此导致“人才争夺战”的爆发和升级。2017年开始的“人才争夺战”,从新一线城市开始,逐步延伸至全国所有城市,打破了人才“唯北上广深不能去”的传统观念。从“有门槛”到“零门槛”,从高端人才的塔尖扩大到青年人才的

① 陈学飞:《改革开放以来大陆公派留学教育政策的演变及成效》,《复旦教育论坛》2004年第3期。

② 姚蓉、严良:《我国科技人才流动的现状、原因及发展趋势》,《科技进步与对策》2003年第2期。

③ Mathias Czaika, Sultan Orazbayev, “The Globalisation of Scientific Mobility, 1970–2014”, *Applied Geography* 96(2018):1–10.

④ 侯纯光、杜德斌、刘承良、翟晨阳:《全球人才流动网络复杂性的时空演化——基于全球高校留学生流动数据》,《地理研究》2019年第8期。

⑤ 李学明:《新发展格局下我国人才流动的发展趋势》,《中国人事科学》2021年第9期。

⑥ 周亮、张亚:《中国顶尖学术型人才空间分布特征及其流动趋势——以中国科学院院士为例》,《地理研究》2019年第7期。

⑦ 徐娟、王泽东:《我国大学高层次人才流动规律研究——来自6类项目个人简历的实证分析》,《高校教育管理》2020年第2期。

塔基,从留下高校毕业生到争夺劳动力。通过放宽落户、重奖顶尖人才、对普惠性人才发放补贴、给予创业就业支持的竞争方式,各大城市人才政策不断迭代升级,进入“内卷化”时代,目标人才群体迅速扩大。截至2019年底,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共有233个直辖市及地级市先后颁布人才工作专项政策文件。^①

各城市的发展阶段、经济实力、区位与功能定位等要素,决定了各城市在人才竞争格局中处于不同的位置。武汉市作为此轮“人才争夺战”的首发城市 and 中部重要的“超大城市”,在此轮“人才争夺战”中抢得先机,吸引了大量高素质人才进入武汉,武汉的人才结构得到优化。

(一) 武汉的人才吸引力逐步彰显

1. 武汉人才总量居全国第一方阵

2020年武汉市共有人才资源285.68万人,比2015年增长23.86%。其中,专业技术人才158.54万人,比2015年增长21.1%;企业经理管理人才63.8万人,比2015年增长19%;高技能人才41.14万人,比2015年增长19%;农村实用人才13.1万人,比2015年增长31%,总量居全国第一方阵。从技能人才来看,至2021年底,武汉市技能劳动者128.26万人,其中高技能人才达41.59万人,较2016年的34.57万人增长20.3%。从高层次人才来看,截至2021年,武汉市共有两院院士81人(居全国第4),柔性引进诺奖得主9名,国家重点联系专家618人。^②

2. 武汉人才吸引力不断提升

2017年以来,武汉市紧紧抓住在汉大学生和在汉高校校友两大关键群体,创造性地提出“四大资智聚汉工程”(即“百万大学生留汉创业就业工程”“百万校友资智回汉工程”“高校科研成果转化对接工程”“海外科创人才来汉发展工程”),积极营造引才、留才、用才的浓厚氛围。2021年,武汉专门成立人才集团,为城市引进人才做好服务。

在以上政策的推动下,武汉市的人才吸引力指数显著提升。智联招聘发布的《中国城市人才吸引力排名:2022》显示,2017—2021年间,武汉人才净流入占比呈现上升趋势;至2021年,武汉在中国最具人才吸引力城市排名中位列第9位。中国联通大数据统计,2019年流入人口最多的城市中,武汉排第8位。《中国城市发展潜力排名2019》显示,武汉位居最具发展潜力城市第7位。武汉作为国家中心城市和长江经济带核心城市,也是中部地区最大都市及唯一的副省级城市,人口吸引力不容小觑。

3. 武汉逐渐成为高素质人才的候选城市之一

猎聘大数据研究院发布的《2022新一线城市人才吸引力报告》显示,中高端求职者投递占比排名中,武汉位居第5位。智联招聘发布的《2020中国海归就业创业调查报告》指出,2020年在国内求职的海归人数同比增长33.9%,武汉排名国内前十,海归人才吸引力呈上升趋势。《2021年度武汉中高端人才就业大数据报告》显示,武汉市中高端人才中,25~35岁人才占比超六成,硕博人才占比达20.03%。跨区域流入武汉的人才中,“北上广深”一线城市占比达35.05%。“965”产业体系深入布局,在人才政策持续加码等多重因素作用下,武汉人才集聚效应显现。

① 左晶晶、段鑫星:《“留”还是“流”:高校毕业生流动的空间布局与影响因素分析——以“双一流”建设高校博士毕业生为例》,《江苏高教》2022年第7期。

② 武汉市社会科学院课题组:《武汉人才高质量发展战略研究》,载樊志宏主编《武汉社会科学·总第24辑》,武汉出版社,2022,第56—60页。

(二) 新户籍制度改革背景下武汉人才辐射范围不断扩大

为提升人口吸引力,打造中部城市引擎,从2017年开始,武汉不断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现在武汉落户方式更加多元,外地居民可通过学历落户、积分落户、投靠落户、市外迁入、市内迁移、军部落户、购房落户、人才落户、创业落户等多种方式落户武汉。目前,不满45岁的专科及以上学历或学位毕业生、在城镇稳定就业生活且积分达到75分的外来务工人员、总部在汉的企业员工均可申请在武汉中心城区落户,武汉已逼近人才落户“零门槛”,以专科及以上学历或学位毕业生等高学历人才为主的迁移人口结构已悄然发生变化。

一是武汉市对各省人口的吸引力正在加强。自2017年降低户籍门槛以后,武汉户籍净迁移人口迅速由负转正,2018年时最高达到23.1万人。近几年,受疫情因素影响,迁入人口总量有所波动,但净迁移人口总量均保持在10万人以上。从历年武汉市净迁移人口的省份分布来看,2015年仅湖北省(1.2万人)、黑龙江省(95人)、西藏自治区(25人)等三个省来汉净迁移人口总量为正值,其他省市自治区的净迁移人口均为负值。但至2021年,除广东、上海、海南、北京、浙江、天津等省市来汉净迁移人口为负值外,其他省市自治区净迁移人口均为正值。

二是武汉市的人口辐射范围正逐步扩散至中部以外区域。从迁入武汉的各省市人口分布来看,2021年迁入武汉市最多的省份是湖北省(74.6%)、河南省(5.1%)、广东省(2.7%)、湖南省(1.8%)、安徽省(1.7%)、江西省(1.7%)和山东省(1%),以武汉周边省份为主。从2015年至2021年各省市迁入武汉人口的总量变动来看,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中,仅有上海、北京、天津3个直辖市的迁入人口有所减少,其他省市的迁入人口均有增长,其中增长幅度最大的省市分别是湖北省(247%)、广东省(197%)、安徽省(188%)、河南省(178%)、福建省(147%)、浙江省(127%)和黑龙江省(105%)。

2017年开始的户籍新政,以专科及以上学历的高素质人才为主要对象,故而武汉的人才辐射范围与人口辐射范围基本一致。伴随着武汉城市吸引力的不断提升,武汉的人才吸引力范围正逐步由湖北省扩散至中部,甚至是东部和东北地区等其他地区。

(三) 武汉逐步成为大学生就业的首选城市之一

“抢人大战”是存量博弈,高校毕业生作为高学历、高层次人才,是各大城市争相抢夺的重点。2017年以来,武汉市先后3次优化调整大学生落户政策,出台了一系列宽松政策,例如提出“进一步放宽落户条件”“提供人才安居保障”“提升免费创业工位”“加大创业融资支持”等。武汉力争“手续最简、机制最活”,打造了“全员放开落户”“全家解决落户”“全时办理落户”的新模式,吸引大学毕业生落户武汉。

1. 百万大学生落户政策有效解决近80万大学生的落户需求

武汉坚持把推动大学生留汉就业创业计划作为推动经济发展战略的“先手棋”,为武汉打造全国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夯实基础。截至2021年,“百万大学生留汉创业就业工程”启动5年来,共有191万余名大学生留汉就业创业,其中办理大学生落户77.3万人(2017年有14.2万人、2018年有17.5万人、2019年有19.0万人、2020年13.9万人、2021年有12.7万人),大学生落户数量稳居全国前列。

2. 湖北是武汉高校毕业生的首选省份

2021年各高校公布的毕业生就业质量报告显示,在武汉市“双一流”高校毕业生中,有30%以上的毕业生选择在湖北省就业,而且博士毕业生选择在湖北就业的可能性更高。以武汉大学为例,2021年博士

毕业生选择在中部地区就业的占 53.83%，远高于本科毕业生的 33.66% 和硕士毕业生的 39.57%。同时，普通高校毕业生选择在湖北省就业的占比高于“双一流”高校。从表 1 可以看出，湖北省属高校的本科及以上学历毕业生在湖北省就业的占比最低是武汉科技大学，但占比也已经高达 46.46%，比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在省内就业的占比高出 10 个百分点，省内就业占比最高的是武汉商学院，其本科毕业生在湖北省就业的占比达到 72.85%，在武汉就业的占比就高达 57.17%，远高于其他省、市。

表 1 武汉市部分高校本科及以上学历毕业生就业区域对比表

学校名称	学校类别	年份	湖北省	广东省	北京	上海	浙江省	江苏省
华中师范大学	“双一流” “211”高校	2021	24.47%	14.32%	2.23%	2.10%	4.35%	3.68%
武汉大学	“双一流” “985”高校	2021	30.45%	18.92%	6.57%	—	6.20%	6.08%
华中科技大学	“双一流” “985”高校	2021	33.38%	20.72%	7.37%	6.56%	6.33%	6.08%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双一流” “211”高校	2020	34.23%	19.42%	4.18%	3.64%	4.63%	3.60%
武汉理工大学	“双一流” “211”高校	2021	35.73%	19.07%	4.29%	5.95%	5.32%	5.22%
中国地质大学 （武汉）	“双一流” “211”高校	2020	36.47%	13.89%	6.37%	4.08%	5.14%	3.44%
武汉科技大学 （本科）	湖北省属高校	2020	46.46%	13.3%	4.83%	3.89%	4.14%	4.56%
湖北大学（本科）	湖北省属高校	2020	54.92%	12.57%	3.71%	4.23%	3.88%	2.67%
江汉大学（本科）	湖北省属高校	2020	63.75%	8.01%	2.71%	3.94%	3.91%	2.75%
湖北经济学院	湖北省属高校	2022	65.44%	9.10%	2.31%	2.50%	4.65%	2.06%
武汉商学院 （本科）	湖北省属高校	2021	72.85%	9.32%	1.26%	2.61%	3.27%	1.61%

资料来源：各高校毕业生就业质量年度报告。

注：部分高校没有公布 2021 年数据，武汉大学没有公布到上海就业人数占比。江汉大学、湖北大学、武汉科技大学、武汉商学院仅为本科生，其他高校包括本科生和研究生。

四、武汉人才流动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武汉市对优质毕业生的吸引力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一是武汉对优质高校毕业生的吸引力不足。猎豹大数据显示，全国 2022 届应届毕业生首选的前四名城仍是上海、北京、深圳、广州 4 个一线城市；武汉位列第 8 名，与第一名上海相差近 16 个百分点。从各高校毕业生的属地就业率来看，2021 年北京大学的毕业生属地就业率高于 42%，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及浙江大学的毕业生历年属地就业率均高于 65%。武汉市七所“双一流”高校在湖北省就业的占比分别为中国地质大学（36.47%）、武汉理工大学（35.73%）、中南财经政法大学（34.23%）、华中科技大学（33.38%）、华中农业大学（31.08%）、武汉大学（30.45%）、华中师范大学（24.47%）。^①也就是说，武汉市“双一流”高校毕业生在省内就业的占比均低于 40%，在武汉市就业的占比则更低。同时，从其他省市“双一流”高校毕业生的地域分布来看，毕业生到中部就业的占比基本上都低于 5%。在各城市不断推进

^① 除华中农业大学是 2020 届本科毕业生数据，中国财经政法大学、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是 2020 届毕业生数据外，其他均为 2021 届毕业生数据。

人才新政的情况下,武汉市不仅对本地优质高校毕业生的吸引力有限,对省外优质高校毕业生的吸引力更显不足。

二是大学生落户政策效应开始有所减弱。2017年武汉实施大学生落户政策后,通过不断地调整政策,武汉大量存量大学生已完成落户武汉的任务。2019年,武汉大学生落户人数达到最高值19万人。2021年武汉市大学生落户人口降至12.72万人。2021年各学历落户人数与近5年的最高值相比,博士落户人数为2017年的47.4%,硕士落户人数为2018年的55.13%,本科落户人数是2018年的52.16%,专科落户人数是2019年的63.79%。2020年后,随着各地户籍政策的不断放开和宏观经济、疫情等因素的影响,武汉市大学生落户人数开始出现小幅下滑。

(二)武汉市高端人才总量偏少的问题仍然突出

作为中部地区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武汉在全国发展大局中的战略地位不断凸显,但能够站在国际科技前沿、引领科技创新、承担战略科技任务的“高层次”创新人才仍显不足,且存在创新人才流失等问题。

一是武汉对高端人才的招聘难度较大。《2021年度武汉中高端人才就业大数据报告》显示,近3年武汉TSI指数^①均值分别为0.83、0.80、1.06。武汉对高端人才有极高的需求度。但《2022未来人才就业趋势报告》显示,2022年1—4月全国中高端人才平均年薪,基层为16.69万元,中层为24.38万元;北京中高端人才平均年薪最高,为25.09万元;上海、深圳、杭州中高端人才的平均年薪分别为24.82万元、20.96万元、16.67万元,分列第2、3、4名;武汉中高端人才的平均年薪为13.17万元,居全国第12位,位于苏州、广州、南京、宁波、青岛、佛山、天津之后。武汉对人才,特别是对高端人才的招聘难度仍在不断提高。

二是武汉高端人才外流问题仍然突出。《2020年度武汉中高端人才就业大数据报告》显示,2020年全国中高端人才供给城市中,武汉占比为2.43%,位居第10位。从2019—2020年跨地区吸纳武汉的中高端人才去向城市分布来看,上海、深圳占比最高,分别为13.09%、12.82%;北京、广州、杭州位居第3、4、5位,分别为8.56%、6.32%、5.28%;流出武汉的中高端人才除了一部分留在襄阳、荆州、孝感之外,大部分去了经济发达省市。

三是武汉对海归人才吸引力仍显不足。《2020中国海归就业创业调查报告》显示,北京、上海吸纳海归人才的占比均超过15%,其次是深圳、杭州、广州,占比分别为8.1%、5.1%和5.0%,武汉吸纳占比为2.0%,居第10位,略低于天津和苏州,与一线城市仍存在较大差异。

(三)武汉的人才新政加大武汉与湖北省其他省市的人才差异

武汉丰富的人才资源与科研优势、不断优化的产业发展格局,以及安居落户、求职创业补贴等扶持政策,必然吸引了大量的湖北省内人才。

从户籍人口来看,2017年至2020年间,湖北省其他城市每年有10万~13万的专科及以上学历人员通过大学生落户政策落户武汉,而从武汉迁出到湖北省其他城市的人口总量却不足1万。从常住人口中大学(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人数总量来看,武汉市大学文化程度人数占湖北省大学文化程度人数的比重由2010年的45.17%上升至2020年的46.63%,增加了约1.5个百分点。从人才总量来看,2008年武汉市人才总量151.2万人,占湖北省人才总量的28.24%。至2020年,武汉市人才总量已达到285.7万人,

^① TSI指数是指人才紧缺指数,即有效需求岗位数/求职数。TSI大于1,表示人才供不应求;小于1,表示人才供大于求。

占湖北省人才总量的比例上升至31.34%。从高端人才来看,湖北省以81名院士为代表的高层次人才基本上聚集在武汉。

“十三五”期间,武汉以“四大资智聚汉工程”为抓手,在人才落户、薪酬、住房、购车、子女入学、配偶就业、医疗保障等方面进一步优化政策,吸引了湖北省内大量高学历人才,这也无形加大了武汉市与省内其他城市的人才总量差异。

(四)武汉公共服务与人才区域分布不匹配问题仍然突出

一是受各区功能分布和经济发展现状影响,武汉人才区域分布不均衡的问题日益凸显。从表2可以看出,有着“中国光谷”之称的东湖新技术开发区,是武汉常住人口就业率最高的区,达到55.06%;是武汉硕士研究生总量第一和博士研究生总量第三的区;是全国三大智力密集区之一,海外留学归国人员与常住外籍人员数量近2万人,聚集了4名诺贝尔奖得主、68位中外院士,7000多个海外人才创业团队,近2000名外国专家,新侨增长速度位居中部地区第一。洪山区和武昌区,作为武汉高校的主阵地之一,常住人口的就业率分别为36.01%和41.27%,但就业人口中大学专科以上人口占比均超过63%,两区博士研究生总量占全市博士研究生的比例达到56.36%。青山区是武汉市的重工业城区,该区常住人口就业率为40.14%,就业人口中大学专科及以上学历比例为47.71%,在武汉市7个中心城区中均属于低位。东西湖区、江夏区、汉南区、蔡甸区、新洲区、黄陂区6个新城,就业人口中大学专科及以上学历比例均低于40%,最低甚至达到17.82%。

表2 2020年武汉市各区受教育程度的就业人口对比表

单位:人

地区	常住人口	就业人口	大学专科	大学本科	硕士研究生	博士研究生
江岸区	98705	42783	10871	11871	2095	151
江汉区	65668	34449	7339	7964	1519	212
硚口区	67702	31543	6405	6250	1027	254
汉阳区	80947	37918	9261	9407	1341	126
武昌区	109480	45185	10808	14511	3413	733
青山区	43687	17537	4020	3720	550	77
洪山区	167018	60145	14427	17829	4562	1509
东西湖区	86213	46815	9703	7224	879	73
汉南区	13073	6886	1127	570	34	2
蔡甸区	53053	25956	3536	2205	199	53
江夏区	97544	39585	7551	5769	888	122
黄陂区	126055	58703	7025	3270	155	12
新洲区	99849	48790	5647	3351	223	20
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	37501	20051	4246	4521	732	80
东湖新技术开发区	99322	54685	13141	15797	3718	527
武汉东湖生态风景区	10404	5259	1096	985	194	26
武汉化工区	3156	1631	109	58	1	1
合计	1259377	577921	116312	115302	21530	3978

资料来源:湖北省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就业数据。

二是公共服务供给水平与人才分布不匹配的问题仍然存在。以大学毕业生安居房为例,2021年4月至2022年4月,武汉人才集中的洪山区没有提供安居房,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只提供了6套安居房,武昌区提供了250套安居房。相反,人才总量相对较少的硚口区却提供了1407套安居房。另以东湖新技术开发区教育资源为例,该区经过几年努力,2022年拥有幼儿园151所、小学32所、初中16所、高中6所,在武汉中心城区中总量靠前,但仍存在民办学校较多、学位需求与供应缺口大、教师队伍补缺提质任务艰巨等问题。

五、推进武汉人才有序流动的对策建议

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是经济发展迈上新台阶、社会发展迈入新境界的关键环节,是影响国家和区域发展的核心要素。从影响人才流动的演化趋势上看,收入在人才迁移决策中的重要性开始减弱,自然条件(气候、生态)、居住环境(发展水平、开放度、包容度、安全度)、生活设施(商业、基建、公共图书馆)、公共服务(教育、医疗、交通、住房)、归属感等非经济因素被纳入人才流动的分析框架。^{①②} 在全球人才加速流动的背景下,武汉市应深入实施人才强国战略,充分发挥支点作用,走在前列,真心爱才、悉心育才、倾心引才、精心用才,在“抢人才”的同时,在“留人才”上大做文章,聚天下英才加入建设现代化大武汉的队伍中。

(一)以人为本树立人才第一资源理念

政府各部门应牢固树立人才是第一资源理念,把人才工程作为首要战略和“一把手”工程,把人才优先发展理念落实到各项具体工作部署当中。坚持以人为本,想人才之所想,急人才之所急,解人才之所忧,多方位了解人才在住房、薪资、科研条件、进步空间、子女入学、社会融入等方面的需求和困难,整合各方资源,切实解决人才的实际问题。做到思想上重视人才,政策上保护人才,生活上关爱人才。

各区应根据区域发展趋势和人才结构特点,有针对性地制定人才政策。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在继续做好普通人才配套工作的同时,应加快未来国际社区建设步伐,吸引更多的高端人才为武汉服务。洪山区和武昌区等高校聚集区域,应在“学子留汉”工程上多做文章,通过深挖一批高质量的岗位、搭建一批精准高效的平台等,吸引集聚优秀高校毕业生来汉留汉就业创业。

(二)高水平建设新时代人才活力之城

城市的有效运行离不开各类型、各梯队人员的参与。只有构建完整的人才梯队,才能从整体上提升城市的竞争力。

对于国际人才,武汉应顺应国际人才流动新趋势,健全专业化、国际化的人才市场服务体系,尝试建立国际人才虚拟集聚平台,大力支持国际化人才服务中介组织健康快速发展,推进全球网络空间协同创新、离岸创业和柔性流动,用更大的力度吸引海外优秀人才到武汉就业、创业。

① 崔璨、于程媛、王强:《人才流动的空间特征、驱动因素及其对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的启示——基于高校毕业生的分析》,《自然资源学报》2022年第6期。

② 人民论坛问卷调查中心:《2019人才流动趋势调查研究》,《国家治理》2019年第7期。

对于高端人才,武汉应紧扣产业发展,聚焦武汉有基础、有优势、能突破的重点科技领域,围绕“965”产业体系,瞄准高精尖缺和破解“卡脖子”难题引进人才,建立动态顶尖人才、战略人才引进清单,实行定向邀约、一事一议,有针对性地开展招才引智活动。

对于青年人才,武汉市应深入推进“学子留汉”工程工作部署,持续加大集聚优秀青年人才力度。一方面加大面向北京、上海、南京、西安、广州、成都等城市高校毕业生的专场招聘活动的力度,吸引更大范围的优质毕业生落地武汉。另一方面深入实施“学子留汉”工程,打造宜居宜业宜创的大学生友好城市,吸引高校毕业生留汉就业创业。

(三)多措并举增强人才集聚效应

在人才培育上,武汉应借助丰富的教育资源,特别是院士团队力量,开展人才培育工程。围绕武汉重点产业、重点企业进行深入调研、摸清底数,在政府、科研院所、企业之间建立有效、通畅、长期的人才信息共享平台,依据人才特点、特长进行精准筛选、精细管理,促进企业人才需求与人才工作需求的有效匹配,最大限度做到尽其才、尽其用。

在人才使用上,为人才提供富有挑战的机遇,充满学术活力和“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成长“软环境”。积极畅通人才流动渠道,健全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及社会人才双向和多向流动机制。破除“唯论文、唯学历、唯奖项、唯‘帽子’”的“四唯”倾向,支持高技能人才参加职称评审,鼓励专业技术人才参加职业技能评价,搭建起人才成长的双向“立交桥”。

* 基金项目:2022年度武汉市委市政府重点课题“武汉人才密集型平台组织建设研究”(项目编号:ZD2022015)。

作者简介:

曹莹,武汉市社会科学院农村与生态研究所副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城市社会学、社会统计学、人口社会学等。

(责任编辑:陶秀丽)

基于新发展格局下的 武汉与广州发展比较研究

武汉市社会科学院课题组

摘要:广州与武汉的地位、功能最接近,有很多相似点和契合度,是现阶段武汉这座城市最合适的对标对象。本课题从全国经济中心、国家科技创新中心、国家商贸物流中心、国际交往中心、区域金融中心、综合交通枢纽、城市规划建设、都市圈和城市群等8个方面,比较研究了武汉与广州之间的功能差距和短板弱项,提出了武汉以广州为学习对标对象进行追赶及缩小差距的重点方向和路径。

关键词:武汉;广州;对标城市;对比分析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武汉、广州同为国家中心城市,同处发展黄金期和战略机遇期,相互之间历史渊源深厚、经济联系紧密、人文交流频繁,担负着相近的责任和使命,既有许多相似之处又各具优势特色。武汉经济规模即将迈上两万亿台阶,在新起点上确定功能定位相似、发展水平略高、综合表现优异的广州市作为发展目标和学习对象,比较分析两城发展情况,对于武汉学习先进典型,更好指引打造新时代英雄城市,实现高质量发展,谋求弯道超越,进而推进与广州、深圳等大湾区中心城市之间的战略合作,开创新格局下区域协调发展新局面,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通过武汉与广州之间的比较研究,指出广州是现阶段武汉最合适的学习对象,并提出了未来学习广州推进高质量发展的方向和路径。

一、广州和武汉之间的相似之处

广州地处中国南部、珠江下游、濒临南海、毗邻港澳,是中国通往世界的“南大门”,是全国最大的侨乡都市。改革开放初期,广州与武汉、沈阳、重庆之间实力相差不大,4座城市实力均低于上海、北京、天津,处于第二梯队。1990年广州GDP跃居全国城市第三,1992年“南方谈话”后广州继续迅猛发展。2008年金融危机后,广州开始“腾笼换鸟”,经济增速放缓。2012年广州GDP总量被深圳超越,至今基本保持在全国第4位,奋力实现老城市新活力、“四个出新出彩”。广州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地和粤港澳大湾区区域发展的核心引擎,与武汉相比,在发展阶段和质量上略高,在区域地位和功能上有较多的相似点。

(一) 区域地位与功能高度相似

广州进入“一线城市”多年,发展水平相对较高,大区中心地位和辐射带动区域发展功能与武汉高度相似。根据《世界城市名册 2020》和《世界城市品牌价值 500 强(2022 年)》,上海、北京、广州、深圳、武汉的排名依次为第 5、6、34、46、98 名和第 8、11、31、34、107 名,五城在世界城市网络体系中的分布呈现三个层次。综合各方面的结论和城市的规模总量,目前国内头部城市基本可划分为三个梯队。

第一梯队:北京和上海。经济总量“4 万亿+”规模,肩负冲击“世界经济中心”使命,全面参与全球竞争,目标是成为与纽约、伦敦、巴黎、东京相媲美的顶级(A+甚至 A++)全球城市。

第二梯队:广州、深圳、重庆、苏州。经济总量近“3 万亿”规模,其中广深肩负带领粤港澳大湾区成为世界级大都市区的责任,在科技创新、先进制造、航运等领域参与全球竞争,目标是成为次于第一级别(A 甚至 A+)的全球城市。

第三梯队:成都、武汉、杭州、南京等。经济总量近“2 万亿”规模,肩负带领所在区域提升在全球经济体系中的竞争地位的使命,目标是成为第二级别(B+甚至 A-)的全球城市。

总体上,北京、上海是武汉学习的榜样,但不适合作为对标的对象;深圳、苏州在综合性大区中心城市地位较弱,在部分单项领域是很好的学习对象,如深圳的创新创业和先进制造业、苏州的先进制造业等;重庆、成都的规模体量虽大,但发展水平和质量并无明显优势。只有广州既满足规模体量、发展水平领先,又满足对区域发展的综合性功能作用相似的两个关键点,且与武汉同为建设中的国家中心城市。

(二) 产业结构方面高度相似

广州和武汉具有同样的“商贸重镇+工业基地”特质,与北京、上海相比,不论是在人口总量、工业总量上,还是在三次产业结构、主导产业上都更为相近。2021 年,广州市工业增加值为 6716.7 亿元,占 GDP 的 23.8%;武汉为 4586.5 亿元,占 GDP 的 25.9%。汽车、电子、石化都是两城的传统支柱产业,合计占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比重都在 50%左右;新一代信息技术、智能网联与新能源汽车、生物医药与健康均是两城主要的新兴支柱产业;广州有纺织服装、美妆日化、皮具箱包、珠宝首饰、家居建材等特色产业,武汉也有烟草食品、智能家居、纺织服装等特色产业。

主要不同之处在于,广州先进制造、科技创新、现代服务的发展水平较高。新兴产业占比超过武汉;科技创新能力已经开始领先武汉,高新技术企业数量、年技术合同成交额较多;在现代服务业发展中,不管是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国际会展名城建设,还是区域金融中心、期货交易所建设等,都远远强于武汉。

(三) 商贸流通方面高度相似

自唐宋以来,广州基本都是我国南方的门户,并依托“广交会”,成为国际商贸中心和联通内外贸的重要枢纽,年办展数量和面积均稳居全国第二,跨境电商进口额连续七年居全国之首。同样,崛起于明清时期的汉口镇以及改革开放初期的汉正街,乃至近年崛起的汉口北市场群和“汉交会”,也发挥着重要的商贸流通、内外贸枢纽功能。但广州的能级更高,内外贸联动更紧密,其在国际贸易、国内市场辐射等方面的发展值得认真学习。

(四)综合交通枢纽方面高度相似

武汉是我国中部地区的综合交通枢纽,“铁水公空”各种交通方式便捷联通东西南北。广州是华南地区的综合交通枢纽,不断构建完善空港海港铁路港数字港“四港联动”、空铁一体化的综合交通体系,提升国际综合交通枢纽能级,形成“产业带动+流量承载”良性循环的综合交通枢纽发展模式。此外,广州在航运航空枢纽方面较为领先,广州白云机场旅客吞吐量和货邮吞吐量居全球前列,分列国内第1、2位;广州港货物、集装箱吞吐量为全球第4、5位;高铁班次、广州南站客流量均居全国第一。

二、广州和武汉的比较分析

“十四五”期间,武汉的发展主线是打造“五个中心”,建设现代化武汉。重点从“五个中心”功能和武汉须弥补的短板弱项等8个方面对武汉和广州进行对比分析,并阐述广州的好经验好做法。

(一)全国经济中心方面

在GDP、人口、产业发展等主要经济指标方面,武汉与广州相比还有量级上的差距。2021年,广州市GDP 28232 万亿元、常住人口 1881 万人、工业增加值 6717 亿元、服务业增加值 20203 亿元,占全国比重分别为 2.47%、1.33%、1.80% 和 3.31%;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 8617 亿元,占全市 GDP 的 30.5%;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约为 5000 亿元,占全市 GDP 的 20%(2020 年)。武汉 GDP、常住人口、工业增加值、服务业增加值占全国比重分别为 1.55%、0.97%、1.23%、1.81%,新兴产业和数字经济占全市 GDP 比重偏低。

1. 广州长期坚持产业第一、制造业立市

2008 年以来广州加快“双转移”(传统产业向外转移与劳动力转移相结合)和“腾笼换鸟”步伐,先进制造业、高科技和现代服务业等高附加值产业发展迅猛,产业转型升级和旧动能转换成效明显。广州产业发展两大目标是: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集群和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现代服务经济中心。《2022 年广州市政府工作报告》再次明确“坚持产业第一、制造业立市,推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

2. 广州强力推进重大项目“攻城拔寨、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2017 年起广州每年全力以赴推进重点项目“攻城拔寨”。其中决定未来经济体量和产业竞争力的重大产业项目被列为重中之重,粤芯半导体、花都文旅城、广汽发动机、乐金 OLED、超视界 10.5 代显示器、创维超高清显示、广汽新能源、小鹏汽车广州智造基地、树根互联全国总部等重大产业项目陆续“落地结果”。

3. 广州大力发展新兴产业和先进制造业集群

近 10 年来,广州始终将“IAB”(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与“NEM”(新能源、新材料)产业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重要培育方向,建成海珠琶洲互联网、增城新型显示、天河软件等 10 个价值创新园区,打造智车之城、软件名城、显示之都、定制之都、新材高地,建设“全球数产融合的标杆城市”,初步形成了 6 个具有竞争优势的千亿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其中,超高清视频和智能家电、智能装备、高端医疗器械 3 个先进制造业集群与周边城市一起入选“国家队”。

(二)国家科技创新中心方面

广州科创能力已经开始领先武汉,突出表现在科技创新投入、技术合同成交额、高新技术企业数量等方面。(见表1)“十三五”期间,广州5年累计科技研究与试验发展(R&D)投入总量超武汉1000亿元左右,是武汉的1.5倍;5年累计财政科技支出超武汉250亿元,是武汉的1.4倍;科创投入规模大,增量科技资源多。2021年新挂牌广州国家实验室,2022年新增两所“双一流”建设高校。2021年,广州技术合同成交额是武汉的2.1倍左右,高新技术企业数量比武汉多2000多家。

表1 广州与武汉科技创新相关指标比较

城市	“十三五”期间 R&D 投入总量/亿元	“十三五”期间财政科技支出/亿元	技术合同成交额/亿元	高新技术企业数量/家	规模以上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亿元
广州	3042.62	915.95	2413.00	11435	8616.77*
武汉	2061.00	665.78	1127.75	9151	4786.10

数据来源:两市历年统计年鉴、2021年统计公报。其中前两项为“十三五”期间累计数,其他项为2021年数据。
注:“*”处是由于广州市未公布“规模以上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数据,使用其“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替代。

1. 广州着力打造世界重大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先行之地,提升创新策源能力

一是重视与中科院“国家队”战略合作,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取得突破。2018年中国科学院与广州市签订院地合作协议,共建南沙科学城和中科院明珠科学园等。目前在广州建设的大科学装置数量、高水平研究机构数量已居全国前列,“1+2+4+4+N”战略科技创新平台体系持续巩固优化。二是加大对部属、省属高校投入。实施《高等教育“冲一流、补短板、强特色”提升计划实施方案(2021—2025年)》,广东省对高校R&D的年投入超过湖北2倍,广州有两所省属高校被纳入国家“双一流”建设,同时,华南理工大学广州国际校区、香港科技大学(广州)、中国科学院大学广州学院等高端平台相继落户。

2. 广州着力打造链接关键节点的创新核和创新轴,提升重大创新节点能级

以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和大湾区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建设为契机,以“一区三城”为基点(广州人工智能与数字经济试验区、南沙科学城、中新广州知识城和广州科学城),广州链接关键节点的创新核和创新轴基本成型。^①深化国家知识产权综合改革试验,在中新广州知识城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家知识中心及国际知识驱动创新的战略高地。创建粤港澳大湾区制度创新先行区,建设国际科技创新合作示范区,成为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创新枢纽核心节点。

3. 广州着力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科技创新型企业集群,不断完善创新生态

制定“科技型中小企业十条”“高企六条”以及《广州市推动高新技术企业高质量发展扶持办法》等,构建“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企业—硬科技企业—独角兽企业—上市高企”梯次培养体系,全方位扶持高新技术企业做强、做优、做大。实施《广州市科技创新条例》《广州市加强基础与应用研究实施方案》《广州市重点领域研发计划实施方案》《广州市科技创新母基金管理办法》等,形成“1+5+N”科技创新政策体系,构建“科学发现、技术发明、产业发展、人才支撑、生态优化”全链条创新路径和创新生态。在全国率先实施科研经费使用“负面清单”管理,总规模1000亿元的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创新产业投资基金落户并设立。

^① 黄海涛:《中新合作中城市次国家行为体的地位与作用——以中新广州“知识城”为例》,《东南亚研究》2020年第3期。

(三) 国家商贸物流中心方面

广州在商贸物流总量能级上高于武汉。2021年,广州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0122.56亿元,商品进出口总额10825.88亿元,货运总量21881亿吨,货运周转量9.8亿吨公里,集装箱吞吐量2447万标箱,航空货运量224.14万吨,分别是武汉的1.5、3.2、5.9、1.5、10、7.1倍。(见表2)在2021年中国物流城市竞争力排名中,广州在竞争力和辐射力上都排名第3,武汉物流竞争力排名第7,物流辐射力排名第9。

表2 商贸物流中心方面的指标比较

地区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亿元	进出口总额 /亿元	货运总量 /亿吨	货物周转量 /亿吨公里	集装箱吞吐量 /万标箱	航空货运量 /万吨
广州	10122.56	10825.88	21881	9.8	2447	224.14
武汉	6795.04	3359.40	3720	6.7	243.6	31.6

数据来源:广州市和武汉市2021年统计公报。

1. 广州大力建设国际商贸中心,深耕“千年商都”优势

广州出台《广州市精准支持现代物流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加快建设“全球效率最高、成本最低、最具竞争力”的国际物流中心。聚焦国际航运中心建设,大力开拓“一带一路”沿线市场。建设南沙自贸区,完善外贸经营环境,提高口岸保障服务能力。将会展、商贸、物流、金融业相融合,推动广交会成为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要平台,不断完善大宗商品交易所体系。

2. 广州抢抓国家战略机遇,提升商贸承载功能

抓住培育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机遇,形成“一带两区一轴”世界级消费功能核心承载区和“5+2+4”国际知名商圈(5个世界级地标商圈、2个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岭南特色商圈、4个枢纽型国际商圈)。抓住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机遇,实现现代化、国际化突破,举全市之力推进“双区”建设、“双城联动”,打造国际国内市场的贸易集散地。

3. 广州大力发展电商新模式,打造商贸新引擎

培育电商龙头企业,打造功能互补和差异化发展电子商务产业集聚区,深化穗港澳跨境电商合作,推动商贸创新转型效果显著。为从资金奖励、人才培养、融资支持以及税收优惠等方面促进政策落地,仅2013—2018年5年广州市财政累计安排约17亿元资金,扶持各类电商企业、平台企业、电商产业园区发展。创建“直播电商之都”,推出“个十百千万”工程,涌现出一大批如唯品会、花生日记、钱大妈、1药网、洋葱海外等电商豪杰,成为广州新业态、新技术和新模式创新发展的重要引擎,推动千年商都向现代商都跃升。

(四) 国际交往中心方面

广州近年来积极培育国际交往载体,拓展国际交往格局,扩大国际交往影响,优化国际交往环境,推进全方位高水平对外开放合作,在国际交往中心功能方面大幅领先武汉。仅从国际机构数量来看,广州目前领事馆数量达到66家,友好城市数量为38家,分别比武汉多61家和10家。

1. 广州大力巩固国际知名会议目的地、国际会展之都地位

搭建了一系列重大国际活动平台和永久性的主场外交平台,主办与承办“读懂中国”国际会议(广州)、从都国际论坛、中国法治国际论坛、国际金融论坛等高规格活动,扩大海交会、海博会、广交会、金交

会等系列展会品牌效应。

2. 广州成功打造了一系列文化品牌活动,塑造城市国际形象,推动广州故事走向世界

“广州文化周”足迹踏遍 20 多个国家和地区,促进广府文化和西方文化交融互鉴。“我们,广州”精彩亮相重大国家会议,有效展示宣传城市文化软实力。“丝路花语——海上丝绸之路文化之旅”宣传体系成型,促进海上丝绸之路文明传播与粤港澳大湾区文化旅游一体化发展加快,穗港澳三地文化交流互动深入频繁。“穗港澳青少年文化交流季”系列活动全面铺开。

3. 广州积极推进国际城市间的交流合作,深度参与和引领全球城市治理创新,扩大友好网络格局

发挥世界大都市协会主席城市、世界城地组织世界理事会和执行局城市等作用,搭建“广州奖”、全球市长论坛、国际城市创新领导力研讨班等交流交往平台,成功加入世界城市文化论坛等国际组织,深耕城市合作。

(五)区域金融中心方面

广州区域金融中心建设水平远超武汉。2021 年,武汉的金融业增加值、本外币存款余额、贷款余额、保费收入分别为广州的 73%、45%、66% 和 57%。截至 2021 年底,武汉有 A 股上市公司 71 家,广州则有 131 家;武汉有外资银行 11 家,广州则有 40 家。广州金融服务辐射范围除了传统华南地区,还因为与深圳、香港等地协同而更具国际影响力。

1. 广州致力于共建粤港澳大湾区国际金融枢纽,着力推进建设五个“金融中心”

大湾区资产管理中心、大湾区绿色金融创新中心、大湾区科技金融创新中心、大湾区跨境投融资服务中心和大湾区金融要素区域交易中心等五个“金融中心”定位,不是单纯的区域金融中心而是国家级的金融中心,与深圳、香港联动发展打造国际金融枢纽,定位更高、支撑更强,更能得到国家层面的支持与认可。

2. 广州大力引进区域性金融机构和交易所

广州实现国家级金融基础设施历史性突破——广州期货交易所揭牌运营。广州还拥有中国人民银行广州分行、上海证券交易所南方中心、深圳证券交易所广州基地、新三板华南服务基地以及上海保险交易所南方总部等国家级金融基础设施或区域性金融机构。武汉仅有全国碳排放权注册登记系统、中国人民银行武汉分行等跨区域性机构。

3. 广州着力发展绿色金融、科技金融,优化金融生态环境

广州获批建设国家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依托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环境权益交易市场,广州碳排放权交易中心碳配额现货交易量全国第一。广州着力优化科技金融和创新生态环境,“十三五”期间科技信贷风险补偿资金池撬动银行发放企业贷款累计 470 亿元。2021 年广州中国城市科技金融发展指数排名第 4(武汉第 7),中国城市金融生态环境排名第 3(武汉第 7)。

(六)综合交通枢纽方面

现阶段广州所在的粤港澳大湾区国家战略地位高于武汉所在的长江中游城市群,其在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中的综合交通枢纽地位仍然领先,广州白云机场、广州港、高铁广州南站等表现亮眼。

1. 广州着力建设全球重要综合交通枢纽,打造国际国内双循环换乘中枢

广州围绕建设国际性综合交通枢纽,打造全球领先的国际航空枢纽、高水平国际航运枢纽、世界级铁路枢纽。在航空方面,与湾区城市共建世界级机场群,打造白云机场空铁联运综合枢纽。在铁路方面,对内构建分散布局、多点到发、“一心五向”的枢纽群。在公路方面,规划建设连接全国、辐射华南、通达省域、直连湾区、覆盖都市圈的华南公路枢纽中心。

2. 广州从战略层面系统谋划大湾区交通一体化格局,着力打造湾区“306090”交通圈

与湾区城市从互联互通走向直联直通,打造湾区“306090”交通圈,即广州中心城区30分钟可以到达佛山、东莞、深圳中心城区,60分钟可以到达湾区其他城市中心城区,90分钟可以到达省内其他城市中心城区。^①

3. 广州大力推进实施国家级交通物流枢纽项目

广州着力推进四大国家级交通物流枢纽建设。当前正全力推进的广州东部公铁联运枢纽项目投资额高达1076亿,项目定位为“通道+枢纽+产业”枢纽经济示范项目,是粤港澳大湾区规模最大、唯一的生产服务型国家物流枢纽。广州还完成了广州港深水航道拓宽工程、南沙港区三期、南沙国际邮轮母港等一系列重大工程。

4. 广州推动交通物流信息平台整合发展

广州交易所集团是国内首家从事权益和商品等各类要素交易平台投资运营的企业集团,目前正着力打造包含物流、产权、碳排放权的交易平台矩阵,在物流信息、交易定价、综合服务等领域领先;相比而言,武汉物流交易所刚刚起步,航运交易所发展也还不够,与广州交易所集团相比差距较大。

(七)城市规划建设方面

广州在城市规划建设工作方面走在全国前列,发挥了规划的战略引领作用。先后组织开展了全国首个城市战略规划(2000年)、首个总体城市设计(2011年)、首个“三规合一”规划(2012年,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城市规划、土地规划),并在自然资源部新一轮国土空间规划改革中成为首批试点城市之一。

1. 广州重视城市规划的战略引领功能作用

2000年时任广州规划局局长王蒙徽利用行政区划调整契机,在全国率先开展“广州市城市总体发展战略规划”,对城市总体发展进行引导和结构性控制。2008年组织编制《广佛同城化发展规划》,推动广佛都市圈一体化,带动广佛肇区域合作,后续推出广清一体、穗莞合作、广深合作等一系列规划。2011年在全国首个开展总体城市设计,探索推进城市更新、重点地区的城市设计工作。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老城市新活力”要求后,广州又在全市全面推动了精细化、实施性城市设计工作。此外,在国内较早开展“一张图”信息平台建设工作,强化数字化技术运用和动态更新的规划管理图则,加强城市规划大数据平台建设和应用。

2. 广州把“城市中轴线”规划建设作为城市发展利器

基于东西向珠江城市景观主轴线,规划建设了3条南北向城市中轴线,规范城市重心的转移和变迁。第1条是近代中轴线:越秀山—中山纪念碑—中山纪念堂—人民公园—起义路—海珠广场,南北长3.3公里,凝聚千年商都文化底蕴。第2条是当代中轴线:燕岭公园—中信大厦—天河体育中心—珠江新城—

^① 黄舒旻、郑慧梓、谭超、朱伟良:《“大”广州跨城“出圈”——打造湾区306090交通圈》,《南方日报》2021年3月2日第2版。

广州塔—海珠湖,南北长12公里,体现世界级城建水平,代表广州城市面貌新窗口。第3条是未来中轴线:知识城—科学城—天河智慧城—琶洲—思科(广州)智慧城—广州大学城—明珠科学院—南沙科学城,是广州“十四五”时期首次提出的科技创新中轴,成为代表广州创新发展动力源和未来世界级科创水平的关键。

3. 广州强调面向实操应用的规划政策保障

在“三旧”改造、城市更新等领域出台了一系列面向实操应用的创新政策,在全国起到了示范引领作用。以工业用地相关政策为例,研究提出了“工业区块线”等政策,为实体经济发展提供空间保障和政策支持;在存量工业用地更新方面,提出了旧厂房“工改工”类微改造项目实施指引等政策,为提升工业用地绩效、促进高新技术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八)都市圈和城市群方面

城市群一体化和都市圈同城化是“十四五”时期的发展重点,从三大城市群对比来看,上海所在的长三角城市群和广州所在的粤港澳大湾区是我国经济实力最雄厚、发展水平最高、创新活力最强的两大城市群。粤港澳大湾区较高的市场化程度以及优异的营商环境吸引了众多的外国投资者的目光,长期以来外商直接投资额名列前茅,年度PCT(专利合作条约)申请最多,是中国人口增速最快的地区。长江中游城市群是我国重要的先进制造业基地,是长江经济带发展和中部地区崛起的重要支撑,是全国统一大市场中的空间枢纽和人流物流的战略枢纽,正在加快基础设施和现代物流体系的建设。

广州通过“双城联动”、广佛同城和南沙战略打造大湾区核心,在一体化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广东着眼于支撑引领粤港澳大湾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双区建设”,强化广州、深圳“双城联动”。从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共同举办“双城联动”论坛,到确立常态化沟通对接平台、联合举办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广州、深圳大湾区两个核心引擎融合发展,共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打造国际性综合交通枢纽、共建现代产业体系、共建生活圈等成为主攻方向,南沙、前海成为主要合作平台。广州与佛山在2009年正式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广佛同城”成为国内最早实践同城化概念的地区,凭借成立广佛规划委员会、共建“广佛制造业人才走廊”、建设广佛高质量发展融合试验区等一系列重磅举措成为全国同城化的典范和标杆。“广州服务+佛山制造”的协同效应不断凸显,产业竞争力不断增强,未来广佛把全域作为一个超级城市来整体谋划,实现全域同城化深度融合。2022年6月,随着国务院印发《广州南沙深化面向世界的粤港澳全面合作总体方案》,广州市南沙区完成了从郊区向粤港澳重大合作平台的转型。凭借地处粤港澳大湾区的中心区位,南沙区充分发挥依托交通枢纽快捷通达的优势,构建“枢纽带动、多点支撑、整体协同”的发展格局。

三、武汉学习广州推进高质量发展的方向和路径

当前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开局起步的关键时期,需要我们积极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结合实际创造性开展工作。通过上述比较分析,针对武汉存在的短板差距,建议从九个方面推进高质量发展。

一是长期坚持工业强市,始终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武汉经济建设的主旋律、主阵地。旗帜鲜明地把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世界先进制造与产业创新中心作为武汉打造全国经济中心的主要目标,始终围

绕先进制造业发展协同推进“五个中心”建设,以研发设计创新链、先进制造产业链、商贸物流供应链等为核心支撑,形成以先进制造业和现代生产性服务业为双主导的产业结构。^①

二是加快新旧动能转换,始终坚持“创产城融合”发展。依托东湖科学城、光谷科技创新大走廊以及遍布全城的创新街区(园区、楼宇)等创新空间载体,结合城市更新和新城建设,加快建设新科技新产业育成中心。在创新空间载体建设中探索“双创集聚+产业生态+城市社区”“创产城融合”发展模式,协调科研、生产、生活、生态,打造更加适合新兴产业发展、高端人才工作生活的环境。

三是适度超前布局科学基础设施,加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布局,构建高水平协同创新网络。依托湖北省与科技部、中科院等部(院)的会商合作机制,加强部、省、市沟通合作,积极承接和参与国家科技创新重大项目和重大任务,争取更多大科学装置等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布局建设。以东湖科学城为极核,串联城市圈、长江中游城市重点园区和重要创新平台,共同建设高水平实验室和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群,打造“立足中游、引领中部、服务全国、链接全球”的全球创新网络的重要枢纽,共同打造世界级科技产业创新策源地。

四是积极探索培育创建国际消费中心城市路径,着力打造系列国际性消费目的地。打造复合型的国际消费场景集群,依托各级各类开放平台载体,建设中外人文复合交流融汇中心、全球商品贸易港和世界级商圈商街,荟萃全球优质商品、服务,促进商品贸易、人员往来、文化交融。构建多元化的国际消费活动体系,联动发展购物节、旅游节、艺术节、时装周等节庆活动,以商圈商街、景区景点、场景应用等为纽带,打造24小时城市社交目的地和世界级休闲旅游目的地。打好长江文化、历史文化、科技文化牌,谋划长江国家文化公园、滨江特色历史街区、青年潮流文化活动,彰显特色化的国际消费魅力。

五是打造国家级综合交通枢纽集群,突破性发展多式联运,提升全球通达便利度和辐射能级。从战略层面系统谋划城市圈交通一体化格局,联合中原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共同打造国家级的综合交通枢纽集群。立足建设国际航空客货运双枢纽门户,全力推动建设“天河—鄂州”商贸物流大走廊,建设国家级临空经济示范区。加快建设长江中游航运中心,组建武汉航运物流交易所集团,整合资源打造具有导向意义的物流“武汉价格”。积极争取中央支持,设立面向全国的资源交易平台、大宗商品交易平台等,强化资源配置能力,提升对全国重要商品物资价格、交易等方面的影响力。争取国家级交通物流联运枢纽项目,突破性发展多式联运和中部陆海联运大通道。

六是积极承办国家重大主场外交活动、重大国际会节赛事活动,打造外交主场城市、国际会展赛事名城、政商学国际高端会议目的地。着力提升全球资源整合配置能力,大力引进跨国公司,吸引国际组织设立区域总部和运营中心,提高武汉在全球资金流、信息流、商业流网络体系中的地位。建设跨国机构、国际组织集聚地,稳步推进外国领事馆区建设,打造汉阳龟北片国际文化交往中心,争取更多外国领事机构、国际商会、协会、贸易代表处等国际性组织落户。策划举办国际性政商、文化、体育等重大活动,培育办好具有武汉特色的国际性定期定址品牌会展、会议、节庆、赛事等活动。充分借助新媒体等形式加强武汉城市形象海外传播,讲好武汉故事。

七是提升金融中心战略定位,谋划国家级金融基础设施布局,推进科技金融、区块链金融试点示范。争取把武汉金融中心建设纳入国家战略,确立中部金融枢纽定位,给予实质性政策支持。围绕全国碳排

^① 周阳:《加码先进制造中心建设:面向2035武汉打造国家中心城市的路径》,《决策与信息》2022年第2期。

放权注册登记系统争取建设碳期货交易所,推动区块链技术应用,打造全国碳金融中心和区块链金融中心。推进江北银行保险集聚区、江南总部金融集聚区、光谷国际创投集聚区的总体规划布局实施,重点建设以科技金融为特色的区域金融中心。推动上海证交所、深圳证交所、北京证交所、上海保险交易所等在武汉设立区域管理总部,提升武汉地区的资本市场服务能力。

八是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推进高水平城市发展战略谋划和战略规划。用战略谋划和战略规划来统领城市发展和城市治理,凝聚各方发展合力。建立空间留白机制,加强重要通道、重大设施和重大项目的空间预控。构建动态调整机制,及时调整规划策略,增强规划适应性。加快建设智慧城市、智能市政、智慧社区、智慧城管,推动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的新型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实施城市更新行动,以新城对接新基建,提升城市运行管理效能。在围绕长江主轴、垂江中轴、“两江四岸”发展的过程中,持续丰富完善“城市中轴线”,加快凸显并不断增强其潜在长期价值,以此构建国家中心城市核心区的独特魅力。

九是加快打造以武鄂黄黄为核心的武汉都市圈,推动区域协同联动开放共享发展。大力推动“1+8”城市圈同城化发展,依托长江中游城市群拓展畅通国内大循环的经济腹地,打造联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门户枢纽,培育集聚高端资源要素的强大市场。依托交通运输网络培育形成多级多类发展轴线,推动周边城市协同发展,打造以武鄂黄黄为核心的武汉都市圈。推动武汉都市圈、城市圈产业合理分工布局,构建产业链空间协同体系和创新链服务体系,促进产业链创新链跨地区深度融合。

作者简介:

课题组成员包括武汉市社会科学院樊志宏、周阳、陈进、操玲姣、顾晓焱,中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黄骏以及武汉市规划研究院林建伟。

(责任编辑:林丽)

周期视野下武汉动能结构优化研究

辜小勇

摘要:处理好经济周期与经济增长政策的适配关系,有利于提升增长政策的绩效。据此,本研究对武汉经济增长的动能结构体系进行了有针对性的优化设计。长周期下,经济增长政策的重点应是:进一步改革完善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全方位推动科技创新、以现代服务业的突破性发展带动高端制造业的不断扩张、更加充分合理地使用城市土地等。中周期则主要根据本轮中周期为“反弹周期”的特性展开,既充分利用5年左右的景气时间窗口,又要在景气转向前及时收缩战线,做好抵御严重萧条的准备。

关键词:周期;武汉;动能结构;优化

依据现代经济增长理论转化形成的经济增长政策,总体上对政策出台时机的要求不是非常严苛,但如果能在周期视野下加以进一步的内容调整与时机优化,则无疑会产生类似“在正确的时间做正确的事”的政策“叠加”与“优化”效果,获得更好的政策绩效。武汉经济具有“投资拉动”与“工业结构偏重”两项基本特性,城市经济发展的强周期特征十分突出,由此,在周期视野下进行武汉动能结构优化研究就具有了重要的现实意义与极强的实用价值。

一、现代经济增长的动能结构体系与作用机理

纵观人类历史,经济增长并非社会发展的常态。事实上,经济增长几乎可以说是近现代才出现的特有现象。综合前辈大家的研究可知,人类社会这一复杂系统经济增长的成果主要来源于文化、制度、创新、经济结构、资本积累、技术进步、劳动(人力资源)等七大因素(子系统)的复杂作用。^①这种复杂

^① 七大因素作为现代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这在既往的研究中已经得到了充分的阐述或论证。唯一需要指出的是,这种阐述或论证,基本上均是依托单一因素而展开,稍微复杂一点的如三因素索罗模型,侧重的仍然只是单方面。这在理论研究中很好理解,所谓“片面的深刻”,便于说清核心命题。但这些理论与现实显然是有距离的。为了将理论运用于实践,作者将前述七大因素在复杂性理论视野下进行了一个简单的综合。可以视为在七大因素相关增长理论基础上的一个推论或者说是作者个人对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一种理解。严格说起来,七大因素中的前四项与后三项只能算是大致上的并列关系,因为前四项因素更为基础、影响的时间更为久远,后三项因素则更接近于实务层面,产生影响的时间一般不超出长波周期范畴。

作用主要体现于两个层面,其一,七大因素作为单独的子系统直接作用于人类社会这一复杂系统,推动经济增长。其二,单个因素作用于其他子系统(因素)并接受其反馈,间接推动经济增长。这里最核心的脉络大致应是:一国或一个地区的地理环境、资源禀赋,影响和决定着当地的历史和文化;历史和文化会诱致产生、决定着当地的社会、经济一揽子制度安排;制度安排对当地的创新进程有着非常重大的影响;而创新又对该地区经济结构的形成和演变发挥着关键性作用。之后,文化、制度、创新、经济结构等深层次的基础性因素,决定和影响资本积累、技术进步、劳动(人力资源)等直接作用于经济增长的基本因素,并受到这些直接因素的反作用。在这些因素复杂的交互作用下,形成了人类经济增长的基本成果。

从解析还原的角度看,单个要素作用于人类社会这一复杂系统、推动经济增长的机理大致如下:

(一)文化

一个国家和地区的文化,历史性地影响并决定了当地人民的价值观及行为准则。不同的文化背景形成了不同的经济、社会制度和不同的经济发展模式。亚当·斯密指出:任何市场经济,只有在共享的道德观,即信守契约、履行(支付)承诺、尊重市场伙伴的基础上才能正常运行。也就是说,特定的文化观念成为市场扩张和经济发展必不可少的条件。马克思·韦伯认为:资本主义的兴起基本上是一种植根于新教信仰的文化现象。他还进一步比较了世界主要宗教的经济伦理,认为儒家伦理阻碍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国内也有不少学者对我国的传统文化观念提出了批评性意见。如张培刚等指出,经济水平的低下限制了社会文化的发展,而文化意识上的安平乐命和不思进取反过来又强化了传统社会经济的落后状态,于是就陷入了刘易斯所说的“贫困文化”恶性循环之中,并通过代际关系的影响而世代代递传下来,在社会组织和人们心态上形成了源远流长的超稳定结构,并严重阻碍着现代经济的兴起与发展。

(二)制度

所谓制度,其实就是一套明确的规则体系。依托制度体系,增加了资源的可得性,提高了信息的透明度,减少了经济活动的不确定性和风险。马克思指出,没有抽象的生产,也没有离开制度(马克思的提法是生产关系,实质上就是制度)的生产力及其发展;生产力总是在一定的生产关系中组织和运行的,先进的生产关系会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落后的生产关系则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一个持续稳定的生产关系(制度框架)必然会为生产力发展提供相应的制度“空间”。道格拉斯·诺斯认为: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关键是制度因素,一种提供适当的个人刺激的有效制度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除非现行的经济组织或制度安排是有效率的,否则,经济增长不会简单产生。诺斯指出:在制度因素中,财产关系的作用最重要,经济增长有赖于明确的产权结构;但在技术和现有组织的制约下,产权的创新、裁定和行使的代价都极为昂贵,国家作为一种低成本地提供产权保护与强制力的制度安排应运而生,并最终对产权结构的效率负责。

(三) 创新^①

亚当·斯密认为,分工是国民财富之源。从现代意义上讲,分工就是一种最重要、最基础的创新。约瑟夫·熊彼特是现代“创新理论”的奠基人,熊彼特将创新分为五种类型:产品创新、技术创新、市场创新、资源配置创新、组织创新。熊彼特的创新理论主要有以下几个基本观点:第一,创新是生产过程中内生的,这种变化是许多重要经济现象产生的原因。第二,创新是一种“革命性”变化。熊彼特曾作过这样一个形象的比喻:你不管把多大数量的驿路马车或邮车连续相加,也决不能得到一条铁路。第三,创新同时意味着毁灭。即并不是驿路马车的所有者去建筑铁路,而恰恰相反,铁路的建设意味着对驿路马车的否定。第四,创新必须能够创造出新的价值。熊彼特认为,先有发明,后有创新;发明是新工具或新方法的发现,而创新是新工具或新方法的应用。“只要发明还没有得到实际上的应用,那么在经济上就是不起作用的。”第五,创新是经济发展的本质规定。他认为,可以把经济区分为“增长”与“发展”两种情况。所谓经济增长,如果是由人口和资本的增长所导致的,并不能称作发展。第六,创新的主体是“企业家”。熊彼特把“新组合”的实现称之为“企业”,那么以实现这种“新组合”为职业的人们便是“企业家”。

(四) 经济结构

威廉·配第发现,各国国民收入水平的差异及经济发展处于不同阶段的关键原因是产业结构的不同。科林·克拉克总结了劳动力在三次产业中的比重变化与人均国民收入提高的相关性:劳动人口会持续地从农业向制造业进而从制造业向商业及服务业移动——所谓的克拉克法则。刘易斯提出了二元经济结构模型用以解释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赫希曼提出了关联效应理论和最有效次序理论。罗斯托提出了主导产业扩散效应理论和经济成长阶段理论。一般认为,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会带动经济总量的高增长,而经济总量的高增长也会推动产业结构的高级化进程。随着这两者间的互动和内在联系的日益强化,社会分工也将越来越细,产业部门增多,部门与部门间的资本流动、劳动力流动、商品流动等联系也越来越复杂。

(五) 资本积累

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关注资本、土地、劳动等直接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奉行“资本积累是经济增长最主要因素”的信条。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在肯定资本积累重要性的同时,注意到资本积累与技术进步的紧密联系。索洛提出了投资当中蕴含着技术进步的观点,并命名为“嵌入式技术进步”,也就是说,技术进步是“嵌入”在资本形成当中的。阿罗的“干中学”模型认为,技术进步是资本存量的函数。因为知识是在生产活动中产生的,生产经验的多少决定了技术进步的快慢。生产率的提高或技术进步是资本积累的副产品。阿罗同时还强调,他仅仅考察了在生产资本品过程中的学习和知识累积,没有考虑在使用资本品过程中的学习和知识积累,而后者其实对于发展中国家更为重要:发展中国家通过购买资本品,与自己的劳动力结合,可以大幅促进自己的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积累。

^① 本文将“创新”与“技术进步”作大致的并列关系处理。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在熊彼特创新理论体系中,创新是一个涵盖范围十分广泛的概念,技术进步固然在其中有一席之地,但也仅是五种创新类型之一,熊彼特关注的重点并不在这里。在熊彼特的创新语境下,更重视创新的主体,也就是“创业家”或者说“企业家”的作用。这与当下高度推崇“技术进步”的增长理论有着近乎本质的区别。

(六) 技术进步

发达国家处于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的前沿,发展的核心动力来自技术进步,经济增长的模式是技术进步导致产出增加,带动投资增加,所以技术进步是源头。这种背景下产生的新古典增长理论、内生增长理论特别注重知识和技术在长期增长中的作用。索洛模型把产出写成资本和劳动的函数: $Y = AF(K, L)$ 。其中,K代表资本,L代表劳动,A代表生产技术,给定资本和劳动投入,产出随着A的提高而增加。索洛模型的一个重要推论,就是清晰说明了只有技术进步才能维持长期的、持续的经济增长。因为模型中的要素资源特别是劳动力资源是有限的,同时要要素投入增加还受到边际收益递减的约束。罗默从技术溢出的角度构造了一个独特的竞争性均衡增长模式。该模型中,技术变化是内生的,知识具有溢出效应,是增长的主要因素,它能使资本和劳动等要素产生递增收益,从而整个经济具有规模收益递增的特征,存在着具有外部效应的竞争性均衡。因为知识不断增长和外溢,所以经济能够持续增长。

(七) 劳动(人力资源)

现有经济增长理论对劳动(人力资源)的作用和地位有一定的研究。索洛模型也可以理解为,长期增长率是由劳动力增加和技术进步决定的——前者不仅指劳动力数量增加,而且还含有劳动力素质与技术能力提高的意思。卢卡斯的两部门资本模型强调了劳动者脱离生产、从正规或非正规的教育中所积累的人力资本对产出与经济增长的作用。他认为,劳动者将业余时间放在教育培训上,能使人力资本按照一定速度增长,从而保证了人均产出的可持续增长。此外,现代经济增长理论也认可一项经验性的事实:即劳动力与资本之间可相互替代。虽然如此,但在总体上,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对劳动(人力资源)重要性的认识仍显不足。因为从本质上讲,劳动(人力资源)才是现代经济增长的根本源泉,这也正是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核心与精髓所在。这方面,现代经济增长理论或许还有较大的研究与提升空间。

二、实际宏观经济周期分析

既往研究业已证实:中周期视野下,武汉经济发展的轨迹与宏观经济周期运行高度同步。^①长周期下此结论更是成立的。由是,我们可以用实际宏观经济周期作为武汉经济发展的基本周期加以考量和分析。两者的分析效果应该是高度一致的。

(一)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一轮长波周期已进入后期^②

以“大跃进”为背景,自1958年之后4年间,我国GDP增速陡降48.6个百分点(如图1)。1961年,我

^① 辜小勇:《当前的宏观周期形势及武汉的应对》,载樊志宏主编《武汉社会科学·总第23辑》,武汉出版社,2022,第72—74页。

^② 所谓经济周期,一般是指经济活动沿着经济发展的总体趋势所经历的有规律的扩张和收缩。其关注的核心表征是国民总产出、总收入和总就业的波动状况。只要总体经济活动扩张或紧缩两种态势交替出现,且其中任一态势都能延续一年以上乃至数年,则可判定存在着经济周期现象。至于引起波动的原因,在这里并不重要。所以计划经济时期同样存在着经济周期现象。长期背景下,研究中国宏观经济周期,一般均是将计划经济时期与改革开放后的阶段作连续性处理。本文遵循了这种处理方式。

国 GDP 增速以-27.3% 的同比增长率创下新中国成立以来 GDP 增长的绝对低点,^①由此,1961 年有极大概率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宏观经济长周期的起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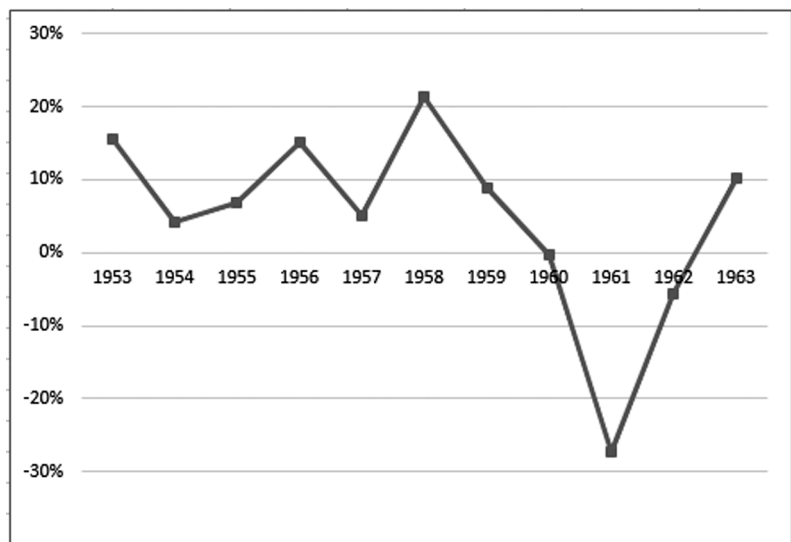


图 1 1953—1963 年我国 GDP 增长率

新中国成立以来这轮长波周期,其推动力主要来源于四个方面:改革开放、经济全球化、信息技术革命、快速城市化。^②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动力源的“能量”大体得以释放。模糊估计,其剩余部分仍有较大可能维持或者推动一个中周期量级的景气运行,也即可以推动长波周期继续运行一个中周期性质的周期循环。

1. 改革开放

经过 40 多年的努力,我国改革开放成绩斐然。但经济体制改革远未取得完全成功,经济体制仍然不够完善。改革开放所创造的“中国奇迹”中,政府的作用,尤其是政府配置资源的作用功不可没。但这并不代表着这种模式在未来就可以简单复制或延续。因为这种模式与具体的历史条件和环境息息相关。随着时代发展,一方面,市场的力量强大了起来,有了发挥力量、成为“主角”的客观条件和内在需要;另一方面,中国经济发展水平有了长足的进步,虽然距发达经济体的劳动生产率水平尚有距离,但其间的各种差距已大大缩小,经济发展的主题词已由“追赶”“赶超”变换为“创新”。进一步深化改革,“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既是方向,也意味着发展的空间和潜力。

2. 经济全球化

经济全球化是一个历史进程,但迅猛发展则只是最近几十年的事情。2008 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后,经济全球化进程进入减速状态。在未来发展中,中国和世界仍然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局面,但短期内再要快速提升外贸依存度不现实。从战略上考虑,由内而外,徐图进取,比较妥当。首先就是通过对内改革,加快建立全国统一大市场,畅通国内经济大循环。然后以国内大市场的开放、发展为筹码,“反弹琵琶”,进一步推动对外贸易和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在更高层次上参与国际经贸及产业分工。重点领域包括:“一带一路”建设、中国上海自由贸易区等一系列的自贸区建设等。这几大领域的新

^① 文中所有 GDP 增速数据均来自相关年度《中国统计年鉴》或《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公报》。

^② 自 1961 年以来的 60 余年中,计划经济体制主导时期经济增长乏善可陈,国民经济实质性的成长均是在改革开放之后取得的。相应地,四大推动力发挥作用的时间区段也均是在改革开放之后。

进展,对我国的经贸活动和对外经济交流是一个巨大的推动,有利于我国宏观经济发展进入一个新境界。

3. 信息技术革命

一般认为,每一次大的技术革命都会经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新兴产业的兴起和新基础设施设备的广泛安装,第二个阶段是各行各业应用的蓬勃发展和收获。每个阶段各 20~30 年。本轮信息技术革命起源于 20 世纪 70 年代,2000 年美国互联网泡沫破灭,标志着信息技术革命第一阶段的结束和第二阶段的开始。又经过 20 来年后的今天,互联网在我国已达到了非常高的普及率,互联网的利用深度也居于世界前列。站在当下展望未来,一方面其可展望空间明显不如 20~30 年前那么辽阔,另一方面人们在大数据、物联网、3D 制造、工业 4.0、虚拟现实、元宇宙、人工智能等若干方向上又有较大的潜力可挖。继续发掘、收获一轮中波周期意义上的信息技术红利应该具有较大的成功可能性。

4. 快速城市化

我国城市化进程以城乡二元制度为基本初始条件,农村人口众多、耕地严重不足、城乡差距巨大,由此积蓄起的城市化“势能”也格外充沛。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曾经断言,21 世纪影响世界进程和改善世界面貌的有两件事:一是美国高科技产业的发展,二是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可以想见,城市化对于我国经济发展的巨大促进作用。截至 2022 年底,我国按常住人口统计的城镇化率达 65.22%,较上年增加 0.5%。按国际城市化的一般经验法则以及目前的城市化增长率粗略估算,我国快速城市化进程至少还将持续 6~8 年。到那时,城市化对经济发展的直接刺激作用才有可能出现较为明显的衰减。

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 GDP 增长情况进行中周期划分。1961—2020 年间可明显划分为 5 轮中周期,轮廓和边界均很清楚(如图 2)。其中,1961—1967 年是第一个中周期,为期 7 年。1967—1976 年是第二个中周期,为期 9 年。1976—1990 年是第三个中周期,为期 14 年。1990—1999 年是第四个中周期,为期 9 年。1999—2020 年是第五轮,也是一个特殊的中周期:库兹涅茨周期。该轮中周期以加入 WTO 为背景,GDP 增长率逐年攀升,2007 年达到 14.2% 的高峰,然后以次贷危机爆发为转折点,GDP 增速陡然下滑。随后,GDP 增速连续 8 年在 8% 到 6% 的区间徘徊下行,直至 2020 年,在疫情冲击下,GDP 增速降至改革开放 40 多年来的最低点。这同时也标志着该轮中周期的结束。第五轮中周期运行长达 21 年,再加上本轮周期中房地产业高度发展的周期特征,则本轮周期明显应属于库兹涅茨周期的范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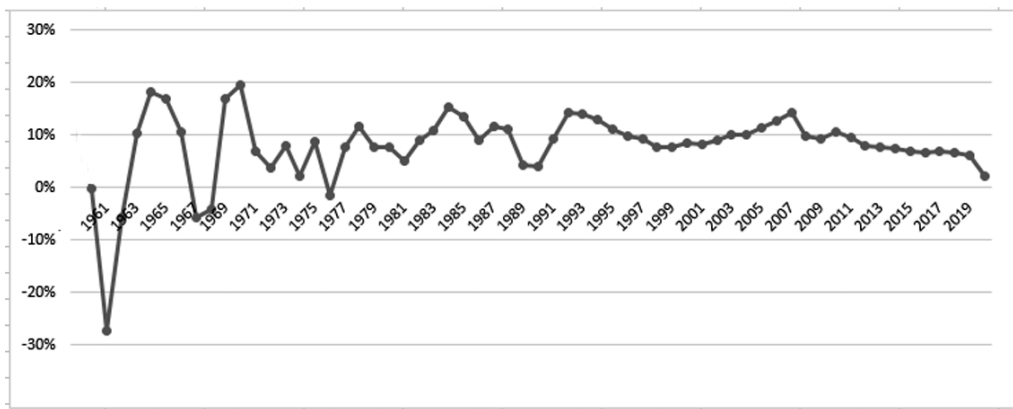


图 2 1961—2020 年我国 GDP 增速变化情况

如果以上分析正确的话,则新中国成立以来长波周期很可能还有一个中周期没有运行完毕。也即,当下中国经济正在运行着长波周期中的最后一轮中波周期。

(二) 一轮新的中波景气可以期待

关于新一轮中波周期的来龙去脉,在拙文《当前的宏观周期形势与武汉的应对》中已有详尽分析。其核心观点是:2020年极有可能成为宏观经济中波意义上的周期转折点,新一轮中波周期由此展开。通过对近3年宏观经济运行的观察,这一观点正在一步步地得到证实。

这3年,我国宏观经济明显运行了一个较为完整的短波周期,继2021年的跃升之后,2022年,我国GDP增速再次低至3%,接近于2020年2.3%的历史性低点水平。随着经济走势下行,部分民众的心理再次跌入谷底。其实,这种悲观大可不必。2022年经济形势下行,可视为对2020年中周期低点的一个回抽确认,这种现象在中周期波动中屡见不鲜,单个年度低点后直接的“V”字形反转反倒是比较罕见。随着全面放开,2023年我国经济很大可能将会出现一轮恢复性增长,国务院新年度《政府工作报告》确定的年度GDP增速为5%左右即为明证。由此,进一步确认了2020年作为新一轮中周期底部的准确性。在美联储激进加息、俄乌冲突等重大事件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和冲击逐渐被消化后,预计未来几年世界经济环境再次遭受重大负面冲击的可能性不大,中国经济大概率会延续自身发展路径和固有的周期逻辑,展开一段较为稳定的中周期景气进程。

在确认新一轮中周期景气正在展开的同时,我们预计新一轮中周期时间跨度应在一般正常区间。因为,不论是长波周期四大推动力的“余量”,抑或中周期层面上的内外因支持,均不支撑本轮中周期的时间跨度超越一般正常区间,也就是10年左右。由此,2030年前后,本轮中周期大概率进入周期性萧条阶段。

(三) 长波周期结束阶段有可能形成严重萧条

当第六个中周期从景气高点跌落,转入衰退阶段时,也就意味着长波周期亦同时进入了最后阶段。双重下行趋势叠加之下,有形成严重萧条的较大可能。

长波周期结束,本就隐含着大幅度回调,出现严重萧条的可能性。一轮长波时间走得越长,周期内经济增长的数量级越高,未来产生严重萧条的概率就越大。这既有明斯基“金融不稳定假说”作为理论依据,也有美国大萧条、次贷危机、日本泡沫经济破灭、东南亚金融危机等相关历史事实作为现实支撑。很大程度上,这可以说是长波周期发展的一个必然结果。1978年以来,我国四大长周期驱动力因缘际会,交替、协同发力,从而造就了中国奇迹。而当这四大驱动力近乎在同一时期“踩刹车”,而又缺乏近似量级的动力“替补”时,中国经济列车很难不出现一定程度的“失速”现象。

在中波周期视野下观察,本轮中周期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实业投资领域缺乏明显、普遍的商业机会。实体经济“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即使景气度高的行业领域,也多属于周期性的景气,而不是有穿越周期的长期性光明前景。以我国迈入高收入国家门槛为背景,笔者判断,本轮中周期景气的主战场很可能在资产领域,也就是证券市场与房地产市场,实体经济景气度或因财富效应影响有所提升。但这种“虚拟经济”“非正常繁荣”出现的同时也就埋下了资产泡沫破灭与严重萧条的种子。

本轮长波周期的景气高点出现于2007年,此前的1961—2007年,一共出现了五波中周期意义上的景气上行,以及四次中波周期性质的景气低点。这四次景气低点,一次比一次高。这些表现明显与长波周期的上行阶段相呼应。2007年之后,我国经济增速一路趋势性下行了13年,且最低点的2020年经济增速为2.3%,大幅度低于第五轮中波周期起点年度的7.7%,很显然,国民经济在长波意义上已转入下行阶

段。如此一来,最新一轮中周期的基本定性应为“反弹周期”,结束之后中国经济将继续寻底。考虑到2.3%的年度经济增速实在是不太可能成为中国经济长波周期的底部,由此中国经济再出现低速乃至负增长的年份就有了很大可能。再考虑到从2007—2020年间中国经济是处于一种缓慢调整的态势,以及本轮长波周期的总时长早已超出一般正常范围,则反弹周期结束之后的寻底过程很可能是短促而激烈的。而这,正是“硬着陆”及严重萧条的一般表现形态。

三、周期视野下,武汉经济增长动能结构优化的基本设计

实际经济周期的运行既形成了武汉经济发展的基本背景和主要制约条件,同时也构成了预测分析武汉中长期经济增长、演变轨迹的一个基本依据。据此,我们可以有针对性地进行武汉经济增长动能结构的优化设计。

(一)长周期背景下的动能结构优化设计

1. 进一步改革、完善政府与市场关系

武汉作为传统计划经济重镇,计划经济影响的烙印是刻在骨子里的——自新中国成立,乃至改革开放40余年,武汉社会经济发展的所有重要事务,几乎都是习惯性地由政府主导。民营经济和民间组织发展不充分,影响不足,难担重任。长期来看,这种状况必将对武汉经济发展形成重大制约。由此,“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的改革对于武汉经济高质量发展就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这方面改革的重点在于推进政府管理体制改革。规范政府职能,市场的归市场,社会的归社会,政府着力于建立和维护市场经济秩序、创造良好的经济运行环境、保护各类经济主体的合法权益。进而,实行“精兵简政”,减少财政供养人员总数和相关行政支出;推行、落实普惠式税收及其他各项财税改革政策,较大幅度降低政府税费水平;加快社会事业改革,提高政府公共服务的效能和效率等。

2. 全方位推动科技创新

全面改善科技创新环境。鼓励成功,宽容失败,以良好的城市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为基础,营造激昂向上的城市创新文化和创新氛围,吸引全社会对创新的普遍参与。以发展教育为核心,采取各种有效措施,提升城市的人力资源质量,使之成为城市创新能力提升的基本源泉。要着力解决科学研究与产业发展“两张皮”的问题。从发达国家经验看,解决这方面问题的关键在于大力培育、培养技术转移机构和技术经理人,架构起科技与产业之间的桥梁。这方面做得最成功的是德国,这也是德国科技创新在世界领先的关键所在。其中的典型代表之一是成立于1949年的弗劳恩霍夫应用研究促进协会,该组织目前在德国设有74个研究所和研究机构,有28000名员工,每年研究经费总计超过28亿欧元,其中超过23亿欧元来自科研合同,约70%的研究经费来自工业合同和由政府资助的研究项目。^①显然,德国经验值得武汉着重效仿。

3. 以现代服务业的突破性发展带动高端制造业的不断扩张

突破性发展现代服务业,突破口应该是教育事业。现行的教育体系,不管是基础教育还是高等教育,

^① 黄奇帆:《结构性改革:中国经济的问题与对策》,中信出版社,2020,第53页。

弊端重重,反过来意味着巨大的提升空间。改革、完善教育体系,最关键、最核心的问题是处理好公立教育与民间(私立)教育的关系和合理定位问题,应通过政策法规和财政资源的规范和诱导,使这两个方面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其次就是促进医疗卫生事业的长足发展,医疗卫生事业的情况与教育行业有若干共同点——现行医疗卫生体系的弊端和缺陷,同样意味着巨大的改良提升空间。物质消费需求满足之后,对精神文化方面的需求自然会占据更为重要的位置,文化娱乐事业需要大发展是显而易见的。而生产性服务业有长足的发展空间,是因为从全球经验看,生产性服务业在产业转型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通过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可以深化专业分工,从而降低制造业的交易与营收成本,通过“制造服务化”和“服务型制造”模式的变革,促进生产环节向高附加值的两端延伸,增强制造企业的盈利能力和更好地满足消费者偏好。此外,预计生活性服务业也将会有新的发展进步,新的业态、新的商业模式将不断涌现,其中的部分细分行业或有较大发展。

4. 更加充分合理地使用城市土地

以土地批租制度的进一步改革为重心,抑制“土地财政”及其附属权力的不合理扩张,压减产业用地比例,提高产业用地效率。新的土地使用制度框架应为:(1)城市政府对城市土地利用的管理、引导主要依靠城市规划。(2)除农地变性为城市土地需经过征地、政府(土地中心)收储、统一拍卖外,城市建成区内的国有土地转让一般均通过符合规划许可下的“补地价”形式实施。所谓“补地价”,是指改变土地使用性质或使用条件,必须经所有者(如政府)同意,并向其缴纳地价差额。通过“补地价”政策,实现城市土地的高效流转和有效使用。(3)城市土地国有下的永租制。通过批租出让的土地,使用年限到期后自动续租,但政府保留在服务于公共用途前提下对出让土地的征地权利,以及按年度征收土地使用费(地租)的权利。(4)土地批租的租金,既可一次性收取,亦可转为年租制,按年收取。两种形式并用。(5)政府制定好工业和工业区发展规划,提前做好大规模的工业土地征收和储备工作。制定优惠政策,鼓励已用地制造企业购买其所使用的国有土地,成为企业土地,并可进入工业土地市场流转。对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高科技产业等鼓励发展的产业,使其享受分类优惠地价,并可在经营期内按实际缴纳的税费总额的一个比例,逐年享受地价返还,也即税费可以抵地价。

(二)中周期背景下的动能结构优化设计

其一,抓住当前的时间窗口、机会窗口,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大胆布局、大胆投入。

打造最优营商环境。一方面,提高政府经济管理与监管服务的效率,降低制度成本;另一方面,不断降低税费成本、融资成本、物流成本、要素成本和劳动力成本等,使在武汉经营的企业能够享受到综合性的成本优势。

推动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大发展。以“两个一百平方公里”工业园区建设暨全市产业发展三年行动方案为核心,推动企业集聚、要素集约,使武汉市高端制造业的规模有显著的扩大和水平有显著的提升。在总体推进现代服务业发展政策体系支撑下,分类设计、分类改革,加快形成促进现代服务业发展的强大合力。

加快武汉新城及长江新区的建设。以五年为一个完整的建设周期,量力而行,做好相关的建设计划、产业发展规划。然后倒排工期,抓紧完成。并有效地完成土地批租及产业招商工作,勾勒出武汉新城及

国家级长江新区的大模样。

加速科技成果产业化。按照“少而精”的原则培育3~5个具有强大孵化功能的科研成果转化基地,以点带面,推动全市的“技术转化创新”。

改革全市国资管理体制。将市国资委按照新加坡“淡马锡”模式加以改造。国资委从出资人角度管理国有经营性资产,按年度承担严格的经济责任,每年根据中长期管理绩效兑现奖惩。

稳住房地产业基本盘。以保交楼为核心,支持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帮助一些基本面较好,只是遭遇了流动性问题的房地产企业渡过周期性难关。所有纾困政策在中周期房地产重新景气时退出。

其二,在中周期景气转向之前,及时收缩战线,增加现金储备,做好抵御2~3年严重萧条的准备。主要措施如下:

在景气高点之前,将以后2~3年的土地批租项目提前全部出清;将市属国企可能进行混改的项目,可能出让的股份全部出让完毕。

尽可能地使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在景气转向前建成投入使用。一般不考虑跨越危机年份的长线项目。努力使可能发生危机年份的基础设施在建项目的规模与政府“储备现金,渡过难关”的基本原则不发生抵触。

调整、完善政府的负债结构,降低总体负债率,拉长负债的还款期限。研究、模拟危机背景下政府的收入情况,使危机发生时的政府净收入能够充分覆盖政府的总体债务,不至于产生流动性问题。

作者简介:

辜小勇,武汉市社会科学院经济与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副研究员,研究方向为经济周期与经济形势分析、城市化、房地产等。

(责任编辑:周阳)

打造中国“赛车谷”， 促进武汉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

——基于国内外赛车运动及赛车产业发展的启示

李黎 周阳 陈龙 尹婧 张巍

摘要:从国内外赛车运动及赛车产业发展现状来看,发展赛车运动、赛车产业和赛道经济,是跨界链接“汽车文化后市场”“大体育”“娱乐”三大风口的重要举措,能够推动整个汽车产业生态的进化。打造一站式汽车“产业+文旅”城市综合体、汽车主题公园、赛车小镇、赛车谷等成为具有汽车产业发展优势或赛车文化潜质的城市或区域的重点发展方向。因此,武汉有必要、有条件抢抓机遇,加快谋划打造中国“赛车谷”,促进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

关键词:赛车谷;赛车运动;武汉;汽车产业

赛车运动也叫汽车运动,是世界上最受欢迎的体育运动之一,尤其是F1(世界一级方程式锦标赛)更是与奥运会、世界杯足球赛并称为世界三大赛事,顶尖的赛车手亦属于商业价值最高的运动员之一。赛车运动的发展已有上百年历史,众多汽车品牌希望凭借赛车运动中得到的成就,增强其在行业内的影响力,获取客户对品牌的认可。^①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汽车市场,近年来,不管是传统燃油车还是新能源汽车与智能网联汽车,汽车产业发展迅速,与此同时,各级各类赛车赛事如火如荼,一些将赛车赛事、汽车消费、文旅休闲、节庆会展、电子竞技、体验教培等业态进行跨界融合与全面重构的新消费场景、新体验模式孕育而生,打造一站式汽车“产业+文旅”城市综合体、汽车主题公园、赛车小镇、赛车谷等成为具有汽车产业发展优势或赛车文化潜质的城市或区域的重点发展方向。

汽车承载了人的第三空间,不管是构建完整的汽车产业链,深耕汽车后市场,还是顺应新时代人口需求、引领汽车运动文化潮流、打造地方特色文化体验平台,抑或是发力下一代汽车产业,加快从“中国车谷”迈向“世界车谷”,武汉都应该立足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雄厚的汽车产业基础、丰富的体育运动资源、国家级的体育产业示范基地等优势,围绕做强做优做大“中国汽车摩托车运动大会”等赛车赛事及相关产业,打造中国“赛车谷”。

^① 冯灼峰、汤伟雄、晏和玉:《赛车运动对汽车品牌价值的影响》,《汽车工业研究》2018年第2期。

打造中国“赛车谷”,营造一流环境、形成强大磁场、注入澎湃动力,是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汽车强国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省第十二次党代会部署的需要;是抢抓下一代汽车产业发展、汽车产业资源和产能向中西部转移集聚机遇,促进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需要;是抢占万亿级汽车产业走廊、全国汽车制造与研发基地、全国性汽车服务平台等制高点的需要。

一、国外赛车运动及赛车产业发展的历程及经验

赛车运动起源于车企之间的产业技术竞赛,是汽车厂商展示科技和实力的平台。汽车厂商通过赛车赛事,实验最新技术,提升车辆性能,推动汽车工业向前进步。赛车产业以赛车运动为载体,以赛车文化为核心,向上延伸至汽车研发、设计、原材料、汽车制造装备、汽车零部件、生产服务和基础设施等,向下延伸至时尚艺术、品牌、营销、休闲体验等,侧面扩展到辅助性产品和技术,是一条完整的产业链。同时,赛车产业能有效拉动赛事举办地和赛车基地城市的文化、旅游、酒店、餐饮、会展等行业的蓬勃发展,最后形成一个极具市场关注度和市场价值的产业生态系统。赛车运动市场辐射广阔,延伸行业市场规模巨大,能够形成产业集群,极大提升城市价值、推广城市形象,进而推动区域经济健康快速发展。国外不少城市因赛车而蜚声世界。

(一)英国“赛车谷”:赛车产业的硅谷

1950年,英国北安普敦郡举办了世界上第一场F1大奖赛,成为现代赛车运动的发源地。随后,北安普敦郡又兴建了两条赛道,更多世界级的汽车赛事在当地举行,各类赛车的零部件供应商和物流等支持性服务业也纷至沓来。赛车运动和赛车经济在北安普敦郡同时发展壮大,并逐渐影响着周边的地区,扩展到牛津郡和南安普敦郡,逐渐形成了世界赛车界和汽车制造业内的“赛车谷”,意为赛车产业中的硅谷。

英国“赛车谷”集聚了全球11支F1车队中8支的总部,每年举办上百场赛事,赛事组织、宣传、赞助等支持项目年收入达到17亿英镑,吸引旅游人次超过35万人次/年。根据英国赛车工业协会(MIA)统计,“赛车谷”聚集了4500家赛车相关企业,年营业总额达到90亿英镑,这些企业将超过30%的营业额投入技术研发,用于发动机技术、能源存储、空气动力学、轻量化材料及车身设计等方面的改进和突破,从业人员约4.1万人,其中近3万人是受过高级培训的工程师。同时,“赛车谷”以英国克兰菲尔德大学和牛津布鲁克斯大学等国际一流的技术学院为科技依托,集聚了一大批全球最尖端的赛车配套研发工厂和试验中心,其中有世界著名的英国克兰菲尔德大学F1现场撞击模拟试验室、迈凯伦技术中心等。

英国政府大力推动“赛车谷”的发展。2003年,成立了赛车产业集群的领导和管理机构“英国赛车发展局”,5年间投入近2000万英镑,从完善赛车经济的产业链和提高赛车运动的参与性两方面着手,打造赛车产业集群;建设创新中心,设立16个企业孵化器和“赛车100家”的联合会,为产业链上下游的企业相互联系、实现合作提供平台;发起“从赛车到航空”计划,鼓励和促进赛车产业和航空工业之间的技术转移和两个领域内企业的共同发展。

(二)法国勒芒:世界赛车领域最先进的技术实验室

勒芒只是法国西部一个有着20万人口的小城市。这座城市之所以能闻名于世界,主要是因为自1923

年开始,每年6月在此举行的“勒芒24小时耐力赛”。该赛事同世界一级方程式锦标赛(F1)、世界汽车拉力锦标赛(WRC)一起并称为世界三大汽车赛事。由于勒芒24小时耐力赛是全球各种耐力赛比赛时间最长的,而且选手驾车在同一环形赛道上要不停地转上350多圈,因此赛车手需要的是一台兼具速度、稳定性以及低油耗的赛车,这些都是21世纪汽车发展的大方向。所以,许多车厂都将勒芒看作是新车测试性能和耐力的地方,纷纷耗费巨资,将发动机、悬架、材料等各个方面最先进的技术应用于勒芒赛车上,想在这项大赛中取胜以提高公司声誉,这也让勒芒24小时耐力赛被称为“全世界先进技术的实验室”。

勒芒24小时耐力赛,每年吸引观众超过20万人次,最多的一年达到了30多万人次。该赛事每次虽然只举办2天,却能给勒芒带来数十亿美元的收入。

(三)美国纳斯卡车赛:撑起3家上市公司

美国纳斯卡赛事是全美运动汽车竞赛的总称,自1948年正式开赛以来,每年超过1.5亿名观众观看比赛,电视收视率更是远远超过棒球、篮球和橄榄球等体育运动。如果说F1属于绅士运动,走高端路线,那么纳斯卡则走的是亲民路线,虽然在影响力和知名度上无法与F1抗衡,但却凭借着平民性、融入性以及激烈的碰撞成为最受美国观众欢迎的汽车赛事。^①

纳斯卡的商业价值之一就是转播权。从2015—2024年,这项美国最为昂贵的赛事之一与两家转播商达成了总价值达82亿美元的合同,但纳斯卡的商业价值显然不止于此。从诞生至今,纳斯卡以契合国民性格和美国文化的独特赛事呈现形式,吸引了7000万名纳斯卡车迷,广泛的群众基础是纳斯卡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宝贵土壤。在此基础上,不仅仅有纳斯卡这项吸引人的赛事,而且诞生了无数凭借纳斯卡赛事而生存发展的商业公司,其中有3家公司登陆资本市场。这3家上市公司能从以纳斯卡为主的赛车赛事中得到总计约12亿美元的收入,市值总计达到近30亿美元。

二、国内赛车运动及赛车产业发展现状

国内最早的赛车文化起源于港澳地区,从港澳传来。新中国举办的第一届汽车赛事是1985年的港京拉力赛,从香港到北京路线总长3400多公里,纵跨7个省市。随着F1、A1、MotoGP、保时捷卡雷拉杯等顶级汽车赛事相继登陆中国,国内赛车运动近年来迎来了飞速发展期,大大小小的汽车赛道和赛车场如雨后春笋般建立。但由于功能过于单一、与汽车产业脱节、地方政府主导等,直接经济效益普遍不佳。时至今日,我国已形成几个大规模的汽车制造研发基地和集群,新能源和智能网联汽车全球领先,汽车保有量巨大且持续增长,基本到达了依托汽车产业基础进一步提升汽车文化和赛车产业水平的临界点。赛车运动、赛车产业和赛道经济是长产业链复合业态,是跨界链接“汽车文化后市场”“大体育”“娱乐”三大风口的重要举措,具备引领推动整个汽车产业生态进化升级的强大动能。从全国范围内来看,在这条发展道路上已有城市先行探索,如上海国际赛车场、天津武清V1汽车世界国际赛车场、成都天府国际赛道等。这三个案例充分说明了,在我国打造像沃尔夫斯堡市大众汽车城主题公园、法拉利主题公园等汽车产业文化的复合经济形态,是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一条可行路径。

^① 王亚飞、魏明江、姜绍忠:《以纳斯卡赛为例探讨我国赛车运动运营模式》,《汽车工业研究》2016年第6期。

（一）上海国际赛车场和上海国际汽车城

安亭镇位于上海市西北郊,是上海市“一城九镇”建设的重点镇,改革开放以来逐渐变成了汽车工业聚集地。从第一辆自行设计制造的上海牌轿车,到与德国大众合作生产的桑塔纳,安亭创造了中国汽车产业史上的许多第一。2001年,集制造、研发、贸易、博览、运动、旅游等多功能于一体的上海国际汽车城在安亭开建,包括核心区、整车制造和零部件配套制造区、国际赛车场、教育园区和安亭新镇区等主要区域。

上海国际赛车场及上海F1赛道是上海国际汽车城的名片,是上海营造汽车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上海F1赛道总面积约5.3平方公里,赛道总长度7公里左右,由赛车场区、商业博览区、文化娱乐区和发展预留区组成。商业博览区拥有大型购物中心和赛车博览馆。文化娱乐区建有健身运动设施、电影院、舞厅、酒吧、高级酒店、宾馆等各种文化娱乐设施。从2002年动工,到2004年建成并举办F1大奖赛中国站,上海国际赛车场保持了极高的上座率。F1像是一面招牌,拉动了安亭周边的汽车产业发展,上汽大众迁来总部,蔚来在此起家,理想、百度汽车把新总部放到这里,吉利、奇瑞、长城等都在此有研发基地,带动上下游供应链企业数千家在此发展。2016年上海国际汽车城整车产量达194.9万辆,产值突破2286亿元,成为中国首个整车年产量突破100万辆的生产基地。

（二）天津武清V1汽车世界国际赛车场和佛罗伦萨小镇商圈

天津武清V1汽车世界国际赛车场位于天津武清开发区,由美国威特集团与中国远洋集团共同投资建设,于2018年11月部分开业运营,规划建筑总面积60万平方米,是全国首创集成汽车创新生态园、汽车产业基地、赛车运动、体育运动、时尚生活体验的综合体。天津武清V1汽车世界国际赛车场拥有一条世界上距离高铁站最近的国际2级赛道,从武清站乘高铁到北京南站仅需21分钟,到天津站仅需13分钟,是北方最完善的国际赛车场,吸引国内外顶级车队、专业车手集聚于此,带动北方汽车赛车运动产业发展。在这里,除了可以享受到汽车线上线下零售服务、维修改装、试乘试驾等各种服务外,还可以体验到汽车博物馆、新能源汽车、智能汽车技术创新测验,以及汽车运动俱乐部和汽车赛道等诸多项目。天津市体育局将天津武清V1汽车世界国际赛车场确定为天津首个汽摩运动基地,举办了2022京津冀体育产业大会、京津冀赛车节,以及汽车场地挑战赛、摩托车金卡纳公开赛、汽车漂移表演等赛事活动。

佛罗伦萨小镇京津名品奥特莱斯,是中国首座纯意大利风格的大型高端名品折扣中心和休闲文化中心,每年吸引游客超过1000万人次,年销售额超60亿元,入选全国购物中心销售排行榜前三。2021年7月,天津成为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培育建设试点后,在紧邻京津城际武清站的V1汽车世界国际赛车场、佛罗伦萨小镇、创意米兰时尚生活广场及周边地区大力推进消费升级,聚集高端名品消费、汽车特色产业消费、文创产业消费、文旅商体综合消费,打造佛罗伦萨小镇商圈,形成“品牌街+赛车+小镇”发展模式,日益成为京津冀地区餐饮零售、旅游购物、运动休闲的绝佳娱乐购物目的地。

（三）成都天府国际赛道和方程时空港项目

成都曾于2007年建成金港国际赛车场,是西南地区赛车爱好者的根据地,但在2018年因距离主城较近成为中国首个被拆迁的赛车场。2021年,成都市与吉利铭泰集团签约在东部新区简州新城核心区域建设方程时空港项目,包括吉利学院、吉利铭泰汽车科技文化世界和天府国际赛道等重点工程。先期2020

年3月吉利集团于1999年在北京创建的北京吉利大学已整体搬迁至成都,并更名为吉利学院。吉利铭泰汽车科技文化世界项目总投资70亿元,包含汽车娱乐世界、水世界、科技海洋世界、度假酒店、新商业等业态。天府国际赛道项目分三期规划建设,一期修建一条二级赛道,可举办除F1以外的所有高级别公路赛事,配套4S商业集群和改装车间;二期修建800米美式环形赛道,引进纳斯卡赛事,增加规模化的房车营地;三期建设东区赛道,并与一期赛道联通,形成一条总长度为6公里的F1标准赛道。

成都天府国际赛道和方程时空港项目建成后,将发力“赛道+”商业模式,打造国内最具影响力赛道商业综合体,具备赛车赛事、新车发布、汽车销售、汽车体验、汽车娱乐、商业活动等多种功能,成为西部地区汽车运动胜地。若能如期引入F1方程式比赛,将进一步成为具有“国际范”的汽车文化及运动平台,集教育、汽车文化、国际赛道、城市功能配套于一体,开启文、商、旅、体深度融合的创新型汽车生活方式。对于简州新城而言,其兼具产业孵化器功能,有利于借助校地合作、校企合作等多种创新模式,赋能上下游产业链,促进区域汽车及后市场产业周边生态链企业群招引、孵化落地与高效发展。

三、武汉有必要、有条件打造中国“赛车谷”

作为全国六大汽车产业基地之一,武汉完全有必要、有条件抢抓机遇,延伸汽车产业链,打造中国“赛车谷”,推动武汉和湖北汽车工业实现高质量发展。

(一)打造中国“赛车谷”顺应国内外和自身产业发展趋势

从全球汽车工业变革趋势看,燃料电池、混合动力等新能源发展加快,汽车制造与互联网加快融合,一场以节能化、低碳化、网联化、智能化为代表的汽车发展浪潮,正在改变全球汽车产业格局。特别是基于互联网的智能网联汽车,是未来汽车产业发展的重要方向,是对传统汽车产业的颠覆式创新。迫切需要通过赛车这一平台,推动智能网联汽车技术创新试验、升级发展。打造中国“赛车谷”,就是通过集聚汽车产业前沿科技和工业制造先进水平,不断抢占全球汽车工业技术的竞争制高点,引领汽车产业转型升级。

从我国经济发展看,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居民消费正逐步转变为个性化、多样化的高品质消费。党中央、国务院积极主动适应这一趋势,将发展体育产业作为促进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力量,着力推动体育产业总规模到2025年实现5万亿元。发展赛车产业,打造中国“赛车谷”,是落实国家加快发展体育产业政策,适应我国经济发展和消费需求转型升级,满足人民群众高层次精神需求的必然要求。

从武汉汽车产业现实看,武汉是各大车企重要的仓储、物流、制造基地,但研发设计功能相对不足。随着传统汽车制造发展瓶颈问题的显现,我市汽车销量增速已现拐点,亟须寻找新的发展风口。通过发展赛车产业,打造中国“赛车谷”,将有助于武汉补齐汽车研发设计功能,为汽车制造提供系统性支撑,助推武汉汽车工业弯道超车。

(二)打造中国“赛车谷”具有良好的科教实力和人才资源潜力

东风设计研究院为国家级工业设计中心,新能源汽车工研院发展加快,法雷奥车灯研发中心、康明斯东

亚研发中心、汉阳专用汽车研究所等车企研发中心和行业技术服务机构实力在国内领先。以华中科技大学、武汉理工大学、武汉设计工程学院为代表的大专院校在汽车领域人才培养方面卓有建树,全国第一所赛车学院“中国赛车学院”落户江汉大学,首届31名赛车赛事专业毕业生即将迈上工作岗位,并且供不应求。特别是武汉现有国家级职业车队6支,高校车队4支,拥有G级飘移执照车手9名。武汉籍国际职业赛车手程飞,在第61届美国赛百灵12小时耐力赛中荣获冠军,是第一个获得世界级赛车冠军的华裔选手,其所在耀莱成龙DC车队就在武汉注册。此外,还云集了谢欣哲、胡云飞、朱磊、严凯等国内著名职业赛车手。

(三) 打造中国“赛车谷”具有较好的赛事和赛道基础

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拥有武汉体育中心等顶级体育设施,近年来大力推进产城融合,支持体育产业发展,举办了“世界飞行者大会”“跳水世界杯”“羽毛球世锦赛”“足球世界杯预选赛”等国际顶级赛事,精彩上演CTCC武汉街道赛,获批武汉首个国家体育产业示范基地。尤其是连续成功举办国内规模最大、级别最高、项目最全的汽车摩托车运动综合赛事——中国汽车摩托车运动大会,汽车赛事氛围日益浓厚,赛车上下游产业快速集聚。开发区已建成两条专业赛车赛道,全国唯一、全球罕有。一条是围绕武汉体育中心的中国第一条依湖而建的街道赛赛道,2017年建成,国际三级标准,总长2.98公里,13个弯道,连续举办三届顶级赛事,被誉为中国迄今最成功的街道赛赛道。另一条是2022年竣工的F2级赛道,位于武汉智能网联汽车测试场,是世界唯一F2级赛道和T5级测试场结合的项目。新赛道全长4.3公里,既可以满足世界最高等级自动驾驶汽车测试,也可以举办除F1方程式以外的所有国际国内顶级汽摩场地赛事,还能汽车厂商提供试乘试驾、性能测试、新车发布等多种服务。两条赛道可以各司其职,F2级赛道举办WTRC、CTCC等顶级场地赛事,街道赛赛道举办顶级街道赛事。

四、关于武汉打造中国“赛车谷”的基本构想

近年,“积极培育汽车摩托车运动等体育消费新业态”“积极发展汽车赛事、旅游、文化、改装等相关产业,深挖汽车后市场潜力”等成为我国推动消费升级、激发消费活力的重要内容。“建设场地设施,增加要素供给,优化体育产业供地”“实施‘体育+’行动,促进融合发展”“促进区域特色体育产业发展,引导汽车摩托车、航空等运动项目产业合理布局”等是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点方向。2022年7月,国家体育总局印发《关于体育助力稳经济促消费激活力的工作方案》,要求加大赛事供给,安全有序恢复线下体育赛事,以及加快投资建设,支持各地加快体育公园、全民健身中心、公共体育场等体育设施建设进度。武汉应抢抓重要政策机遇,加快谋划推进中国“赛车谷”建设。

(一) 总体目标定位

以举办国际顶尖汽车赛事为契机,以做大做强中国赛车学院为依托,吸引整合全球顶尖创意、科技、时尚、运动、文化等要素资源,打造中国“赛车谷”,建设覆盖研发设计、生产制造、体验消费等赛车全产业链,推动中国重要自主品牌汽车研发基地、国家新能源和智能网联汽车基地建设,促进汽车运动和汽车产业深度融合联动发展,努力打造世界级汽摩赛事中心、世界级新能源及智能网联汽车创新中心、全球知名

赛车之城。

丰富完善武汉新能源和智能网联汽车试验场功能,壮大中国赛车学院规模,围绕试验场谋划建设国际一流的专业赛车场及其配套设施,适时升级赛道满足并争取国际国内高水平汽摩赛事落户,建成国内一流汽摩运动体验中心,推动赛车相关产业发展,助力汽车消费升级,成为世界级汽摩赛事中心、中部地区汽车运动胜地、汽车“产业+文旅+教育+赛道”城市综合体,成为兼顾专业赛事与大众参与的汽车文化乐园、世界车都的亮丽名片。

(二)具体举措建议

一是谋划中国“赛车谷”空间布局。以武汉国家智能网联汽车测试场的3600亩规划面积为重点区域,以F2国际赛道为依托,建设武汉国际赛车场,并规划更大空间范围的中国“赛车谷”(5平方公里左右)。以超前理念、世界眼光,向全球征集方案,做好顶层设计和长远规划。重点对标上海国际赛车场和上海国际汽车城、天津武清V1汽车世界国际赛车场和佛罗伦萨小镇商圈、成都天府国际赛道和方程时空港项目等,考虑赛车俱乐部、赛车学校、汽车7S店集群、汽车后市场中心、汽车改装集群、汽车会展博览中心、赛车主题文化广场、商业中心、五星级酒店群、主题餐厅,以及汽车特色游乐小镇、高端住宅等功能,积极打造4A级以上国家旅游景点。

二是推进中国赛车学院建设。支持在中国“赛车谷”核心区布局建设中国赛车学院(江汉大学分院)。坚持国际化、高端化的发展定位,加强与世界知名赛车教学、科研机构合作,推动赛车大数据应用、汽车休闲产业、新能源和智能网联汽车等研究中心建设,努力打造中国汽摩运动研发创新、人才培养、产业培育的“黄埔军校”,促进赛车“产学研用投”一体化发展。

三是谋划举办国内外顶级汽车赛事。围绕“赛事引进高端化、赛道经营多样化、赛车产业集群化、赛事文化普及化”的综合立体融合式发展理念,逐步形成“国际顶端赛事+国内一流赛事+长江中游区域性赛事+大众体验娱乐+普及汽车和赛车文化”的市场形态,推进武汉赛车运动和赛车产业规模化、国际化发展。持续办好世界房车锦标赛中国站、中国房车锦标赛、国际汽联F4锦标赛等国内外顶级赛事,争取中国汽摩运动大会永久落户武汉,争取针对新能源量产车的世界跨界拉力锦标赛落户。筹划举办以武汉冠名的中国智能网联汽车、氢燃料电池汽车等国家级赛车赛事,以及以长江中游城市群冠名的赛车赛事和赛车节。积极引入中国智能汽车大赛、世界智能驾驶挑战赛、i-VISTA自动驾驶汽车挑战赛等自动驾驶专业赛事,更好展现自动驾驶方面的最新成果和技术,加快促进自动驾驶产业化、商业化。

四是推动赛车产业链和汽车产业链发展。依托国内外重大赛车赛事,引进赛车研发设计、改装装饰等领域世界领军企业及研发机构,积极发展汽摩运动展示、体验、消费新业态,打造上中下游全面覆盖的赛车产业生态。大力吸引世界及国内知名车队落户,努力打造我国第一个赛车赛事产业集群。推进赛车赛事产业集群与汽车产业集群融合互促发展。

五是加快与飞行者大会、通航产业对接。借鉴英国赛车谷服务航空产业发展的经验,引入吉利飞行汽车等新型航空产品研发机构,推动新能源、新材料、新动力研究由汽车领域向通用航空等工业产品领域拓展,提升通用航空产品研发应用水平,实现“铁马”与“飞马”、汽车产业与通用航空产业协调发展。

六是完善工作机制。成立工作专班,统筹推进“赛车谷”规划建设,优化“赛车谷”建设运营机制,依托

市场化手段推动共建。联合汽车领域行业协会,以及国内主要城市赛车协会、有关高校及研究机构、赛车赛事企业等,推动创立赛车行业联盟,为中国“赛车谷”规划建设提供支持。

作者简介:

李黎,市供销社理事会副主任,党委委员;

周阳,经济学博士,武汉市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所副所长、副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城市和区域经济等;

陈龙,市委政策研究室(改革办、财经办)财经综合处处长;

尹婧,市委政策研究室(改革办、财经办)城乡生态处副处长;

张巍,市委政策研究室(改革办、财经办)文化社会处副处长。

(责任编辑:林丽)

中欧班列(武汉)与产业融合发展研究

胡爽平 杨乐 陈雯

摘要:中欧班列(武汉)作为推动武汉融入“一带一路”国家贸易的重要抓手和载体,在丰富通道方式的同时,重塑武汉与欧洲的经济地理,也极大地推动了产业融合发展。本文分析了中欧班列(武汉)与产业融合的发展现状、存在问题及产生的原因,对新发展格局下加快推动中欧班列与产业融合提出新的思考建议。

关键词:中欧班列(武汉);产业融合;新发展格局

规模化运营的中欧班列既通过互联互通缩短了中欧贸易的“时空距离”,也通过贸易投资便利化缩短了“非时空距离”,还通过磁场效应改变了贸易格局和产业布局,极大地推动了产业融合。在新发展格局背景下,武汉对外开放有望迎来更大飞跃,中欧班列(武汉)必将与更多产业联结,在推动武汉产业链供应链分工和实现通道、贸易、产业深度融合等方面将发挥更大作用。面对国际国内发展形势,中欧班列(武汉)发展机遇和挑战并存,还需要在体制机制、平台建设、产业对接等方面不断探索创新,推动中欧班列(武汉)与产业高质量融合。

一、中欧班列(武汉)与产业融合发展现状

(一)中欧班列(武汉)扩大了武汉国际物流的“辐射效应”

中欧班列(武汉)以其运距短、速度快、安全性高的特征,使物流条件得到了颠覆式改变,已成为国际物流中陆路运输的骨干方式,有效地带动了通道经济的繁荣发展。中欧班列(武汉)除常态化运行的“公共专列”外,还有专门为大型出口企业提供的“定制专列”,又有随到随走为中小企业提供的拼箱版服务的“散发列车”,还有为特殊货物提供的“冷链专列”,并开通“日本—武汉—欧洲集装箱水铁联运国际中转新通道”等铁海联运、多式联运增值服务,已拥有41条稳定的跨境运输线路,有效地带动了武汉仓储、分拨、转运、拆拼箱等增值配套服务业发展,大大提高了物流服务效应,辐射欧亚大陆40多个国家、100多个城市,境外服务面积达3000万平方公里,初步形成了“联通欧洲、覆盖中亚、衔接日韩、边境东盟”的国际多式联运服务网络。

(二)中欧班列(武汉)推动了武汉外向型经济发展

中欧班列以运带贸、运贸一体化,通过直采、直购、全程溯源,支持一般贸易、跨境电商、国际邮包等多种

贸易方式,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制造商、贸易商等建立直接合作关系,为产业搭建国际贸易供应链平台和推进对外贸易持续健康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中欧班列(武汉)铁路通道与本地产业的匹配度高,不仅为东风汽车、神龙汽车、烽火科技、长飞光纤、明德生物、人福医药、稳健医疗、安琪酵母等重点企业拓展海外市场,而且带动了省内宜昌、襄阳、十堰、荆州等地外贸产业的发展,为扛起“一主引领”担当发挥了积极作用。2021年,中欧班列(武汉)进出口货值127.96亿元,承运货值占湖北省对欧盟地区进出口总值的18.42%。

(三)中欧班列(武汉)强化了资源汇聚和产业聚集

中欧班列的开通不仅为商品贸易提供了一个新的通道,而且也提供了一种新的产业集聚选择,让外向型产业集聚成为可能,为更加开放的产业格局奠定了基础。通过大力发展“班列+产业”模式,在服务好本地外向型企业的同时,中欧班列(武汉)吸引了来自长三角、珠三角等地大量货物在武汉集聚,发往德国、俄罗斯、法国等欧洲国家,推动了光电、服装、木材等产业在武汉聚集发展。比如,吸引富士康、冠捷将沿海城市的部分产能转移到武汉;促进法国迪卡侬将江浙地区的采购订单转移到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等地;促成黑龙江、福建、广东等众多木材贸易商在武汉建设进口木材的加工、集散、分拨基地,助推武汉形成一级木材交易市场、国家战略物资储备基地。中欧班列(武汉)强化了资源要素汇聚功能,成为产业集聚的“吸金石”。

二、中欧班列(武汉)与产业融合发展存在的问题

(一)运量滑坡增长受限,严重影响与产业融合发展可持续性

从纵向比较来看,开行数量和发运量自2018年后滑坡严重,2020年又因疫情影响停运2个月,班列仅230列。虽然近两年增长速度较快,但总量依然不足。从横向比较来看,2014年中欧班列(武汉)开行列数位居全国第3(占全国的13.6%),2018年开行列数开始下滑位居第5(占全国的6.5%),2022年占比为3.8%,与西安、成都、重庆、郑州、乌鲁木齐五大集结中心城市的差距逐步拉大,也落后于长沙、合肥、义乌、金华等后来居上的城市,在前有标兵、后有追兵的形势下,发展空间受到明显挤压。(见图1、2)运量的严重滑坡和增长受限将严重阻碍班列与本地产业的持续融合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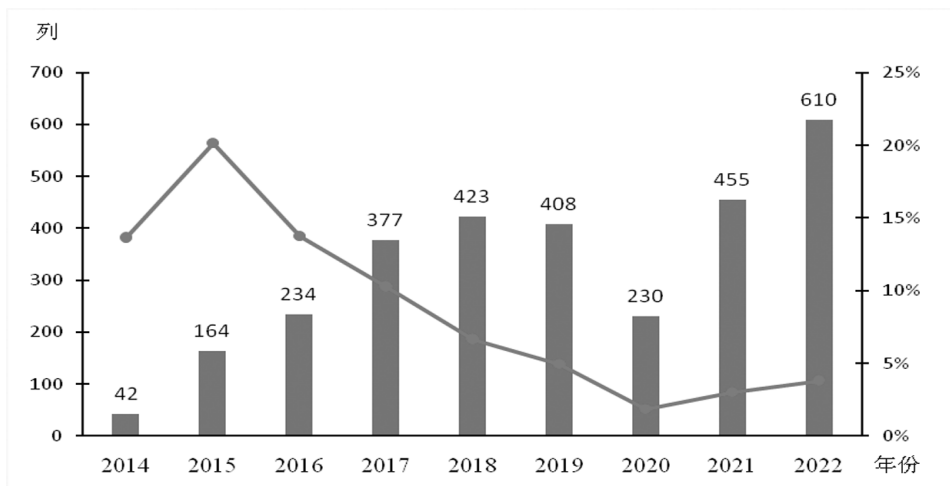


图1 中欧班列(武汉)开行数量及全国的占比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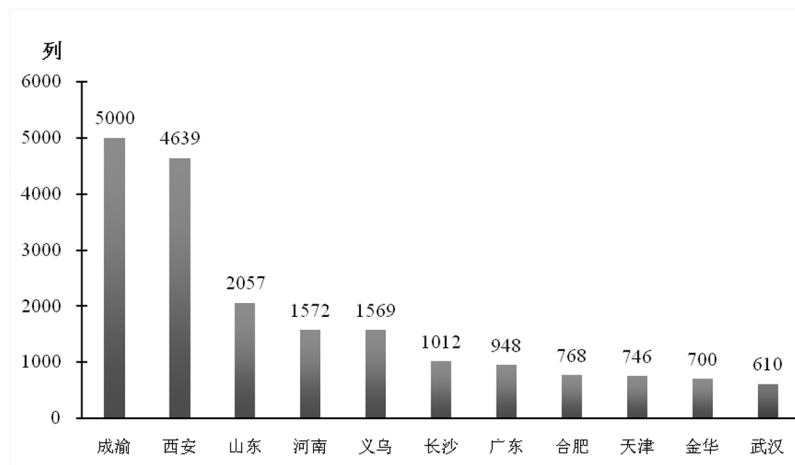


图2 2022年主要地区中欧班列开行量

(二) 货源组织范围相对较小, 极大限制了产业融合能级跃升

中欧班列(武汉)考虑到运营企业的最大承受能力,以保通道保功能、保湖北武汉本地企业国际运输为主,货源组织以省内为主,服务范围相对较小,对外辐射能力受限,产业融合能级很难实现突破。目前,中欧班列(武汉)主要服务于湖北省内外贸出口企业,武汉市货源占比超80%以上。相比之下,中欧班列(西安)采用陆铁联运方式,实现高频次稳定开行,运输省外货物超过75%。郑州通过在运输组织、货源组织、金融和信息服务等方面先行先试,对1500千米以内货源地的货物实行免费集结,中欧班列(郑州)在运输货物中,河南本地企业及产品占比较少,绝大多数为外地企业及货物。与其他城市相比(见表1),武汉对外辐射服务能力还需大力挖掘。

表1 中欧班列开通省市组织本地货源占比情况

城市	武汉	合肥	成都	乌鲁木齐	山东	重庆	义乌	长沙	郑州	西安
本地货源占比	>80%	70%	70%	60%	55%	>50%	45%	40%	40%	25%

(三) 进出口货物品类结构较单一, 制约了产业融合的带动能力

目前中欧班列(武汉)输送的货物品类主要为光电子产品、机械设备、服装、汽车零部件和防疫物资等本地特色产业。对照海关总署与商务部的进出口商品22类标准来看,中欧班列(武汉)目前去程和回程货物主要品类基本吻合,进出口货物结构较单一。^①从去程货物来看,第16类商品(机电及其零件、附件)为最主要出口货物,德国为该品类的最大需求国;此外,第17类商品(车辆及汽车零部件)、第11类商品(服装)和第18类商品(医疗物资、杂项制品)也有一定出口需求。从回程货物来看,主要为俄罗斯进口的第5类商品(木材)和第16类商品(机械设备)为主要进口货物,占武汉进口贸易额的65%;其次还有第17类(车辆)、第4类(食品、酒)和第11类(棉纱)。从货源类型来看,中欧班列(武汉)运送的货物大部分为机电、机械、汽车零部件等高价值、时间敏感类技术型产品,相较于重庆、成都、西安、郑州等城市来看,

^① 穆焱杰、杨永春:《中国西部城市国际货运班列的线路特征、货物类型及货源组织》,《世界地理研究》2021年第4期。

肉类、粮食、水果、水产品等初级产品和资源型产品很少(见表2)。可见,中欧班列(武汉)输送的货物品类结构还较为单一,推动产业融合能力有限,从而影响产业融合的带动力。

表2 主要城市中欧班列运营和货物品类情况表

城市	开通当年	2021年
重庆	笔电产品	笔电产品、液晶面板、集成电路、电子通信、汽车整车、农副产品、生物医药、水果、肉类、奶粉等
成都	电子产品、家用电器	汽车及配件、机械产品、电子产品、服装鞋类、肉类、食品、花木水果、日用品、粮食等
郑州	轮胎、高档服装、文体用品、工艺品等	电子产品、高档服装、冷链产品、医疗器械、机电产品、水果、粮食、肉类、冰鲜水产品等
西安	工程机械、家用产品、服装等	工程机械、服装、快消品、电子设备、粮食、汽车、肉类等
武汉	电子产品、汽车整车及零部件等	电子元器件、汽车零部件、机械设备、衣服鞋帽、保健品原料、电子产品、茶叶等
长沙	茶叶、瓷器等	机电产品、茶叶、服装、鞋帽、陶瓷、食品、钢铁、水果、冰鲜水产品等
合肥	服装、工艺制品等	太阳能光伏、传感器、机器人等产品

(四)运营平台规模实力较弱,抑制了产业融合的有效推进

和水运比,中欧班列天然没有成本优势,随着补贴退坡政策的实施^①,之前靠财政补贴填补资金缺口的方式不再延续,那么班列公司的运营能力就显得尤为重要。据了解,重庆、成都、西安、郑州等在开行之初便组建了实力强劲的平台公司(见表3),能够应对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欧班列(武汉)的运营公司为武汉汉欧国际物流有限公司,是武汉港发集团二级子公司。自运营以来,武汉汉欧国际物流有限公司虽通过国际贸易、货运代理、园区运营、冷链运输等业态盈利来反哺班列运营,但业态创效能力不足,规模较小、利润杯水车薪,与其他城市中欧班列平台公司相比,其体量小、实力弱、资源少、自我造血能力差,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产业融合的有效推进。

表3 主要省市中欧班列运营公司运营模式表

地区	运营模式
成都	成都国际铁路班列有限公司为成都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下属成都国际铁路港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简称港投集团)投资成立的国有全资子公司。港投集团下属三个子公司,分别负责不同工作,其中陆港公司作为销售公司,负责组织货源、港口管理;自贸公司作为金融公司,提供平台,保障运行所需资金流,并进行供应链金融创新;班列公司负责境内境外铁路组织。班列补贴发放由港投集团直接给付
重庆	唯一一个由中国、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和德国四国铁路部门和重庆交通运输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四国五方”共同合资组建的铁路物流企业。班列补贴由重庆国际物流枢纽园区直接拨付
西安	西安班列由西安国际港务区统筹运营,分三个公司运营不同线路。中欧班列(长安号)由西安国际陆港多式联运有限公司运营,该公司是西安国际陆港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的子公司,主要负责中欧班列(长安号)的组织 and 运营工作,西安自贸港建设运营有限公司负责运营中亚线路,中国外运股份有限公司负责运营俄罗斯回程木材及大宗散货运输
郑州	郑州班列是由郑州国际陆港开发建设有限公司负责运营,由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和河南中豫国际港务集团有限公司联合组建,是一家省属国有独资企业
长沙	长沙班列是由湖南中南国际陆港有限公司运营,长沙交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33%)及中外运物流华南有限公司(67%)控股,省级占比40%,市级占比60%
江苏	江苏整合南京、徐州、苏州、连云港等市资源,并引入央企资本,组建江苏省国际货运班列有限公司,专门负责班列运营

^① 财政部从2018年开始,要求地方政府降低中欧班列补贴标准:以全程运费为基准,2018年补贴不超过运费的50%,2019年补贴不超过40%,2020年将不超过30%。

三、影响中欧班列(武汉)促进产业融合发展的原因分析

(一)顶层设计还不够,班列促进产业融合的重要性得不到体现

中欧班列(武汉)已成为服务全省的重要战略通道和支撑平台,但省市对中欧班列重视度还有待加强,需要在顶层设计上加强班列服务全省、全市的战略定位,在统筹、协调、规划、政策等方面构建省市共建机制。据了解,成都搭建市、区和铁路部门联合出资平台,实行场站、班列、产业、贸易一体化运作,盈亏互补,出台市、区两级补贴机制,并对区内土地出让金予以返还。郑州搭建由省、区两级国资联合出资的平台,形成省、市、区三级政府共同承担的财政补贴模式,同时还充分利用大平台公司土地开发资金支持班列快速发展。重庆搭建“四国五方”平台公司,形成了市、区政府共同承担的财政补贴模式。除了资金支持之外,重庆还通过重庆国际物流枢纽园区平衡土地等方式支持班列快速发展。西安运营平台财政补贴资金严格按政策规定执行,其余资金由上级公司的房地产、市政工程等业务板块获得的盈利以线路开行奖励的形式给予。江苏整合南京、徐州、苏州、连云港等市资源,并引入央企资本,组建江苏省国际货运班列有限公司,专门负责班列运营。相较于以上城市,中欧班列(武汉)尚缺乏强有力的领导协调机制来建立可持续的市场化运营模式维护资金平衡。此外,无论是中欧班列(武汉)的运营企业汉欧国际物流有限公司,还是投资和土地属地东西湖区政府,在行政权属上和业务对接上与国家铁路集团和海关部门都不具备对等性,导致在线条申请协调、口岸申报、争取政策支持等方面的工作均不能有效开展。

(二)线条制约严重,运能受限制约班列的良性发展

据调研了解,目前中欧班列(武汉)货源充足,但受国家铁路线条配比限制,货物严重积压而不能及时运出。国家铁路集团安排年度铁路线条的依据为上年度总运量,2020年中欧班列(班列)受疫情影响滑坡到230列,直接导致中欧班列(武汉)2021年的配比严重不足,其后影响每一年的增长。2022年,武汉每周只有4条出口线路,而成渝班列每天计划7列班列出口,西安每天计划6列出口。根据目前市场需求,武汉本地货源发运预计每周15列左右,线条配比的严重不足,一方面直接造成组织的货源运不出,企业损失巨大;另一方面无法大量揽货会造成货源的流失,班列货源组织能力被不断削弱,严重阻碍了其良性成长。中欧班列(武汉)目前只能勉强满足省内本地企业和老客户,无法有效地组织货源。

(三)功能平台及配套滞后,班列能级提升慢限制产业融合拓展

多年来,中欧班列(武汉)运输能级都没有得到跨越式提升,且从全国前三下降到十名开外,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功能平台及相关配套设施滞后。具体来看,一是通关口岸数量少。相较重庆、成都、郑州、西安、长沙、义乌至少有4个进口商品指定口岸(见表4),武汉只有整车进口和药品2个铁路指定口岸,缺少粮食、肉类、水果、国际邮包等指定口岸资质,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进口货物的运输品类,无法有效拓展服务产业链。二是平台公司缺少有效配套支撑。如重庆、成都、西安、郑州均为中欧班列配备了大型物流园区和产业园,而中欧班列(武汉)配套的物流园规划面积小且还处于起步建设阶段。三是口岸功能发挥不够。班列口岸资源碎片化、基础设施相对较为落后、站内的海关监管区建设面积偏小、关检及多式联运监管配套服务不够完善、通关便利化有待提升等问题也严重制约了口岸功能作用的发挥。

表4 主要城市口岸开通情况和集结中心园区配套表

城市	铁路口岸	园区配套情况
西安	拥有进境粮食、进口肉类、整车进口、跨境电商、进口药品等5个监管场地及指定口岸	中欧班列(西安)集结中心港口功能区项目占地超过7500亩,建设有进口木材加工交易基地、海铁联运仓库、加工制造服务区冷链仓库及相关配套设施;“一带一路”临港产业园项目总占地1000亩
成都	拥有进境肉类、进境粮食、进口整车、进口药品、木材、多式联运海关监管中心等6个功能口岸	成都国际铁路港经济技术开发区规划面积为18360亩,具备汽车整车、肉类、粮食指定口岸和木材监管区
重庆	拥有整车进口、进口药品、进境肉类、进境水果、复合木材等5个监管场地及指定口岸	重庆国际物流枢纽园区规划面积53250亩,园区独占重庆铁路口岸(复合木材、药品、肉类功能)、整车进口口岸、重庆生物制品口岸和药品进口口岸和重庆铁路保税物流中心(B型)等多个开放型设施
郑州	拥有进境水果、进口肉类、冰鲜水产品、食用水生动物、屠宰用牛、汽车整车、国际邮件、进境粮食等8个功能性口岸	郑州国际陆港航空港片区总规划面积28650亩,打造世界级国际铁路枢纽港、中欧班列运贸产创新发展示范区、内陆口岸经济高质量发展先行区
武汉	拥有整车进口、药品2个指定口岸	规划面积215亩,建成后,将打造集班列服务、国际进出口食品加工、国际贸易等于一体的现代化综合物流园
长沙	拥有冰鲜水产品、食用水生动物、药品、水果等4个指定口岸	中南国际陆港金霞保税物流中心,内设海关出口监管仓和普通仓
义乌	拥有冰鲜水产品、肉类、水果、跨境电商等4个指定口岸	义乌铁路口岸项目规划总用地约1616亩,概算投资48亿元。含四大物流板块,分别是仓储物流、口岸物流、冷链物流、公路物流

(四)市场化运行机制不完善,市场挖掘不够

全国陆续开行中欧班列的城市已达90多个,各班列所在省市区政府高度重视,均利用财政补贴大力扶持中欧班列运行,抢占市场货源,增加班列运行数量,一定程度上出现虚假繁荣的现象。由于地方政府对中欧班列的过多干预,导致中欧班列市场化经营效率低,加剧了各运输企业之间的恶性竞争,扰乱了正常的市场秩序。在这样的现实压力下,加上平台公司整体运营能力较弱,中欧班列(武汉)无法通过提高揽货价格以达到收支平衡,应对市场变化和抵御市场风险能力薄弱。

四、推动中欧班列(武汉)与产业加快融合的对策建议

(一)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强化中欧班列(武汉)与产业融合的制度保障

一是高度重视中欧班列(武汉)对武汉未来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中欧班列作为国家战略资源仍处于发展期,还存在综合运输成本偏高、供需对接不充分、无序竞争时有发生等问题,但我们要看到它对实现物流运输高质量发展、提高武汉外贸核心竞争力、拉动经济发展等方面具有多重效应^①。湖北省、武汉市应将其视为国家战略资源,充分意识到其在新发展格局中的战略作用。

二是完善省市协同推进机制。充分发挥班列高质量发展省级联席会议制度的作用,加强省市统筹协调和定期会商,形成省政府领导亲自挂帅、省级部门协力支持、武汉市主体推动的运转高效的联动工作机制。当务之急是需要省市共同协力与国家铁路集团协商,争取更多的线条支持,解决中欧班列(武汉)线

^① 据华中科技大学测算,在不考虑消费诱导贡献的情况下:中欧班列(武汉)运行每投入1元,对GDP的总贡献当量为10.50元。其中,直接贡献增加值0.38元,间接贡献增加值10.12元。在考虑消费诱导贡献的情况下:中欧班列(武汉)运行每投入1元,对GDP的总贡献当量为20.34元。其中,直接贡献增加值0.38元,间接贡献增加值19.96元。

条严重不够问题。

三是创新奖励政策。针对财政补贴逐步退坡,探索奖励补贴、土地出让金预留、土地综合开发利用等多渠道支持机制,增强班列运营可持续性。建议设立中欧班列(武汉)专项奖励资金,对相关外贸企业、物流项目和重点企业、公共服务设施、基础设施建设等给予财政支出支持,引导更多的企业发展国际运输。

(二)搭建服务大平台,夯实中欧班列(武汉)与产业融合的现实支撑

一是积极申报第二批中欧班列集结中心示范。在集结中心示范工程建设的推动下,中欧班列有效降低了中西部地区的运输成本,为中西部地区搭建起参与全球经济的重要平台。武汉虽未能入围第一批中欧班列集结中心,但应该充分考虑到武汉的产业基础、资源禀赋、经济腹地等支撑作用,考虑到中欧班列(武汉)的服务质量、运营能力、辐射范围和发展潜力,应创造条件积极争取第二批中欧班列集结中心示范工程建设。

二是打造一体化运作平台。建议东西湖区加快启动吴家山国际陆港规划编制,充分整合辖区物流、产业资源,规划布局周边配套产业,预留枢纽经济发展空间,高标准打造吴家山国际陆港,以港产城一体化发展模式支撑班列逐步提高市场化发展水平。建议学习借鉴重庆、成都、西安、江苏、山东等地模式,支持运营平台构建与省内其他市州、本地开发区、自贸区、综保区等开放平台的有效战略合作。加快汉欧国际综合物流园区建设步伐,打造集班列服务、国际进口食品加工、国际贸易等多业态于一体的国际现代化综合物流园。

三是加强口岸功能建设。建议借鉴其他城市完善指定铁路口岸资质的做法,积极争取国家支持,推进粮食、肉类、水果、国际邮件、跨境电商等进口口岸资质申报建设,丰富铁路口岸功能。同时,优化整合口岸资源,加快建立物流协调机制,合力解决中欧班列(武汉)遇到的不同方面的困难,实现报关、报检、清关等流程网络化。

四是提高运营企业的经营能力。建议整合多方资源,重组班列运营平台,做强运营主体。树立中欧班列(武汉)品牌效应,在服务、速度价格等方面,争取最优化,保障中欧班列(武汉)通道服务质量,打造一个快捷高效、实惠安全的多式联运的国际化货物运输品牌和便捷化的运输通道。支持企业开展设施联通、功能联合、资源共享,提高全程信息化数字化水平。

(三)强化产业对接,挖掘中欧班列(武汉)与产业融合的发展潜力

一是强化与本地产业深度融合。整合湖北武汉本土外贸资源,加快制造业、农产品加工业转型升级,进一步提升武汉外贸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围绕“965”产业体系,发挥产业优势,做强制造业专列,稳定外贸外资基本盘,保持中欧班列(武汉)的可持续发展动力。

二是积极探索产业合作潜能。2016年重庆借后谷咖啡与中欧班列(重庆)合作的契机,成立了咖啡交易中心,咖啡产业实现了“从无到有”。中欧班列(重庆)已成为众多“新”产业落户重庆的催化剂。中欧班列(武汉)可以通过细分市场运行特色化班列,有针对性地发展优势项目,诸如可以在波兰的农业、新材料、新能源、矿山安全等领域,捷克的机床、医药、矿业、环保和通用航空等领域,匈牙利的医学医药、生物技术等领域,俄罗斯的木料、食品、肉类、纸浆等领域,东盟国家海鲜、水果、粮食等领域开辟专属市场,探索产业合作可能。

三是加强口岸产业联动。依托武汉临时铁路口岸进口货物,形成木材交易中心、国际展示贸易中心,加强国内外集货能力,探索运贸一体化运行模式,形成高附加值消费品的重要分拨中心。依托汽车整车

进口口岸,在武汉新港空港综合保税区东西湖园区内开展落地保税及展示保税业务。加强中欧班列(武汉)与武汉天河机场国际航空运输、武汉港国际水运航线的业务联系,共同打造“跨境电商+市场采购+外综服”新业态综合试验区,促进运输与贸易新业态结合的跨境贸易新模式。

(四)探索模式创新,打造中欧班列(武汉)与产业融合的发展合力

一是强化境内外经贸合作创新。积极拓展服务链条,高效服务本地企业“引进来”“走出去”,协助国内外企业实现物品的双向流动,增强班列市场化运营能力和可持续性高质量运营。支持外贸新业态新模式发展,搭建境外经营协商平台,合理整合运量运力,争取更大的境外运输优惠政策和服务能力,最大限度地降低物流成本。建立境外经贸合作区,共商共建共享物流基地、分拨集散中心、海外仓、境外还箱点等,提升境外物流辐射和服务能力,最大限度增加返程货源。

二是加快组织管理创新。武汉可学习借鉴成渝经验,可与长沙等地合作共建,合理规划资源的配置,建立物流、外资、产业等统一协调的灵活机制,鼓励各企业合作共赢,避免恶性竞争和产业分散化,提高整体的竞争优势。

三是创新多式联运模式。中欧班列(武汉)高质量发展,必须融入全球陆海联运大循环物流系统,吸引优质企业共建中欧班列物流供应链服务平台,与中欧班列集结中心城市协同建设境内外物流网络,畅通政策、物流、信息、贸易、金融通道。加快发展铁水公空联运,利用中欧班列(武汉)与空运、水运进行多式联运,降低运输成本,为武汉提供宽广的货源。

作者简介:

胡爽平,武汉发展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区域经济研究;

杨乐,武汉发展战略研究院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为产业经济研究;

陈雯,武汉市社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责任编辑:周阳)

长江流域舞蹈艺术的历史传承与现代演绎

——第15期大江论坛专家发言摘编

编者按：舞蹈艺术是长江文明的重要表现形式和主要组成内容，深刻展现出历史长河中长江流域五彩斑斓的社会面貌、精神风貌和艺术想象，共同促进了中华民族舞蹈艺术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为挖掘弘扬长江流域舞蹈艺术的时代价值，研究开发荆楚舞蹈文化在内的长江文化历史大IP，助力长江国家文化公园武汉先行核心区和文化强市建设，2023年4月6日，在中共武汉市委宣传部、湖北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工作专家咨询委员会指导下，武汉市社科院、武汉市社科联、武汉设计工程学院、多牛世界联合举办第15期大江论坛——铓衣摇曳大江流·长江流域舞蹈艺术的历史传承与现代演绎。来自武汉音乐学院、武汉设计工程学院等高校的专家学者就长江流域舞蹈文化相关论题展开热烈研讨交流。现将与会专家发言整理摘编如下。

历史的幸存者偏差

樊志宏 武汉市社会科学院党组书记、院长

我们在回望历史时，往往容易不自觉地陷入一种历史的“幸存者偏差”误区中。作为历史演进到当下的承继一代，会不自觉地、想当然地用当下的时空环境，当下的认识、经验及知识体系来反推历史，反推先辈们所处的时空环境、当时的认知和经验，反推人类从远古走到当下的历史演进历程。

一、长江干支流“主脉”的幸存者偏差

我们当下的大都市很多集中在长江干流沿线，人口、经济及功能的中心也越来越集中于长江两岸，所以，不论是长江大保护、长江经济带的高质量发展，还是长江文化的传承弘扬、长江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等，我们都自然而然地更加重视干流主脉，而有意无意地忽略支流支脉。

这样的幸存者偏差，会让我们走偏什么？会让我们错失什么？或者具体来说，对于长江这一中华民

族的母亲河,哪里才是她的真正历史“主脉”?

如果按照以上的“偏差”思维,那肯定是长江的干流;但是,如果跳出幸存者偏差的局限,我们会发现,汉江、汉水才是真正的孕育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主脉之一,至少从文明初曙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是这样的。

粗略地看,至少有三个逻辑主线能证明这点:

一是我们的先辈们受制于文明初曙期较低的生产力、技术能力,还无法“征服”长江干流沿岸区域的环境,无法在干流两岸生存;而只能在支流中上游沿线的丘陵地带生存繁衍发展。

二是我们的先辈们对长江干流源头的探索认识,也是随着拓展生存空间能力的提升而逐步深入的。一直到明徐霞客时期,才大致确定了金沙江为长江的上游源头,之前的认识是岷江,再之前是汉江。^①

三是汉江从西北向东南汇入长江,借着汇集秦岭南向之水的力道,畅通了黄河、长江两大文明区域之间的路途,从而成就了推进中华民族形成多元一体格局的主要文明融合通道。

当然,还有其他分析解读这个问题的逻辑思路。但不论怎么分析,跳出历史的幸存者偏差,我们应该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汉江其实也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其贡献并不比黄河、长江弱。我们对待汉江,也要赋予其崇高的生命源泉之礼赞——要让她健康丰满,而不是羸弱瘦小;让她富有活力,而不是难堪重负;让她青春永续,而不是老态龙钟。因为,我们的生命,我们世代的生命,都是源自、融合、勃发于这文明之河中,她的清澈甘甜、浩浩汤汤、活力激荡,都会转化为我们生命中的美好和幸福;而她的苦涩、艰辛、惨淡,也必然会带来流域文明的黯淡和衰弱。

二、文明溯源中文化源头的幸存者偏差

人类社会有几大终极命题,其中之一是:我们从哪里来?

为了求解这个问题,近现代以来,人类发展出了考古学,从地面及地下的蛛丝马迹“信息”中探寻祖先留下的痕迹,以期溯源推测文明的源头及演进路径。

在这个过程中,一般社会大众往往会陷入历史的幸存者偏差误区中,即在探寻早期文明信息时,可能很重视文字等之类文明信息媒介的溯源作用。但是,文字只是作为评判一个人类社会整体进入文明时代的三大标志之一,是经历了相当长一段时期发展的一个里程碑。金属工具的出现、国家的形成也都是一个道理。

那么,我们该如何探寻那些,在有文字、青铜、陶器之前的看不见的文明历史之河呢?

借用“原点思维”,我们会发现,求解这个问题,还有一个关键性的探究路径,那就是我们“自己”。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是一个原点,依此可以向两个源头追溯:一个是身体的“基因之源”,另一个是精神与物质的“文化之源”。

基因和文化这两个溯源媒介,具有两个共同的特性:一是稳定性,都能穿越四维时空,对人类社会持久地发挥主导性影响;二是适应性,即随着人类社会生存环境的变化,而做适应性、互动性的调整。这两个特性,也是它们能成为历史溯源媒介的根本原因。

就文化而言,从源头来看,人类对于周边生存环境及群体生活空间的认知、表达和实践,最初一定是

^① 战国《尚书·禹贡》中写道:“岷山导江,东别为沱。”

感性的,这些感性的认知、表达和实践,也一定是经历了很长一段历史时期的演进后才会趋于理性化,而理性化的集中表现,即为文字等文明信息媒介的出现。

下面,我们再对文明初曙时代做个场景猜测:在以采摘渔猎为主要生存方式的时期,即新石器及农耕文明革命之前,人类祖先应该还没有能力手工制作乐器等器具,所以只可能更多依靠自己的身体、可采集的自然之物等,来进行这些感性情感的体悟认知、交流表达、劳作实践和传播传承。具体来说,可能主要集中表现为:源于自然界和自身节奏、韵律的舞蹈、音乐、绘画等。

显然,要论证这种猜测是否符合历史逻辑和历史演进进程,我们必须跳出历史的幸存者偏差,到中华民族乃至人类文明源起的大河文明中,从万年之前的舞蹈、绘画等艺术遗迹遗存及演进史中去探寻。

特别是在经历了农耕文明、工业文明之后,面对信息文明这样一个新的文明长周期的到来,面对似乎更加无法预知的未来,就像我们探寻史前那些无法感知的历史一样,我们依然需要更多感性的认知、感性的实践、感性的传播等,来与理性的力量一道,导引我们、支撑我们、推动我们向前。

其中,舞蹈、绘画等古老而现代的艺术,自始也必然至终地,源远流也必然流长地,给予我们这样的感性力量和情感引领。

三、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中的幸存者偏差

有句俗语:“远亲不如近邻。”这句话是用来描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但细想想,也适用于我们人类与大自然、与动植物的关系。

在人类文明的早期,由于长距离出行或迁徙能力的不足,所以人们往往一辈子都生活在一个范围较小的区域中,不同氏族群居区域之间的交往是较少的。由此,人们对周边自然环境及其中的动植物的接触和认知,远远多于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也就是说,在此时期中,人类社会依然还是自然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没有异化、脱离出去。

不知这是否可以部分解释下,为什么早期人类社会往往是崇拜动物图腾,而到了近现代,则是崇拜人类社会中少数的某些杰出人物,如思想家、政治家、科学家、企业家、艺术家等。

随着人类文明的逐步演进,特别是到了航海革命、工业革命等引发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的系列变革之后,人们的出行或迁徙能力逐步得到显著的提升,人与人之间的社会性交往活动开始大幅超过人与自然、人与动植物之间的接触、交往,人类社会也日益复杂化,并在形式上日益脱离自然系统,甚至于成为自然系统的主宰者、掌控者、破坏者。

从这个角度来说,由超级城市区域、大型城镇网络等组成的人类社会系统,越来越隔离于纯粹的自然系统之外,越来越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系统。

那么,这是人类文明的进化还是退化呢?从长远来看,这种文明形态是可持续演进的,还是会陷入生存发展危机呢?这些问题即包含在党的二十大报告关于中国式现代化五大中国特色之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命题中。

2023年2月28日农业农村部公布了2022年长江江豚科学考察结果,长江江豚种群数量为1249头,首次实现止跌回升,反映出长江大保护和十年禁渔政策落地实施已经开始取得初步的突破性成果。虽然成效如此让人欣慰和鼓舞,但仍只是看到了“未来曙光”的初现。我们还需要借助江豚——这一长江自然

生态系统中的最高等级动物——的微笑,来启发我们更深层次的反思——我们该如何看待我们人类社会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之间的关系,该如何准确地理解认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这一中国式现代化特色的本质内涵、实现路径等。

人类社会要探索人类文明新形态,需要突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支撑作用。而要实现这点,则需要跳出历史的幸存者偏差,求解一系列发展矛盾和生存悖论。其中之一,就是生态系统“边缘化”与人类文明“中心化”之间的矛盾。

历史来看,人类社会文明形态的进步具有典型的“边缘突破”特征。即人类社会文明演进进程中的主要突破,基本上都是源自某种边缘(界)路径上的革命或突破,此中所说的边缘(界),要么是人群自身所栖息区域的边缘(界),要么是动植物生存的边缘(界),还有可能是人自身能力、劳作或能源开发效率等的边缘(界)等。在经历了一系列人类文明的“边缘突破”之后,原本的边缘边界“地带”,反而成了人类文明社会的“中心”,而自然生态系统则越来越从“中心地带”退缩为“边缘地带”了。

这种“边缘”与“中心”的“文明冲突”,是当前人类社会文明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之间不能和谐共生的主要根源与表现。而要实现人类社会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之间的和谐共生,也必然是需要构建一个能让人类中心与自然生态中心共生于一体的大系统。具体到武汉,什么时候能够在武汉的长江江水中经常看到江豚的身影,那么我们就可以说,武汉即是人类社会系统的重要中心,也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中心。

原始圈舞·连臂踏歌

柳雅青 武汉音乐学院舞蹈系教授、硕士生导师

我的发言主题是从长江流域舞蹈艺术史切入来谈长江文明。长江流域舞蹈艺术史如此浩瀚,我想今天只摘取其中点滴,以便在有限的时间里能让大家相对具体地感受舞蹈的魅力,为此,我提出两个关键词“原始圈舞”“连臂踏歌”。

舞蹈是随人类的发生而发生,随生产劳动和生活的发展而发展。云南作为长江流域的上游,是人类发祥地之一,170万年前的“元谋人”是已知的最早用火者,或许那时的元谋人就有了围着篝火起舞的行为,只是我们无从考证知晓,直到云南沧源岩画的发现,我们才可一窥原始舞蹈的样式,在沧源岩画十个点中,有一个点所绘的是“五人圈舞图”(见图1),画面以一单线圆圈为中心,五位舞者沿圈外形成圆形构图,舞人均一手臂高扬一手臂弯曲下摆,其中一人的躯干未做颜料涂实,所绘为单线轮廓,使得与其他四人不同,有学者推测是强调该舞者的特殊作用,即圈舞的领舞者。从沧源岩画所呈现的这一舞蹈场景,我们可以判断该地区的原始人已采用围圆起舞的形式舞蹈了。

很有意思的是,无论是原始社会人基本生存的需求,还是社会发展其功能、目的转换,原始社会所出现的圈舞这种舞蹈形式却具有超长的生命力一直保留了下来,并随各民族及历史朝代的更迭而持续焕发出独有的光彩。从历史文献记载来看,围圆起舞的这种形式有了相对清晰的描述:

《资治通鉴》有注:“踏歌者,连手而歌,踏地以为节。”即是古人手臂相连,踏足为节,载歌载舞的一种形式。云南江川李家山出土的汉代圆形镂空舞人扣饰,就证实了这种歌舞形式:十八位舞人皆束腰带、系尾饰,挽臂成一圆圈,踏足而舞。(见图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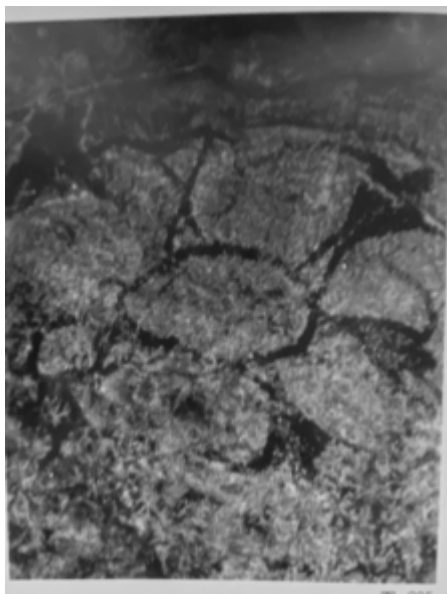


图1 五人圈舞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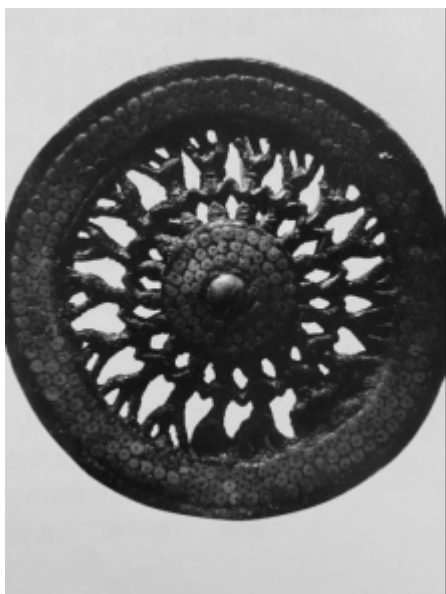


图2 汉代圆形镂空舞人扣饰图

上述发现说明汉代就有了连臂踏歌。而这种形式发展到了唐代,在民众中更为盛行,其功能也更加趋向于自娱性,民众群体一边唱歌,一边用脚踏地打拍子,可以边走边唱。其中歌的部分曲调不断反复,歌词却会更替出新,舞的部分以脚下踏地形成的舞步贯穿,时而连臂,时而舞袖,节奏鲜明,具有感染力。《宣和书谱》卷五记载:“南方风俗,中秋夜,妇人相持踏歌,婆娑月影中,最为盛集。”从简短的文字中,可想象明月高悬的中秋之夜,女人们相互牵手,边歌边舞,婆娑于月影中、尽兴欢畅的情景,非常浪漫和诗意。为此,唐代留有许多关于踏歌的诗文描述,如诗人李白的《赠汪伦》:

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

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

由原始圈舞到连臂踏歌,本质上呈现了舞蹈本体围圆构图,牵手、舞步、节奏这些动作要素,这些涉及舞蹈本体关键的动作要素,如今在长江流域尤其是少数民族中仍有遗存,如藏族的“锅庄”、彝族的“打歌”、羌族的“萨朗”等。还有我们湖北土家族的“摆手舞”,也是以逆时针围圆的行进舞步来承载祭祀活动。可以说原始圈舞、连臂踏歌是长江流域舞蹈艺术史上具有普遍性、代表性的舞蹈形式,是人民群众智慧的生动的表达。一部长江流域的舞蹈艺术史是长江文明的组成部分,无论是祈祷来年风调雨顺、更加美好的生活,还是敬拜天地、驱逐鬼神,它都是广大劳动人民借助舞蹈这样一个载体来表达生命感的一种仪式,为此,生命的光彩照亮了一个“轶态横出”“丽靡烂漫”的舞蹈世界。

公共艺术视域下长江流域舞蹈文化的多元与互动

张素琴 武汉设计工程学院特聘教授、上海戏剧学院舞蹈学院教授

如何弘扬长江流域舞蹈的时代价值,长江流域舞蹈文化如何作为一种公共艺术介入当代的社会和文化建构之中?这是我们当下要讨论的问题。

任何艺术都无法独立于社会语境之外。随着都市的快速发展、传播媒介的革命性进展,市民社会和

公民意识之间互相促进,公共意识也被赋予了社会政治文化、道德素质等诸多概念,公共艺术也因此而生。其渐进式的发展以及在阿伦特、哈贝马斯等学者的讨论与推进中,共同、参与性、公共权力、民主、共享、沟通、不可被质疑、自发、散发性等概念也逐渐成为公共艺术的自律性追求。

日益萎缩的乡村在萎缩着传统意义上的长江流域的舞蹈文化,其他的传统艺术也面临着挑战。就舞蹈而言,博物馆式的保存、学院式的萃取、精英式的审美和改造并不能从根本上壮大其根本,饱满其血肉。相较于原生态文化的广度和辐射,某些形式的保护只是杯水车薪。因此,就我而言,与其困惑于长江流域传统非遗层面的舞蹈文化发展,不如面对不断产生的公共文化,探讨长江流域的舞蹈文化如何介入其间,在保有旧流域舞蹈文化的同时创造新流域的舞蹈文化,下面我简要列举中西两个舞蹈介入公共艺术的实例来进行探讨。

第一个作品是2014年10月,殷梅教授和其团队在纽约中央公园进行环境舞蹈创作,继而将这一创作作为素材呈现在舞台上,使舞台公共空间进行场景交融的对话,正如殷梅老师强调的那样,舞蹈是“时代的画像”,最后是人与自然、国家与国家、不同人群超越空间的沟通诉求。

第二个作品是2019年5月18日,我和团队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创作的跨界作品《殇园·遇》。表演分为两个场所,一个是史料陈列厅的尾厅,另外一个是在陈列厅之外60米的长廊,呈现了祭奠之舞和逆行的相遇。我们的舞蹈名字叫“祭奠之舞”,是和策展主题呼应的。这个作品呈现之后有较大的反响,这也是遇难同胞纪念馆第一次接受舞蹈。舞蹈身体语言主要是选择了与长江流域文化有关的红色文化、战争文化、水文化和农耕文化,运用长江流域舞蹈文化的元素和符号,把它改造为一种公共传播学意义上的建构。包括一些哭泣的母亲的形象,在大屠杀纪念馆周围的雕塑的形象,都成为我们对长江流域新的舞蹈文化的重新建构和创造。

公共艺术与环境舞蹈不是噱头、不是新奇和陌生的异质感,它有极强的严肃性和考验性,我认为这种艺术机制的生成动力不仅仅是视觉化传播的媒介差异,也更充分体现了公共领域媒介传达的公共性。正是因为如此,不论是纽约中央公园的实践、殷梅教授的系列创作,还是武汉设计工程学院的学生作品,在传播学意义上的建构其实都是为了一种公共性的传播以唤起公众感受。这也是在具身理论之下,基于身体传达的朴素的生命观和生活及艺术所呈现的审美张力,从而使身体、舞蹈及其观念在社会的互动中完成集体表象上的认同,也完成人性的挖掘和深度的情感沟通。这一艺术形式也极大地拓展了舞蹈的边界,并在传播中表现出公共性、参与度、民主、权利和一种自律性,这也完成和超越了文字和口头语言的沟通和认同。

因此,环境舞蹈或者说公共舞蹈是在缩短传统镜框式舞台或剧场舞蹈和群众之间的审美距离,也是通过身体的公共性表达对空间进行重构,构建了一个共在的公共领域。公共领域的叙述者不应该仅仅是具有优越感或排他性的专业舞者,而是使这个空间变成集体参与的话语共同体。但是遗憾的是,这一艺术的前沿和多元探索还未能引起舞蹈界的充分注意。尽管在当下的舞蹈界,环境舞蹈已经有很多了,但是站在公共性的角度去考虑艺术机制的深层动力似乎还有距离。

2006年蒋天文与樊志宏教授发布了研究成果——《大江大河从“公共资源”到“公地悲剧”演变的内在机理分析》,在这篇文章中,他们提出:大江大河提供了丰富的文化资源,但又非常容易因为认识上的滞后、制度上的博弈及利益之间协调的失衡形成“公地悲剧”。这一提法不免有些忧患色彩,将近20年过去了,同样我认为在长江流域舞蹈文化的认知中,也容易陷入文化保护的单一认知、固化的艺术性创作的陷阱中,从而导致这一丰富的、由江河文化提供的丰富公共资源因为认识上的滞后,而在当代城市发展公共

文化空间利用中的缺失;尤其是以武汉为中心的荆楚文化在公共空间中的缺失,从而形成地理和文化上的双重的“公地悲剧”。

那么,长江流域舞蹈文化这一丰富的公共资源在今天应该如何利用,如何发挥其介入城市、介入公共空间中的深入认识和创新意识,如何突破价值认识的滞后与误解?从这个角度上而言,武汉设计工程学院所开展的公共艺术教育,有着极强的社会参与性,相关的舞蹈作品开拓性意义及价值尤为凸显。这意味着他们的艺术工作和创作理念已经突破了传统的或者说固有的、相对来说较为狭隘的艺术观念,尤其是舞蹈观念中剧场舞蹈和镜框式舞蹈表演的固化认识。

舞蹈的文化资源本应作为社会的重要资本为今天的城市文化服务,为社会的介入服务,从而使长江流域的舞蹈文化介入一种广义的生态环境服务的概念中。这一服务即传统舞蹈的边界的突破尚需要一定的时间,因为确实存在着观念和观念之间的博弈,但是我们也看到在其他的艺术门类中,尤其是戏剧、交叉艺术、多媒体艺术、影视艺术、音乐文化的公共艺术介入性也在逐渐增强。我想,舞蹈应该在其综合性艺术的特点及极强的身体参与性和互动性中,成为公共资源服务的重要资本,如此才能使长江流域舞蹈的文脉和舞脉并存,才能使长江流域的舞蹈文化互动超越出历史的和传统民族学意义上的认知,进入我们当下的言说之中,从而参与城市的文化叙事,真正成为公共艺术发展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在对长江流域舞蹈文化的研究中,武汉毫无疑问是一个重镇。相关的研究成果,尤其是武汉大学国家文化发展研究院、武汉市委政策研究室、武汉市规划研究院联合完成的“武汉打造长江文明枢纽城市”课题,和武汉市社会科学院关于城市空间治理的三大升维导向课题,对于空间美学、空间布局的研究,都能为舞蹈的创作提供不少的经验与智力支持。

阿多诺在《艺术社会美学》一文中说:艺术把自己从宗教祭奠功能及其图像中解放出来之后,赢得了自律性。这种自律性受到人性观念的滋养,但是由于人性观念的缺乏,这种自律性也就随之瓦解。那么,面对社会的飞速发展、观念的多元变化,尤其是我们面临着技术变革的挑战之时,艺术尤其是舞蹈更应该从其“纪念碑性”走向生活,为其介入公共艺术赢得新的自律性,使其不至于生命的凋敝和枯萎。

舞入江流

荣 涛 武汉设计工程学院特聘教师

长江流域的文化浓郁丰富,千百年来源远流长。在文化历史的长河里,长江流域的人们以舞蹈表现形式依旧表达着人们对生活的理解与热爱。

回放早期关于人类生活的形态记录,长江流域摩崖石刻中的岩画是重要线索之一。其中,我们解读到以动作形态来表达事件、以动作形态来传递情感,虽然是简单的形态勾勒,却折射出当时人们对天地自然的敬畏、生命繁衍的坚韧状态,对未来期许的预留空间的重要文化气息以及生命符号。

如今,当我们梳理长江流域舞蹈艺术传承时,自然处在了一个“以往”与“未来”的结合点之上。现代演绎的形式随着飞速发展的时代精神各抒己见,舞蹈艺术作品更是精彩纷呈。无论是引领潮流还是另辟蹊径,首先应该是与包容的态度并行的艺术创作态度。有着深远文化历史根基的长江文化带,不仅拥有着包容的特殊品质,而且艺术作品的素材更有着广泛的生活基础。

每一个时代舞蹈作品的符号,都是那个时代的特殊时尚。发现自我的文化来源,也就可以进一步提

高艺术创造的可行性,任何艺术作品的形式都应是在完善中传承下去的。

这次应第15期大江论坛之邀,以“铢衣摇曳大江流·长江流域舞蹈艺术的历史传承与现代演绎”为主题,携武汉设计工程学院成龙影视传媒学院舞蹈表演专业的学生,创作了舞蹈作品《遇》。切片式并列了两种“场景”的舞蹈形式,直白抛出问与答。一个遥远的“某个生命符号”对视一个当今的“流行时尚动感”,两名舞者各自代表着时代的符号交融并行于舞动之中;是一种穿越,是一种记忆,是一种链接。他们以舞动的形式于片刻之间相遇,期待着来自观者角度的解读。也许在他们的眼中,观者即是舞者,而他们才是不停观看四周的人,在文化的大江大河中演绎前行。

现代演绎的目的是什么?这是每个人都有的询问。我们唯一知道的是“答案众多”。我们更知道演绎的形式背后是生活的反映,是对一个时代的艺术精神的提炼。舞者以律动现生活片段,观者以生活映生命脉络。武汉市社科院、武汉市社科联、武汉设计工程学院与多牛世界联合举办的第15期大江论坛更是一个广博的平台、一个包容并蓄的平台,广博是视野,包容是自信。传承与演绎这个长久的话题,在这里一定会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L. I. F. E 揭开生活的面纱

文/Kevin Polak 武汉设计工程学院特聘教师 译/李卉琼

L. I. F. E 或环境信息表达,是一个强大的工具,可用于揭示日常地点隐藏的美丽和意义。通过使用特定场所(位置)的信息来表达艺术,创作者和表演者可以帮助人们以新的眼光看待周围的环境,并揭开这些空间中的故事和历史。无论是酒吧、博物馆还是文化遗址,每个地点都有其意义和功能,是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通过将注意力吸引到这些地点并突出它们的几何形状、美感和历史,L. I. F. E 表演可以帮助人们以更有意义的方式与周围环境联系起来,并发现他们以前可能从未注意到的生活的新方面。

一、L. I. F. E 作为艺术反映生活

人们常说艺术是模仿生活,是多面的,但说艺术反映生活也许更准确。它是探索人类经验、情感和思想的媒介。

一般来说,艺术可被用于多种目的,包括传达思想或信息、挑战社会规范和习俗、激发想象力和创造力、记录历史和文化、引发思考和反省,以及提供审美愉悦或美感。最终,艺术的目的是丰富和提升人类体验,提供不同的视角和看待世界的方式。

二、L. I. F. E 融入欧洲的传统生活

几个世纪以来,环境表演一直激励着表演者和创作者。在公共场所(街道)举行的节日表演在欧洲有着悠久的历史,可以追溯到罗马竞技场的竞技时期,在那里它们是被用作娱乐人们并帮助他们忘记烦恼的一种方式。

比如阿维尼翁戏剧节,目前是最古老、最负盛名的表演艺术节之一,每年在法国阿维尼翁市举行。该节日成立于1947年,旨在为创新和实验性戏剧作品创造一个平台。最初,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

遗产“教皇宫的荣誉法庭”是它的摇篮。如今,每年在7月的3周时间里,整个阿维尼翁市变成了名副其实的剧院小镇。多年来,这个节日展示了各种各样的表演,包括戏剧、舞蹈、音乐和马戏,来自世界各地的艺术家和公司都有参与。该节日已成为国际表演艺术界的重要枢纽,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观众。

一个拥有10万居民的城市被3万名外来游客参观了3周,这些外来人占到原始居民的30%。想象一下像武汉这样的城市,如果有占常住人口30%的游客集中到访,会是怎样热闹的场景?

通过使用特定的场所,表演者和创作者可以利用空间并将其独特的元素融入表演中。这为观众创造了更加身临其境和引人入胜的体验,并挑战创作者在他们通常的创作过程之外进行思考的能力。然而,使表演适应地点可能具有挑战性。表演者需要考虑空间的几何形状,并创建一个与表演相得益彰并吸引观众的空间设计。艺术家今天犯的最大错误是在一个地点上搭建舞台,完全无视这个地点并将他们的戏剧表演强行带到这个地点。

因此,黄金法则应该是:不要根据你的表演调整场所,而是根据地点调整你的表演。但最好是郑重地根据地点所激发的灵感创作新作品。

三、通过 L. I. F. E 融入社会

艺术家也需要考虑该场所不同类型的观众,并提升与有意和无意的观众互动和交流的技巧。

有意向的观众是那些主动选择观看演出的人,他们有节目单,或者地图,上面写着各种演出的内容、时间和地点。而无意的观众可能会偶然看到表演。例如,一家人提着购物袋走在街上,突然遇到了艺术。他们将会做什么?忽略它还是停留下来?

这听起来可能微不足道,但我希望有所不同,我坚信当无意的观众留下来时,环境表演会蓬勃发展。因为大多数时候无意的观众是那些不经常或很少自己买票看艺术(剧院、博物馆、展览等)的人,他们很少会融入各种社会阶层,或是意识到公共空间及其建筑风格、历史或美丽。如果一小部分无意的观众对他们所看到的东​​西着迷或感兴趣,那么也许下次他们会去买一张剧院表演或博物馆的票,从而为艺术创造新的和未来的观众。

此外,他们将与同龄人交流他们的体验,在他们的社会阶层中创造一个新的链接,通过艺术开阔他们的视野。例如,阿维尼翁戏剧节已成为非常有声望的节日,主要吸引特定类型的社会阶层,因为它缺乏无意识的观众。我相信,通过保持有意观众和无意观众之间的合适比例,能够促进社会融合和观众数量最大化。

两者都展现了独一无二的机遇和挑战,表演者需要意识到这两类观众,并考虑如何与这两个群体接触、融合和沟通。艺术在群体中、艺术属于每个人、艺术用于表达、艺术拥有吸引力,都是环境表演的重要元素。他们将人们聚集在一起,创造表达机会,并提出对我们生活的世界的独特见解。

总之,环境表演是艺术家和创作者在作品中探索新维度的重要技巧。根据环境调整作品并吸引有意和无意的观众,表演者可以为观众创造更加身临其境和引人入胜的体验,同时在地、地区之间、国际文化中创造社会融合和交流。环境表演是艺术家和创作者、观众和政府(市、省、国家)相互促进、融合和交流的宝贵而有力的工具。归根结底,环境表演是搭建桥梁、探索人类体验和反思生活的有力工具。

当代环境舞蹈艺术与城市场景利用

殷梅 武汉设计工程学院特聘教授、纽约城市大学皇后学院终身教授

在当代环境舞蹈研究中,一个突出的研究理念是“身体即学术、实践即研究”。这也是目前处于世界前沿并具有深入探讨价值的身体表演研究理念。

西方哲学家们在一个半世纪前提出了“体现、化身”(Embodiment)这一概念,他们把“体现、化身”和“动中觉察”(Awareness Through Movement)视为一个认知的框架。尤其在近50年里,这一概念在身体运动科学、表演艺术研究领域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体现、化身”和“动中觉察”——我们的身体感官所产生的微妙而具有渗透性的反应,我们对生活进行体验的身体,是我们认知的根本。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在当下历史时刻所面临的数字空间、大自然空间、跨界融合等事物或现象,在历史上从未如此突出。在这种情况下,研究身体与认知的关系、身体与空间的关系、身体与社会的关系,对于环境舞蹈与社会互动,将更具当下意义。

关于这种互动,我归纳出三个特征:

第一,身体与认知的关系。我们身体内在的能量结构与意识的能量结构是一体的。简单来说,我们的身、心是合而为一的。

第二,身体与空间的关系。首先,身体处于客观空间中,这种情况下舞蹈的身体是看得见的;其次,身体已不局限于客观空间,比如杂技演员、运动员、舞者等,他们在表演高难度动作时展现出其独有的不可视空间,此时身体超越物质与信息交换,链接直觉与洞察力,通过信息结构进入感应层面的空性。三是身体即是空间。

第三,身体与社会的关系。身体的能量结构空间,是创造力深度发展的空间环境,身体在空间环境中获得了多元的发展维度和无限的自由度。身体与社会的关系——最高境界则体现着人与人之间的无限关爱与崇敬,是身体与意识能力的关联。

环境舞蹈首先是走出剧场,打破在舞台被观赏的娱乐价值观,让身体和舞蹈回归本初,践行人与空间、人与环境、人与大自然的相互观照。这个空间可以是任何场景——可以是城市乡村,抑或是长江山川。身体本身源于自然,是自然之启。而我们生存其中的现代主义的时代是什么?现代主义是城市剧烈变化的产物,它像一个正在裂变的细胞所呈现的状态。在现代文化里,每一种系统的文化都在裂变,所以原来被约定俗成的、被限制的、被某种固定的理念逻辑化的认知,在新的时代都面临着被解构的挑战。所有人的能动性、能量、想象力都会在这时被释放出来。这个释放,在舞蹈上的表现,就不再是观众在剧场看一个固定框架里的舞蹈,例如《天鹅湖》……虽然那种艺术形式可以继续保留。现代文化的体现,必然是多维度系统的跨界融合和裂变。

我们的舞蹈艺术的发展,也顺应了这个转变过程。首先,它是人与人、人与环境、人与自然生态的链接过程。因此,舞蹈可以与长江、山川、丛林、石柱、商场等对话。在传统模式中,大家都要到剧场看舞蹈,台上演出,台下鼓掌。然而这个观赏和被观赏的模式在当代已经被改变了,变成了一个共融、共进、参与式的模式。甚至表演的内容未必是确定的,重要的是它的创造力以及创造性的感染力。

环境舞蹈,是现代生活催生的一个概念,是站在现代主义文化的维度上展开的、体现包容性的概念。没有现代主义的人文思考,将不会有舞蹈思辨,不会有高雅艺术与城市文化的融合。当代舞蹈艺术概念

和人文理念,影响着当代人的认知,并在发生深刻的变革。舞蹈的信仰和研究,不仅推动舞蹈融入城市景观,而且在建设城市、创造城市文明的同时,它催生出了“身体创造城市”“身体即是空间”等舞蹈理念。

武汉设计工程学院是中国首个探索现代舞国际办学的大学教育机构。我们是践行现代舞理念——“身体即学术、实践即研究”的探究者。在环境舞蹈实践中,我们用有温度的身体与坚硬的大理石对话,感应天地、承载阴阳,不断地感悟生命、艺术与生活之间的关系,以身体独特的触觉、听觉、嗅觉、视觉,与其隐形空间关联,不断地归纳自己、释放自己,展示生命痕迹、生命舞蹈、时代的自画像。生命痕迹的自画像反映的是觉知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地感悟大自然和宇宙,不断地与历史对话,不断地与当下实践对话,然后才能面向未来。身体的痕迹涵盖了我们的纵横观点,催化、裂变新的舞蹈思潮,体现生命的本性。

后疫情时代我们才知道生命如此脆弱,我们都在重新认识生命、认识自然、认识城市环境。在舞蹈研究中,现代主义概念中的舞蹈已经不仅是舞蹈,它更是身体本身,是身心科学及心灵表达,是身体与外部交流的工具,体现身体与生存空间的关系,以及与生存状况和生活环境的关系。这种在肢体表达上形成的语言,是我们在课堂上、在创作中的研究思考——身体应该有表达处境的能力,不被约定俗成所挟制、捆绑。

城市在巨变,我们的舞蹈理念也在与时俱进。身体与城市的对话,使空间重新对人予以观照,给来到现场的人提供感悟的可能;灵魂相互照见,让观众看到他们作为艺术的见证者是多么的重要。他们使表演真正得以实现,他们的参与使我们时代的自画像行为得以完善。

我们的内在能量结构与我们的意识能量结构成为一体。意识能量结构是我们的认知深度或高维度能量结构。高维度能量结构与身体之间有着——对应的关系。在那个状态里边,舞蹈动作和场景产生一种内在的显化。这种内在显化,投射出来的是一种完美的呈现,是天人合一(和道法自然)。身体的内在认知、内在意识,是一种自然的流动,是与整个身体当下完全合一的状态,它对整个能量场的影响是不可言喻的,是不可重复的,也是独一无二的。

环境舞蹈是一种观念艺术,是创造人与城市空间互动关系的新观念。这种观念,使观者独立去观察、想象、感悟,是精神的释放,是生命能量的释放,远远超越了舞蹈本身。

(整理者:赵煌)

(责任编辑:周阳)

武汉城镇空间历史演变中所蕴含的 中国传统哲学思想探究及其现代启示

方可

摘要:本文通过剖析转型阶段国土空间规划的现实需求与我国传统文化的思想根基,从规划方法论、规划治理方向、可持续发展思路以及改进国土空间规划编制方式等几个方面阐述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及传统文化在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可鉴之处;并针对当前普遍存在的问题,在深入分析“善治”方法论的契合点的基础上,探讨武汉城镇空间历史演变对国土空间规划提升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高质量发展;国土空间规划;新理念新方法;武汉

一、前言

当前在中国城镇化进程中,城市功能具有更高的发展质量、城市空间拥有更高的利用效率、城乡居民拥有更强的获得感和幸福感、城市发展模式更加具有可持续性,这是新的历史阶段对国土空间规划提出的新命题。而随着人口规模的增长和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物质空间形态的急剧变化,给城市发展质量、空间利用效率、城乡居民发展公平性、发展的可持续性等方面都带来了不同程度的问题。

为了寻求解决以上问题的良方,我们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试图从西方发达国家在城镇化进程中所积累的经验中汲取有益的养分为我所用,但由于社会文化心理、本民族特有性格特征以及民族生活习惯等不同,西方的城乡空间治理方法论并不完全适应本土的实际情况。我们再一次站在了十字路口——高质量发展阶段下城镇化进程何去何从?通过对城镇空间历史演变分析归纳,从中找到高质量发展的传统智慧和经验借鉴,或许能给我们带来不一样的启示。

二、武汉三镇古代历史空间演变特征概述

(一)历史空间演变

1. 与自然环境抗争时期

在春秋战国之前这一漫长的历史阶段内,因生产力水平因素的制约和环境条件的影响,生活在现今武汉地区的先民被动地适应生存环境。这一时期先民生存空间分布呈现“避水不离水,近山不居高”的特点。在江汉平原以冲积型地形地貌为主要特征的地理格局下,由于生产力水平较为低下,武汉地区先民被动地适应自然生存环境,放弃地势低洼、易遭受洪水侵袭的平原地区,而趋向小型河流汇入长江的入江口,且能有效避开洪水侵袭的地形高程相对较高的地区,利于生存,又能方便取水,成了居民点的理想选择。

2. 连年战争影响时期

长江既是黄金水道,又是具有军事功能的天堑,从汉代到隋代,位于长江两岸的城池是敌我对垒的隘口,以军事功能为主,如鲁山城、夏口城、鄂州城、临漳城。鲁山城、夏口城虽兼有一定的政治功能,但其政治功能未占据主导地位。

从汉代末期至三国时期,由于武汉所在的江夏郡地处曹操势力范围的豫州、刘备势力范围的荆州和孙权势力范围的扬州的三州交汇处,长期处于各方势力争夺的前沿,因此,武汉境内城邑格局和职能受到严重影响。从公元208年至公元259年前后,江夏郡在刘备与孙权势力范围的争夺中几度易手,受地理位置和地形条件的影响,以石阳县、却月城和鲁山城为典型代表,城邑格局和职能定位处于变化状态。位于府河北岸的石阳县(今黄陂区黄花涝)一度成为魏江夏郡的治所,位于长江北岸与汉水交汇处的却月城、位于长江南岸的夏口城主要以军事职能为主。三国时期以后,从晋代至隋代的几百年间,江南和江北的行政建制隶属和治所虽几经变迁,城邑的规模有所扩大,但城邑主导性质和职能未发生根本性变化。这一时期,位于长江南岸(今蛇山北侧)的夏口城在南北朝时期扩建形成郢州城,随后在隋朝改郢州为鄂州。位于江北(今龟山)的鲁山城继续发挥军事堡垒功能。

3. 军事政治因素为主导时期

朝代的更迭和政权的动荡,给长江两岸城镇职能带来了一定影响。公元621年,江北设置沔州、汉阳郡和汉阳县的治所,作为长江北岸汉水下游流域重要行政中心的职能地位日益突出。在龟山南侧依托凤栖山修筑了府城,由于此时汉江进入长江的主入江口位于今龟山以南,大致为现今钟家村以南地区,而从鲁山城南迁至此的府城又位于汉江入江口以北,因此被命名为汉阳府,自此“汉阳”的称谓一直沿用至今。江南鄂州城既有的军事功能一直保留,同时,随着城邑规模的扩大和作为长江中游重要的水运枢纽,城镇还具备了一定的行政中心的职能。元代北方民族向南扩张时期,位于长江南岸的鄂州城也成为重要的行政管辖中心,既是行省级大区域行政中心,又是湖广行省、武昌路和江夏县的治所,武昌这个地名也在历史中首次出现。

4. 三镇综合功能形成时期

随着国家中央集权的巩固,疆域版图逐步稳定,长江作为军事天堑的功能作用下降,三镇各自具有的行政、经济、文化等综合职能逐步体现。虽然历史学界和地理学界对汉水改道的时间和具体方位仍有争论,但汉水改道后给长江两岸城镇格局带来的影响是无可争议的。由于汉水入江口改至龟山北麓,原先龟山以北低洼区域一分为二,汉阳府管辖重心南移,汉水以北地区形成了同时濒临长江与汉水的独立空间格局。由于现今汉口所在的地区仍为两江长期冲刷形成的低洼地区,所以水患一直阻碍着这一区域的发展,公元1635年修建起长约11公里的袁公堤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这一问题,同时也奠定了汉口老城的格局基础。由于汉口成形较晚,所以在明代至清末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汉口所在的集中发展区域内既无各级行政建制的治所,也无军事防御堡垒的存在,空间拓展完全依靠自组织形成。依托长江黄金水

道和汉江入江口的天然优势,汉口的商贸发展十分迅速。清代以后,武昌城作为区域行政中心的地位进一步凸显,此时,武昌城内云集了湖北布政司所辖的八府的各级衙门,此外还有贡院、学署、督署、织布局、纺纱局、步队十五协、步队十六协等机关。而同一时期,汉阳府州、县两级行政治所均设在汉阳城内,但由于隶属于江南湖北布政司,因此,其行政中心的职能定位没有武昌城突出,但汉阳城在府级行政中心职能的带动下,综合功能进一步提升,城内贡院、城隍庙、协署、府署等行政和文化设施较为集中。

(二)特征概述

1. 选址注重交通区位条件

无论是汉代的石阳城、三国时期的鲁山城和夏口城,还是南北朝时期的萧公城、晋代的临漳城,其选址都十分注重交通区位条件。在对外交通联系可选方式十分有限的古代,水上交通也成为城邑选择地址时的考虑因素。石阳城、夏口城、鲁山城、萧公城、临漳城和涂口城无不是临水而建,且选址在陆上交通隘口上,同时拥有良好的水上和陆上交通区位条件。

2. 布局遵循礼制且兼顾因地制宜

三镇中位于江南的武昌古城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其行政主导功能的地位相对更加突出。根据1521年《湖广图经志书》资料显示,至明代时,当时的江夏城已有完整的城墙,并建有九座城门。城内蛇山南北两侧分别布局有官署、学署、贡院等行政和文化机构,其中官署居于城市中央,学署、贡院等设施分布在相对外围地区。城内主要道路系统为南北向和东西向,但由于山体和湖泊的影响,道路布局形制并不规整。直至清末,武昌城的主要空间形态结构未发生较大改变。而城内蛇山南麓的阅马场地区,由于其位于古城空间地理几何中心,同时南临紫阳湖,背山面水,在空间形态上具备传统礼制上作为城镇中心的条件,逐步成为武昌古城行政中心所在地。

不同于平原城市,在同时具备山水资源条件的武昌城,虽然在城市功能格局上遵循了“中轴对称”的传统礼制,但在空间形态上因地制宜,并未因单纯遵循规整的路网系统而打破既有的山水格局机理,巧妙地兼顾了礼制和借助城市山水资源的需要。

3. 注重对山水资源的利用

武汉市域内的城镇历史演变,几乎无一例外地围绕着山体和水体来做文章。商周及其以前,相当漫长的一段时期内,生产力低下,水患严重困扰着先民的生存。城镇选址多位于地势较高的地区,但因生活和交通的现实需求,又不能远离水,如商周时期的鲁台山、盘龙城、茅庙集等,均为傍依山地,而不远离水体,蔡甸城头山上的临漳古城,依托高地发挥着扼守汉江水上要道的军事作用。至汉代以后,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城镇治水的的能力逐步增加,不但能修筑城墙来抵御水患,同时注重借助水体营造城镇山水格局,如汉阳古城中有水体连接城外,城镇格局背山面水;武昌古城充分利用东西走向的山体,同时发挥城中大小九座湖泊的雨水调蓄和景观组织的作用。

4. 呈现商贸空间的自组织变迁

在漫长的历史演变过程中,依托长江和汉江水道和洲体的改变,三镇航运条件也随之改变,沿江码头、港口的兴衰带动着商贸空间的自发形成和变迁。汉阳刘公洲、鹦鹉洲、武昌金沙洲相继带动汉阳市和武昌南市的形成,促进了两座古城以外商贸空间的自发组织的形成,成为吸引城镇空间向外扩张的重

要吸引力。如,明代时,金沙洲位于武昌巡司河入江口,具有良好的船舶停靠条件,在吸引船帮在此聚集的同时,带动了这一地区商贸的快速发展,聚集成为武昌南市,并在此形成了夏口驿。至清代,这一地区依托商贸集市的历史基础,进一步成为武昌城向南拓展的基地。自明代汉口建镇后,依托港口优势,商业快速发展,城镇空间迅速扩张,更是空间自组织发展模式的具体体现。

三、从武汉城镇空间演变回顾中汲取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

回望武汉城镇发展历史,就是一个探寻与生存环境和谐相处、与世事和谐相处的过程,对交通区位条件的重视、遵循礼制且兼顾因地制宜的空间布局、对山水景观资源的利用以及商贸空间的自组织变迁蕴藏着中国传统思想的精华,对当前国土空间规划有着重要的启发。文化心理的形成经历了岁月的沉淀,民族特有的风俗习惯、思维方式和处世哲学直接影响到当代城镇空间的组织——城乡人口的年度迁徙、跨代抚养的家庭结构、以教育为重心的家庭生活方式、老有所养的养老模式等等,这些因素仿佛是一双无形的“手”,对城乡空间组织产生着重要影响。

(一)整体联系的观点

当前,在我国全面推进城镇化的过程中,城市空间拓展与生态敏感地区保护之间的需求、旧城更新与城市整体功能提升、城市功能区片打造与城市品质整体提升之间的时序安排等等,这些都或多或少地蕴藏着局部与整体、量变积累到质变转化之间的辩证关系。“无孤立之理”,在武汉城市发展演变这一复杂的巨系统中,作为城市整体功能的组成部分,各类子系统之间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汉口传统码头区、武昌古城、汉阳府的空间演变,相互作用,城镇功能互为补充。这对未来国土空间布局的优化也有着重要的借鉴,如:在土地利用开发中强化交通影响分析,对道路和公共停车空间的规划强化用地性质对交通流量的吸引和影响分析;城市空间整体规划中深化细化局部用地的人群需求分析。在系统研究和整体统筹的基础上,做好部分城市功能空间的文章,使城市整体的功能得到有力支撑,才能为城市高质量发展整体目标的实现提供可行性。

(二)基于城镇居民需求的空间治理

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中对民众力量在治国中的重要性有着深刻的认识,管仲在《管子·牧民》中提到“仓廩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他认为普惠众民是确保国家政令畅通的前提,从实现国家强盛的角度来看,只有使民众生活富足了,百姓经济基础稳定了,才能抓住治国的根本。《尚书·五子之歌》也提到“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强调将民众的需求与国家的发展紧密联系。墨家的经典《墨子·非命上》中提出“废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的思想,即应该将先人治国的言论应用于实际政治,看其是否符合国家百姓人民的利益,来裁定其取舍。武昌古城中政治文化功能的空间协调布局、汉口汉正街特有的宗教祭祀—仓储商贸—码头集散功能的形成、汉阳沿江会馆宗祠的集中布局都反映着民众的文化心理。

当前,民众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已由简单的温饱转向对更高层级的宜居、宜业和更高层级精神生活的需要。随着社会生活老龄化、网络化的趋势日趋明显以及二孩家庭、空巢家庭等家庭模式的出现,城镇居

民日常生活需求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这些功能需求既涵盖了居民自治管理、生活必备消费等必备的基本功能,同时也包含了个性化服务功能。诸如此类,国土空间规划面临着许多“最后一公里”的短板问题,如何使城乡居民拥有更强的获得感、满足感、认同感和幸福感,是国土空间规划改革中需要面对的重要问题,同时,尊重民众多元化的自我实现需求,也是民众在国家治理中具有重要地位的具体体现。

(三)从对立面把握事物发展规律

正视事物的变化和发展,善于从对立面中把握事物相互依存的关系,是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中值得借鉴的又一闪光点。《老子》中关于“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敝则新”以及“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的论述,为我们在矛盾的相互转化中把握事物发展规律提供了借鉴。处在变革期的当今社会,常常面临着发展与保护、创新与传承、求速与保质之间取舍的困惑。武汉三镇历史上功能特色迥异,城镇职能差别显著,然而,经过几千年的演进,三镇的空间融合从未停滞,功能叠合使得城市的整体效能不断增强。从对立面把握事物,通过系统分析矛盾双方的成因和背后的动力机制,找到可以向对立面进行转换的点,是有条件、有可能向积极一面转化和发展的,在满足基本功能的前提下可以进行合理利用,从而为稀缺资源赋予更多的价值,真正实现城市发展与稀缺资源保护的共赢。

当前,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但发展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也是时代的主题。从矛盾的观点来看,对自然风景资源的保护和有序利用二者之间存在着辩证关系——一方面,保护是为了使城市建设对生态旅游资源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降到最小,将其控制在环境生态系统所能承载的容量之内,避免开发利用而造成的破坏。另一方面,通过合理的引导可进一步提升保护的质量,一味只强调保护,不懂得科学引导利用,不但不能体现出资源本身所具有的价值,而且也不利于发挥城市资源优势和提升城市整体功能。对生态资源的保护利用如此,触类旁通,对历史风貌区的保护和利用、对旧城保护更新、对老旧工业用地改造和对城镇空间人文内涵的挖掘和彰显等其他问题同样如此。

(四)动态平衡的思想理论支撑

被誉为群经之首的《易经》对“易”的诠释中就深刻揭示了其蕴含的变易之意——世上万物,皆有从不平衡状态向平衡状态转化的过程,维持系统相对动态平衡,需要蓄积新的能量进行革新,这是动态平衡理论的哲学核心要义。从武汉三镇的空间关系演进来说,三镇之间没有铁板一块、一成不变的整体,也没有绝对孤立、与外界毫无联系的个体,个体与整体之间保持着一定的联系与平衡关系,这种平衡是变动的、相对的,在某一阶段的平衡,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环境的变化,需要应对新的变化进行调整,变化是永恒的,追求动态平衡的状态也是永恒的。

当今的中国社会正处在一个快速发展的变革期,在快速城镇化的进程,我们习惯于以终极蓝图式的思维来对未来的社会物质形态进行安排,而在当今万物互联的时代,多变的因子、更迭的要素以及突发的重大事件都可能对城市空间组织和发展模式产生根本性的影响。当发生类似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极端情况下,暴露出城市空间使用效率和城市功能组织等方面的突出问题——专项规划设施配套标准、城市公共设施的复合利用模式、社区医疗设施配套水平、城市综合预警干预机制的建立以及如何维持城市基

本功能正常运转等方面的问题,以及城市本该具备的韧性、弹性和自组织功能的严重匮乏,都给现有的国土空间规划编制体系敲响了警钟。面对重大突发应急事件的“易”,打破了常规状态下城市各项要素之间的平衡,需要对原有的不能满足新态势需求下的固有状态进行彻底改变。

这给国家治理带来的启示是十分深远的,我们希望国土空间规划能给予我们的,不再是机械地实现认知不足前提下所制定的终极蓝图式的目标,而是城市能够以充裕的冗余空间、灵活的功能配套和高效的组织模式应对各种不确定因素的挑战——“知变守常”,善于把握变化中的不变,方能从容实现动态中的平衡,才能更好地提升城市的弹性和韧性。

四、在“善治”与传统哲学思想契合点上探索国土空间规划的新方法

面临高质量发展阶段的新形势和新挑战,国土空间规划模式需要从方法论层面进行创新,而一个良好的“善治”模式也需要契合本土国情和民族文化心理。就治理主体、治理目的、治理方法和治理结果来分析,“善治”与传统文化的契合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从主体来看,“善治”应该以整体思维方式来处理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统筹协调城乡,合理引导整体与各组成部分的功能发挥,善于从细微处着手,着眼大局,积量变为质变。二是从目的上看,“善治”的根本出发点就是为人民群众提供服务,让公众享有更充分的公共产品和最大化的社会福利,这与传统文化中“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有着紧密的内在联系。三是从方法上看,“善治”是广泛建立在契约基础上的一种成熟、稳定的合作模式,不是单方面靠政府权威施压,需要管理者和治理对象的良性互动,需要从对立面把握事物发展规律。四是从结果上看,面对多元化和复杂的社会形态及社会冲突,“善治”需要以动态平衡的思维来改进工作方法,以体制和机制的创新来提升规划编制、管理的效能,真正实现提高国土空间弹性和韧性的目标,其思想精髓与传统哲学中的动态平衡理论是一致的。基于以上分析,在高质量发展的规划实践中,运用传统文化中的哲学思想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

(一)在规划主体层面,以整体联系的观点提升对事物的认识水平

明代思想家王夫之强调“有即事以穷理,无立理以限事”,即研究者应不断提升思维格局,需要对研究的对象进行立体的全面的研究,不断提升对事物的认识,此为“事以穷理”,这一思想体现了知识对实践的作用,强调了应尊重自然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社会在变,人的需求在变,快速发展的科技给人类随之带来的生活方式和行为习惯也在变——“变”是永恒的,这恰好与传统规划模式下几十年一成不变的蓝图式规划模式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对比。几十年的规划实践,我们更多的是按照眼前的技术条件来设想、安排未来的空间发展构想,人在某一历史阶段认识的局限性就无法对未知领域和未知事物进行准确把握,这种不确定性自然动摇了未来几十年空间规划布局设想的科学性。

空间治理体系是实现人居环境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是国家治理体系建设的重要环节。而整体联系的观点要求我们辩证统一地看待城乡发展中的各类要素和出现的不同问题。通过建立起科学的价值引导体系和实施标准体系,解决某一子系统的问题时,需要站在系统的角度分析总体与局部之间的联系和因果关系,才能使我们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平。

(二)在规划目的层面,以人本思想为指引实现“本固邦宁”的规划目标

人与自身的关系表现在对事物认识水平和精神境界的提升上,直接关系到人民安全感和幸福感的满意度获取和对国家治理成效的认可,是国家公民、生存环境和治理主体三者之间最深刻的关系。“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作为体现国家治理效能的基本单元,社区是完善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环节。当前社区居民构成的多元化特点十分突出,不同年龄、不同地域来源、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层次,甚至不同宗教和国别的居民共同生活在同一个社区,而社区尽其所能,可提供的服务类型和总量又十分有限,这些不同需求本身存在一定的矛盾和潜在的冲突。而另一方面,百姓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需求已具化为系统性的指标和明确的空间需求。由于规划工作本身具备反映意愿和解决需求矛盾的双向功能,因此,针对社区日益多元化的需求,应充分发挥规划工作的协调性、政策性和引导性作用,应给不同利益群体以充分选择的自由和表达意愿的机会,提高方案、计划和政策的可实施性。只有从细微处落实好国土空间规划的各项人本目标,才能实现城市乃至国家层面高质量发展的整体目标。

(三)在规划方法层面,以“教以人文,化成天下”思想为指引从对立面引导矛盾转化

空间的矛盾实质上是人与自然之间、人与人之间的矛盾,需要抓住人这个根本,从本源上协调和转化矛盾。《论语》中记载,孔子把拥有一定人口规模、富裕的生活和教化视为立国的三要素,而其中他认为最重要的是在人民生活富足后应对其进行教化,以提升百姓的思想境界与认识水平。“教以人文,化成天下”,这是治理国家很重要的一部分内容,同时也是难度比较大的一项工作。物质生活水平提升到一定阶段后,其与人民群众生活满意度的提升之间不一定存在必然的正相关关系。一旦精神世界认识层面与物质条件之间脱节,就有可能因此产生各种矛盾。因此,在国土空间规划的实践中,应在深度沟通的前提下,从以下几个方面为人类对自我认识的提升和引导矛盾的转化做好服务:

一是因地制宜改善城乡人居环境,善于转化城镇发展与生态保护之间的矛盾,提升居民生活质量,以增强居民的获得感。

二是因地制宜地深度挖掘文化之“根”,善于转化现实发展需求与历史文化遗存保护之间的矛盾,以增强居民对生存环境和文化传统的自豪感。

三是充分考虑不同群体的行为需求特点,善于转化城乡之间、不同群体之间和不同行业之间发展不平衡的矛盾,以增强城乡居民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四是全面完善农村居民点和城乡社区规划体系,善于转化规划目标与落地实施之间的矛盾,以增强居民对自我实现的满足感。

面对国土空间复杂的系统问题,应透过空间看到背后的社会心理,在实践中善于深入分析矛盾的成因和根源,利用矛盾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向对立面转化的特点来化解矛盾。

(四)在规划结果层面,以动态平衡思想为指引实现高质量发展

世间万物,“动”是永恒的,“静”是相对的,而且从国土空间的角度而言,“静”的根源来自“动”,静止的空间只是特定行为活动的载体而已,各种个人行为和社会行为都有一定的规律可循。国土空间规划

应紧紧抓住“动”这一永恒的特征,在不断的变化中增强规划编制的针对性,提升规划成果的时效性,突出规划管理的弹性和韧性:

一是要善于运用“无为而治”的哲学思想将国土空间规划的关注点由终极蓝图式的引导转移到对底线思维和生态本底的控制上来,对认识水平尚未达到、技术手段尚不成熟、发展目标尚不明确的构想,在空间上大胆留白。

二是在系统性的目标定位中明确提出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标准、布局要求和社区生活圈建设等基本原則,并作为完善国土空间要素配置的重要内容,及时开展居民沟通。

三是运用新技术手段,充分发挥国土空间信息平台的动态监督预警功能,大幅提升规划管理的时效性。

在深入研究和掌握行为规律的基础上,关注对象由静态的“空间”向动态的“行为”转变,使静止的空间在动态行为的牵引下实现更加合理的安排。

五、结语

武汉城镇的发源与演变,与逐水而居的生存方式和军事政治功能关系密切,彰显城市特色,需要从历史根源挖掘文化内涵,“教以人文,化成天下”,这是治理国家很重要的一部分内容,同时也是难度比较大的一项工作。高质量发展阶段,空间治理体系是国家治理体系建设的重要环节,在国土空间规划的实践中,认识也是在不断深化的,反过来对城乡规划理论的提升也是有益的促进,这本身也是“知行合一”理论的体现。有理由相信,在我国传统哲学思想精髓的滋养下,在探索城乡高质量发展的实践中,我国城乡规划的理論发展将会结出更加丰硕的果实。

作者简介:

方可,武汉市规划研究院数字规划研究中心主任工程师,注册规划师,高级规划师。

(责任编辑:林丽)

化“流量”为“留量”， 打造武汉高品质文旅空间

——基于“特种兵式旅游”浪潮的思考

郭林 林建伟 黄焕 苏醒

摘要:2023年“五一”小长假全国及武汉迎来“特种兵式旅游”浪潮。本文尝试以人的空间需求分析为中心,基于“空间集聚现象—空间足迹特征—空间选择内因—空间营造举措”的逻辑,思考浪潮背后人的需求转变和城市空间应对策略。武汉应化“流量”为“留量”,将网络流量引至更多、更广领域,拓展文化旅游消费空间,通过“多主题”谋划、“多空间”保障、“多线路”组织、“全链条”服务,打造高品质的文旅空间,使“网红”变“长红”,形成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文旅品牌。

关键词:特种兵式旅游;文旅空间;武汉市

“五一”小长假全国及武汉迎来“特种兵式旅游”浪潮。高品质国土空间是高质量文旅服务消费的重要支撑,本文期望武汉能抓住疫情放开后全国旅游业报复性复苏的契机,通过城市文旅空间供给侧的不断创新,以高品质文旅服务引领爆发式增长的文旅需求,化“人气流量”为“产业增量”,支撑建设文化繁荣的新时代英雄城市。

一、武汉“五一”迎来“特种兵式旅游”浪潮的空间现象

“五一”期间,一大批旅游“特种兵”抵达武汉,开启深度游“打卡”模式。携程、美团等互联网平台发布的2023年“五一”出游、消费数据显示,武汉位列全国十大热门旅游城市。央视节目《朝闻天下》公布数据显示,4月29日至5月1日,武汉东湖风景区游客量在全国景区排行榜中排第8名。

“特种兵式旅游”浪潮推动武汉地铁客流量刷新历史纪录。武汉地铁客流量4月28日、29日、30日连续三天创新高,日均超过500万乘次,最高达到519万乘次,成为继北上广深蓉之后,中国内地第六个轨道交通客流量突破500万大关的城市。江汉路、循礼门、司门口黄鹤楼、昙华林武胜门、梨园等30个景点周边车站,单日客流量均刷新历史纪录。

二、武汉旅游“特种兵”空间足迹特征分析

通过对“五一”期间百度热力地图等大数据的初步分析,武汉旅游“特种兵”在空间上的活动轨迹主要具有以下特征。

(一)“大江大湖”生态游——从漫游东湖到畅游百里长江

从各大热门区域空间足迹停留人次总量来看,东湖、两江四岸地区排名靠前。数据显示,161万名游客畅游东湖,较去年同期增长114%。东湖绿道“五一”期间共接待游客71万人次,较去年同期上涨31万人次,增长75%。东湖沙滩景区入园人数也创历史新高,5月1日当天破开园以来“最高单日入园人数”记录。中科院武汉植物园迎4.5万名八方来客,出游人次同比2019年增长了60%。

(二)“英雄城”文化游——夜上黄鹤楼、长江灯光秀等热门景点

黄鹤楼等老牌景区推陈出新,吸引大量年轻人“打卡”。数据显示,“五一”假期首日,近4万人次游黄鹤楼,“五一”期间,黄鹤楼支付宝小程序日均浏览量超过10万人次。3000余名游客一起“夜上黄鹤楼”,看“八仙奇遇夜”奇幻上演。武汉城市名片长江灯光秀,“五一”期间以“建设英雄城市、弘扬劳模精神”为主题,点亮两江四岸。游轮“知音号”通过一场漂移式多维体验剧带领游客穿越回百年前的老武汉。“船长9号”将戏曲演出搬上游船。

(三)“烟火气”体验游——淄博烧烤火出圈,武汉小龙虾跃跃欲试

“打最多的卡,吃最多的美食”是网民对“特种兵式旅游”的特征总结。从空间足迹数据来看,武汉各大美食街区是旅游人口集聚的热点区域。“五一”假期,汉味美食街区雪松路、吉庆街,汉味小吃街区江汉路步行街、前进五路水塔街,汉味过早街区武昌粮道街、户部巷、大成路、汉口山海关路等人气猛增。数据显示,各大美食街区餐饮销售额同比2019年上涨169%,武汉主力连锁虾店肥肥、靓靓、巴厘以及武汉83个品牌主力连锁餐饮等预计共“撮”了小龙虾超300吨。高峰时期,巴厘龙虾、靓靓蒸虾等多家虾店排位超1000桌。

(四)“慢生活”乡村游——花博汇、木兰花乡等“沉浸式”乡村体验

外围乡村地区同样可成为旅游人口集聚的热点区域。木兰花乡、木兰草原、花博汇等景区周边民宿在小长假期间“一房难求”。木兰草原夜间有近8000顶帐篷,黄陂区“五一”前三天总接待人数102万人次,远超前三年同期总和,凭借“不夜城”称号,武汉再次冲上假期旅游目的地热搜。花博汇景区游客量超过万人,开启“白+黑”游览模式,白天游客徜徉四季花海,夜间观看焰火剧场秀。

三、“特种兵”钟情武汉的空间资源基础

为什么“五一”小长假武汉迎来“特种兵式旅游”浪潮?除疫情放开、文旅部门主动宣传等因素外,更多的是因为武汉拥有优越的文旅空间资源,如“大江大湖”的生态资源、独特的商业基因、“荆楚汉派”的文

化资源、“九省通衢”的交通区位优势等。

(一)“不一样”的国际湿地城市

武汉是世界唯一一个人口超千万的“国际湿地城市”,也是全国唯一一个同时荣获“国家园林城市”“国家森林城市”“国际湿地城市”城市生态最高荣誉的省会城市。武汉地处古云梦泽地带,长江及其最大支流汉江在城中交汇,形成武昌、汉口、汉阳三镇鼎立的壮美景观。^① 武汉境内江河纵横、百湖密布,165条河流奔腾不息,166个湖泊星罗棋布,1624平方公里湿地美景如画,湿地面积占全市面积的18.9%,被誉为“百湖之市”“湿地之城”。近年来,为彰显大江大湖城市特色,武汉规划新建、续建了东湖绿道、百里江滩公园等一批城市绿色基础设施,市园林和林业局数据显示,武汉市人均公园绿地面积已增至14.99平方米,实现人均“一间房”,已建成公园800余座、绿道里程2216公里,公园逐渐串珠成链、织链成网,实现了“300米见绿、500米见园”的目标。

(二)“不一样”的工商都会

武汉历来是工商业重镇,多层次的商业消费空间和多元化的消费业态吸引了广大游客。在快速城镇化过程中,武汉一方面通过城市微更新、微改造,保留了一批具有烟火气的特色商业街;另一方面新建了一批高水平的商业综合体。规划注重延续千年来码头城市的本色——最有市井烟火气,为发展平民商业提供了便利条件,保留了大成路、粮道街等一批网友评选的“武汉最具烟火气小吃街”,微改造了一批以昙华林、户部巷等为代表的历史街区。同时,在武汉多中心、组团式的城镇格局下,规划建设了中山大道—江汉路、鲁巷、中南路—武珞路等一批市级商业中心,形成了武广商圈、中南商圈等知名商圈,通过发展“首店”经济等高端业态,满足了华中地区高端人群的消费需求。在商业高度发达的当今社会,武汉多层次的商业空间承载着多元包容的汉派文化,吸引了四方游客。

(三)“不一样”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作为第二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之一,武汉历史悠久,“城市之根”盘龙城筑于商代,距今约有3500年的历史。武汉因其得天独厚的交通区位优势,成为古往今来楚文化区的重要中心,在几千年的历史进程中,沉淀了“荆楚汉派”的文化特质,集中了琴台知音文化、问津书院文化、归元宗教文化、万里茶道文化等文化名片。近代以来,武昌起义打响辛亥革命的“第一枪”,武汉后续成为国民革命中心和全面抗战指挥中心,留下了武昌起义军政府旧址、五大会址、八七会议旧址等一批革命遗址,形成了丰富的以红色文化为代表的英雄文化。同时,武汉是中国最早期的开埠城市和近代工业的发祥地之一,留下了江汉关大楼等汉口近代建筑群和汉阳铁厂等一批工业遗产,城市进一步融合了租界文化、近代工业文化、码头商贸文化、近代新式教育文化等,形成了多元包容的文化特质。^②

^① 徐斌:《武汉旅游保险产品创新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广西师范大学,2021,第22页。

^② 林建伟:《长江文明传承视角下武汉城市文化空间营造策略思考》,《决策与信息》2022年第2期。

(四)“不一样”的综合交通枢纽

武汉东联长三角、西接成渝圈、南向粤港澳、北望京津冀,既是全国经济地理中心,又是长江黄金水道和南北交通大通道的枢纽中心,正在加快建设“超米字形”高铁网络,可实现高铁4小时通达国内80%的主要城市,为促进文旅发展奠定了便捷的交通出行基础。武汉是全国为数不多的集铁、水、公、空等多种交通方式于一体的综合交通枢纽城市,是国际航空客货运门户双枢纽、铁路客货运双枢纽、全国公路路网重要枢纽、港口型国家物流枢纽、全球性国际邮政快递枢纽。

四、武汉高品质文旅空间营造策略思考

2023年4月28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要改善消费环境,促进文化旅游等服务消费”。“五一”时期“特种兵式旅游”浪潮为武汉促进文化旅游消费带来了空前的流量,但流量不是终极目的,更应将网络流量引至更多、更广领域,拓展文化旅游消费空间,化“流量”为“留量”、使“网红”变“长红”。如何实现“流量”向“留量”的转化,建议回归“人的需求”,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围绕高水平建设长江国家文化公园(武汉段),通过“多主题”谋划、“多空间”保障、“多线路”组织、“全链条”服务,打造高品质的文旅空间,形成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文旅品牌。

(一)“多主题”谋划,塑造文旅核心品牌

武汉应在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旅游目的地的总目标下,以长江国家文化公园(武汉段)建设为契机,深挖武汉“大江大湖”生态底色、“荆楚汉派”人文本色和“烟火气”城市特色,延续“五色旅游”发展思路,主动谋划具有国际吸引力的文旅IP,打造有灵魂、有创意、有温度、有活力的城市旅游品牌。

擦亮“蓝色水上旅游”主题。以水上游线串联沿线历史景观,优化两江游览游线,串联长江沿线历史遗迹(黄鹤楼、江汉关、晴川阁等)、历史建筑(横渡长江博物馆等)、特色码头(粤汉码头、汉阳门码头等)、桥梁(长江大桥等)4类历史景观。以“知音号”为文化品牌,通过“游船+”模式,推广邮轮、游船、游艇等水上旅游产品。以东湖沙滩景区、东湖水上运动中心、凌波门等为载体,丰富帆船、皮划艇、游泳等水上运动。

擦亮“绿色生态旅游”主题。打造“东湖世界级城市生态绿心”品牌,保护彰显东湖旷阔郊野的自然生态本底和半边山水半边城的景观格局,利用历史人文景观和大学环绕的书香文化资源,统筹布局观光、科普、娱乐、休闲等多种公共功能。打造“百里长江生态廊道”品牌,以龟山、蛇山、长江大桥、南岸嘴“一桥两山一嘴”为主体,建设“长江公园”,整体展示“两江交汇、江汉朝宗”的山水形胜格局,打造长江大保护典范城市的核心标识区;龟北片区以长江文明传承创新和世界大河文明交流交融为主题,通过布局世界大河对话论坛会址、长江文明高等研究院等超级IP,打造世界最负盛名的大河文明对话区。^①市域北部以木兰山为核心,打造全国最大的城市生态景区群、国际性山地生态休闲目的地。市域南部以梁子湖为核心,

^① 武汉市委政研室与武汉大学国家文化发展研究院联合课题组:《武汉打造长江文明枢纽城市初步研究》,载涂文学主编《武汉学研究(第2期)》,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第3—14页。

打造国际湿地生态魅力休闲区。^①

擦亮“红色革命教育旅游”主题。依托武汉中共中央机关旧址、毛泽东旧居、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纪念馆、八七会址旧址等红色旅游资源,打造全国红色旅游教育示范基地。武昌以武汉革命博物馆为核心,通过整治提升老街老巷、中华路城市阳台、武昌廉政文化公园等,拓展红色文化空间,打造全国知名的“武昌红巷”和展示英雄城市文化的核心标识区,打造辛亥首义文化节节庆活动品牌。江夏依托中山舰博物馆、槐山矶驳岸,新建联勤保障部队博物馆,打造国家国防教育示范基地。黄陂、新洲依托新四军第五师历史陈列馆、将军山革命根据地,建设红色旅游公路,融入大别山红色旅游区。

擦亮“古色历史人文旅游”主题。形成包括文化遗址公园、历史遗迹公园、历史博物馆、历史街区、历史村落等的古色旅游产品。深挖武昌历史城区、汉阳历史城区、汉口老城历史城区、汉口近代历史城区等文化资源,打造“历史之径”文旅品牌。围绕荆楚文化,启动建设明楚王墓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提升磨山楚文化游览区,扩建楚文化馆,集中展示楚国帝王将相、楚城集市、楚歌楚舞、楚风民俗等楚文化。

擦亮“夜色休闲旅游”主题。以创建国家级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为目标,以长江灯光秀和两江游览为核心,形成包括夜游美食街区、夜游购物商圈、夜游娱乐步行街等旅游品牌。学习黄鹤楼开放夜间游览的经验,推动琴台美术馆等公共文化场馆夜间开放,为市民和游客提供差异化、多元化的文化夜生活。^②

(二)“多空间”保障,创新文旅服务场景

高品质的文旅空间不应仅出现在 A 级景区,更应拓展到文旅街区、文旅田园综合体、文创产业园区等多元空间场景。

文旅景区。A 级景区的数量与质量是一个城市旅游业发展水平的重要体现,目前,武汉市共有 A 级景区 52 家,与重庆(272 家)、上海(134 家)、成都(92 家)等旅游名城有一定差距,仍需在 A 级景区创建上做文章。在 A 级景区创建中,可通过“博物馆+旅游”“非遗+旅游”“演艺+旅游”“节庆+旅游”等融合发展,发展网红经济、夜间经济、创意经济、体验经济等,形成 A 级景区运营的新模式,如汉阳区将龟山、月湖、古琴台、晴川阁四大景点串珠成线,打造“知音文化旅游区”景区。^③

文旅街区。伴随大众旅游时代的到来,城市特色街区的游客比重大幅提升。文旅街区除满足游客需求,还要满足城市居民的休闲娱乐需求,兼具文旅景区、商业步行街等多重属性,将文旅功能与城市功能高度融合。国家“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出“打造一批文化特色鲜明的国家级旅游休闲城市和街区”。2022 年以来,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联合发布了两批共 111 个国家级旅游休闲街区,武汉市黎黄陂路历史文化街区入选。武汉市目前共划定了 16 个历史文化风貌街区,包括江汉路及中山大道等 5 个历史文化街区,首义片等 5 个历史地段,显正街等 6 个传统特色街区。未来可进一步强化历史文化风貌街区的保护性利用,加强对历史建筑、老旧厂房等创意化设计和改造,把创意美术元素、文化艺术元素广泛应用到城市更新中,做精人文艺术主题街区,推动“文旅+消费”“文旅+体验”等融合发展,植入网红美食、

① 严春:《打造世界一流的城市亮点区块》,《长江论坛》2017 年第 2 期。

② 樊志宏:《建设国际消费中心的关键是打造系列国际性消费目的地》,载樊志宏主编《武汉社会科学·总第 25 辑》,武汉出版社,2022,第 31—33 页。

③ 樊志宏、刘婧:《“夜间经济”:发生、演进与治理》,《群众》2019 年第 20 期。

复合书店等新业态,营建体验式、沉浸式、互动式文旅融合消费新空间。

文旅田园综合体。在乡村振兴的大战略下,近年来国家不断推进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宅基地、承包地“三块地”改革,深化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试点。根据国家第三次国土变更调查数据,武汉市村庄建设用地约455公里。其中,经营性建设用地约49平方公里,宅基地约330平方公里。乡村存量建设用地可成为发展乡村旅游的助推剂,推进“入股+田园综合体”“出租+艺术下乡”“抵押+创业创新”“共建共享+产业融合”等多种模式,为乡村文化旅游发展提供空间保障。通过“文旅+农业”“文旅+生态”融合,推动发展以田园风光、生态景观为主题的观光型乡村旅游,以乡土文化、乡村民俗为主题的体验型乡村旅游,以康体疗养、健身娱乐为主题的康乐型乡村旅游,打造集农耕研学、农事体验、观光旅游、休闲度假、特色民宿等服务于一体的田园综合体。^①

文创产业园区。通过主城区内低效工业厂房、闲置商业楼宇等存量建筑的整治改造,推动存量建筑资源再利用,规划建设多形态、低成本、小规模嵌入式创新创意空间,为小微企业提供多样化的成长空间,推动“文创+旅游”“音乐+旅游”“电影+旅游”“动漫+旅游”“设计+旅游”“传媒+旅游”等新业态创新发展,如规划布局三阳设计之都、汉钢文创园、环武音音乐谷等。

数字文旅空间。依托武汉数字经济产业优势,强化文旅产业数字化转型,实现虚拟文旅空间与实体文旅空间的融合互动。利用大数据、元宇宙、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开展数字文博、云展览等服务,建设长江文明数字博物馆等虚拟文化设施,发展馆藏资源活化技术,让文物“活”起来。延伸剧场空间边界,发展云演播、网络直播等,以演播形式引领传统戏曲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研究启动盘龙城、武昌古城等文旅元宇宙场景应用实现项目,通过VR沉浸式虚拟建模、AR情景式互动体验、XR现实与虚拟结合等先进技术,再现武汉代表性主题场景的沉浸式文旅空间。

(三)“多线路”组织,打造优质景区集群

以推动景区景点串点成线、连线成片、集群发展为目标,以提高游客舒适度和丰富游客体验为出发点,综合考虑文化旅游资源空间分布密度和慢行、公交、自驾等不同旅游出行方式的时空距离,谋划多类型、多层次的游线。

谋划区域文化线路。保护万里茶道(已列入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汉冶萍工业遗产线路等区域性文化线路,深入挖掘沿线各类历史文化遗产资源,整合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类似“欧洲文化线路”、南粤古驿道、浙东唐诗之路等的文化线路,逐渐成为城市文化品牌。^②

贯通都市圈自驾游线。武汉都市圈将形成“四环三十射”高速公路网体系,可实现高速公路1小时活动圈。基于旅游资源空间分布关联性,依托区域交通廊道,串联红色革命文化、荆楚文化、近代工业文化、百家交融文化等文旅集聚区,打造长江荆楚、三国文化、古道文化、山地康养、红绿景观、孝文化、宗教文化等各具魅力的自驾游文化路径。成立武汉都市圈文化旅游合作联盟,优化区域文旅资源配置,共同打造武汉都市圈“打卡”线路。

织密城市绿道慢行游线。打造东湖绿道、东西山系人文绿道、百里江滩公园绿道等世界级滨水绿道,

^① 刘伟:《浅谈辽宁乡村旅游发展与文化艺术的营销》,《农业经济》2009年第4期。

^② 龙迪:《国外文化生态保护区规划研究》,硕士学位论文,东南大学,2016,第29页。

主城区内形成“三镇三环”滨水绿道系统,可慢跑、可骑行、可登山、可亲水。依托九真山—九峰山东西走向山脉,汇聚名山名川名湖等自然元素,创新组合历史遗迹、现代名胜等人文元素,加快建设东西山系人文绿道,串联黄鹤楼、晴川阁等主要历史人文场景,串联武昌古城、汉阳古城、中法生态城、洪山大学城、东湖科学城,打造一条无断点、宜慢行、念古观今、畅想未来的人文绿色长廊。其中,两江四岸段挖掘最具武汉特色的历史文化特色,打造百年风华、万里茶道、华商汉韵、工业艺术、汉阳古城、两江纵览、诗词览胜、红色记忆、古城时光、辛亥风云等主题历史之径。

提升水上特色游线。联动长江上下游城市,依托各地自然风光、历史古迹、民俗文化、爱国教育等特色,设计内涵丰富、主题鲜明的邮轮产品,打造具有特色的邮轮航线和中部地区游轮服务中心。构建多层次、特色化两江游览、东湖游览产品体系,做好“游船+”文章。

优化公交都市游线。串联城区内 A 级景区、特色街区、文化场馆、演出场所等,谋划公交都市游线。如精准对接市民游客出行赏樱需求,打造“公交赏樱专线”。充分利用丰富的红色资源,在基本不改变运营路线和市民出行习惯的基础上,增设站点,串联所途经的红色场馆,打造“红色旅游公交专线”。

(四)“全链条”服务,丰富文旅消费体验

淄博“火出圈”的“流量密码”之一为政府快速响应、精准服务游客需求,比如开设烧烤专列,青年驿站半价,新增 21 条公交专线等。这是从网红现象到网红品牌 IP 打造过程中政府部门的教科书式反应,非常值得武汉学习。将游客“引进来”后,要着力提高当地软硬实力,做好线下配套服务,改善交通、住宿等基础条件,逐步规范旅游秩序、提升营商环境,赢得更大发展。建议围绕游客食、宿、行、游、购、娱等具体需求,做好“全链条”服务文章。

优化旅游交通系统。规划交通枢纽与主要景区之间便捷的旅游集散通道,设置旅游接驳和景区直通车线路。开展旅游公路示范工程建设,开辟旅游观光巴士线路。加强旅游景点周边轨道交通站点最后一公里接驳换乘设施建设,强化公交换乘枢纽的人性化、精细化设计,营造多种交通方式高效衔接的换乘环境。

建设品质消费商圈。结合城市重点功能区建设,引入新一代文旅商业综合体,融合特色文化、美食、演艺、文创、零售等多业态,打造可体验、可娱乐、可消费的网红项目。加快引进世界知名品牌旗舰店,发展“首店、首牌、首秀、首发”,打造国际顶级商圈。提升步行街软硬件水平,建设国家一流示范步行街。

提高酒店接待能力。形成包括经济型酒店、星级酒店、民宿等多层次的服务体系,引导文旅景区、文商旅街区等周边区域酒店的合理布局。适应旅游人群新需求,推动旅游民宿品牌化发展,打造特色鲜明的旅游民宿群。

作者简介:

郭林,武汉市规划研究院(武汉市交通发展战略研究院)总体规划所规划师;

林建伟,武汉市规划研究院(武汉市交通发展战略研究院)总体规划所所长;

黄焕,武汉市规划研究院(武汉市交通发展战略研究院)副院长;

苏醒,武汉市文化和旅游局办公室主任。

(责任编辑:周阳)

论大数据时代武汉市慢行系统建设

严 炜 解宇航

摘 要:大数据时代城市慢行系统改变城市交通结构,具有景观性、文化性、参与性等特点。武汉市已初步建成“傍水而生”的慢行系统网络,“两江四岸”和“环东湖”等滨水慢行系统的品质持续提升,人文底蕴不断积累,推动城市可持续发展。但武汉市慢行系统存在着安全性不足和人性化设计不够等问题,需要依托大数据、物联网等数字技术进行改造优化,提升安全性和连续性,实现与城市公共交通的无缝连结。

关键词:慢行系统;大数据时代;武汉市

城市慢行系统是城市交通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指由步行、骑行、公交车等多方式协调的慢速综合交通体系,为民众提供多元化出行体验。城市慢行系统改善城市交通结构,引导民众低碳出行。通过构建完善的慢速交通网络,使慢速出行方式成为城市交通主体之一,引导城市交通从“车主导”转型为“公共交通主导”,从而有助于推进城市碳达峰碳中和,推动绿色低碳交通发展。城市慢行系统是慢行交通的空间载体,^①在协同推进城市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方面成效显著;在城市建设和改造过程中通过铺设更多步行道或自行车道,增加绿色基础设施和公共户外空间,助力形成绿色低碳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提升居民幸福指数,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进入21世纪,武汉市为建设国家中心城市,不断贯彻“互联网+”创新思维,依托大数据技术持续发展城市慢行系统,优化城市公共空间,让城市生活“慢”下来,有效缓解交通拥堵,减少大气污染,降低能源损耗,迈向“碳中和”城市。本文基于武汉市慢行系统建设的成效和不足,提出了进一步的优化对策。

一、武汉市慢行系统简况

(一)武汉市慢行系统发展图谱

百湖之市、江汉交汇、江风湖韵的美丽武汉,拥有全国最大城中湖东湖。在大数据时代按照世界滨水文化名城标准建设全年龄段友好型慢行系统,精心塑造“以人为本、以水为魂”的慢行网络。在城湖融合

^① 吴洪洋、杜光远、尹志芳编著《城市慢行交通系统》,人民交通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2016,第2页。

发展中全面提升公交、慢行等绿色交通体系,以期实现公交、慢行、小汽车“442”的交通出行结构,助力“双碳”目标实现和绿色低碳智慧城市建设。

1. 武汉市慢行系统建设坚持科学规划与统筹管理

2016年的《武汉市综合交通规划》、2017年的《武汉市慢行交通及绿道系统规划》指出,构建与城市发展相适应、与机动车发展相协调、与公共交通良好衔接、管理有序的“安全连续、便捷舒适、生态魅力”的慢行交通和绿道系统。武汉不断健全慢行道路管理维护机制和安全巡查制度,增强城市慢行系统的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慢行交通品质持续提升,阶段性成就明显。2021年《中国城市步行友好性评价报告》指出武汉步行友好改善总分排名居全国第三。

武汉市慢行系统分为步行系统与非机动车交通系统两部分,实行分区分级管控模式。其中自行车道和步行道建设均设置为“四级分类”标准;^①按照人车分离级别重新分配道路路权,将道路使用权更多地归还给行人和自行车。近些年武汉大力推动城市自行车路网和步行路网建设,高标准改造历史街区和城市重点功能区的慢行结构,完善配套相关公共交通和其他公共资源,形成了结构合理、功能完善的慢行交通网络。城市慢行系统承担起融合城市自然生态系统与城市交通系统的作用;通过建设绿道滨水城市公园,为市民提供运动健身休憩的公共场所。使武汉市交通出行结构由私家车为主转化为共享单车辅助“公交”模式。2020年底武汉构建的步行道和自行车道总长达4800公里,2022年武汉百里长江生态廊道慢行系统全面贯通。

2. 武汉市慢行系统构建着力打造协同发展新格局

基于大江大湖的地理环境,武汉依照慢行系统规划,在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前提下,以各类江河湖库水系为核心,聚焦自然保护区和自然公园,融合小绿地、小广场、小森林等“三小绿地”,因地制宜连片成网、协同推进,打造与自然景观、地域文化相协调的高效便捷的城市慢行系统。重点围绕“两江四岸”和大东湖、汤逊湖、青菱湖、后官湖、府河、武湖等湖区进行差异化布局,建设整体提升的慢行交通示范路。引导黄陂、新洲等北部山区以及蔡甸、江夏等南部湖泽,塑造山清水秀、北峰南泽的滨水慢行系统。

(二) 武汉市慢行系统基本类型

武汉市慢行系统依照功能区需求可分为休闲度假型、商务办公型、综合服务型等三大主要类型,满足各功能片区对于慢行交通的需求。^②

1. 休闲度假型慢行系统

休闲度假型慢行系统多与城市文旅资源、体育设施融合发展,为市民提供休闲娱乐大型综合步行街区或生态集群。如法国里昂罗纳河慢行道、瑞士日内瓦艾尔河水花园、美国华盛顿钻石蒂格公园。^③武汉中山大道历史文化慢行街区为武汉市规模最大的娱乐休闲产业集群,整合江汉路步行街、吉庆街美食街、黎黄陂路历史街区等商业成为一个整体,提供度假休憩购物体验。

① 高嵩、郑猛、杨翌照、王维:《落实规划管理,促进慢行系统复兴——武汉市慢行交通发展策略》,《交通与运输(学术版)》2016年第1期。

② 陈涛、冯晓静:《城市慢行交通系统规划》,《中国科技信息》2020年第1期。

③ 托尔比约恩·安德森:《滨水慢行系统》,贺艳飞、王丽伟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第42—87页。

2. 商务办公型慢行系统

商务办公型慢行系统多建于城市 CBD 区域,通过商旅一体式打造写字楼、商务酒店集群,构建一站式商务办公街区。旨在降低业务来往的远行需求,在慢行街区内即可满足日常商务办公和商务差旅的所有需求。如武昌滨江商务区。

3. 综合服务型慢行系统

综合服务型慢行系统依托大型社区或城市政务中心而建,有效串联社区各组团与社区文化、商业中心,构建联通的公共活动空间。旨在把传统旧街区嵌入自然,同时将城市各职能部门服务窗口统一设置于一个慢行系统街区内,一站式解决居民政务需求。如东湖高新区左岭街道智苑社区。

(三)武汉市慢行系统主要特点

大数据时代武汉市慢行系统形式各异、功能多元,体现出鲜明的景观性、文化性、参与性和经济性特点。

1. 景观性

作为城市名片,景观性是慢行系统的第一要素,意味着城市具备生态友好、休闲观光、和谐宜居等特征。慢行系统在选址和设计之初,就会注重城市公共设施与场地的适配性。武汉水域面积广,山体植被丰富,独特亲水景观使武汉两江四岸、环东湖圈的滨水慢行系统享誉世界,为长江大保护、市民休憩、建设世界一流滨水城市夯实基础。

武汉“两江四岸”慢行系统是山水相融的集防汛、景观、生态休闲、亲水、文化、慢行等多功能于一体的百里长江生态廊道。其“碧道”无障碍串联武汉三镇最美岸线和黄鹤楼、长江大桥、晴川阁、龟山电视塔等建筑景观。而另一生态蓝道系统——著名的武汉环东湖慢行绿道,将城市滨水区自然环境与人类活动融合,呈现出“山环水绕彩云蒸,万顷湖光一望澄”的和谐滨水景观。

2. 文化性

文化输出是城市慢行系统设计之本。武汉市慢行系统多层面、全方位传承文化,彰显城市人文精神。通过园林景观、空间意象表现、构件材质等构建文化氛围,连接城市文化景点。常见的是从“市级文化战略区—区级文化中心—社区文化设施”层面彰显城市公共空间文化底蕴,结合楚文化、红色文化资源和文化创意产业,凸显武汉人文历史风貌。如武汉市中山大道慢行系统横贯汉口历史租界区,西洋建筑林立,串联汉口文化核心区的文化元素。

3. 参与性

参与性是衡量已建成慢行系统价值和作用的重要指标。武汉市慢行系统内部采用开放式街道尺度设计,提供人与人的交往空间,为民众生活出行、健身休闲提供便利。对于社区综合服务型慢行系统,服务面主要为 15 分钟生活圈,慢行系统参与度=日均客流量/慢行系统 15 分钟生活圈覆盖面内全部常住居民。对于商务办公和休闲度假型慢行系统,因客流覆盖面广,慢行系统参与度=日均客流量/预估客流量。布局合理、高质量发展的武汉市慢行系统引导更多市民减少机动车出行,增加骑行或步行选择,从而提高慢行系统使用频率,提高市民的参与度与满意度。

4. 经济性

武汉市慢行系统保护生态、推动城市绿色转型的同时,助推“文旅商贸”融合发展。从而吸纳更多客

流量,拉动消费,为城市带来经济效益。其景观性、文化性吸引民众驻足停留,人流量和自行车流持续增长,提升民众慢行交通出行比例,激活与之相关联的商圈活力,带动城市观光旅游、休闲购物和创意产业发展,文旅消费持续升温。武汉市慢行系统降碳减污扩绿增长,书写绿色生态旅游新篇章;关联多元消费场景,促进商业繁荣,推动慢行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二、武汉市慢行系统建设成效

大数据时代武汉市慢行系统建设经历了从无到有、从有到精、从点到片、连片及市的精细化建设过程。

(一)武汉已建成“傍水而生”慢行系统框架

武汉市慢行系统重视城市滨水区公共空间建设。依靠得天独厚的公共滨水区,已基本形成市民漫步休闲、公共交通设施和滨河湖泊生态系统协同的“傍水而生”高品质慢行系统。目前,武汉市160多个湖泊都进行了“傍水而生”慢行系统改造,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综合治理,统筹构建湖岸缓冲带、滨湖休闲道、多功能慢行道、景观车道、亲水平台、步道桥、金属凉亭、野生动物栖息地等实体空间,充分彰显人与自然和谐的理念。

最典型的当数傍武汉东湖而建的环东湖慢行系统。它连接大学、文化中心、居民住宅区与湖泊丘陵,全方位覆盖环东湖生活区。因路网覆盖率高、与城市滨水区和谐发展而驰名中外。为使民众有更好的观水亲水体验,武汉环东湖慢行系统建设以人为本,鼓励城中湖资源绿色利用最大化,不断推动城市慢行系统与滨水、绿道、公园等空间“三网合一”融合发展。^① 规划布局一环、二脉、三湖、三心、三廊、六轴的绿道(蓝道)干线网,城市生态保护和城市生态旅游协同并进,成为极具竞争力的城市慢行可持续交通系统。

(二)武汉市慢行系统建设聚焦人文底蕴

城市慢行系统是城市公共活动区,也是城市文化发展的集中展示地。武汉市慢行系统建设注重厚植人文底蕴。在慢行系统特色景观中融入历史典故,涵盖城市文化、地域文化、革命红色文化、商业文化和公共文化。在慢行系统网络中设立不同区块单元提升文化品质,建设具有全国影响力的文化之都。目前黄鹤楼、首义文化区、昙华林、户部巷、都府堤等景点片区被文化串珠成链,汉口沿江、月湖—南岸嘴、东湖西岸等慢行系统具备国际一流文化水准。

武汉市慢行系统同步推进“工业+生态+历史+红色+音乐”文化主题,拓展文化传播效应。以数字技术推动博物馆文物的活化利用。以武汉武昌区至青山区沿江慢行系统来说,自武汉市长江大桥至天兴洲长江大桥长江东岸的区域,包含了武汉市历史文化重点保护区域:司门口黄鹤楼首义片区、武汉武九铁路北环线遗址片区及青山工业码头遗址三大区域。

第一,民主路—武车路段慢行系统,立足武昌区历史古城,融入辛亥革命、黄鹤楼、革命红巷等历史文化元素,结合武昌红色展馆、红色遗址、红色故居等红色资源,以浮雕、团花等园林设计方式展现武昌历史

^① 郭明洋、肖书影、王景泽:《城市道路慢行交通与绿道、滨水空间融合发展设计探讨》,《市政技术》2021年第9期。

文化底蕴和革命精神。第二,武车路—园林路段慢行系统,围绕武昌铁路京九线和铁路车辆厂建设铁路文化主题公园,通过铁路文化彰显武昌曾经的铁路枢纽地位。第三,园林路—建设九路段慢行系统,结合青山工业码头遗址打造“工业风”慢行系统,结合钢城历史重现武汉市钢铁工业的辉煌,讴歌武汉工业史和长江工业文明。

(三)武汉市慢行系统建设注重推动城市可持续发展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积极践行“长江大保护”,武汉利用慢行系统连通交互不同城市空间和自然环境,打造生态优美、宜居宜业的花园城市。彰显武汉山水人文之美,引导居民逐渐形成“地铁公交+慢行”出行习惯。绿色出行、交通顺畅、惠泽民众的可持续慢行交通网络,提升城市品质和市民幸福指数,协调推进城市可持续发展。

1. 慢行系统促进城市生态保护

大数据时代武汉通过建设高品质慢行示范路,使慢行系统、生态保护和经济发展协同并进。广覆盖的武汉市慢行系统不断增强步行系统与公共交通系统的连结率,从而引导城市上班族和游客采取绿色出行的方式。大幅降低民众对机动车的出行依赖,减少化石燃料交通工具的使用率。减少大气污染、温室效应、热岛效应,助力“长江大保护”。武汉在城市边缘区域建设慢行系统,承接城市郊野生态绿楔功能。借助郊野公园串联城市不同空间资源,为城乡居民提供一体化健身娱乐场所,提升城乡生态景观,助推城乡生态一体化修复。

2. 慢行系统助力城市经济发展

武汉市慢行系统建设重视打造一体化红色科技文旅经济。弘扬传统文化,促进文旅深度融合、文旅繁荣。慢行系统与市区商业旅游景点、全域乡村旅游联动,融合高层级主流商业经营范围及城乡周边风貌,充分发挥历史建筑、图书展馆、科技遗址、红色故居等资源作用。在构建慢行步道时,串联博物馆、美术馆、纪念馆,大力推动城乡旅游文化品牌建设,如“两江游览”“红巷”和“木兰乡居”民宿品牌。休闲度假型、商务办公型及综合服务型慢行系统,都会在场消费、体验商圈、夜行消费、动感氛围等设计中嵌入时尚元素及文化元素,激发消费需求,发展城乡生态经济,带动城乡旅游业繁荣兴盛。

三、武汉市慢行系统存在的不足

武汉市慢行系统建设虽取得一些成效,但仍存在着走不通、不安全、不舒适等问题,安全性、人性化亟待提升。通过问卷调查和实地考察发现,人车空间的混淆和界限的模糊,影响民众对慢行交通的出行体验感。慢行系统有待进一步完善。

(一)慢行系统安全性不足

武汉现有慢行系统缺乏必要的安全设施,步行、骑行安全无法得到保障。武汉市现有慢行系统多为人车合流交通,部分区域机动车道与非机动车道、人行道缺少明显划分。非机动车道长期被机动车占用,人车抢行、逆向骑行等状况频发,以武汉中山大道与江汉路步行街平交路口为例,经过慢行街区改造后,

原有环形天桥被拆除,取而代之的是斑马线平交路口。由于步行街横向行人滞留,机动车道停止线后第一位机动车启动的平均时间为绿灯亮起后5秒。影响机动车通行效率,对滞留在平交路口人行横道上的行人造成一定安全隐患。武汉市慢行系统的安全性有待进一步提高。

(二)慢行系统人性化设计不够

武汉现有慢行系统的部分慢行步道被挤占,共享单车停车难。停车场地不充足,许多机动车直接停在自行车道上。一些人行步道仍铺设硬装路面,长时间步行脚感不适。长期使用年长者不得不担心潜在膝盖伤病风险。部分人行步道路缘石过高,在平交路口没有设置缓冲坡度用以向地面过渡。如武汉菱角湖公园慢行步道的菱角湖路口,其路缘石高达27厘米,与路面呈直角过渡,对于腿脚不便的老年人存在跌倒隐患。部分人行步道没有设置助盲设施、出现盲道断头或损坏等现象。实地调研发现,西北湖公园和东湖慢行两步道均未设置助盲设施,中山大道慢行街区存在盲道断头及损毁的情况。这些问题说明武汉市慢行系统的人性化设计有待完善。

四、优化武汉市慢行系统的对策

(一)改善武汉市慢行系统的安全性和连续性

首先,武汉需在慢行系统与机动车交通平交路口设计“行人安全岛”。在各通行方向右转车道涂画机动车盲区警示色块,以提示行人不要站立于右转机动车视野盲区内等待通行。在道路过宽的路口设置“Z”字形或“X”字形人行横道,加快行人通行效率,在行人未能及时通过时提供安全滞留场所。

其次,增强行人和自行车的交通信号优先权。在武汉市慢行街区路口设置过街示意按钮,将街区内机动车车速限制到每小时30公里。收窄街区内机动车道、拓宽步行道及非机动车道,使市民外出时自觉自愿采用步行及自行车等慢行出行方式。

再次,提高慢行系统建设密度。将武汉各慢行系统进行有机连结,以“HCH(Hub Connect Hub,节点连结列点)”思想进行规划设计。每一个慢行系统在建成地构成慢行圈(Hub),利用自行车道、人行辅道或公共交通将各个慢行圈进行连结(Connect),从而使得全市慢行系统成为一个相互连结的有机整体。

最后,连片化处理武汉市慢行系统路网,提高慢行交通环境密度。根据慢行交通流,实时调整路口信号灯,实行慢行交通通行优先权,对混合道路进行动态化限速管理。最大化保证慢行交通参与者安全,引导市民或游客使用慢行交通感知城市。

(二)增强武汉市慢行系统的人性化设计

首先,武汉市设计、建设慢行系统要充分调动市民参与学习历史人文知识的积极性。在历史人文知识典故及各类雕塑前设置扫码讲解功能。基于微都市视角让武汉市民在慢行现场积极与历史文化互动,更多关注被生活忽略的城市文化。

其次,建设全年龄段、全阶层友好型城市慢行系统。城市慢行系统要关注城市弱势群体,强调资源配置均等化、公平化。在慢行系统公共空间中强调以人为本,步行导向“人本化”;促进城市中不同年龄、不

同文化背景、不同阶层的人群交流交往,带动城市社会、人文生态发展的繁荣和特色化。^①在慢行步道路口合理设置便于婴儿车、轮椅车通行的无障碍通道,使用缓坡步道,方便老人、婴儿、残疾人等群体出入。让慢行系统更亲民、更人性化。

再次,增强慢行系统的安全性和舒适性。在慢行步道上铺设橡胶缓冲层减轻长时间行走带来的脚部压力。联合医疗系统在慢行系统沿线加装 AED 等应急医疗器具,在意外发生时争取黄金救援时间。将人行步道与自行车道使用绿化带或隔离带进行分隔,避免行人与自行车混流而带来安全隐患。慢行步道间隔百米设置休憩座椅、隔千米设置休憩广场。使用绿化带将慢行步道与机动车道隔离,减少步道尾气污染。

最后,运用大数据、物联网等数字技术强化慢行系统,打造数字景观步道。将武汉市慢行系统与武汉文旅平台、智慧城市建设相融合,强化“数实融合”模式,实现市民、游客数据分析和预测,为市民和游客提供“一站式”、24 小时在线的数字化景区服务。

(三) 实现慢行系统与城市公共交通的无缝连结

武汉市慢行系统要注重连结公共交通站点与居民住宅区、主要商业区,促进“公交+骑行+步行”的有机融合。公共交通为慢行系统提供服务,可融合城市轨道交通系统,容量高、便捷性强,是步行街区对外进行人流交换最有效的工具。根据 TOD(Transit Oriented Development,以公共交通为导向的开发)模式,以城市已建成轨道交通系统站点及公交车站点为基点,向外辐射慢行系统。^②武汉市要在大型慢行系统中采取开放式设计,在中小型慢行系统中采取半封闭式设计,公共交通不进入慢行系统内部,仅在街区外围提供服务。

以武汉市中山大道街区改造工程为例,中山大道文化带与江汉路步行街、黎黄陂路步行街等慢行街区呈栅栏式交错,建有轨道交通站点江汉路车站,考虑到轨道交通站点地理位置与各道路通行流量,设计中山大道为公交导向主轴,横穿沿江慢行街区,并在江汉路处实现步行、自行车、公交车、轨道交通综合换乘。对于此大型慢行系统,将公共交通引入系统内,提供交通干线服务,其余街巷则通过步行导向所引导的交通方式进行精细化连结。

(四) 依托数字技术改造武汉传统慢行系统

首先,使用 POI(Point of Information,信息点)数据和可达性分析技术进行慢行系统前期选址工作。通过 POI 数据获取城市现有慢行系统和绿地分布热力图,结合 15 分钟可行性分析图叠加分析,可以得到城市现有慢行系统分布稀缺的城市区域,并分析其可达性过低等问题。利用分析数据对新建及改建慢行系统进行选址工作,可以最大理解城市居民生活需求,并保护城市自然景观。

其次,安装全路段智能监测系统。在武汉市慢行系统全覆盖智能传感摄像头、温度传感器、噪声传感器、空气污染检测器等智联设备,将慢行系统与智慧城市、天眼工程、雪亮工程相连,实时监控慢行系统概况。充分利用现有城市数据收集和分析技术,监控慢行系统区域里的老年人跌倒、急性突发疾病等意外

^① 赵勇伟:《基于步行导向的城市公共活动中心区城市设计研究》,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7,第7页。

^② 彼得·卡尔索普:《未来美国大都市地区:生态·社区·美国梦》,郭亮译,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9,第75—90页。

情况,起到自动报警、自动呼救、紧急救助功效。在人流量较大的慢行系统区域进行全天候公安监控,补充执勤干警巡视盲区,实时监测流量数据。方便武汉市政府管理部门及时发现问题疏导客流,防止安全事故发生。同时依托大数据技术,将流量数据和现场状况通过网络客户端反馈给公众,增强数字互动创新,以“数据导向”影响公众出行,优化城市慢行系统建设。

再次,精细化治理共享自行车智能服务终端。为解决当下共享自行车需求量激增、难以管理、禁停区增加等问题,可在各慢行系统外围入口设置共享自行车智能服务终端。打造大众智能立体停车楼,设计建造下埋式立体智能停车服务终端,解决共享自行车用车需求和停车难问题。定期巡检各终端车辆状况,为共享自行车加装发电式自行车车灯,降低夜间骑行安全隐患。多措并举提升居民步行或骑行的满意度、舒适度,提升市民低碳出行的幸福感。

最后,建设轻量级慢速自动驾驶示范街区。武汉市慢行系统可以参照多伦多“Sidewalk Toronto”智慧街区更新计划,将轻量级自动驾驶设备(两座及以下)引入慢行系统内部并提供低速、自动化车辆服务。其中,道路限制速度应当以自行车限速20km/h为准,保障交通核心区行人安全。轻量级自动驾驶车辆通过智慧城市终端平台在线预约,仅用于慢行街区内部短途出行或货运。适配于慢行系统内部应急需要及老年人、婴幼儿出行需求,为慢行系统区域内的商业系统提供由主干交通系统至慢行系统内部的配货渠道。

(五)借助数字技术引导市民参与慢行系统建设

武汉市可通过城市信息综合平台、智慧城市大脑,向市民广泛征集慢行系统建设的合理化建议。在慢行系统沿线设置二维码标识,提醒居民通过扫描二维码,提交该区域的意见建议,积极主动参与城市治理。充分发挥大数据技术优势,将信息汇总、共享交换到智慧城市平台。交由各管理部门跟踪整治、有针对性地改进武汉市慢行系统,^①让城市慢行系统建设成果惠及全民,真正实现“以人为本”的数字治理。

同时,使用分层级云计算功能和多维感知系统进行慢行系统建成后的运维管理。按照以服务范围分类的计算机网络类别设计多层级城市云大脑。P Cloud(个人云大脑)通过植入用于移动端程序,用于城市居民获取城市慢行系统运行现状和反馈慢行系统运行问题。L Cloud(局域云大脑)通过获取在慢行系统中布设的传感系统信息,对该区域内慢行系统进行实时分析,并上传至M Cloud(城市云大脑)进行分析处理。M Cloud通过收集L Cloud上传的实时数据,分析各慢行系统运行状况,并反馈至P Cloud,使城市居民及时了解慢行系统运行情况,提前做好出行规划。“互联网+”理念有助于寻找城市中存在的问题、分析最优解决方案。利用大数据技术的广度与速度,提供主动式和交互式智能慢行系统解决方案。

作者简介:

严炜,武汉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斯坦福大学访问学者。

解宇航,武汉科技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网络工程专业本科生。

(责任编辑:吴非)

^① 潘勋:《智慧城市背景下城市慢行系统空间规划设计研究》,《智能城市》2021年第17期。

韧性城市建设 与老城区菜市场改造研究

——以汉口天声菜市场为例

李青董菲

摘要:近年来各种自然灾害和突发公共事件频发,建设“韧性城市”的重要性已成为全球共识。目前我国已进入“存量提质”的城市发展新阶段,韧性理念应全面融入城市各项基础设施补短板、强弱项的工作中。本文聚焦菜市场这一老城区重要的民生基础设施,提出韧性视角下老城区菜市场改造策略,并以汉口天声菜市场为例,从设施韧性、社会韧性和生态韧性三个维度提出其韧性改造的规划建议。

关键词:韧性城市;城市更新;菜市场改造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城镇化发展进入新阶段,2020年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实施城市更新行动”。城市更新涵盖了城市生活、生产、生态、安全等多方面目标,通过完善基础设施等途径提升城市安全与韧性。菜市场作为重要的民生基础设施,是老城区更新工作的重要对象。本文在解析韧性城市概念、特征构成要素等内容的基础上,以老城区菜市场改造为例,探讨如何在中、微观层面的城市更新工作中践行韧性理念,培育韧性能力,对促进韧性城市建设具有现实意义。

一、韧性城市相关理论及武汉实践

当今,功能高度集中、人口高度集聚、建筑高度立体化的大城市在面对灾害、风险等重大公共危机时表现出极强的脆弱性。提高城市系统应对风险的能力,建设韧性城市已成为全球性重要议题。

(一)韧性城市基本概念

“韧性”概念最早源于物理学科,指材料在变形和破裂过程中抵抗、吸收能量的能力,即工程韧性。20世纪70年代,生态学科引入韧性概念以阐述生态系统受扰动后恢复平衡的稳定性,衍生出生态韧性概念,重点是抵抗、缓冲之后塑造新稳态。20世纪90年代韧性研究向人类生态学延展,提出了基于演化理论的适应韧性概念,强调生态—社会系统的适应能力、学习能力与创新能力。进入21世纪后,韧性理念

逐步成为社会经济领域的研究热点。^①

基于韧性理论、可持续发展理论、城市安全经济理论、复杂适应系统理论、城市发展战略理论等,各个国家广泛开展了韧性城市建设理论研究和实践工作。按照国际组织倡导地区可持续发展国际理事会定义,“韧性城市”指城市能够凭自身的能力抵御灾害,减轻灾害损失,合理调配资源以从灾害中快速恢复过来。现代城市规模巨大,为解决城市系统应对自然灾害、社会重大影响事件(如战争、健康)等风险的脆弱性问题,国内外纷纷开始探索建设韧性城市。

(二)韧性城市的主要特征

韧性城市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理念之一,核心是有效应对各种变化或冲击,减少发展过程的不确定性和脆弱性。通常认为韧性城市应具有多样性、冗余性、智慧性、鲁棒性(Robustness, 承受故障和干扰的能力)、适应性和可恢复性等特征。^② 具体而言,韧性城市应能适应外部变化而调整功能或结构(适应性),功能不同的部件在遭受多种威胁时形成多元解决问题的能力(多样性),具有多个相同功能的组成模块增加系统可靠性(冗余性),在异常和危险情况下系统能够生存(鲁棒性),遭受扰动后能恢复原有状态(可恢复性),汲取经验教训以应对未来变化(智慧性),是一个“耐冲击、可恢复、智慧进化”的城市系统。

韧性城市建设是“经济—社会—生活—生态”四位一体的综合性复杂系统,通过这四个维度能充分考察城市的经济是否稳定发展、社会治理是否有效、基础设施体系是否有效运转、生态系统功能是否完善。城市规划建设工作应坚持“以人为本、全面性、冗余性、可持续性”的原则,以提升城市社会韧性、设施韧性和生态韧性为抓手,全面建设韧性城市。

(三)我国韧性城市建设

2020年,习近平总书记发表《国家中长期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若干重大问题》,强调要在生态文明思想和总体国家安全观指导下制定城市发展规划,打造韧性城市。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实施城市更新行动,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打造宜居、韧性、智慧城市”。目前,北京、上海、广州、成都等城市的新一轮发展规划、城市总体规划中均有“加强应对城市灾害能力,提高城市韧性”的相关表述。各大城市广泛开展了海绵城市、低碳城市、智慧城市、适应性城市等一系列建设韧性城市的具体措施。德阳、黄石、义乌、海盐这4座城市加入“全球100韧性城市”^③的队伍之中,与纽约、伦敦、巴黎等国际知名城市共享资源和信息网络,制定并执行韧性城市建设战略,打造韧性城市。

目前,我国已进入“存量挖潜”“内涵发展求品质”的城市更新阶段,基于微观层面、建设规模小、资金投入少、精准解决具体问题的渐进式“微改造”日益增多。全国铺开的老旧小区改造作为典型的“微改造”项目,结合改造建设提升韧性的做法尤为突出。如景观绿化“海绵”改造提升生态韧性,道路市政设施改造提升设施韧性,改造公共活动空间促进邻里交流、实施过程强调居民广泛参与等也充分地提升了社会韧性。

① 张明斗:《中国韧性城市建设研究》,人民出版社,2022,第19页。

② 马晓虹:《国外韧性城市研究对我国韧性城市建设的启示》,《城市建筑》2022年第17期。

③ 邱晨辉:《中国四城市入选全球100韧性城市项目》,《中国青年报》2017年2月27日第12版。

(四) 武汉韧性城市建设实践

1. 生态韧性建设尤为突出

基于“大江大湖、湿地众多”的自然地理特点,武汉市制定了“治水护田”一体化的韧性规划策略,借助“指状城市”理念,建立“两轴两环、六楔多廊”的韧性空间格局,利用生态绿楔预留弹性空间。近年来,武汉韧性城市主要以“水环境”为重点,配合绿地建设、环保升级等建设项目着力提升城市生态韧性。2014年武汉市入选全国首批“海绵城市”试点,综合采用“渗滞蓄净用排”等技术措施对城市建成区20%以上的面积进行改造,与城市排水防涝体系相互补充,内涝问题明显改善。此前,武汉市发布《2023年武汉市城市环境品质提升十大专项行动实施方案》,开展精致园林、水域治理、空气质量提升等十大专项行动,打造宜居、绿色、韧性、智慧城市。

2. 结合城市防灾减灾推进设施韧性建设

为实现功能复合利用、减少投资、节约资源、便于规划管理,近年来武汉市探索对人防设施、公园绿地、市政广场、学校等场所兼作地震避难场所,出台了《武汉市城市公共避难场所功能复合利用技术标准》,这是湖北省首个兼容多灾种的公共避难场所复合利用地方标准。截至2021年,武汉市已建成66个城市公共避难场所。为应对重大公共卫生安全事件,武汉市加大公共卫生领域投入,2020年开工建设六大公卫应急管理体系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其中4家三甲医院可实现不同程度的“平战结合”“一键转换”成为传染病救治医院、局部隔离病房等。

3. 依托社区基层治理提升社会韧性

2013年以来,武汉市开始创新基层社会治理,2019年武汉市持续推动“红色引擎工程”拓面提质,建立“民有所呼、我必有应”的工作体系、工作机制和工作平台。政府、市场、市民等多元主体,在相对平等的基础上沟通、协商、合作,从而逐步提升社会韧性。

综上所述,近年来武汉市的韧性城市建设取得了极大成就,但也存在着“新建多、改造少”“专项型多、复合型少”等问题。在城市更新的时代背景下,应进一步结合存量改造,全方位、综合性地推进韧性城市建设。

二、老城区菜市场的韧性特征及其改造的韧性城市建设价值

城市更新要以提升城市韧性为己任,回应城市安全需求。老城区菜市场普遍存在着分布广泛,已成为社区生活中心和公共交往空间,环境污染问题显著等特征,是城市更新改造的重点之一。结合韧性城市建设理念,在老城区菜市场改造更新中注重韧性功能提升,对于推动城市安全和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 分布广泛的公共服务设施,有利于提升韧性设施覆盖率

菜市场关系到千千万万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是城市不可或缺的重要商业设施。基于《武汉市标准化菜市场空间布局规划(2014—2020年)》(以下简称《布局规划》)的成果数据,2014年武汉市域范围内现状菜市场总数为584家,其中农贸市场分布最为广泛,是菜市场的主体形态。空间分布上全市菜市场对居住用地的覆盖率达到59%(以500米的服务半径分析),而老城区集中的二环以内区域居住用地覆盖率达到85%以上。

(二)重要的老城区生活中心,便于开展社会韧性建设活动

菜市场在区位上具有良好的可达性,功能上能精确匹配周边社区需求,居民在菜市场工作、消费、采买、享受服务,频繁进行社会交往,不断保持提升人际关系,增强社区归属感。由于老城区空间局促,缺乏绿地等开敞空间,老城区菜市场在满足日常生活所需的同时,已经逐步演化为重要的社区生活中心和公共交往空间。大数据和热力图分析显示,菜市场是老城区社区中热力最高的区域,特别是生鲜菜市场及其周边各种小餐饮、小百货等业态集聚形成的“街市”区域,人气又明显高于功能单一的菜市场。与此同时,菜场内多元化的小微商业为本地居民、外来者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就业率的上升会相应减少贫困、福利依赖、家庭纠纷相关社会问题,吸引外来人口稳定流入能有效缓解老城区人口老化的问题。

(三)环境污染重要源头之一,环保升级改造将显著提升生态韧性

由于建成年代早、建设标准低,“脏乱差”是菜市场普遍存在的顽疾。菜市场生鲜售卖和餐饮加工每天产出大量的生鲜垃圾,洗涤经营废水、餐饮油烟和腥臭空气污染,扰民问题严重。大数据分析显示市场经营活动与投诉热力图呈现高度重叠。根据调查资料,部分标准化农贸市场水产宰杀洗涤污水的氨氮、COD, BOD₅的浓度都没有达到地表Ⅴ类水标准。老城区污水处理系统老旧,水产宰杀、洗涤污水如排入城市雨污合流制管网,遇到汛期中心泵站溢流放江,会给城市河流带来不小的污染负荷,影响城市河流的生态环境。

综上所述,老城区菜市场应该被纳入韧性城市建设的重要板块内容。老城区菜市场与居民日常生活息息相关,是老城区难得的公共空间资源,天然兼具“设施”和“社会”两大属性。对于改造空间和资金都极其有限的老城区,结合菜市场改造工程,尽可能增加复合韧性功能的建设内容,“实现城市韧性的工程性项目与社会性措施的结合与重构”^①,必将进一步提升城市韧性水平。

三、武汉老城区菜市场韧性改造的典型案例分析

2020年武汉市制定了《武汉市农贸市场(菜市场)标准化改造工作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针对“由市场开办者向若干个经营者提供摊位、以零售为主、集中经营面积不少于600平方米的农贸市场”分类实施标准化改造。改造重点首先是市场环境卫生整治,其次是智慧管理,个别有条件的菜市场探索打造新型社区商业功能中心。本次武汉市的菜市场改造活动,其主旨仍聚焦于改善经营活动和满足环保要求,还未有意识地结合公共设施改造植入韧性功能。

(一)天声菜市场韧性改造案例

1. 天声社区和天声菜市场概况

天声社区位于武汉市江岸区京汉大道、公安街、友益街和车站路围合的区域,总用地面积约为8.5公

^① 朱正威、胡向南:《以韧性治理回应现代城市的复合型灾害与风险》,《中国安全生产》2021年第9期。

顷。用地紧邻老汉口火车站、江汉路及中山大道片历史文化街区和大智路片历史风貌街区,属于城市发展区和历史街区的咬合部位。依托老汉口火车站的建设,该片区一直以来人口稠密,是武汉市久负盛名的黄金商业街道、服务业聚集地和资深文创天堂。以老旧社区、商品房住宅等居住功能为主,路网密度高,人行巷道纵横,往来交通便利。

天声菜市场位于天声社区中部,20世纪80年代起以货源充足、蔬果新鲜而闻名三镇,一度是武汉农产品集贸市场的代名词。天声菜市场由天声生鲜食品市场,以及周边沿街聚集的生鲜、调料、餐饮熟食、生活服务等多种小微商业共同形成,不到两百米的街道店铺林立,街坊、食客穿梭其中。不论是日常的“过早”小吃、冬天的腊肉、夏天的藕带,还是腊月里琳琅满目的年货,天声菜市场充满了抚慰人心的烟火温度。

2. 社区和菜市场目前面临的主要问题

天声社区是典型的老城区,即“双老双弱”社区,设施建筑老旧化、人口老龄化,抵抗风险能力弱、自救能力弱,韧性极其低下。天声社区总人口约0.97万人,截止到2017年,该社区老龄化比例已达20%,同时流动人口(租户)高达35%。流动人口画像特征为青壮年、外来务工人员、市场商贩等,主要依附天声菜市场工作生活。天声社区普遍存在建筑物老化、建设标准低下、产权居住情况复杂、绿化活动空间匮乏等老城区社区的共性问题。作为历史资源丰富、人情味浓厚的老社区,实地走访和问卷调查结果意外地反映出居民对历史文化认识不足,对社区不了解不熟悉,整个社区凝聚力正在逐渐散失的问题。

设施不完善、环境“脏乱差”、违规占道搭建等共性问题在天声菜市场同样存在。此外,运输车辆占道停放、经营挤压路权、人行空间逼仄、阻碍通行的情况也较为突出。对于消费者而言,天声菜市场物美价廉、品类齐全且易于到达,但通行不畅、环境脏乱且无可停留休息的区域,购物体验并不好。市场经营者判断现状尚好,但未来发展并不乐观,大部分商户支持菜市场改造更新。

(二)天声菜市场韧性改造规划

1. 功能平战结合,提升设施韧性

从“平战结合”的角度对天声生鲜食品市场进行硬件改造,提升设施韧性。按照武汉市标准化菜市场1.0市场的标准,针对污水横流、异味难闻、光线昏暗、电线火灾隐患等问题,对菜市场摊位设施、地下管网、污水分流、水电、新风、厕所、消防等全面提升,满足日常生鲜售卖的需求。在此基础上扩展新增集中储藏、冷冻冷藏等备用冗余功能空间,满足灾害时期肉、禽、蛋、水产、蔬菜等基本保障物资的储运要求。按照2.0市场标准实现“智慧运营”,包括农残检测、食品追溯、“秤屏联动”等内容,构建各环节信息数据库。同时预留公共安全数据库和应急指挥调度平台接口,实现数据共享和资源整合。

韧性改造后天声菜市场在应急状态下可“一键转化”为社区物资储运指挥中心,一楼卖场保障物资储运,二楼承担临时指挥办公功能,全面提高应急管理水平和防灾减灾韧性,为极端情况做好战略性储备。

2. 助力基层治理,培育社会韧性

针对基层社区治理薄弱的问题,保障公共活动空间开展社区营造活动,塑造社会韧性。天声生鲜食品市场二楼一直闲置,参照武汉市标准化菜市场3.0市场的标准,规划在二楼配置时尚快剪、主题咖啡、图书馆等邻里服务场所,满足社区居民综合性社交文化购物升级需求,打造准邻里中心。同时划定公益社区活动区域,结合菜市场自身的特点,在此策划“菜S场”系列社区活动和社区事件。例如教小朋友辨识五谷的“菜识场”,在各色香料介绍中学习大航海历史的“菜史场”,家庭主厨交流手艺“菜师场”……吸

引儿童、青年等菜市场“稀客”,强化天声菜市场的社交属性、文化属性和社区属性,增强居民的社区认同感,构建社区共同体,加强基层社区治理。

3. 污染源头减量,保护生态韧性

从污染防治入手,分别对天声生鲜食品市场和周边餐饮加工门面提出针对性建议,对污染源实现源头处理,打造老旧社区环保微治理的示范案例。

生鲜市场垃圾堆放、污水排放等问题突出,《武汉市生活垃圾分类技术导则》要求“农贸生鲜市场(超市)应集中设置有害垃圾收集容器或固定回收点;设置易腐垃圾和其他垃圾两类收集容器,并结合实际提高易腐垃圾收集容器配置比例”。规划调整生鲜食品市场的水产、畜禽、肉类售卖布局,以集中污水排放口并设置隔离过滤设施,提升废水排放等级。增设专门的垃圾间安装生物发酵处理设施,对菜市场生鲜垃圾进行就地处理。冗余的处理能力还可以就地消化天声社区的垃圾,有效减少垃圾运输过程中“跑冒滴漏”的问题,减少清运费和二次污染。配合建设宣教基地,起到社区环保示范引领的作用。

针对沿街小餐饮加工点餐厨油污问题,以加强管理为主,硬件改造为辅。建议天声片区内餐饮档口均增设小型隔油设备,对餐厨油污进行预处理。设置隔油池能减轻未入网污水对水体的污染;减少油脂漂浮物对管道造成堵塞,降低管网的维护成本;减轻污水处理厂的处理负担(隔油池对COD的去除能力一般超过40%)。厨房大隔油池一般大小为2000mm×1000mm×1200mm。目前市场上隔油设备价格约2000~20000元左右,体积小、成本适中、安装灵活,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

四、天声菜市场韧性改造的经验启示及整体推进对策建议

天声菜市场韧性改造的案例说明,在城市更新的时代背景之下,作为社区重要组成部分和城市存量资源,老城区菜市场可以从设施、社会和生态三个维度入手,结合改造更新全面提升社区韧性。

(一)以设施韧性强筋骨

基础设施是指为城市提供公共服务的工程设施,保证城市正常运转的公共服务系统,是城市基本骨骼。基础设施韧性主要体现在能抵御灾害冲击、快速恢复以保障功能。社区级公共设施服务覆盖广、体量小、构成简单,可靠性和稳定性较强,设施韧性建设重点在于强调“平战结合”,通过增加备用功能模块预留“平/战”转换的可能性,以提升设施整体的适应性、多样性和冗余性。

老城区菜市场一般规模在1000平方米左右,交通便利,服务范围广。增加韧性功能模块后,菜市场灾害时期可以变身社区物资储运指挥中心,发挥物资存储冷藏、垃圾初步处理和应急指挥功能。社区居民和工作人员对菜市场点位、布局和往返交通非常熟悉,灾害时期的高效配送能有效安抚、降低社区的恐慌焦虑情绪,有助于城市系统快速稳定恢复。

(二)以社会韧性健体魄

社会韧性是危机发生时,城市居民抵御冲击、组织应对和恢复重建的能力。社会韧性高低取决于社会治理水平,社区营造、社区规划等都是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基层社区治理方法。社区营造的核心是通

过组织策划社区事件,如社区花园、社区论坛、社区农场等,恢复人和人之间的紧密关系,从而建立稳固紧密的社区关系网络。在物质层面,社会韧性建设举措主要是保障公共活动空间,为社区营造等社会治理活动提供空间资源。

利用菜市场自带“流量”,用地紧张的老城区可以学习新加坡和苏州的经验,在菜市场中嵌入公共服务模块,将其升级为购物、社交、活动一体化的邻里中心,建构“交互式”的交往空间。

(三)以生态韧性夯基础

生态系统是城市发展基础,社区层面的生态韧性建设主要是针对污染问题建立固废危废污染联防联控体系。

菜市场是区域污染源,不仅生鲜市场是垃圾污水的重要源头,周边聚集的小微服务业、流动商贩等也是排污重灾区。特别是老城区菜市场周边常聚集很多传统小吃和老字号餐饮,含油污水直排城市管网,产生了极大的生态压力。菜市场生态韧性重点在于将上下游产业的衍生污染整体纳入治理范畴,从源头治未病。

作者简介:

李青,武汉市规划研究院规划师,高级建筑师,研究方向为历史保护、老城区更新;

董菲,武汉市规划研究院国际交流与合作所所长,教授级高级规划师,研究方向为历史城市研究。

(责任编辑:周阳)

超大城市社区治理现代化 挑战、经验与思路

——基于“武汉实践”的调查

冯丽婷 凯萨尔 陈浩然 王德福

摘要:超大城市社区治理现代化关乎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现。社区治理是国家资源与社会自治不断调适、相互衔接的过程。探索超大城市社区治理现代化:一是发挥基层党组织的领导作用,做实党建引领,有效对接社区治理内生需求;二是加强基层政府的协调整合作用,构建多方参与的社区治理共同体;三是创新群众工作方法,提高社区工作者的工作能力,动员组织群众,发挥人民主体性。社区治理现代化要实现人民对城市美好生活的向往。

关键词:超大城市;社区治理现代化;党建引领;社区治理共同体;群众工作

社区是基层基础。2000年,我国在城市普遍建立起社区体制。经过20多年的社区建设和社区治理实践,社区已成为党和政府联系群众、服务群众和组织群众的基层战斗堡垒。社区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基础。超大城市是我国城镇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超大城市治理质量直接带动各个城市群(圈)的治理质量与发展前景。超大城市社区治理具有复杂性、系统性和风险性等特征。^①超大城市处于城市体系第一梯队,承担着探索社区治理现代化道路的重任。

2020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武汉考察时提出“努力探索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新路子”^②,为武汉布置下一道时代“必答题”。近年来,武汉社区治理在巩固既有基础上,不断推出新举措,取得了一系列扎实有效的创新成果,社区治理水平显著提升,有力支撑了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武汉经验”。

2022年8月,我们所在研究团队重点调研武汉市江汉区、青山区、汉阳区和硚口区等18个街道办事处30个社区,社区类型涵盖老旧小区、商品房社区、“村改居”社区、保障房社区等主要类型。采取深度访谈与实地考察相结合的调研方式,先后访谈社区书记和社区工作者、居民代表、业委会成员、物业公司负责人等各类对象60余人次。基于对超大城市社区治理的主要挑战的基础上,围绕党建引领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提升群众自治水平、构建社区工作者队伍体系以及完善基层治理体系方面等若干创新举措做

^① 张锋:《超大城市社区整体性治理机制研究》,《城市发展研究》2022年第6期。

^② 习近平:《在湖北省考察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时的讲话》,《求是》2020年第7期。

了深入调查。

结合武汉城市社区治理的经验调查,本文试图呈现当前超大城市社区治理面临的主要挑战,总结武汉探索超大城市社区治理现代化的具体做法,并揭示武汉经验的启示及意义,回答超大城市实现社区治理现代化的思路。

一、超大城市社区治理的主要挑战

我国城镇化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城市社会深刻转型,社会治理事务更加繁重,人民群众因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而对社区治理提出新的更高要求。在城市社区快速转型背景下,社区设施老旧化严重,社会关系个体化和多元化程度不断提升,新的多元需求不断出现,给城市社区治理现代化带来诸多挑战,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党建引领作用有待加强

“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党建引领是新时代超大城市社区治理创新的核心。城市社会不断变革和发展,人员流动加速和新职业群体的增多,更是给基层党建工作带来挑战。

区域化党建力度薄弱,紧密型党建共同体尚未形成。城市社区治理事务复杂,居民需求多样,治理主体多元,需要破除层级壁垒,建立多级联动的党建大系统,以党组织为核心,统合优势资源。面对棘手公共事务的跨域性和跨界性,城市社区共治过程中的区域化党建存在组织内部协调容易,组织之间、公私之间协调困难的现实困境。^①

基层党建创新性不足,党组织群众动员能力弱。基层党建工作流于形式,过于重视“盒子档案”,硬件建设存在攀比现象,不惜花重金建设高标准党群服务阵地,但场地利用率不高。基层党组织片面注重开展活动和服务,对于党建带群建制度与群众协商机制建设重视投入不够,难以有效识别出社区内各种积极分子并转化为志愿者,强化社区治理力量。在常态化发展局面下,干部下沉工作机制的合理性、必要性和进入退出机制等研究不足,缺少与法规相符合的系统化工作制度体系。

(二)群众自治水平有待提高

群众自治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城市社会深刻转型,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对其自治水平提出更高要求。从实践来看,目前群众自治水平总体上仍然较为薄弱。

群众责任意识较为淡薄,社区治理参与度低。陌生人社会多数居民只关心个人事务和私人居住空间,很少关心小区公共事务和整体公共空间。社区治理中以老年人参与为主,缺少年轻有为的积极分子。小区内消极分子较多,容易对积极分子产生挤压和消解。多元化激励机制不完善,未充分动员网格员、楼组长、志愿者等居民群体参与社区自治。

业主结构复杂,住宅小区自治能力弱。住宅小区内生精英多,利益纠纷围绕具体事件,权利意识强,

^① 陈亮、谢琦:《城市社区共治过程中的区域化党建困境与优化路径》,《中州学刊》2019年第6期。

依法保护自身权益,追求绝对公平,增加达成共识的难度。缺乏奥尔森的“选择性激励”,即关键群体激励和搭便车行为约束,以致陷入集体行动困境。^①

(三)社区工作者队伍建设存在不足

我国社区工作者队伍逐渐壮大,已成为城市社区建设与治理的主体力量,^②加快社区工作者职业体系建设,打造一支能胜任社区治理繁重任务、能服务好群众的骨干队伍,是实现社区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社区工作者制度建设需要加强。社区工作者薪酬待遇偏低、保障激励较少、培训力度不大等问题比较突出。^③过多的行政工作挤压社区工作者的休息时间,需要加班完成应急事务,难以实现家庭和工作的平衡。社区工作者自我身份定位模糊,对职业晋升空间存在困惑,需要形成多层次激励机制。

社区工作者的群众工作能力需要提升。社区网格员作为社区同居民打交道最多的工作人员,把过多的时间精力分配到后台系统的数据维护中,没有时间与居民交流,回应居民诉求,群众能力比较薄弱。一些社区工作者刚和本社区居民熟络,就被上级调走。

(四)基层协作共治格局尚未充分形成

街社联动机制有待强化。社区作为城市有机体中的一个小单元,边界相对开放,居民差异性较大,社区内众多治理事务超出社区能力范围,必须整合多方资源实现共治。目前街社联动机制有待强化,街道办事处作为区级派出机构,具有较强的行政动员能力,街社联动可以有效实现社区赋权,弥补社区在日常治理中的执法、管理、服务等资源的不足,提升社区应对外溢出社区范围的治理难题的能力。

多元共治格局尚未形成。社区内存在多种治理资源,如何动员激活这些治理资源关系到社区治理水平的高低。社区尚未形成“社区党组织+业委会+物业公司”的“三位一体”共商共治联动机制,聚焦小区实际难点居民诉求,开展多方协商。社区内众多积极分子没有被激活,社区自治组织培养严重不足,外生型的专业社会组织联结不够。

二、社区治理创新的武汉经验

近年来,武汉市持续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培育以党建引领为核心、多方主体协商参与的基层治理共同体。构造社区治理共同体的基本要义是,由社区党组织创新治理机制,将现代城市中的多元治理主体转化为共治力量,通过资源整合、责任分配、搭建平台等方式促进公共参与,共同缔造美好的社区生活。基层治理共同体有力提升了社区治理水平,推进了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① 王德福:《业主自治的困境及其超越》,《求索》2019年第3期。

② 朱胜进:《城市社区工作者队伍建设的现状调研——以杭州市典型社区为例》,《浙江社会科学》2011年第10期。

③ 贾志科、刘玉东:《社区工作者队伍结构现状、问题与对策——基于南京市54个社区的实证研究》,《中州学刊》2015年第3期。

（一）探索党建引领新机制，构筑社区治理共同体

构建“纵向到底、横向到边、共建共治共享”社区治理体系。武汉全市组建小区党支部 5495 个，成立楼栋党小组 2.4 万个，建成小区党群服务驿站 2303 个，充分让党的“神经末梢”与城市治理的“基础单元”互融共促，打通服务群众的“最后一百米”。纵向到底，汉阳区实施“深根工程”，在各居民小区建立党群红色服务驿站，可办理政务事项达 69 项，其中 51 项日结、18 项待结，让居民办事不出小区。横向到边，江汉区北湖街道链接辖区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等多方资源，形成“资源清单”，对接社区居民“需求清单”。街道将辖区内十余个金融企业党支部编成多个综合党支部，联合开展党建活动。企业为街道各社区提供 100 多个实习岗位，促进居民就业。

创新在职党员常态化下沉机制，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武汉全市共有 14.9 万名在职党员到社区报到，1793 个机关企事业单位党组织全覆盖对口联系全市 15 个区 1428 个社区，为提升社区治理水平注入强大力量。单位组织化下沉发挥部门特质。青山区 74 个职能部门全面建立“好样的工作队”，盯群众痛点。建于 20 世纪 70 年代末期的冶金街道工业四路片区，多年前安装的监控设备大多损坏，居民向社区反映希望尽快更换。区政法委“好样的工作队”了解情况后承诺为小区安装监控探头。2017 年 9 月，一套 24 小时无盲点、无死角监控设施安装到位，给居民营造安全的生活环境。同年 12 月，碧苑花园社区发案率同比下降 90%。专业化下沉打破党员下沉形式化，多元化激励机制保障下沉可持续。在硚口区罗家墩社区，下沉党员可以根据自身优势完成不同事务获得对应积分。社区每季度对下沉党员排名进行公示，给予道德模范表彰，这些荣誉成为下沉党员在工作单位中年终考核的重要参考。

搭建群众参与平台，激发居民参与主体性。广大人民群众不仅是社区治理的对象，而且是日常生活的主体。社区要通过群众动员、吸纳整合的方式，组织居民解决问题。社区引导，以居民生活需求撬动协商共建。江汉区横堤社区创立“邻里夜话”暨“协商在一线”活动，利用“晚饭后一小时”聚集热心居民，商议小区事项，譬如绿地维护、停车规则等。据悉，“邻里夜话”已开展 80 余期，参与人数从不到百人到近三百人，并推出升级版“家长里短”系列。整合意见，化私人需求为公共共识。北湖街道正街社区推动小区“微改造”，居民成为改造的主体。社区动员下沉干部、“两长四员”等积极分子宣传工作，借此带动更多居民，同时协调居民意见形成多数人的共识。

（二）深化“三方联动”，提升群众自治水平

打造“红色业委会”。针对业委会普遍存在的成立难、监管难、管理难等组织困境，聚力打造“红色业委会”。鼓励党员业主参选，街道党工委牵头，社区党委组建业委会换届工作小组，考核候选人，把控业委会的组织底色。搭建决策和公示平台，设立专职执行秘书制度，规范业委会运行。建立公示和审计制度，解决小区关于公共收益的矛盾争议。

“红色物业”提质增效。武汉市全力打造红色物业 3.0 版，推进“三化”改革，即市场物业“红色化”、自管物业“规范化”、公益物业“长效化”。江汉区探索一条老旧小区物业管理的四级转化道路：无物业—自助物业—专业物业—红色物业。北湖街道存在房龄 40 年左右的独栋单院式小区，既无业委会又无物业。街道以红色物业服务中心为阵地，吸纳一批能人巧匠、下沉党员、社会组织及辖区专业物业公司，成

为物业服务“合伙人”,让居民在家门口享受电器维修、水管疏通、法律援助等便民服务。

全面深化“三方联动”。建立社区党总支领导下的社区居委会、小区业委会和物业企业“三方联动”机制,社区主导、业委会监督、物业协同管理。在物业内部建立物业党支部,以党建工作形式给物业提“要求”,使物业公司承担公共服务的主体责任。引导热心党员、积极分子参选业委会,使业委会成为社区引导物业服务的舵手,发挥监督协助物业履行物业服务合同的作用,激活物业服务体系。

(三)加强社区工作者职业体系建设,夯实基层治理的组织力量

社区工作者职业体系建设是新时代治国理政大格局的需要,是巩固党在城市执政的基础呼唤,是提高人民群众生活质量的必需。全方位构建进出有通道、考核有标准、待遇有保障、发展有空间的社区工作者职业化体系。

进出有通道。在引入机制方面,2020年,面向社会招聘1483名大学毕业生,纳入社区工作者管理的“两委”和社区干事有21615人,平均每个社区专职工作者约15人。在退出机制方面,优者奖劣者汰,连续2年考核不合格将解聘。

考核有标准。考核方式坚持群众导向,党员群众评议权重占60%,街道考评占40%,突出群众满意的导向。党员群众评议参评人员包括居民代表、驻社区单位代表、物业服务企业代表、业委会代表等,重点考核社区工作者工作态度、工作作风、为民服务等情况。

待遇有保障。合理设定报酬体系,形成正常增长机制,社区工作者的基本报酬占岗位等级报酬的80%,绩效报酬占20%。依据年度考核结果确定奖励,适当拉开差距,即考核优秀多发1.5个月工资,考核合格多发1个月工资。视个人情况享受一定学历津贴、职业津贴。2020年,武汉市区两级财政增加投入8亿元,社区工作者人均年应发报酬达到7.1万元,较之前增长了79.4%;实行事业岗位管理后社区书记人均年应发报酬达到13.3万元。

发展有空间。武汉在全省率先建立四岗十八级岗位序列,形成大学毕业生—社区干事—社区“两委”委员—社区“两委”副职—社区书记的成长链条。各区每年分别拿出20%左右的街道(乡镇)公务员职位、基层事业岗位名额,定向招聘(考)社区工作者。

(四)动员多方参与,提升社区治理现代化水平

广泛调动居民参与。发挥居民自组织在物业小区管理、社区服务、社会治理中的凝聚和组织作用,建设管理有序、治安良好、关系和谐的新型现代化社区。江汉区八古墩社区将居民自发组织的10人义务巡逻队整合为“星火相传志愿服务队”。志愿队开展治安巡逻、倡导文明养狗、化解邻里纠纷等活动,在社区与居民之间起到桥梁作用。在社区发动下,志愿队挖掘特长居民,成立蓝衣便民服务分队,提供理发、修理、缝补等服务。经过7年发展,志愿者队伍扩大到近200人,常态化活跃人数达40余人。

整合多方资源。整合体制资源,联合帮联单位,用活多元力量,改变纯财政资金的社会治理模式,向社会共治的方向转变。2011年末,花山街道完成13个村征迁,3万多名村民变为城市居民。为使街道原住民更加安居乐业,2021年,街道探索社区公益慈善的路径,成立首家街道级别的社区基金会,向街道办事处、村改制公司、共建单位、本地民企等多方力量募集到420万元的启动资金。基金会每季度开展一个

项目,涵盖就业、助学、惠老、公益等,覆盖各年龄段群体。

深化“民呼我应”改革。武汉市将过去各部门开设的150余个服务专线、投诉平台全部整合进“一号”(12345市长专线)、“一网”(城市留言板)、“一微”(武汉微邻里)中,统一诉求渠道,解决跨区域跨部门事件,解决响应时间长、处理效率低、重复报事、多头派单、层层转办等问题。此外,按照“依法下放、宜放则放”原则,整合区街执法力量和资源,在街道一级组建统一的综合执法中心,推动城管、园林、公安等执法力量进小区,合力解决小区难题。同时线上实时评价各职能部门,评价结果纳入绩效。督促街道各职能部门主动响应群众投诉,破除有些问题大家“都能管”却“都不管”的现象。

三、超大城市社区治理现代化的思路

武汉是一座特殊的城市。从城市构成上看,武汉是涵盖了多种区域类型的组团式城市。江汉区、江岸区、硚口区商业密集,武昌区政治和文化气氛浓郁,还有以汉阳区为代表的休闲居住区,以光谷为代表的高新技术开发区,以东湖为核心的生态风景区,以青山区为代表的老工业转型区。丰富的城市结构塑造了多种类型的社区,以及不同群体的一般化和特殊需求。武汉城市的发展过程中行政力量和市场力量相对均衡,社区硬件和软件层面的治理资源适中,是近20年来中国快速城市化的典型代表。武汉作为超大城市,在社区治理现代化的道路上积极探索,提供具有城市特色的独特思路。

(一)党建引领要与社区内生治理需求有效对接

党的基层组织是党在社会基层组织中的战斗堡垒,是党的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在城市社区多元主体参与和治理格局中,党组织是社区治理的坚强领导核心,党建工作包括阵地建设、队伍建设和平台建设等。党建引领抓住城市社会的特点,补齐了社区治理的短板。一方面,城市社会的本质是缺少沟通和互动、缺乏联系和信任的陌生人社会,同时也是多种资源密集、各类主体活跃的现代社会。城市的多样性意味着丰富的资源禀赋,而城市的陌生性阻碍了资源的整合运用。另一方面,社区作为一级制度规定的自治组织,权限小、资源少,直面基层社会的复杂矛盾和大量细碎繁琐的需求。

城市基层区域化党建扮演着重要的“整合中心”角色。^①党建引领是打破行业区分、体制区隔、关系亲疏等壁垒的利器。党建工作在一定区域内通过对人的组织实现对资源的整合。社区要有机地链接、整合、配置、运用资源,提升社区治理水平。党在现代条件下要继续发挥统领全局、协调各方的作用,克服城市社会的陌生化特点、打破信息壁垒,发挥多样性优势。在面对现代城市社会的复杂环境,党的组织体系和政治动员能力既是必要选择,又有用武之地。

党建工作不仅是发展党员、组织建设等专门的工作,而且是其他各项工作的要求和灵魂。党建工作需要以社区治理的内生需求为载体、以大多数居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方向,否则党建工作就会陷入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党建工作应该与察民情、解民忧、暖民心相结合,而不是喊口号、写材料、拍拍照。形式主义的党建工作,不仅无法满足居民需求、无法体现治理成效,还会浪费党的组织优势和动员能力,有损党的光辉形象和执政基础。

^① 卢爱国、陈洪江:《论城市基层区域化党建的整合功能》,《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5年第1期。

(二) 人民群众是城市社区治理最宝贵的资源

群众路线是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过去的群众路线主要运用在广大农村、单位小区等熟人场域,群众之间知根知底,此外熟人社会的公共舆论能够排挤、改造、争取少数落后分子,利于集体行动的达成。在现代都市社会里,市民生活的独立性、私密性程度高,以频繁、亲密的面对面互动为特点的传统群众工作方法不再适用。^① 习近平强调:“要深入研究和准确把握新形势下群众工作的特点和规律,改进群众工作方法,提高群众工作水平。”^②

社区工作者只有多与群众接触,才能认知群众中的不同群体,才能了解群众内部对于公共事务的不同态度。以武汉为代表的超大城市,各社区规模少则几千人、多则上万人,远超过社区工作者的自然交往范围。因此,社区工作者要学会找到社区的积极分子,和他们交朋友,将其争取为社区中的骨干力量,转化为基层治理中的助手、盟友、治理合伙人。在陌生居民中,让一部分积极分子先熟悉起来,能够减轻社区工作者的负担,协助社区工作者了解并梯度动员群众。

对待不同居民群体应实行分类治理,采取与现代城市社会特点和居民生活方式相适应的群众工作方法。一是动员积极分子。社区有动员群众参与治理的需要,也有一部分群众愿意为公共利益奔走呼号。做群众工作就要发掘这部分人,引导、支持、保护他们,使其自我价值实现的需要与社区的治理需要相对接。二是转化沉默多数。“群众里的大多数是沉默者”,不可能、也没必要动员每一名群众。社区治理的成效关乎居民的生活幸福和房产保值,居民有意愿参与到切身利益相关的事件。之所以沉默,可能是能力、精力、性格等个人因素,也可能是缺少平台、渠道、身份等客观因素。社区治理通过搭建平台、畅通渠道、赋予身份,可以为沉默的大多数转化为积极分子创造条件。三是分化消极分子。社区治理难免遇到群众不配合、不理解,不能笼统地将持反对意见的群众视为消极分子。有些反对意见来自假借公共利益之名谋个人私利的投机分子,需要及时处理。有些反对分子是某种意义上的积极分子,集中反映社区中老、大、难的问题,并且有影响力、号召力。反对派中的积极分子是检验社区治理方向的一个标尺,社区工作者如果回避其反映的真问题,搞一些花架子,他们自然“反对”。反之,只要互相理解需求和难处,就能壮大积极分子的队伍,让投机分子孤立无援。社区要建立民事民议、民事民决等群众参与机制,引导居民差异化需求的共同表达,建设社区引领下的强协商型治理共同体。

(三) 社区工作者是提升社区治理水平的关键力量

社区工作者构成了城市管理体系在生活空间中的最基层,一方面向居民递送政府的管理和服务,另一方面接收居民的意见诉求。事务繁多、细小琐碎是社区工作者的主要压力。

不同社区治理成效有差异,既有硬件条件限制,又与社区工作者的工作能力有很大关系。工作能力分为两方面,一是基础性的行政工作,比较容易处理;二是与群众打交道的能力。社区工作者直接面向基

① 王德福:《新生代社区工作者的职业激励与职业发展——兼论面向社区治理现代化的干部培养路径》,《理论月刊》2022年第12期。

② 《习近平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筑牢理想信念根基树立践行正确政绩观 在新时代新征程上留下无悔的奋斗足迹》,《人民日报》2022年3月2日第1版。

层、面向居民。社区的结构位置决定社区工作者仅仅完成制度条例的规定动作是远远不够的,还要同居民打交道。社区工作者和居民之间没有复杂的利益纠纷,群众工作是一个将心比心的过程。越会和居民打交道的书记,越觉得居民好相处。相应地,居民也会更加认可社区工作者,社区治理工作就更好做。

群众工作不仅是提升社区治理现代化水平的要求,而且能增强社区工作者的职业认同感。社区工作者的激励结构是多元化的,既有制度激励层面的工资待遇,又有自我激励层面的价值实现需要,更有社会激励层面的来自社区居民的肯定评价。事实上,老百姓真情实感的认可能给社区工作者带来更多的成就感与价值感,能将工作转化为事业,从而产生更稳定长久的职业认同。通过群众工作,社区工作者的工作能力和工作动力形成正向增益的循环,社区治理水平就会持续提高。

社区工作的本质是人对人的工作,是社区工作者向居民做群众工作。提升社区治理水平,关键在提升社区工作者的群众工作能力,而群众工作能力只能在实践中习得和进步,要给予充足时间、稳定预期同群众打交道。由此,才能将成千上万名扎根一线的社区工作者,打造成一支为党分忧、为民服务的治理队伍。

(四)“条块联动”为社区治理提供有力的保障

破解权责不一的困境是提升社区治理现代化水平的必由之路。如果党建引领是创新党组织工作机制,为社区链接资源,“条块联动”则是在不增加治理资源的情况下,完善治理体制,赋权基层同时提高职能部门的履职率,增进基层治理绩效。

基层事务具有复杂性、琐碎性、偶发性和跨界、跨部门性。社区身处一线,直面居民问题,处理矛盾纠纷,但权限小、资源少,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在能力范围内的事情,社区可以组织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而超出范围的事务,需要向上争取街道资源,化解难题。“条块联动”通过畅通信息渠道,优化部门、街道、社区之间的资源配置,发挥社区的群众基础优势、街道的整合协调优势、部门的权力和资源优势,有效应对基层治理需求,保障城市基层生活空间的秩序稳定。

“条块联动”不仅是当下为社区赋权的手段,而且是未来探索“社区减负”的方向。在城市治理体系中,社区的一项重要任务是协助职能部门工作、递送管理和服务,但现在一些部门直接将任务下派、责任下派、控制下沉到社区,这使得部门从执行者转变为考核者,增加社区工作负担,挤占群众工作的时间与精力,还容易造成“形式主义”。究其原因,除个别地方、部门的官僚主义作风顽固外,还在于没有厘清部门、街道、社区三者的权责边界,社区工作事项清单不明确,基层政府对社区的支持、保障和指导作用发挥不充分。

四、结论与讨论

社区作为城市的基本单元与神经末梢,是城市治理中的一线治理场域,承担着更直接的治理责任,这也意味着城市社区面临着更大的城市治理压力和挑战。但社区作为重要的自治载体,其在应对日益庞杂的治理任务时充分发挥治理韧性,激活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能力和积极性对社区的有效治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武汉社区治理最突出的经验,就是在超大城市社区治理中仍然要坚持群众路线,根据新的历史条件、新的社会环境,创新群众工作方法,建立以党组织为核心、群众多方参与的治理共同体。做实党建引领,才能动员组织群众。提高社区工作者的工作能力,根本是提高群众工作能力。人民对美好生活

的向往就是党和政府的奋斗目标,而美好生活的实现需要动员人民群众共同参与。

群众路线在现代城市社会的复杂条件下仍然具有强大生命力。归根到底,人民群众才是最宝贵、最扎实的治理资源,其他资源只有结合群众参与才有价值。有些基层工作者抱怨经费太少、资源不足,这在一定程度上指出基层权责不匹配的困境,也要警惕其中暗含的“唯资源论”倾向。不依靠人民群众,仅靠资源堆砌、购买服务,社区治理就是华而不实的空中楼阁,经不住困难的考验。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组织动员群众参与,要创新群众工作方法,发现群众的新特点、新需求,找到社区治理与群众需要的接触面,以公共参与机制整合不同群体的利益诉求,通过沟通和参与,构建现代化的社区治理共同体。

作者简介:

冯丽婷、凯萨尔、陈浩然,武汉大学社会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为城乡基层治理;

王德福,武汉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都市社会与城市基层治理。

(责任编辑:陶秀丽)

统一战线服务超大城市 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研究

——以武汉城市社区的实践为例

李 婷 吕德文

摘 要:在城市社区快速转型的背景下,超大城市社区治理面临着诸多挑战。推动统一战线服务城市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是超大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路径。基于武汉城市社区的调查发现,统一战线服务基层社会治理的核心是通过发挥统一战线协商、服务和公益的功能,链接专业人士、社会资源和社会关系,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城市社区治理共同体。在实现路径层面,在党的领导下,可将统一战线服务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视作一种特殊的群众工作,同时应避免对统战成员的过度组织和动员。

关键词:统一战线;基层治理;超大城市;社区;社会治理共同体

一、问题的提出与研究思路

(一)问题的提出

统一战线服务基层治理,被视为超大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路径。结合历史经验和当下的治理需求,武汉市构建了系统完备的基层统战工作格局,充分利用统一战线联系范围广、辐射面宽、人才荟萃、智力密集的优势,探索了统一战线服务基层社会治理的有效路径。2022年8月,笔者所在研究团队对江汉区、汉阳区、青山区、硚口区、东湖高新区等一些典型社区进行了实地调查,在了解了武汉这一超大城市社区治理的实际挑战的基础上,围绕统一战线在协调社会关系、提供公益服务、进行民主协商、化解社会矛盾、凝聚社会共识等方面的经验做法做了深入调查。

结合武汉城市社区治理的经验调查,本文试图呈现当前超大城市社区治理面临的挑战,在此基础上讨论统一战线在应对这些挑战中的功能定位,分析统一战线服务超大城市社区治理的具体路径,并针对实践中出现的问题提出具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二) 研究思路

超大城市是中国特色的全新共同体形式。^① 打造超大城市社会治理共同体,被视为通往城市现代化之路。^② 而统一战线与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具有高度的契合性,是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的重要路径。

统一战线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重要的政治功能,^③ 也具有重要的治理效能。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践中,具有独特的优势。^④ 国家治理现代化强调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公共事务治理。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发挥统一战线优势。

在基层社会治理层面,统一战线作为“合作型政治”^⑤ 的重要实践形态之一,和社会治理一样,强调在党的领导下实行多元治理和协同治理,与社会治理具有高度的契合性^⑥。社会治理共同体被视为社会治理的进阶形态^⑦,统一战线不仅在理念层面与社会治理共同体具有高度契合性^⑧,且是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重要路径之一^⑨。因此,结合武汉城市社区治理实践,分析统一战线服务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的挑战、定位和具体路径,是本文的基本研究思路。

二、当前超大城市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面临的挑战

作为超大城市的武汉,在城市快速转型发展的背景下,社区设施普遍老化,社会关系个体化和多元化程度不断提升,新的多元需求不断出现,给城市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带来诸多挑战,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 物业管理中的“市场失灵”问题凸显

市场主体是城市社区物业管理的重要主体,是城市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的重要力量。当前物业管理中“市场失灵”问题凸显,构成城市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的重要挑战。

物业管理本身具有弱市场的特点,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一对多的合约治理成本高、履约难度大。在物业公司和诸多业主的共同治理格局下,城市社区作为陌生人社会,人口密集、流动性大、异质性强,社区组织难度大,通过组织起来降低交易成本的难度大。^⑩ 二是物业管理服务的供给和获取具有模糊性。物业管理服务采取总体性供给和总体性获取的模式,服务供给琐碎、难以量化,不同主体获取服务不具有排他性且并不均质,决定着服务的供给和获取都具有模糊性,增加了双方履约的难度,也弱化了履约

① 赵孟营:《超大城市治理:国家治理的新时代转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8年第4期。

② 袁方成、何雪娇、林洁云:《通往城市现代化之路:打造超大城市社会治理共同体》,《复旦城市治理评论》2021年第1期。

③ 林尚立、肖存良:《中国共产党与国家建设——以统一战线为视角》,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第305页。

④ 李俊:《统一战线的现代化国家建设逻辑及其优势》,《社会主义研究》2021年第5期。

⑤ 徐理响:《合作型政治:统一战线与政治整合的中国逻辑》,《统一战线学研究》2020年第4期。

⑥ 杨松祿:《论统一战线与社会治理的契合性》,《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7年第1期。

⑦ 张明皓:《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的理念基础、结构审视与行动路径》,《天津行政学院学报》2022年第5期。

⑧ 李永娜、袁校卫:《新时代城市社区治理共同体的建构逻辑与实现路径》,《云南社会科学》2020年第1期。

⑨ 何虎生:《坚持统一战线:汇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伟力》,《光明日报》2022年3月25日第6版。

⑩ 仇叶:《住宅小区物业管理纠纷的根源——基于合同治理结构变形与约束软化视角的解读》,《城市问题》2016年第1期。

的动力,加大了违约的可能性。

从单位制社区建立算起,武汉城市社区发展已有一定的历史。2000年后商品房小区逐渐增多,20年间社区治理经历了从以单位制小区为主到以商品房小区为主的转变。随着时间的推移,大量在21世纪初期建立的商品房小区因楼体逐渐老化,物业管理费用上升,但物业服务价格调整刚性化,物业管理的“市场失灵”问题开始凸显。

政府试图通过成立业委会来解决这一问题。实际上业委会作为一个自治组织,面对复杂、陌生化的都市小区,很难将居民组织起来,也很难在业主和物业公司之间起到较好的协调作用,甚至会因为其自利性被激活而起到激化矛盾的负面作用。比如某商品房小区业委会要求物业公司花11万元公用维修资金修缮一些楼栋的门禁系统,但物业公司不同意。业委会意欲与物业公司解除服务合同,但需要2/3的居民同意,业委会无法做到。于是,业委会成员多次到社区和政府相关部门,要求后者帮助其解决问题。

(二)社区居民矛盾纠纷发生率提升

伴随社区社会关系的理性化、原子化程度不断提高,社区居民内部的矛盾纠纷发生率也不断提升。社会关系紧张,矛盾增多,给致力于整合社会主体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带来不小挑战。

社区设施老旧化,是矛盾发生率提升的重要原因之一。一方面,在中心城区,绝大多数小区的楼龄都达到10年以上,小区以集合式建筑为主,楼体设施的老化,密集居住在老旧楼体中的居民就容易因为楼体设施损坏而产生各种矛盾。^①另一方面,当前老旧小区改造处于高峰期,历史遗留问题和新问题交织在一起,如拆迁和设施改造如何适配不同人的生活需求,给社区治理带来重大挑战。

城市社区社会关系趋于更加个体化和理性化,是社区内社会关系紧张和社会矛盾日益增多的另一重要原因。调研发现,随着信息网络的发展,社区居民更多地通过手机和网络平台打发闲暇时间,使得城市社区居民的日常生活尤其是闲暇活动的公共性弱化,导致城市社区内社会关系个体化趋势加强。同时随着市场化程度不断加深,个体的市场价值和市场意识不断深化,社区居民理性化程度不断提升。调研中有居民反映,“做好事的人很难得到认可,因为别人总认为你做这个事情是有利可图”。这种理性化的预期必然会增加社区居民之间的交往成本,增加矛盾产生的可能性,化解矛盾的社会资本愈发稀缺。

(三)新的多元需求不断出现

社区服务对象的差异化,社会需求的整合和回应难度增大,也构成当前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的新挑战。一方面,在人口老龄化的大背景下,当前社区服务的主要对象是老年人和其他特殊人群。以青山区南苑社区为例,该社区60岁以上老人占社区常住人口总数的34.4%;其中重症失能老人370人,占老年人口总数的24.3%。另一方面,社区中居住着各行各业的专业人士,一旦社区物业管理问题产生,大量专业人士就会参与到与物业公司的利益博弈过程中,专业人士成为到社区表达和反映诉求的主体。而社区工作人员有限,专业素养还不够,无法有效回应不同群体的差异化需求。

^① 王德福:《中国式小区:城市社区治理的空间基础》,《上海城市管理》2021年第1期。

三、链接:统一战线服务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的基本定位

近年来,武汉市持续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培育以党建引领为核心、多方主体协商参与的社区治理共同体。一是在组织架构上建立完善了“街道党工委—社区党委—小区综合党委—楼栋党小组—党员中心户”五级基层社会治理网格体系,构筑纵向到底实体化党组织架构,切实把治理力量覆盖到辖区全域。二是在治理机制上通过党员常态化下沉、建立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社区居委会、小区业委会和物业企业“三方联动”机制,以及五社联动等做法,构建了通过党建引领实现共建共治共享的社区治理共同体。

然而,超大城市社区治理具有主体多元、需求多样、问题多源、资源分散的特征^①,既有的治理体系还无法有效解决当前社区治理面临的挑战。要有效应对这些挑战,需要将社区的沉淀资源激活,动员多元主体加入社区治理中,建立社会治理共同体。而统一战线作为大党建体系的一部分,是链接和激活社会资源的重要平台。

(一)城市社区:都市社会的浓缩体与资源沉淀地

城市社区是一个治理资源密集沉淀的单元。在都市中从事不同职业、处于不同阶层、具有不同身份特征的居民,最终都要回到社区生活。可以说,城市社区是都市社会的浓缩体。

当前,在党建引领机制下,社区党员通过红色业委会、红色物业、党员下沉常态化等途径参与到社区治理中。但是,社区的其他专业人士还没有较为完善的路径参与社区治理。社区居民中有来自各行各业的党外人士,他们相较于普通群众,有一定的专业知识和社会地位,是各行各业的精英人士,有可能成为社区治理的重要资源。以江岸区为例,该区现有民革、民盟、民建、民进、农工、致公、九三学社等7大党派共计约2600人,分布在经济、教育、科技、医疗卫生、文艺等各个领域,呈现行业领域广、学历高、素质好等特点。

(二)作为链接者的社区及其限度

社区为了应对新的治理挑战,除了强化党建引领机制以外,也在试图通过搭建各种平台来激活社区内的非正式治理资源,比如建立多样化的志愿服务队。在实践中,参与社区志愿服务队的群体往往是退休的老年群体,他们在社区治理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比如青山区南苑社区成立的“夕阳对对红”,帮助社区解决了部分的养老和矛盾纠纷调解问题。但这些平台能够动员的群体十分有限,尤其是一些在市场参与中属于中坚力量,具有较多专业知识和特定技能的统战成员,很难在社区志愿者平台中发挥作用。

社区是链接市场、政府部门和社会力量,回应群众需求的平台。^②当政府部门或者市场主体回应群众诉求的能力和动力不足时,社区链接资源的能力就会受限。此外,链接资源的一个重要前提是获得信息,并且拥有整合相关资源、服务于社区治理的能力。而社区组织居于城市治理的末梢,难以与城市其他体系发生密切联系。大量社区治理资源处于“沉睡”状态,难以依靠社区自身的力量将其唤醒。

^① 柳建文:《新型城镇化背景下超大城市的社区功能及其发挥》,《人文杂志》2016年第4期。

^② 王德福:《催化合作与优化协作: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现代化的实现机制》,《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19年第3期。

(三) 社区链接强化: 统一战线的基本定位

近年来基层统一战线工作格局逐步形成,各级党委和政府建立了组织和动员统战成员参与社区治理的途径。通过统战部门的积极作为,社区可以链接统战成员回应群众需求,将其转化为社区治理的资源。由于大多数统战成员往往归属于特定的群体或者组织,民主党派人士、无党派人士、工商企业人士、新社会阶层人士等,往往在特定的专业组织和行业中从事相关职业。这意味着,统战部门作为资源链接者的作用还体现在,统战成员不仅仅是作为个体参与到社区治理,而且依托于统战成员所在的特定组织参与到社区治理中,这为社区应对基层治理挑战提供了重要的治理资源。

因此,统一战线在城市社区治理中发挥作用的关键核心是“链接”。一是在社区与统战单位和成员之间发挥链接作用,使得统战成员成为社区治理的资源,形成“共建”格局;二是在政府、市场和社会等社区治理主体间发挥链接作用,将统战工作中具有成熟经验的协商、服务和公益融入社区治理中,形成“共治”格局;三是将社区居民、社会组织和市场主体的需求链接起来,形成“共享”格局。概言之,统一战线工作为社区组织激活社区资源、形成社区治理共同体提供了抓手。

四、统一战线服务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的具体路径

社区和统战成员的链接,使得社区内外的治理资源被有效激活,建立了社区治理共同体。具体而言,统一战线主要通过服务、协商和公益来构建城市社区治理共同体。

第一,服务。武汉市实现了基层统战工作组织架构全覆盖,完善了三级统战工作机构建设,在统战工作任务重的机关、企事业单位建立统战工作联络室26个,在街道(乡镇)、开发区(工业园区)建立统战工作联络站138个,在社区(村)建立统战工作联络点827个。同时,广泛建立基层统战工作阵地平台。建立区级统战性组织125个、街道(乡镇)统战性组织121个、社区(村)统战性组织336个。

建立组织的关键在于,依托组织来发现辖区里的统战成员,做好基础的信息登记工作,建立和完善统战人员信息库。在社区为统战成员组织活动提供一定的空间,加强统战成员的联系和组织,更好地服务于基层治理。比如,汉口北湖街道打通社区和统战成员“双向服务”渠道,根据统战成员优势组建不同行业界别“新经济人才队伍”,如“非遗艺术队”“天使义诊队”“民间能人队”“自治合伙人”等,将统一战线的服务资源项目纳入统战网格,在小区常态化开展维修保障、秩序维护、民事调解等多项服务,持续推动志愿服务向深层次参与社会治理转变。

第二,协商。武汉市通过搭建统战成员参与社区治理的协商议事、决事平台,通过参与社区治理来强化对统战成员的动员和组织。协商既是一种赋权和激励,又是统战成员嵌入社区治理的重要机制。协商的过程本身就是参与社区事务的过程,也是接触社区居民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激活个体潜在的参与积极性,提升参与社区治理的能力。如北湖街道横堤社区的“邻里夜话议事厅”,统战成员通过参与物业公司、业委会和社区三方联动等难点问题的事前、事中、事后监督议事,其参与度和触角直达居民区。

为统战成员提供参与社区治理、解决社会问题的平台,同样重要。在北湖街道横堤社区,社区建立统战成员之家,为辖区统战成员开展联谊、服务社区提供场所,并引导统战成员加入社区“邻里管得宽”志愿服务队,开展调解邻里纠纷、上门关爱空巢老人等活动,协调解决居民群众实际困难。

第三,公益。统战成员参与基层治理具有志愿性质,但也要直面其激励问题。可以依托社会认同和互利机制,实现对统战成员的适度激励。从调查看,社区在动员统战成员参与公益活动过程中也尝试建立相适应的激励机制:其一,加强对统战成员身份和工作的宣传,使其在参与社区治理的过程中能够获得居民的社会认同,体现其社会价值。其二,在社区为统战成员参与社区治理建立互利机制,调解工作与志愿活动之间的矛盾。在青山区南苑社区,社区内开办了价格实惠的便民食堂,但是一些老年人因为行动不便需要配餐。为了引导外卖员免费给社区高龄老年人送饭,便民食堂为快递小哥提供实惠的套餐。快递小哥可以在配送小区其他外卖时顺便给老人送餐,因此免费配送的成本并不高,而且还能通过购买实惠套餐获得一定补偿,其与社区之间形成了一定的互利关系,也是其能够长期参与免费配餐的重要保障。

总体来看,通过统战部门的有效链接,以及协商、服务、公益等路径,武汉市已经从统一战线服务基层社会治理,转化成了统一战线嵌入基层社会治理,逐步形成了社区治理共同体。

五、完善统一战线服务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的对策建议

从我们的调研看,尽管统一战线在服务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也有一些典型经验,甚至在一些地方还从“服务”转向了“嵌入”,基层统一战线工作和基层社会治理实现了有机结合;但从总体上看,统战力量在基层社会治理中整体呈现“小、散、弱”的特点,统战成员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体制机制还不够顺畅。探索统一战线服务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的路径,不仅要了解社区治理的需要和统战成员的契合性,还要了解统一战线服务基层社会治理的特点。为此,我们提出几个建议:

第一,统一战线服务城市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需要在“大党建”引领下实现。统一战线的领导与实践主体是中国共产党,增强党的力量、巩固党的领导,也是统一战线的重要使命。^①这不仅是国家政权建设的需要,也符合治理实践的诉求。

当前,我国城乡基层社会治理已经形成了党组织领导下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新格局,城市社区治理在党组织领导下开展,武汉市在党建引领社区治理中取得了较大的成效。这就要求,一方面,党建引领社区治理需要重视统一战线工作;另一方面,统一战线服务社区治理也要主动融入党建工作中去。

党的统一领导不仅体现了中国特色的治理优势,而且切中了现代超大城市社会的客观特点,既是政治要求,又符合科学规律。党在当前条件下要继续发挥统领全局、协调各方的作用,就要克服城市社会的陌生化特点,打破信息壁垒,发挥多样性优势。在面对现代城市社会的复杂环境时,党的组织体系和政治动员能力既是必要选择,更有用武之地。统战成员在参与社区治理过程中,尤其是在参与一些资源相对密集和利益关系复杂的社区治理时,应突出党建引领,以党建带统战,以统战促党建。

第二,统一战线服务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是一项特殊的群众工作。只有创新群众工作方法,才能扩大群众参与,实现充分的群众动员,才能打造多方力量协同的治理共同体。^②

调研发现,一些社区治理之所以有活力,主要是社区工作者坚持走群众路线。有些社区建立了民事民议、民事民决等群众参与的机制,引导居民差异化需求的共同表达,为积极分子提供发挥作用的平台,

^① 林尚立:《人民共和与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建设国家的政治方略》,《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1年第4期。

^② 吕德文:《社区疫情防控模式及其运作机制》,《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11期。

建设社区引领下的协商型治理共同体。群众路线在现代城市社会的复杂条件下仍然具有强大生命力。归根到底,人民群众才是最宝贵、最扎实的治理资源,其他资源只有结合群众参与才有价值。其中,统战成员经过动员可以成为积极分子,也是拥有一定社会地位和社会资本的群众。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组织动员群众参与,要创新群众工作方法,发现群众的新特点、新需求,找到社区治理与群众需要的接触面,以公共参与机制整合不同群体的利益诉求,通过沟通和参与构建治理共同体。

第三,统一战线服务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是一项弱组织与弱动员工作,不宜将其当作中心工作。社区作为链接不同资源、回应需求的主导者,依托于党委与政府各个部门来链接资源。在多元的链接接口中,统战部门只是其中的一个接口,应该得到充分重视,但是也不应该过度被强调。统战成员大多是市场参与的中坚力量,是各个单位的业务骨干,工作任务重、工作要求高、工作压力大,所以,他们服务社区治理的时间和精力都是有限的。因此,应该科学评估统战成员与社区之间的匹配度,在能够承受的限度内,推动统战成员发挥自身的优势,服务于社区治理。只有避免对统战成员的过度动员和组织,才能避免资源依赖,推动统战成员长期、持续发挥其作用。

当前,协商、服务和公益是统一战线服务基层社会治理的主要路径。由于大多数统战成员都是专业人士,也是市场活跃主体,未来应该充分挖掘“链接”的内涵,通过人员、资源和信息的链接,建立统战人士日常工作与社区治理互利共赢的新路径,让统一战线服务基层社会治理更具稳定性和可持续性。

作者简介:

李婷,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副研究员,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基层治理;

吕德文,武汉大学社会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政治社会学和中国农村治理。

(责任编辑:陶秀丽)

以社区党建创新引领基层 社会治理高质量发展

——以武汉市武昌区的基层经验为例

杜爱国 杨少华

摘要:社区是城市基层治理的依托和根基,社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是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根本路径。武昌区社区基层党组织建设在若干方面都进行了积极探索,取得基层治理的良好成绩与经验:社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具有核心领导、政治导向、组织凝聚、思想教育、整合资源、和谐稳定的六大功能;社区治理的主要特点体现在用坚定的政治方向解决基层治理“向何方”的关键问题,用坚实的人民为中心论落实基层治理“为了谁”的痛点问题,用科学的工作方法推进基层治理“低效率”的难点问题;在经验基础上,加强社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高质量发展的实践路径有四个方面,包括以优化社区党建引领领导班子作为提高基层治理引领力的关键点,以推进党建责任制度化作为提高基层治理推动力的基础点,以提升党建宣传教育现代化作为提高基层治理号召力的强化点,以构建社区党建队伍专业化作为提高基层治理凝聚力的依靠点等。

关键词:社区党建;创新引领;基层治理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指出:“加强城市社区党建工作,推进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①社区是国家构架中最基层的自治组织,是城市基层管理的重要依托。加强社区党建引领、创新基层党建工作,对于坚持和切实加强基层社会治理中党的领导、夯实我们党长期执政的组织基础、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本文主要以武汉市武昌区近年来抓基层社区党建引领社会治理工作取得的经验与成效为例,特别是结合“美好环境与幸福生活共同缔造”活动中的相关做法,系统阐释基层社区党建工作对基层治理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意义与现实价值,重点分析加强社区基层党建工作的主要功能、主要特点和实践路径等。

^①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22年10月26日第1版。

一、社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极端重要性与紧迫性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基层党组织是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最后一公里”,不能出现断头路。修改后的新党章也明确规定:“党的基层组织是党在社会基层组织中的战斗堡垒,是党的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①随着新时代新征程中我国现代化的全面推进和城市管理体制的深化改革,管理重心不断下移,社区已成为城市社会治理工作的根基,发挥社区党组织的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作用,以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创新至关重要。在实践中,武汉市武昌区的基层治理工作始终围绕党的建设来推进,取得了扎扎实实的成效。

(一)强化社区党组织的核心领导作用,是基层治理的关键

社区党组织是建立在社会基层的党组织,它与广大人民群众有着最直接、最经常、最密切、最广泛的联系,身处基层治理第一线,它能直接倾听人民群众的呼声,掌握人民群众的思想脉搏,了解人民群众的情绪心态,熟知人民群众的冷暖。社区党组织担负着组织、凝聚、发动、服务居民的重要职责。因此,它的核心领导作用关乎着社会基层治理的成败。社区党组织是基层治理的枢纽,没有这个枢纽,基层治理无从谈起。它也是基层治理的组织者,没有社区党组织的组织,就是一盘散沙,难以形成基层治理的合力。此外,它还是完成基层治理任务的执行者,基层社会治理的任务,由社区党组织制定治理实施方案,在执行中落实到位。近年来,武昌区采取积极措施,发挥党建引领的核心作用,探索社区自治、法治、德治与服务一体化即“三治一服务”模式,既发挥了基层党组织的核心领导作用,又调动了基层积极性,取得丰硕成效。

(二)发挥社区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是基层社会治理的根本保证

在革命时期,毛泽东同志曾经深刻指出:“红军所以艰难奋战而不溃散,‘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重要原因。”^②社区党支部是我们党在社会基层组织中的战斗堡垒,具有服务群众、凝聚人心、化解矛盾纠纷、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作用。充分发挥社区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就是在基层社会治理中加强党的领导,把加强党的领导贯彻到基层治理的全过程。武昌区近年来运行街道“大工委”及社区“大党委”工作机制,纵向形成“街道党工委—社区党组织—网格党支部—楼栋党小组—党员中心户”五级架构,横向建立以社区党组织为领导核心,居民委员会、业主委员会、物业企业、驻区单位、群众团体、社会组织共同参与的“1+6”区域化组织体系和治理模式,调动了社区内各类人群、各种力量的内在活力与潜力,形成了有战斗力、有凝聚力、有完成力的强大基层队伍,形成区域内各类党组织、社会组织共建、共治、共享工作机制。

(三)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是完成基层治理任务的中坚力量

在基层社会的治理中必须充分发挥党员的带头、骨干和桥梁作用。村看村,户看户,群众看党员,党员看干部。近年来,武昌区加强了对社区党员干部的培训力度,通过组织各种形式的培训、学习班、讲座等活动,提高了社区党员的政治素养和综合素质。同时,武昌区还加强了对党员干部的督导和考核,确保党员干部能

^① 《中国共产党章程》,人民出版社,2022,第44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68页。

够认真履行职责、发挥示范带头作用。另一方面,武昌区注重发挥党组织、党员在居民自治中的作用,建立了全覆盖的党员先锋模范群众服务站,组建了党员志愿服务队,积极开展环境整治、文明创建、志愿服务等活动,发挥了党员先锋模范带头作用。党员在基层治理中处处走在居民群众前面,成为群众学习的榜样,这是在治理中加强党的领导的重要体现。党员一方面向居民群众宣传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并带头贯彻执行,给群众做示范,积极做好矛盾的化解工作;另一方面向社区党组织反应居民群众在治理中的意见和要求,把党对居民群众的关心与要求和居民群众对政府的诉求沟通起来,真正发挥桥梁作用。

(四)加强社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是迫在眉睫的要务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健全城乡社区治理体系,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提高市域社会治理能力。这就是党中央对加强社区治理提出的新的要求,社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是实现这一新要求的重要路径。首先从引领的主题社区党建工作来看,补齐短板是刻不容缓的要务。在基层,有些社区存在党组织虚化、党建工作淡化、党的思政工作老化等问题;有些社区党组织软弱涣散,不敢碰硬,组织力、服务力不强;有的社区党建工作与中心工作脱节,官僚主义、形式主义比较突出;党的基层组织覆盖面还有空白和盲区;有些地方社会矛盾比较突出,群防群治力量不足,违法犯罪活动时时有发生,突发事件时有发生;脏、乱、差的基层社会环境还没有完全改变;打击整治“黄、赌、毒”等任务任重道远;等等。这些不良现象,需要在基层治理中通过党建的强有力引导来逐步消除。

二、社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主要功能

社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功能,就是社区党组织在加强自身建设的过程中引导和促进基层治理体系不断发展完善,现代化治理能力不断提高。总的来看,武昌区基层社区党建实践中主要展现出对于基层社区治理的六大功能。

(一)核心领导功能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党是领导一切的。社区党建就是要切实加强自身建设,从而实现其引领基层社会治理的核心领导作用。核心领导功能的强弱,关系到引领力量的大小,因此核心领导功能是党建引领的首要功能。武昌区社区党建长期坚持将政治建设摆在首位,牢牢把握基层党建工作正确方向,把旗帜鲜明讲政治刻入灵魂、落到行动。今年特别强调抓紧抓实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这个首要政治任务,进一步统一思想、凝聚共识、汇聚力量,推动党的二十大精神在武昌落地见效。

(二)政治导向功能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政治建设是党的根本性建设,决定党的建设方向和效果。”^①社区组织的政治建设既是灵魂建设,同时又是生命力建设,它对基层治理具有导向的功能作用,基层治理必须坚持正

^①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17年10月28日第1版。

确的政治方向。政治导向功能就是社区党组织发挥它的政治导向作用,引导和带领基层治理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贯彻党的方针政策,走德治和法治相结合的道路,保证社会和谐稳定,长治久安。

(三)组织凝聚功能

党的力量在于组织,组织的力量实质就是党集体的智慧和力量,党组织是由工人阶级的先进分子所组成。他们在居民群众中发挥先锋模范作用,社区党组织在加强党的组织建设中,把党员队伍建设成为一支特别能战斗的队伍,这支队伍凝聚人心,团结带领居民群众完成基层治理的各项任务。例如,武昌区东湖路社区东湖壹号小区综合党委,下设卫生健康、法律调解、文化体育、生活服务以及第二、第三、第四网格共7个党支部。将通过科学规划、统筹安排,确保充分发挥、调动各支部委员的专业特长和社会资源,组织凝聚力大大提升。

(四)思想教育功能

思想教育是党建的优良传统,党员不仅要组织入党,更重要的是思想入党。基层党员干部要加强政策理论学习,强化思想武装,力保在思想上和行动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把思想自觉转化为干事创业的主观能动性。比如,在2021年的党史学习教育期间,武昌区组织开展“党史故事汇”校园巡演、“红心向党”课本剧、“红色地图寻访记”、“红色武昌读红书”、“跟着电影学党史、心中有话对党说”等系列主题活动,展现“学在武昌”风采。在全区“两新组织”党员职工中招募成立14支“两新组织”宣讲队,将理论宣讲与情景剧、快板、诗朗诵等艺术形式相结合,深入全区行业系统进行示范宣讲。

(五)整合资源功能

社区党建就是要不断增强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社区党组织要在加强自身建设上团结方方面面的力量。社区所在地的各单位,除它们垂直的上级主管之外都有属地管理的一面。基层治理要联合它发挥各自的作用,齐心协力,步调一致,才能形成共治的合力,这就要发挥社区党建对各种资源进行整合的作用,做到有钱的出钱、有物的出物、有力的出力,按标准完成各自的任务。例如,武昌区白沙洲街道万福林社区党委组织辖区共建单位以居民群众各类需求为工作重点,拟定服务需求清单,联合开展各类共建活动、以“一事一议”的形式协调组织相关部门共同会商,解决各类重难点问题,成立几支特色党员志愿服务队共同参与社区治理,收效良好。

(六)和谐稳定功能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健全城乡社区治理体系,及时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①社区党建是引领基层治理的主要抓手,通过这个抓手把社区治理体系建立和巩固起来,在党建中发挥党的组织作用,强化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化解基层社会矛盾,解决邻里纠纷,提高居民群众

^①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22年10月26日第1版。

思想觉悟和道德水平,增强广大居民的法治思维和遵纪守法意识,创造安定团结的社会环境。例如,近年来,武昌区黄鹤楼街道彭刘杨路社区通过转变工作思路,始终把美好环境与幸福生活共同缔造当作实践活动的重要任务,变“管理”为“治理”,以改善群众身边、房前屋后的小事为切入点,聚焦社区困难事、群众烦心事,通过对大陶家巷开展综合整治,探索城市管理新机制,将“老大难”变身“新样板”。

三、社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特点

党的力量来自组织,组织的力量源于基层,唯有凝聚党员力量、各种社会力量,整合各类社会资源,扩大党组织影响力,才能起到倾尽全力重拳出击的效果,才能有效开创社区治理新局面。社区党建是城市地域范围基层党建的基本形态之一,从武昌区社区党建经验来看,在解决社区治理面临的实际难点、痛点、关键点的过程中,社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高质量发展呈现出三个方面的主要特点。

(一)用坚定的政治方向解决基层治理“向何方”的关键问题

社区党组织在社会基层治理中处于核心领导地位。其党建引领就是将社区党组织的触角延伸到基层治理的第一线,关系到基层治理举什么旗、走什么路、朝什么方向跟进的大问题,关系到在基层治理中贯彻执行党的方针和政策等重大政治问题。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层治理是服务于党领导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不是为了社区治理而治理,目的是激发社区基层活力,坚定信心,团结一致跟党走。武昌区不断强化组织领导,切实维护党的政治方向,强调党的基层组织是党在社会基层的突出代表,必须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让社会基层组织充分发扬党的政治性,实现社会稳定和有序发展。不断落实党建责任制,强化党组织的政治功能。区党委要求社区基层党组织认真落实党建责任制,做好组织工作,通过开展党性教育、组织民主生活会、定期召开党员大会等活动,加强党员思想政治引领,提高党组织的政治功能。

(二)用坚实的人民为中心论落实基层治理“为了谁”的痛点问题

党的二十大报告对中国式现代化进行深刻阐述,明确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原则之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是一句空话口号,必须落实到各项决策部署和实际工作之中。坚持以人民至上的原则,在武昌区社区党建引领的实际工作中,一贯强调必须把人民当家作主、尊重居民群众的首创精神放在首位。始终注重汲取居民群众的智慧和力量,同时把居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放在第一位,解决居民群众反映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比如,武昌区中南路街道百瑞景社区以居民自主发动的“百事帮”志愿服务为切入点,通过召开“家长里短”议事会协调解决五期东步梯修建等事宜,探索出党建引领聚合力、志愿服务暖人心的超大型社区治理路径,就团结群众统一了思想,汇聚了智慧,充分调动了下沉党员、骨干居民、志愿者的积极性,创造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稳定、和谐的居住环境,切实做好了居民群众的各项服务工作。

(三)用科学的工作方法解决基层治理“低效率”的难点问题

武昌区的社区党建工作强调引领基层治理,决不能采取简单粗暴强迫命令的手段,而是通过党的自身建设,发挥组织的整体作用,去引导和带领居民群众开展治理活动,改变一度存在的“低效率”问题,实

现安居乐业社会和谐文明的新局面。去年以来,在开展“美好环境与幸福生活共同缔造”活动的背景下,武昌区相关街道社区就充分用“决策共谋、发展共建、建设共管、效果共评、成果共享”的“五共”理念与方法,极大地调动了广大群众参与社区治理的积极性,改善了社区的软硬件环境。引领方法的科学性还表现在引领手段的现代化,这就是运用新媒体、新技术,广泛发挥互联网的作用和手机网站的作用来引领社会治理。再比如,在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中,武昌区部分街道还将“科技+”与党史学习教育相结合,借助新技术,服务惠民生,创新开展科普巡展、光影展等活动,让党史学习教育“活”起来,引领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在学思践悟中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

四、社区党建创新引领基层治理高质量发展的实践路径

武昌区基层党建工作根据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关于加强基层党建,特别是推进以社区党建工作创新引领基层治理的新精神新要求,进一步强调在加强基层治理中必须坚持党的领导,把社区党组织建设成为宣传党的主张、贯彻党的决心、领导基层治理的坚强核心。在既有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持续开展的“美好环境与幸福生活共同缔造”活动以及“完整社区”建设方案,在社区党建创新引领基层治理方面进行了若干具有示范性与借鉴意义的实践探索。

(一)以优化社区党建领导班子作为提高基层治理引领力的关键点

社区党组织的领导班子是引领基层治理的火车头,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在武昌区社区党组织领导班子建设中,一是严格社区党组织书记的选拔标准,书记是领导班子的班长和核心干部,是领导班子建设的关键,按标准选拔书记,就能带好一班人。二是按年龄性别等结构配备班子,做到老中青结合,具有合理有序梯队结构。三是领导班子成员的知识结构优化,注意不同学科背景搭配,形成多功能多学科相互配合配套。四是在能力结构上,组成领导能力、组织能力、动员能力、推进能力齐备的领导集体。五是要在心理性格气质上,做到刚柔并济、扬长避短,团结一致。在加强领导班子建设中要严格执行党的组织生活制度,坚持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坚持群言堂,反对一言堂,不断提高社区领导班子民主决策、科学决策的能力。

(二)以推进党建责任制度化作为提高基层治理推动力的基础点

党建责任制度化是克服当前有些社区党建工作淡化和弱化行之有效的重要举措,这就要求主管社区党建的区街党组织建立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知责明责、履职尽责、考责问责的社区党建工作责任精准制度化体系。武昌区基层组织架构完善、基础设施扎实,为探索基层党建特色工作模式打下坚实基础。一是要求知责明责,从社区书记到各个委员明确精细化的党建责任制,根据身背的责任项目,制定尽职尽责的工作实施规划。二是履职尽责,社区的书记、副书记要在党建工作上做一班人的表率。同时检查督促各委员在党建工作中履行职责,做到精准深入、精准发力、精求实效。三是考责问责,坚持定期考核书记、副书记及各委员履职尽责的实际情况,区街组织部门则制定考核标准和实施细则,把软任务变成硬指标。

(三)以提升党建宣传教育现代化作为增强基层治理号召力的强化点

基层治理的宣传教育工作也是非常重要的,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要求就是在建设与宣传齐头并进过程中逐渐汇聚成磅礴伟力。党建宣传教育现代化,就是强化新媒体新技术在党建宣传教育中的应用来引领教育感化社区群众。随着经济社会信息化、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的快速发展,党员的管理教育和党的宣传思想工作必须强化新媒体新技术的应用。新媒体具有新、快、准、活、广的特点,深受党员和人民群众的欢迎,有条件的社区设立党建网站,完善微信群、QQ群等线上渠道的建设,构建党员管理教育平台,在加强党的自身建设中,则要充分发挥智能手机的宣传教育作用。社区充分利用新媒体手段开展社区公共服务,实现服务信息传递的及时性、共享性、互动性和广泛性,积极主动地服务民生,实现更加科学的管理和服务,并将党的基层治理的方针政策向居民群众宣传,号召他们积极参加基层治理活动,同时还可以用它进行沟通交流,及时掌握思想动态和情绪变化,有针对性地开展宣传教育工作,增强引领的号召力。

(四)以构建社区党建队伍专业化作为增强基层治理凝聚力的依靠点

基层工作的落实,最终还是要依靠党性坚强、作风优良、工作踏实的社区治理队伍,社区党建就是要组建这支队伍并提升他们的能力。社区治理还要实施专业化队伍建设,不断在聚集人才、增长才干方面下功夫,通过制定专业化带队制度、加强工作队伍管理、制定职业发展和培训计划、推行考核评价机制以及激励措施等多个方面的措施,增强引领的凝聚力,能够更好地发掘人才、培训人才,吸引并留住优秀的社区工作者集合在这一组织之中。推动社区党建队伍专业化极为重要,还要通过党组织聚拢一大批社区的“专业能人”。像武昌区水果湖街道就创新开展“示范引领行动”,在社区、楼宇、“两新”党组织中分别创建一批基层党建工作示范点,打造“一社区一品牌”“一楼宇一特色”“一企业一亮点”,通过聚拢各方力量,持续开展有为有效有凝聚力的基层社区建设活动,对完善党建队伍建设做出了有益探索。

作者简介:

杜爱国,中共武汉市委党校副教授、法学博士,研究方向为中国式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及治理能力现代化等;

杨少华,武汉市武昌区杨园街四美社区党支部书记。

(责任编辑:林丽)

共同富裕背景下的 城乡低保统筹发展研究

——以武汉市为例

杨莉

摘要:通过对武汉城乡低保的调研发现,建立低保标准量化调整机制,推进城乡社会救助服务均等化;实行农村低保按标施保,统一城乡低保对象认定条件和补助方法;依法规范最低生活保障管理,统一城乡低保审核审批程序;整合城乡低保补助资金,积极开展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后评估工作等,是实现城乡低保统筹的重要举措。进一步优化城乡低保统筹机制,需要加强低保资金保障,加大资金投入;规范低保对象准入机制,简化认定程序;建立立体化救助模式,提升救助效能;加强民政救助政策宣传,确保政策落实到位。

关键词:共同富裕;城乡统筹;最低保障;对策建议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紧紧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健全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改革完善社会救助制度的意见》要求“用2年左右时间,健全分层分类、城乡统筹的中国特色社会救助体系”“到2035年,实现社会救助事业高质量发展”,明确了我国社会救助制度改革的总体规划和方向,体现了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

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作为政府履行再次分配职能、促进公平正义的重要工具,是社会保障体系的兜底保障制度。推进城乡低保统筹发展,是实现各项社会救助制度统筹发展的基础,是当前社会救助领域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为此,武汉市低保中心、武汉市社会科学院联合开展“武汉市城乡低保统筹发展研究”课题调研,立足于武汉城乡低保现状,从实际出发,在梳理城乡低保制度存在的差异基础上,结合当前学界的研究成果和全国各地的实践做法,对推进武汉市城乡低保统筹发展开展调查研究。

一、城乡低保统筹发展的重大意义

城乡低保制度,经过10多年的发展,已取得积极成效。根据民政部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6月底,我国共有城乡低保对象4311.1万人(城市773.1万人,农村3538万人)。全国城市低保平均标准达到了每人每月694元,农村低保标准达到每人每年6150元,分别较上年同期增长6.4%和8.4%。2021年1—6月累计支出

低保资金915.8亿元。低保工作已经成为社会救助体系中相对成熟,惠及人数最多的民生保障项目。

(一) 低保城乡统筹是兜底保障制度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

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作为我国一项基本公共服务,应保障社会全体成员都享有一定标准之上的基本公共服务,实质是“底线均等”。坚决兜牢民生底线、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是坚持和完善统筹城乡的民生保障制度的重要基础和基本取向。破解城乡二元结构,通过社会救助、社会保险、社会福利等方面的制度优化,对弱势群体予以特别保障,实现兜底救助“权利、机会、规则”的公平公正,强化低保在社会救助体系中的核心地位和基础作用,有助于让城乡全体社会成员共享改革发展成果,推进解决基本公共服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保证兜底保障制度可持续发展。

(二) 低保城乡统筹是人口城镇化发展的现实需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化率迅速提高,由1978年的17.9%提高到2013年的53.7%,城镇常住人口由1978年的1.72亿人增加到2013年的7.31亿人,有2.89亿人处于“人户分离”状态,即工作生活在城市,但不能获得城市的基本公共服务。保障流动人口的受救助权利,解除进城务工农民的后顾之忧,以人为本、公平共享,以人口城镇化为核心,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稳步推进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将流动人口纳入居住地救助是推动人口城镇化发展的现实需求。

(三) 低保城乡统筹是实现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

201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的意见》明确提出,统筹城乡社会救助体系,推进低保制度城乡统筹。2020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改革完善社会救助制度的意见》,也提出了在社会救助领域促进城乡统筹发展的具体要求。2021年6月,民政部出台《最低生活保障审核确认办法》,文件中删除了有关城市低保、农村低保的概念,所有规定不再区分城乡,统一规范为“最低生活保障”。这些政策对低保城乡统筹规范化发展提供了政策支撑,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

二、武汉城乡低保统筹发展的基础与现状

党的十八大以来,武汉市加快推进最低生活保障城乡统筹发展,逐步统一了城乡低保标准的制定和调整的主体层级、确定办法、调整时限,统一了城乡低保对象的认定条件、补助金额的确定办法,统一了城乡低保申请受理主体层级和审核审批程序,使城乡差距适应经济社会发展而逐步缩小。全市城乡低保标准,分别由2014年的560元/人/月、270元/人/月,提高到2021年的870元/人/月、730元/人/月,年均增幅分别为7.91%、24.34%,农村低保标准增幅明显高于城市,城乡低保标准月均差距由290元缩小至140元。(见图1)目前,武汉低保对象73884户、103409人。其中,城市低保对象33839户、46477人,农村低保对象40045户、56932人。2021年10月发放城市低保金3562.7万元、农村低保金4119.5万元。2021年1—10月全市累计发放城市低保金45930.9万元、农村低保金47479.6万元。农村低保对象人数和低保金发放金额均超过城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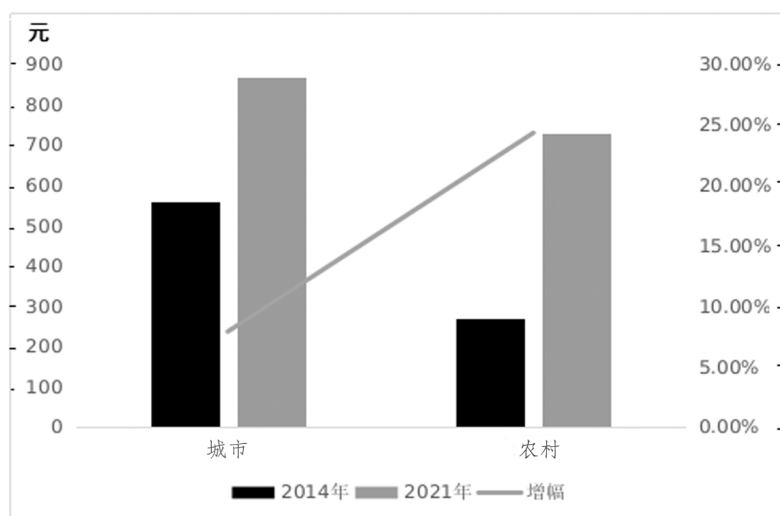


图1 近10年来武汉城乡低保增幅图

（一）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制度体系初步建立

武汉自1996年建立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制度、2004年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以来,先后出台《武汉市低收入家庭认定实施办法》《武汉市支出型贫困家庭救助实施办法(试行)》《武汉市实施临时救助暂行办法》,发展适度普惠型的儿童、老年人、残疾人福利制度,同时加强与医疗、教育、住房、就业等专项救助制度的衔接,初步形成以基本生活救助、专项社会救助、急难社会救助为主体,社会力量参与为补充的分层分类的救助制度体系。

（二）农村低保标准大幅提升

2020年武汉农村低保调整至每人每月680元,较“十二五”(2015年每人每月320元)末增长了112.5%,实现了翻番。城乡低保比从1.81:1缩小为1.22:1,城乡差距不断缩小。全市8.85万人中有22220人建档立卡贫困人口纳入农村低保、4794名纳入特困救助供养范围。

（三）社会救助过程严格监管

开展社会救助领域腐败问题和不正之风专项治理,开展常态化整治,督促低保基层经办人员依规履职尽责,提高低保制度的公信力。建成居民家庭经济状况核对系统,加强救助前的核查;落实公示制度,接受救助中的社会监督;配合监察系统检查,加强救助后的督查反馈。

（四）社会救助标准动态调整

建立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低保标准动态调整机制,每年按照城乡低保标准分别不低于上年度城乡人均消费支出30%和40%的要求,提高城乡低保和各类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保障标准。“十三五”期

间,城乡低保标准连续提标,城市低保年均增幅达7.43%,农村低保年均增幅达16.33%,综合年均增幅达10.93%,超过武汉GDP增长水平。

三、推进城乡低保统筹发展中的难点分析

目前武汉市已建立低保标准量化调整机制,推进城乡社会救助服务均等化发展。先后出台一系列政策文件,合理配置城乡社会救助资源,逐年缩小城乡标准差距。出台《武汉市最低生活保障审核确认实施细则》,统一城乡低保对象认定条件和补助方法,持续推进农村低保按标施保。运用“武汉市惠民政策大数据应用平台”监督检查机制,与多部门信息系统横向对接,精准核查低保家庭经济状况,将核对工作由以城市低保为中心拓展到城乡低保全覆盖,统一城乡低保审核审批程序。

虽然低保城乡统筹发展进入了新阶段,但我们必须正确看待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存在的现实差异。城乡低保在建立时间、对象认定、标准测算、审核程序、资金筹集规模等方面都存在明显差异,不能片面地认为城乡统筹发展就是消除城乡差距。

(一)农村低保制度建立时间短,城乡发展不均衡

我国农村低保制度建立的时间比城市晚了10年。因此城乡低保制度在资金筹集规模与保障标准方面都发展得不均衡。1996—2006年10年间,各级政府投入城市低保的资金规模累计达956亿元,其中中央财政523亿,占比54.7%。与此同时,农村低保仅靠地方财政投入,累计113.4亿元,保障人数与城市相比也极其有限。

武汉城乡低保资金分别由制度建立之初2004年的2.86亿元和0.07亿元增加到2014年的8.15亿元和3.7亿元,10年间,年均增幅分别达到18.45%和518.57%。农村低保建立之初资金投入甚微,但增幅较大。到2020年,武汉农村低保的筹集资金(6.41亿元)与城市(6.51亿元)基本持平,保障人数(城市5.15万人、农村5.90万人)基本相当。

(二)农村低保对象多是刚性贫困老人,脱贫难

2020年武汉农村低保对象59031人,其中65岁以上老年人27739人,占低保总人数110558人的25%;未成年人12021人,占低保总人数的10.9%;一、二级重度残疾人38187人,占低保总人数的34.5%;重症患者21527人,占低保总人数的19.5%;老弱病残合计99474人,占低保总人数的89.97%。

由此可见,武汉农村低保人群主要构成是刚性贫困人口,难以用提供就业、技能培训等方式帮扶脱贫,只能依靠社会救助兜底维持基本生活。而农村老年人随着年龄的增加,患病率上升,逐渐丧失劳动能力,求医看病、农田增收、生活自给都成问题,更难脱贫。

(三)农村低保标准低,收入核算难

从低保制定标准看,城市低保标准按照维持城市居民基本生活所需衣、食、住开销,并适当考虑水、电、燃煤(燃气)、未成年人义务教育等费用确定;农村低保标准较城市低保减少了燃煤和义务教育的费用。目前武汉低保标准约为上年度城市最低工资标准的40%~50%。2021年武汉城乡低保标准分别是

870元/人/月、730元/人/月,两者差距140元。

在计算低保补助水平时,城乡居民收入核算差异,城市主要按差额,农村则分档实施。城市居民收入主要来源于现金形式的就业收入,相对容易核算;农村居民收入主要来源于农副产品、牲畜养殖和外出务工收入。农副产品因生产周期、自然灾害等情形复杂,加上收成不均、经营风险,难以精准核算收入;外出务工收入灵活多变易于隐瞒,难以精准核定。因此,2015年的《民政部、国家统计局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最低生活保障申请家庭经济状况核查工作的意见》对这两种情况提出了估算的方法。但落实到具体操作层面,依然会出现各种核算差异。还有对“共同生活”标准的认定存在困难,现实生活中有多种情形的“共同生活”状态,包括亲戚暂住、人户分离等现象,不仅认定工作量大,还容易出现错漏。

四、国内最低生活保障城乡统筹的相关经验

自党的十九大确定了“统筹城乡社会救助体系,完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目标,中共中央、国务院陆续发布《关于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的意见》(2019年)、《关于改革完善社会救助制度的意见》(2020年),明确提出统筹城乡社会救助体系、推进低保制度城乡统筹及具体要求。国内许多省市积极推进社会救助制度城乡统筹,加快实现城乡救助服务均等化,逐步缩小城乡差距。

(一) 制定低保统筹标准

截止到2021年10月底,北京(1245元/人/月)、上海(1330元/人/月)、广州、深圳(1087元/人/月)、天津(1010元/人/月)5个城市已实现城乡低保标准统一。浙江、江苏、安徽、福建4省已经从低保标准、制度设计、资金管理、申请审核确认程序等方面实现了城乡统筹。四川省成都市自2003年就将城乡统筹列为发展战略,构建一体化的城乡社会救助体系,2015年在全国率先实现城乡标准统筹。另外国内还有诸多二、三线城市都相继实现了城乡低保标准的统一,如2023年广东珠海、佛山、东莞、中山按二类地区(1037元/人/月),惠州、江门、肇庆按三类地区(914元/人/月),以及汕头、韶关、河源按四类地区(857元/人/月)统一了城乡低保标准。分析发现,目前国内已实现城乡低保标准一致的城市定位较高,城市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占到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40%以上。比较国内已实现低保统筹的几大城市,除了北上广深津5个城市外,杭州、南京、合肥、福州4个省会城市GDP皆超过万亿,排名全国GDP30强之列;4个省会城市人口超过或接近千万,且城镇化率^①都在70%以上,各项数据在国内都属于较高水平。由于4个城市城乡二元结构发生了根本改变,结合省会城市GDP带来的社会福利,所以这4个城市的低保标准的统一一蹴而就。

(二) 规范申请审核认定程序

2021年6月民政部印发《最低生活保障审核确认办法》,不再区分表述“城市低保”“农村低保”,统一规范为“最低生活保障”,并在家庭收入核算、申请条件、审核流程等方面实现城乡统一。黑龙江、辽宁、江

^①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杭州城镇化率83.29%、南京城镇化率86.80%、合肥城镇化率74.97%、福州城镇化率70.50%。

西、湖北、陕西等省在户籍制度改革试点中,针对取消农业和非农业户口划分的地区作出政策规定,对无承包土地,且在城镇居住有一定期限,并不参加农村集体经济收益分配的居民适用城市低保认定标准。杭州将社会救助对象和易返贫致贫人口、因病因灾因意外事故等刚性支出较大,导致基本生活出现严重困难的人口信息,录入低收入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库,运用信息化手段推进“政策找人”,将符合条件的及时纳入救助保障范围,帮助转介链接救助服务,防止“脱保”“漏保”。

(三)科学核算家庭经济状况

2021年南京《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工作实施细则》将“家庭经济状况”定义为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拥有的全部家庭收入和家庭财产。家庭收入包括在规定期限(提出最低生活保障申请前至少12个月)内获得的全部货币及实物收入。并对扣减、豁免、不计家庭收入的情况作出了逐条解释,明确“有3套以上拆迁住房、有2辆以上生活用机动车辆、人均金融资产高于同期10倍年低保标准、在各类市场主体中认缴出资累计超过20万元的”的四种情形不得纳入低保的规定。

(四)合理发放低保金和临时救助金

目前,我国低保金按照被保障家庭月人均收入低于低保标准之间的差额确定。计算公式为:家庭月低保金=(低保标准-家庭月人均收入)×保障人数。同时,针对特定对象可以增发一定数额的保障金。符合多项优待政策的,按照就高原则核定,不重复享受。比如南京针对低保家庭中老人(60岁、80岁、失独),18岁以下未成年人(单亲死亡、在读学生),本人每月增发低保标准10%~30%的保障金;残疾人(一级、二级、三级智残精残、重特大疾病人员)本人每月按照低保标准的100%~130%发放低保金。杭州将低保边缘家庭中的低保重病患者纳入“重病型单列户低保”,差额发放不低于低保标准30%的救助金。对因疫情无法返岗复工、连续三个月无收入来源,生活困难且失业保险政策无法覆盖的外来务工人员发放1至3个月低保标准的临时救助金,可谓“一事一议”“救急难”提升救助时效。

五、武汉市低保城乡统筹的可行性分析

武汉市与同级别省会城市的相关指标对比如下。(见表1)

表1 五省会城市人口与城乡低保标准一览表

城市	常住人口 /万人	城镇化率	GDP /亿元	占最低工资标准	城乡低保标准 /(元/人/月)
杭州	1193.60	83.29%	16106.00	46.35%	1056.85
南京	931.47	86.80%	14817.95	46.78%	985
合肥	936.99	74.97%	10045.72	46.26%	717
福州	829.13	70.50%	10020.02	44.19%	760
武汉	1232.65	84.31%	15616.10	43.29%(城市) 40.56%(农村)	870(城市) 730(农村)

2020年全国城市低保平均标准为全国城市居民人均收入中位值的20.1%,城市低保对象占城市常住人口的0.9%;全国农村低保平均标准为全国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值的39.2%,农村低保对象占农村

常住人口的7.1%。反观2020年武汉城乡低保对象分别为51527人、59031人,仅占城乡常住人口的0.5%、3.1%^①,远远低于全国平均值。目前武汉的经济条件明显优于全国平均水平,若与同级别已实现低保城乡统筹的杭州、南京、合肥、福州相比,武汉同样已经具备统一城乡低保标准的经济条件。

依照最新公布的“十四五”时期武汉市民政事业发展规划,农村低保标准占城市低保标准比例2020年基期值为82%,到2025年实现预期目标值90%,不仅可以按时完成这一预期性指标,还可以适当提前、超额完成。

六、武汉市城乡低保统筹发展的对策建议

2020年9月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救助法(草案征求意见稿)》明确规定:坚持城乡统筹发展,坚持社会救助水平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低保城乡统筹进入“立法先行”阶段。

(一)加强低保资金保障,加大资金投入

低保制度不同于社会保险制度,其资金来源相对比较单一,制度对财政的依赖性很大,财政投入的多少直接影响到低保制度的运作与发展,加大财政投入尤其是对农村低保的财政投入是必不可少的。

目前社会救助制度对政府财政的压力并不大。全国公共财政在社会救助领域的预算支出占GDP的比例不到1%,占财政预算支出的比例不到4%。要优化政府财政支出结构,继续加大中央政府的财政投入,减轻农村地区的财政负担。

2021年11月,《湖北省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十四五”规划》正式公布,提出健全农村低收入人口常态化帮扶机制,湖北省财政每年继续安排22亿元,用于农村低保和农村特困救助供养兜底保障工作。武汉作为湖北省会城市,加快低保城乡统筹,应把握发展契机,获得更多上级财政支持。争当湖北省低保城乡统筹的首批试点城市,积极联络部门合作,制订发展细则,参照同级城市统筹经验,确立合理的低保资金筹措机制和经费分担比例,保证政策持续性发展。

可按照“提档增量、多区试点、远城优先”的原则确定全市对所辖城区的资金补助办法,平稳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采取渐进方式,在个别城区率先统一标准,用2~3年时间在全市完成。

(二)规范低保对象准入机制,简化认定程序

在低保对象的确立上,应该改革社会救助制度的瞄准机制,使之从家庭收入——财产瞄准机制转变为家庭和个人实际困难瞄准机制,使更多具有实际困难的群众能够获得相应的救助帮扶。

对于难以确定的隐性收入部分,通过加强民主评议的方法,在保障低保对象人格尊严的前提下,充分发挥基层民主管理的优势,发动村民参与,实行听证或者走访来综合识别保障对象。同时综合运用多种方式,确立多元、动态准入标准,因地制宜结合各地区经济发展情况,借助银行、税务、工商、房地产管理等部门建立起统一的信息共享系统,准确把握低保对象的财产水平,严格认定程序,加强低保对象的管理。

对在居住地申请低保的农业转移人口,给予与城市低保对象同等的教育、住房、医疗救助,使城乡居

^①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武汉市常住人口12326518人,城镇人口占比84.31%,乡村人口占比15.69%。

民享受均等化的社会救助服务,有序推进低保居住地的办理。

(三)建立立体化救助模式,提升救助效能

完善与居民人均消费支出挂钩的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动态调整机制,更新低收入人口数据库及各类困难群众的基础信息;健全基本生活中高风险家庭数据库,系统分析和实时监测困难群众基础信息;扩大实时比对系统数据资源,加快推进部门之间数据互联与交换;加强基层经办人员队伍建设,提升社会救助工作能力。

转变救助观念,将城乡统筹视作实现共同富裕的前提,更好地发挥社会救助在促进共同富裕中的作用。建立“资金+物质+服务”立体化救助模式,针对农村刚性贫困人群,继续加大救助力度,巩固脱贫攻坚成果,防止返贫;针对农村重残、空巢的高龄低保对象,可集中他们到城市供养,方便照护的同时,也能使他们共享城市的生活、医疗服务,提高生活质量;针对低保和特困人员之外的贫困边缘家庭,可以不直接给予现金救助,而根据他们的实际困难给予相应的专项救助,比如发放消费券、购买帮扶服务、提供技能培训、增加就业岗位等方式,从发展机会、发展能力和发展动机等方面提供更多的资源支持,帮助低收入人口中有潜能的人进入中等收入群体,从而更好地实现共同富裕。

(四)加强民政救助政策宣传,确保政策落实到位

进一步提高广大人民群众对社会救助政策的知晓度,将党和政府的关怀与温暖送到困难群众手上,全面提升困难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依托各类社区活动,开展民生政策宣传,并由社区工作者或第三方家境调查员挨家挨户上门送政策。编制《2021年度社会救助政策问答》,将民政救助(含低保、低边、特困供养、临时救助)、住房救助、医疗救助、残疾人两项补贴、电力减免等救助类别及救助金额,制作成宣传册在社区发放,对“什么人可以申请”“如何申请”“审核审批流程”等内容进行详细解答,加强政策宣传力度,扩大政策覆盖范围,确保群众真正做到手中有策、心中有数,户户知晓、人人尽享。

参考文献:

- [1]杨莉. 武汉推动城市适老化改造调查研究[M]//樊志宏. 武汉社会科学·总第22辑. 武汉:武汉出版社, 2021:85-93.
- [2]杨莉. 武汉家庭支持服务需求与提升调查研究[M]//樊志宏. 武汉社会科学·总第24辑. 武汉:武汉出版社, 2022:112-113.
- [3]杨兰. 更加积极的社会救助政策将大有作为——访南开大学社会建设与管理研究院院长关信平[J]. 中国民政, 2021(16):53-56.
- [4]张熠凡,张艳慈. 论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统筹发展[J]. 经济研究导刊, 2020(22):29-30, 147.
- [5]张琳. 推进低保制度城乡统筹发展的实践与思考[J]. 中国民政, 2021(19):18-21, 23.
- [6]杨茂,王玮. 论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城乡统筹发展的制度完善[J]. 商业文化, 2021(6):114-116.

作者简介:

杨莉,武汉市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副研究员,研究方向为人口老龄化、未成年人教育及社会心理等。

(责任编辑:陶秀丽)

武汉市中小学学校体育发展状况调查

熊莉 王洪明

摘要:近年来,国家提出优先发展青少年和学校体育,促进青少年全面发展,各级教育主管部门对学校体育教育工作的重视程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为了解近年来武汉市中小学学校体育发展情况和推进效果,本课题研究选取部分中小学学校开展问卷调查和走访调查。调查显示,武汉市中小学学校体育开展情况良好,品牌赛事活动丰富,特色体育项目进校园进展顺利,体育后备人才培养有序推进。但同时,还存在学校体育场馆设施配置不均衡、特色体育项目进校园试点有限、学校体育社团活动参与不足等问题。今后应进一步加强体教融合、赛教融合,优化学校和社会体育场馆设施资源综合利用,加强对青少年参与学校体育活动的动员和引导,提升中小学生对校园体育赛事、社团等活动的参与度,强化学校体育的育人功能。

关键词:中小学;学校体育;体教融合

2020年8月,国家体育总局、教育部联合印发的《关于深化体教融合 促进青少年健康发展的意见》,明确提出“深化具有中国特色体教融合发展,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目标任务。2021年12月,湖北省体育局、省教育厅印发了《关于深化体教融合 促进青少年健康发展的实施意见》,进一步提出加强学校体育工作的指导思想和基本目标。2023年1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规定:“国家优先发展青少年和学校体育,坚持体育和教育融合,文化学习和体育锻炼协调,体魄与人格并重,促进青少年全面发展。”在国家和省市精神指导下,近年来武汉市中小学校园体育得到高度重视,经过各方的共同努力,学校体育得到长足发展,中小学生获益明显。本调查结合问卷调查和走访调研,对武汉市中小学学校体育发展情况和推进效果开展调研,以期进一步提升学校体育发展质效。

一、武汉市中小学学校体育发展状况问卷调查基本情况

(一)问卷调查的样本特征

本调查主要采用问卷调查法,针对武汉市中小学学生发放电子问卷630份,回收问卷630份。其中,女生307人,占比48.73%;男生323人,占比51.27%。小学生231人,占比36.67%;中学生399人,占比63.33%。

(二)调查结果分析

1. 中小学生对体育课、体育老师、体育课程安排、上课形式、体育课项目方面的喜好情况

调查显示,教学内容、教师的授课形式或风格、学生自身的运动水平、学生对运动项目的喜好等因素对学生上体育课的积极性有重要影响,体育老师将教学内容设计成学生喜欢的形式很重要。(见表1)

表1 学生体育课程喜好情况分析表

调查问题	选项	样本数量/人	占比
你喜欢上体育课吗	非常喜欢	396	62.86%
	一般	217	34.44%
	不喜欢	17	2.70%
你是否觉得通过运动 身体健康情况改善了	有所改善	530	84.13%
	没有感觉	100	15.87%
运动后是否觉 得心情很舒畅	很舒畅	525	83.33%
	没有感觉	105	16.67%
你喜欢什么类 型的体育老师	严肃认真	30	4.76%
	风趣幽默	349	55.40%
	运动技能突出	75	11.90%
	有爱心,能师生同练	176	27.94%
你喜欢怎样 的体育课程安排	教师全程控制教学过程	93	14.76%
	教师完成授课内容后让学生自主练习	383	60.80%
	自由活动	141	22.38%
	其他方式	13	2.06%
你喜欢什么 形式的体育课	竞赛形式	118	18.73%
	游戏形式	325	51.59%
	讲解、示范	84	13.33%
	自主探究	103	16.35%
上体育课时你喜欢什 么体育项目(多选)	篮球	295	46.83%
	足球	176	27.94%
	排球	142	22.54%
	田径	131	20.79%
	游泳	214	33.97%
	跑步	237	37.62%
	跳绳	247	39.21%
其他	264	41.9%	

2. 学生参加学校体育社团活动和运动会情况

调查显示,36.67%的学生没有参加过学校的体育社团活动。以运动员身份参加过学校运动会的学生有296人,占比46.98%;以其他身份参加学校运动会的学生有334人,占比53.02%。

3. 大课间活动情况

对于大课间活动,47.78%的学生选择了“很喜欢”,25.08%的学生选择了“喜欢”,20.16%的学生选择了“一般”,仅有6.98%的学生选择了“不喜欢”。

大课间活动是中小学生在日常紧张的课堂学习之余,非常重要的调节放松时段。国内有不少学校在大课间活动设计上进行创新,吸引学生积极参与,提升课间体育锻炼、愉悦身心的效果。针对中小学生对

大课间活动的看法和期待,本调查提问“你认为大课间在哪些方面可以改进(多选)”,结果显示,选择“增加器材”的占比68.57%,选择“增加游戏”的占比67.3%,选择“老师参与”的占比42.38%,选择“增加运动量”的占比32.06%,选择“减少运动量”的占比13.97%。

二、武汉市中小学学校体育发展现状分析

(一)校园体育活动及品牌赛事开展情况

对于中小学生而言,参加体育比赛不仅可以达到“享受乐趣、健康成长、锤炼意志、健全人格”的体育教育目的,而且能促进青少年体育赛事蓬勃开展,发现和培养更多的优秀竞技体育后备人才。近年来,武汉市积极推进体教融合发展,举办、承办和参加了若干品牌体育赛事和校园体育活动,积极引导广大青少年参加体育活动,取得了一定的成绩。2020年,承办有22个省份参加的校园足球夏令营,举办校园足球市级联赛;参加湖北省第十五届中学生运动会,武汉市中学生代表队获得金牌53枚,居金牌榜、奖牌榜、积分榜首位。3名运动员被清华大学田径项目招录。2021年,武汉市第十一届运动会设置了39项青少年体育类比赛;2022年,武汉市青少年运动会开展了18个年度计分传统项目比赛和以俱乐部为组队单位的11个项目比赛等。

(二)特色体育项目进校园及中小学体育技能培训情况

2019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量的意见》中明确提出:“科学安排体育课运动负荷,开展好学校体育特色体育项目,大力发展校园足球,让每位学生掌握1至2项运动技能。”近年来,武汉市教育局每年设体艺卫专项补助,针对各区学校开设游泳课、开展校园足球活动,给予相应补助。2020年,游泳进校园试点学校43所,活动补助1000万元;中小学足球运动试点学校408所,专项经费补助2544万元。2022年,中小学足球运动试点学校增加到437所。

为了服务青少年健康成长,丰富青少年假期生活,提高青少年的体质健康水平,让青少年在假期获得一项体育技能,武汉市教育局、武汉市体育局联合开展了青少年假期免费体育技能培训和免费运动场馆使用的惠民活动。但由于多种因素影响,问卷调查结果显示,武汉市中小学生对暑期免费体育技能培训活动、青少年暑期免费运动场馆的知晓度并不高,参与情况不容乐观。(见表2)

表2 武汉市中小學生参与暑期免费体育技能培训活动、使用免费运动场馆情况表

调查问题	了解或使用情况	样本数量/人	占比
你知道暑期免费体育技能培训活动吗	知道	238	37.78%
	不知道	392	62.22%
你是否参加过暑期免费体育技能培训活动	参加过	128	20.32%
	没参加过	502	79.68%
你是否知道青少年暑期免费运动场馆	知道	274	43.49%
	不知道	356	56.51%
你使用过青少年暑期免费运动场馆吗	使用过	148	23.49%
	没使用过	482	76.51%
周末或假期寻找免费的运动场馆情况如何	很好寻找	261	41.43%
	不好寻找	369	58.57%

(三) 体育后备人才和体育特长生的培养情况

经过 20 世纪 90 年代的竞技体育体制改革,我国已经进入了竞技体育人才培养模式多元化的探索阶段。近年来,为了集中资源破解融合发展难题,武汉市体育传统特校并轨,统一名称为“武汉市体育传统特色学校”,中小学传统特色学校的学校培养模式是其中的一种,该类学校受教育部门直接管理。学校培养模式其实是伴随着我国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所引发的运动员退役安置问题而产生的,是国家为了整合体育与教育资源而实施的竞技体育人才培养新举措。武汉市中小学校的体育教师有一部分来自退役运动员,这部分教师专门负责体育后备人才和体育特长生的日常训练工作。2022 年武汉市高中预安排招生计划 49000 人,体育后备人才 574 人,体育特长生 277 人,合计占比 1.74%;851 名体育后备人才和体育特长生招生计划均在公办高中。

(四) 中小學生课后利用学校体育场馆设施情况

学校体育场馆向社会开放,已经成为缓解社会体育资源供给不足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体育健身需求这一矛盾的重要途径之一。武汉市将学校体育场馆向社会开放工作列为为民十大实事。武汉市是全国第一批学校体育场馆向社会开放的试点之一,从 2006 年最初布局 40 所发展到目前的 120 所,每年接待进校锻炼的青少年等达百万人次之众。汉阳区、东湖高新区区域内中小学体育设施全部对公众开放。武汉市教育局将对全市 120 所体育场馆向社会开放学校给予每年每校 3 万元的经费补助,补助经费主要用于开放场馆设施运营、场馆开放社会体育指导员工作经费等。

三、武汉市中小学学校体育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一) 硬件设施配置不充分,投入结构性矛盾突出

中小学学校体育发展必须有一定的经费投入作为保障。学校的体育场地设施设备配置、升级以及校园体育活动的开展,都离不开经费投入。学校组建发展一个优秀的运动团队,不仅要为其提供良好的场地环境,还要为其提供科学的训练与监控仪器,这些硬件设施的装备对于大部分学校而言都是一笔不小的财务负担,这也影响了学校发展校园体育和培养竞技体育人才的积极性。近几年,绝大多数学校重视体育硬件设施配置,体育器材基本达到《中小学校体育器材目录》标准要求,但运动场地受学校用地面积、建校时期的校园设计等方面的约束,有些学校情况不容乐观。调查显示:31.11% 的学生就读的学校没有风雨操场。受学校所处的地理位置、用地面积、建校时间、校园建筑设计等因素的制约,各个区建校时间越早、越是处于中心城区的核心地段、占地面积越小的学校,缺少风雨操场的情况越严重。

(二) 政策法规不健全,学校体育场馆设施社会化利用面临难题

近年来,武汉市实行新体育中考,体育分值由原来的 30 分提升至 50 分,将篮球、足球、排球列入体育中考范围。然而,武汉市的足球、排球、篮球场地相对于学生的体育训练需求来说,都显得十分不足。相

对来说,学校体育场馆是学生课后和假期练习的好去处。但学校体育场馆对社会开放的过程中,也遇到了一些棘手的问题。比如,学校体育场馆开放的安全问题是学校管理者普遍关注的问题,也是影响学校体育场馆开放积极性的重要因素。针对学校体育场馆向社会开放的相关问题,目前还缺乏明确的权责规定,没有针对学校场馆开放后人身伤害的专门立法,政策法规尚需要进一步健全。

(三)足球、游泳、马术等特色体育项目进校园示范学校分布不均匀,民办学校参与度不高

截至2020年,武汉市有中小学941所。其中,游泳进校园示范学校43所,占比4.57%;足球进校园示范学校437所,占比46.44%;“小小骑士进校园”示范学校22所,占比2.34%,普及率较低。特别是“小小骑士进校园”试点学校分布不均匀,中心城区中的青山区、洪山区、汉阳区没有试点学校,新城区中的汉南区、蔡甸区、黄陂区、新洲区、江夏区没有试点学校。22所“小小骑士进校园”示范学校均为公办学校,民办中小学受经费不足、学校体育安全法律法规不健全等因素影响,参与试点热情不高。武汉市中小学“游泳进课堂”试点工作从2015年春季开始,投入3000万元,按每生每次课50元的标准,对“游泳进课堂”试点工作予以补贴,让43所试点学校的1万名小学生学会游泳。但目前武汉市中小学中具备开设游泳课条件的学校为数不多。对于不具备校内上课条件的学校,将采取购置拼装式游泳池、新建校内游泳馆、向社会机构购买服务等形式解决场地问题。受场地因素制约,几年来游泳试点学校数量并未增加。

(四)受学生课余体育活动时间有限、领导重视程度等因素的影响,学校体育社团活动开展情况不容乐观

体育社团作为课外体育活动的重要组织形式,在活跃课外体育气氛、增强学生身心健康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当前学校开展体育社团活动情况不容乐观,初中比小学更为严重。未能开展体育社团活动的主要原因包括:学校领导重视程度低、学生课余时间有限、经费及场地设施不足、指导教师缺乏、社团活动内容枯燥、学生活动存在安全问题等。体育社团活动经费、师资、时间、场地设施等方面均得到充足保障的前提,是领导对体育社团足够重视。在当前中高考制度压力下,学生的升学压力大,学业负担过重,也是制约学校体育社团发展的重要因素。调查显示,放学后31.43%的学生每周锻炼1次,37.14%的学生每周锻炼2~4次,每周锻炼5次以上的占12.22%,19.21%的学生没有锻炼。没有充足的课余时间保障,学生无法参加体育社团活动。

四、武汉市中小学学校体育发展的改进建议

(一)继续加大学校体育经费的投入力度,保证财政资金精准有效使用

学校体育发展需要政府有强大的财力保障。纵观体育强国,无一例外的对校园体育投入大量的经费。继续加大校园体育经费的投入力度,重点保障体育场地设施设备配置、升级以及校园活动的开展。为保证财政资金在各个学校得到充分、有效、合理使用,对新建或在建学校,要超前谋划,配置体育设备、建设体育场馆时,要将对社会开放接待量考虑其中,由各区教育局体卫艺站负责全程指导或参与规划,在保障在校学生日常体育锻炼的同时,设置适合不同年龄段的运动项目。资金使用过程中,审计部门需加

强对专项经费使用情况的督导,监督财政资金的使用流向,提高财政教育支出效益。

(二)加大对青少年体育赛事和活动的宣传力度,推动以赛促学,以赛促教,赛教融合

学校体育教育对中小学生的身心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而举办校园体育赛事活动是学校体育教育的重要措施之一。当下,素质教育日益深化,鼓励各中小学校利用课余时间和假期组织校内比赛、校际比赛、跨区域及全国性比赛,积极开展校园体育赛事活动,围绕赛事展开学校体育课外训练、运动人才培养、体育锻炼习惯养成等工作。在举办校园体育赛事活动中,要注重赛事的科学合理性,充分激发学生的参与热情,提升学生参与体育赛事活动的主动性与积极性。体育系统和教育系统合作举办赛事,为专业青少年运动队和广大青少年学生搭建互动平台,组织“友谊赛”促进彼此交流切磋,在激发广大青少年参与体育赛事、投身校园体育活动的兴趣和热情的同时,通过体育比赛为学校挖掘到竞技体育后备人才,为学生的未来发展拓宽路径。

(三)加大创新力度,优化编制配备,加强中小学体育教师队伍建设

发展学校体育,师资先行。中小学处于体育教育的起步阶段,是全面发展体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打造一支高素质的体育教师师资队伍,保障青少年体育活动常态化开展,让学生在运动中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锻炼意志。针对中小学体育教师不足的问题,教育主管部门应在盘活事业编制存量、优化体育教师招聘政策、鼓励并支持各学段学校优化岗位设置等方面着力。学校可以创新设立体育教练员岗位,优先聘用符合相关条件的优秀退役运动员从事学校体育教学、训练活动,提高中小学体育教师中高级教师岗位的比例,拓宽体育教师职业发展通道。实行教师编制配备和政府购买服务相结合的方式,解决中小学体育教师人员聘用问题,为中小学及时补充体育学科师资,解决中小学体育教师师资不足问题。重视体育学科名师成长和体育教研员队伍培养,保障师资队伍建设,提高课程质量和教学效果。

(四)建立政府主导、教育与体育部门主管、多部门协调配合的管理体制,引导学校体育场馆和社会场馆资源社会共享有序推进

针对部分中小学校风雨操场缺乏、体育运动场地和设施不足的现状,加大推进各学校及社会体育场馆社会化利用向纵深发展,实现学校、社会体育场地设施资源社会共享。建议学校体育场馆在周末、节假日向社会开放,实现区域内不同学校学生共享;社会体育场馆资源在特定时间面向学生优先、优惠开放。既要加强学校和社会体育场馆资源社会共享的引导宣传工作,又要加强对开放场馆单位的检查、督导和评估工作,并对全市开放场馆实行动态管理,使开放工作实现常态化和制度化。要求各开放场馆单位建立健全开放的各种规章制度,按照开放流程严格管理。加强应对新形势下校园安全防范问题的研究,提出切实可行和行之有效的安全防范措施,推广开放场馆单位安全防范的典型经验,以点带面健全安全保护制度。建立学校场馆和社会场馆开放工作群,及时传递和通报开放工作情况。各开放场馆要落实开放时间、开放形式、开放范围在开放场馆单位网站、微信公众号、开放场馆单位大门口进行公示。各区教育局、体育局要公布学校和社会体育场馆开放投诉电话。创新开放工作的管理模式,试行第三方专业机构管理模式,确保开放工作顺利进行。加大对开放试点学校及社会场馆的经费投入力度,建立“以奖代补”

的经费投入机制,确保开放体育场馆社会化利用可持续推进。

(五) 将传统体育项目引进校园,鼓励学校开展形式多样、各具特色的“大课间活动”

近年来,国内不少中小学探索研制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体育校本课程和体育社团活动,利用“大课间活动”普及推广,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效果。比如长沙市外国语学校 500 多名学生跳街舞课间操的视频一度火爆全网;雅安市雨城区第二中学有 60 多个体育社团供学生选择;甘肃省兰州市宁兴小学将通背拳、太极拳等传统武术项目引入校园,激发了广大学生参与校内体育活动的浓厚兴趣。提升学校体育发展效果,可尝试将传统体育项目纳入学校体育课程内,教育主管部门要积极推进武术、太极拳等作为体育特色项目进校园,在中小學生中普及武术、太极拳运动。持续推进青少年武术技能免费培训活动,开展丰富多彩和形式多样的太极拳赛事及活动,打造太极拳体育赛事品牌。由教育和体育主管部门共同拟制年度竞赛计划,将武术、太极拳等传统体育项目逐渐列入竞赛项目,先向各传特校推广普及,再以点带面,逐步向全市中小学推广。将阳光大课间每天运动 1 小时作为学校体育工作年度考核项目,纳入学校绩效工作指标。

(六) 进一步加强家校合作,助力学校体育社团蓬勃发展

一方面,学校领导要积极转变办学观念,正确认识学校体育社团的开展在学生素质教育中所起的作用;重视体育社团的发展,加大对体育社团活动的投入和支持;鼓励本校老师及技术水平高的学生积极参加社团指导工作的同时,适当邀请外聘老师,增强社团师资力量;根据学生实际情况和中小學生身心发展,合理安排丰富的活动内容;适当减轻学生的课业负担,增加学生课余体育活动时间;制定具有可操作性的体育社团规章制度,使得社团活动和行为有章可循。另一方面,开展家长教育,引导家长积极支持和配合学校体育社团工作的开展,为中小學生积极参与体育社团活动提供家庭支持。

(七) 扩大校园足球、游泳、马术等特色体育项目试点学校,提升学生及家长认知水平,充分发挥体育育人功能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要加强足球、游泳、“小小骑士进校园”试点宣传,使学生和家长了解特色体育项目开设的目的、意义和办法。试点学校应制订安全工作预案,对往返交通、公开课期间的安全工作明确专人负责,实行全过程监督。通过探索中小学足球、游泳、马术公开课开设的途径和方法,制定符合中小學生特点的体育特色课程体系,培养学生对足球、游泳、马术的兴趣,激发学生的参与热情,掌握运动的基本技能和方法,组建高水平青少年足球、游泳、马术运动队,培育一批积极开展特色体育项目的特色学校和培训基地。通过各类特色体育公开课,进一步探索学校特色运动普及的创新模式和校园兴趣课程创新机制,推进素质教育,实现体育的育人功能,通过体教融合,为学生全面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参考文献:

- [1] 马德浩. 我国竞技体育人才资源萎缩的原因探析与应对策略[J]. 体育与科学, 2016, 37(5): 83-98-104.
- [2] 陆小黑, 王洁. 体教融合目标下学校武术教学优化研究[J]. 体育教学, 2020, 40(12): 30-32.

- [3]张恩利,蒋亚斌,张敏昊,等.全面促进职业发展:新修订《体育法》中运动员权利保障的立法突破与现实效应[J].西安体育学院学报,2022,39(4):410-416.
- [4]熊莉.武汉城市区域间教育经费与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研究[J].江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33(3):99-104,127-128.
- [5]毛军,代秀正.小学校园体育赛事活动开展的意义与实践研究[J].青少年体育,2021(7):72,84-85.
- [6]徐庆涛,郭国中.体教融合背景下学校体育“积极外联”机制的实践探讨[J].体育教学,2021,41(10):16-18.
- [7]邴睿.新时代中小学教育装备监测评估策略研究[J].甘肃教育,2022(21):30-35.
- [8]古雅辉.体教融合背景下青少年体育公共服务发展路径研究[J].体育科技,2022,43(3):64-66.
- [9]屈家乐.对以体教融合为基础、以中国足球协会女子乙级联赛为平台的“高校卓越女足人才”培养模式的研究[J].体育视野,2022(17):137-139.
- [10]韩春龙,何敬恩.新时代体教融合背景下学校体育改革发展路径研究[J].青少年体育,2021(8):74-75,88.
- [11]刘平江,王凤玮,周利明.我国部分省市中小学体育社团发展现状分析[J].首都体育学院学报,2013,25(5):423-427.
- [12]王浩.浅谈体育课中影响学生学习兴趣的原因及对策[J].田径,2023(5):19-21.

作者简介:

熊莉,武汉市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为教育社会学;

王洪明,武汉市第二十一(警予)中学校长,中学高级教师,省级骨干教师。

(责任编辑:陶秀丽)

文化软实力视域下 武汉城市品牌形象构建

李小波

摘要:城市品牌形象是城市文化软实力竞争的制高点,城市文化软实力又为城市品牌形象的构建提供核心支撑。一座城市的崛起和发展,需要城市文化品牌作为战略支撑。武汉作为国家中心城市,历史悠久,又是国家重要的科研教育基地,还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选为世界设计之都,在创建城市品牌形象方面具有独特的文化优势。从世界知名城市品牌形象建设的经验来看,武汉城市品牌形象建设要以文化创新为引领,坚持武汉文化发展的世界视野,推动传统媒体与新媒体深度融合,提升武汉城市品牌形象的传播效应。

关键词:文化软实力;城市品牌形象;武汉

城市品牌形象是一座城市的无形资产,也是这座城市文化软实力最直观的外在体现,良好的城市品牌形象可以提升城市文化的凝聚力、吸引力与影响力。武汉作为超大城市、国家中心城市,具有3500年的悠久历史,又是国家重要的科研教育基地,智力密集、人才储备丰富,在创建城市品牌形象方面具有独特的文化优势。武汉必须发挥得天独厚的优势,统筹整合各项重要的文化资源,打造具有自身标志性的城市品牌形象,以推动城市文化软实力的提升。

一、城市品牌形象与城市文化软实力的关系

(一)城市品牌形象

城市形象是一个城市的面貌和风格的总体外在表现,是将一个城市所有资源整合提炼以形成总体风格的结果,从而方便认知主体对其形成整体上的感知。塑造城市形象的根本目的是打造优良的城市品牌,以品牌的战略方法来打造城市形象就构成城市品牌形象的基本含义。而城市品牌与这个城市的个性与特色密切相关,是通过整合这个城市的特色文化资源,突出城市的个性魅力来提升城市的认知度和竞争力。城市品牌形象本身就是这个城市文化软实力的重要体现,是城市被推广和宣传的核心概念,城市品牌形象对于吸引资金和人才,从而产生良好的聚合效应,进而推动城市的快速发展至关重要。

(二)城市文化软实力与城市品牌形象的关系

1. 城市文化软实力为城市品牌形象的构建提供核心支撑

城市的文化软实力越强大,在此基础上构建的城市形象就越鲜明,公众的认可度就越高。文化具有不可复制性的特点,从而造就了城市品牌形象的独特性,也使城市品牌形象更具差异性。“个性与特色文化是城市文化软实力的核心内容”^①,一个城市的品牌形象需要由个性与特色文化来维系与体现,也为塑造良好的城市形象提供核心支撑。城市品牌形象的构建必须以个性与特色文化为基础,大力发展无形的特色文化资产以提升城市的品牌形象。北京被中国网民冠以“帝都”的形象,上海被称为“魔都”,也就在于它们因自身特色文化所形成的强大文化软实力被广大网友认可的结果。

2. 城市品牌形象是城市文化软实力竞争的制高点

城市品牌形象是集城市精神、价值体系于一体的外在集中体现,也是城市文化软实力的重要代表。城市形象品牌化后,城市就有了它自身的标志性文化符号,城市的辨识度就会更高,个性特色更加鲜明。有了鲜明的城市品牌形象,有了更为强大辨识度的城市,更容易在城市间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赢得机会、获得青睐。景德镇被称为中国瓷都,深圳被称为创业之都,这就是将城市最具有代表性的文化符号品牌化的结果。文化赋予一座城市气质与灵魂,而品牌化的城市形象又大大增加了人们对这座城市的印象与感知,成为城市文化软实力竞争的制高点。

二、世界知名城市打造城市品牌形象提升文化软实力的经验借鉴

国际上,大都市往往以文化为切入点打造城市的品牌形象,以提升城市的文化软实力,扩大城市的知名度和竞争力。2020年KEARNEY全球城市综合排名报告显示,世界城市排名前十的分别是纽约、伦敦、巴黎、东京、北京、香港、洛杉矶、芝加哥、新加坡、华盛顿。对其中有代表性的城市进行文化品牌形象建设研究,可以让我们更好地总结世界知名城市品牌形象建设的成功经验,为武汉的城市品牌形象建设和文化软实力发展提供重要的借鉴和参考。

(一)纽约以强化文化创新推动国际文化大都市建设

作为世界第一大中心城市,与其他知名中心城市相比,纽约的城市历史并不算特别悠久,文化传承也谈不上源远流长,但纽约高度重视以文化创新为引领建设国际文化大都市。

纽约注重编制综合性文化战略规划,以科学的制度推动文化创新。2015年5月,时任纽约市长Bill de Blasio签署立法并要求制定纽约的综合性文化战略规划,即Create NYC。2017年7月,纽约市组建了由22名委员组成的市民咨询委员会,并开通多种渠道广泛征求意见,回收市民意见18.8万余条,经整合归纳最终形成了“创造纽约”(Create NYC)文化发展规划,旨在将纽约市构建成为一个更包容、平等、灵活的文化生态系统,^②为纽约树立起世界文化大都市的新城市形象提供了科学的行动指南。这是纽约历史上第一个综合性文化规划文件,内容涉及8个领域的文化创新,具体概括为:公平和包容,负担能力,社会和经济影响,艺术、文

^① 李小波:《论城市文化软实力的核心——城市个性与特色文化》,《武汉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8年第3期。

^② 意娜:《国际化大都市的创意产业发展战略——以纽约市为例》,《中原文化研究》2020年第2期。

化和科学教育,全市协调,公共空间的艺术与文化,邻里角色,文化部门的健康等。这份规划又详细分解为:当前计划(1年内)、短期计划(2年以内)、中期计划(4年以内)、长期计划(10年)。

纽约强化文化发展的政府职能,激发政府对文化创新的引领作用。政府和市场是经济发展的两大动力,带有公益性质的文化的创新更是离不开政府的大力支持,政府对文化发展的支持是文化茁壮发展的关键因素。纽约是美国各城市中,政府对文化支持最为悠久的城市,纽约文化局对全市文化的资金支持力度在全美国来说也是最大的。纽约在推进文化创意产业的建设过程中,在资金、土地、就业甚至工资、人员上都全面给予支持,以加快推进纽约文创产业的发展步伐。

(二)巴黎注重城市视觉形象设计与媒体传播

巴黎作为世界五个国际大都市之一,是享誉全球的世界文化中心,在 KEARNEY 全球城市综合排名、Journal Foreign Policy 城市排名等各项排名中均能名列前茅,在历史上就十分重视利用文化来打造城市的品牌形象。巴黎也是欧洲城市中很早就尝试用城市品牌形象建构与传播的城市,早在 1210 年,巴黎市就设计出了巴黎市市徽,采用帆船的形象来代表这座城市勇往直前的决心。于是,帆船就成为巴黎的历史性标志,成为巴黎形象的重要代表。从此,帆船的设计元素不论是在巴黎市市徽还是在巴黎城市视觉形象设计上都一直沿用至今,成为巴黎闪亮的城市形象代表。2007 年萨科齐总统提出“大巴黎计划”,主要是以文化为主要内容,旨在用 20 年左右的时间将巴黎打造成“世界之都”。在此计划的推进下,目前巴黎已是欧洲拥有博物馆、图书馆、电影院数量最多的城市,巴黎的文化创新能力飞速提高,截至 2020 年巴黎的文创产业占整个城市的 GDP 超过 10%,巴黎城市品牌形象的文化活力被大大激发出来。

为了让巴黎的城市品牌形象得到更广泛的传播,巴黎市政府充分挖掘巴黎城市的文化内涵,以市民生活的角度为出发点,将巴黎的时尚文化、美食文化、历史文化与巴黎的“开放包容、勇敢无畏”的城市精神相结合,推出了《巴黎,我爱你》城市宣传片,该片采用纪实性拍摄手法,利用短短的几分钟时间,将巴黎具有深厚文化底蕴的城市形象浓缩其中。并利用传统媒体和新媒体融合的传播方式,既在法国以及国外的报纸杂志、主流媒体上进行宣传,同时又在 Facebook、You Tube 等新媒体上进行投放,调动公众参与度,增强互动性,提高了传播效果。还通过巴黎时装周、法国网球公开赛等大型国际性活动,全方位、多角度宣传巴黎城市精神与城市文化,增强巴黎城市品牌形象的国际影响力。

(三)东京以城市功能性定位为基础打造城市品牌形象

东京对城市品牌形象的打造十分注重对城市的功能性定位,而“成熟的文化都市”又成为东京城市功能定位的主打牌。持有这一主张的代表人物有前东京都知事舛添要一,2015 年 3 月,他在《东京文化愿景》中提出东京城市的建设目标是要以文化开辟东京的未来,将东京建成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文化都市。^①在此基础上,同年 12 月东京都又发布报告《东京都面向 2020 年的措施——着眼于奥运会之后的遗产》,明确强调将东京建设成为世界文化大都市。

^① 姜瑛:《城市形象媒体传播的框架与策略——以 2020 年奥运会举办地东京为例》,《北京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 年第 6 期。

城市定位一旦确立,整个城市形象传播的大方向和主渠道都要紧紧围绕此而展开,东京城市形象元素就是从“Cool Japan”这一国家战略中提取的元素,把东京特有的文化内容与“酷日本”的文化战略紧紧结合在一起,打造东京版的日本酷文化。“Cool Japan”一词最早是由美国记者 Mc Gray 于 2002 年提出来的,他认为,日本通过发展、推广本国流行文化增强国际影响力的行为是日本打造文化软实力的表现。2011 年 6 月,“Cool Japan”正式被日本政府定为国家战略。如果把“酷日本”看成是日本国家形象总代表的话,那么“酷东京”的城市形象就是其子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酷日本”战略对于打造和传播城市形象最为关键的作用在于,它从官方主渠道选定具有普遍代表性的品牌来组成城市形象元素资料库,来访者可以根据自身需求在资料库中自由挑选相对应的目的地。比如东京,从“内容产业”方面来看,对于动漫、音乐、偶像等内容感兴趣的来访者可以选择前往秋叶原,因为这里有被誉为全球最知名的动漫一条街;对服装类感兴趣的来访者可以选择去银座、涉谷、原宿,因为这三地的服装各有千秋,银座主打“贵妇阶层”、涉谷主打“可爱系”、原宿主打“潮街系”;对美食感兴趣的来访者必定会被筑地吸引,因为筑地已成为寿司的代名词,而日本最著名的酱油品牌“野田”,其公司也在此地。

(四) 首尔强化城市品牌形象构建中公民的参与度

首尔在城市品牌形象建构上高度重视市民的意见,实行的是公民共治模式,给自己树立起古老与现代相结合,文化亲民的城市品牌形象。2013 年,首尔市政府设立首尔创新局,有效调动了市民的参与度,市民有了更多途径可以参与到城市规划与建设中来,以便集中全社会的力量提升首尔的城市品牌形象。2022 年首尔市政府又发布元宇宙首尔五年计划,宣布从此年起分三个阶段在经济、文化、旅游、教育等市政府所有业务领域打造元宇宙行政服务生态,号召全体市民积极参加,本年将通过第一阶段工作完成平台的搭建,引入经济、教育、观光等 7 大领域服务,总投资计划为 39 亿韩元。

对于城市形象建设的重大问题,首尔特别强调市民的全面参与和决策。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的世界“设计之都”,首尔也集中力量大力发展城市创意产业提升城市形象,而在确定某些项目的最终实施方案之前,都要专门通过市民委员会去听取广大市民的意见。比如在对首尔站高架桥的改造过程中,首尔市政府就采取了“停下来,再仔细考虑一下”的策略,由听取专家意见转变为兼听市民意见,并于 2015 年组建市民委员会。在市民全面参与决策后,“首尔路 7017 计划”于 2015 年出炉。经过两年紧锣密鼓的施工,一条长达 1024 米的空中花园步道“首尔路 7017”于 2017 年 5 月正式开放,成为一条兼具交通、休闲、文化、购物等多功能的空中步行街。作为人类最大的河道恢复工程之一,“汉江复兴计划”也是在公民、专家及政府相关部门经过共同磋商后才正式启动,预计于 2030 年完成。在汉江管理过程中,市政府并没有将所有权力集中交予行政机构,而是赋予了公民及民间团体一定的权力,例如创建了由 60 多万公民组成的汉江水务委员会,鼓励普通百姓参与决策过程的每个阶段。

三、文化软实力视域下武汉城市品牌形象构建的对策探析

世界知名城市品牌形象建设中都有自己明确的文化价值导向,都是立足于自身特色文化的基础上不断进行着文化创新。“世界之都”纽约,在文化上体现自己高度的文化创新特点。巴黎则突出自己的世界文化中心地位,展现一个“无与伦比的巴黎”。东京利用“酷日本”突出自己“干练、优雅、合作”的城市精神。而首尔则推行公民共治模式,打造饱含厚重历史又充满时尚新元素的国际大都市。武汉可以借鉴这

些城市在城市品牌形象构建上的成功经验,加快自身城市品牌形象建设。

(一)设计武汉完整的城市品牌形象元素,提升城市视觉形象识别度

“在人的感觉器官中,由于视觉感知是人们认识环境最基本也是最初始的通道”^①,所以,抓住城市的视觉形象设计是城市品牌形象建构的第一步。个性化、系统性的城市视觉形象一旦形成,它会成为城市精神、城市发展理念的重要载体,是对城市进行包装和美化的核心元素,也成为媒体传播宣传的基本内容。个性化、系统性的视觉符号可以让人们在不同的媒体平台、宣传内容中看到一致性的视觉元素,深化对城市品牌形象的认知度、识别度与美誉度。

武汉城市建设和宣传相关部门应根据武汉的城市品牌形象内涵,从武汉城市精神、特色地域文化、环境地理特点等角度,设计武汉城市标志、城市标准字体、辅助配套图案、吉祥物等一系列品牌形象视觉元素。城市标志可以从中部崛起战略支点、长江经济带中心进行设计,采用篆书作为标准字体,沿用“楚红”作为标注色,辅助图案以抽象的长江和黄鹤楼为主,吉祥物可以设计成江豚的卡通造型。武汉城市品牌形象视觉元素经审议通过后,一定要制定出明确的使用标准和规范,印发给城市建设和管理的各个部门、社会组织以及商业机构,并要求其必须严格按照标准进行使用。当这些城市品牌形象视觉元素在网络平台、公共宣传平台、城市导向系统、宣传作品乃至城市建筑装饰、政务用品中被广泛使用时,受众的视觉不断被这些视觉元素冲击,他们会对武汉城市品牌形象的内涵、城市精神、区域特色文化产生情感共鸣,有利于使该城市在人们的认知中形成良好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二)整合武汉特色地域文化,提升武汉城市品牌形象的核心支撑

每个城市都有它突出的地域文化特色,这是构建城市品牌形象的核心要素。武汉城市品牌形象构建要凸显武汉的地域文化特色,例如:盘龙城文化、荆楚文化、黄鹤楼文化、东湖文化是得益于武汉特殊的地理位置和自然环境,经过漫长的历史积淀所形成的武汉特有的文化形态,具有明显的地域特征。深入挖掘整合武汉的地域文化资源,建构武汉城市品牌形象,有利于武汉对外展示自己丰厚的文化底蕴与独特的文化气质。

首先,以主导资源分布的地域为范围对武汉特色文化资源从空间上进行整合。应重点将“阅马场—龟山—南岸嘴—汉正街”打造成整体的文化景观轴;突出武昌、汉口、汉阳三镇各自的地域文化特色,形成三大块各具特色的地域特色文化系统;还要重视环城文化景观带的营造,深入分析江夏、东西湖、汉南、蔡甸、新洲、黄陂等远城区的地域文化特征,突出生态功能,形成环城文化景观带,营造核心明确、均衡发展的城市特色文化系统。其次,利用武汉区域文化资源的巨大优势,打造文化精品项目。一方面要加强城市特色文化资源的挖掘,以江滩文化建设、城市湖泊资源开发、辛亥首义文化、汉阳知音文化、沌口汽车文化、百步亭社区文化等特色项目建设为核心,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着力打造武汉城市特色文化体系。另一方面要加强城市精神文化产品的建设。坚持精品优先的原则,大力挖掘武汉民俗、戏曲、杂技等文化资源,通过实施“文化资源共享工程”“城市民间文化保护工程”等,弘扬武汉的历史文化、民俗文化、工业文化、山水文化,打造“文化武汉”的品牌形象。

^① 王峡:《基于地域文化视角的城市视觉形象设计》,《南京艺术学院学报(美术与设计)》2015年第2期。

(三)加强武汉文化创新引领,提升武汉城市品牌形象的附加值

1. 培育城市文化多样性的生态土壤,营造具有高度活性的城市创新软环境

创新是一种非规范性的突发性行为,世界级城市规划大师彼得·霍尔认为,各种各样的人聚集交流,不断地创造着“新事物”,不同文化的融合碰撞,为创新提供巨大的动力。武汉应不断加大对文化原创人才、高端复合型人才、文化经营管理人才的挖掘、引进、培养和服务力度,重视城市人口的多样性建设,吸引海外华人华侨、优秀的外国文化艺术人才留汉发展,多样化的人群对于激发城市的创新活力起到关键性作用。在外来人口与本地人口对比所形成的“熔炉指数”方面,武汉与纽约、巴黎、伦敦等城市相比还有巨大差距。

当前,我国城市的公共文化发展是以政府主导实行自上而下的“公共文化服务”为主,武汉应努力尝试在政府主导、社会协助的公共文化服务格局下,加大对草根文化、先锋文化和民间自发的公共文化等“小微文化细胞”的引导和扶持力度,比如加大对其资金、场地、设备的资助力度。对于有些深受广大市民欢迎、有一定影响力的民间自发文化活动聚集地,政府部门可以加以引导并支持其发展壮大,使其朝着巴黎蒙马特高地、纽约格林尼治村这种文化特色区域的方向发展。

2. 充分调动社会性文化嵌入,加强对市民的主体需求回应

在对文化创新的激发方面,当前武汉需要广泛调动全社会的积极性,提高社会性参与度和加快社区性文化再造速度,从社会型文化创新角度提升社会基础细胞的创新活力和公众参与度。城市文化的发展一定要以满足市民主体需求为根本价值旨归,一定要表达对不同人群和市民主体的平等与包容。巴黎、华盛顿都积极致力于培育充满活力的群体文化氛围,促进城市对于市民群体的文化满足。在培育和打造文化项目的过程中,武汉要摒弃开发和建设“孤岛化”倾向,深入思考文化项目与周边环境的融合,特别是各类不同的市民阶层对它的参与和共享。文化的创新要由人来完成,创新的文化最终由人共享。城市中的文化创新要充分考虑不同的市民主体在生活、交流中的现实需求,形成饱含人文氛围的创新文化。

3. 推动文化创意产业科学发展,提升文化创意园区的品质与内涵

武汉的城市文化创新必须大力借助文化创意产业和文化创意园区建设。文化创意产业具有推动城市经济发展与凸显城市文化个性的双重属性,对于打造城市的品牌形象也意义非凡。武汉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要立足武汉本土的特色文化资源,使之与武汉的历史文化遗产、工业文化遗产、自然生态资源、特色民俗文化相结合,既能延续武汉的历史文化记忆、保护生态环境,又能传承与创新武汉历史文化、展现武汉本地文化特色,带动武汉文旅产业发展,从而提升武汉城市品牌形象的附加值。要加强多领域、多部门之间的协同配合,充分激发武汉龙头企业的引领作用,使之与武汉中小型企业之间形成资源分工合作的良好产业链条,扩大产业集聚效应。武汉文化创意产业还应坚持市场需求导向,以弘扬武汉城市精神为己任,创作出反映武汉人民价值观,并且既具有武汉地方文化特色又符合国际主流审美的文创产品。这些产品承载着高文化附加值和强有力的文化渗透性,可以增强武汉与其他城市、多种文化群体之间的交流,有效传播武汉的城市文化内涵。

当前,武汉文化创意园区建设也存在比如注重物质外壳而忽视文化内涵、文化创意元素沦为点缀、地产化和商业化倾向突出等问题。武汉文化创意园区建设不能只是单一地由其市场化和产业化运作,否则可能本末倒置,形成“创新空间不创新”的尴尬局面。文化创意园区必须形成浓厚的文化氛围,在功能和主题上建设具有复合功能的文化聚居区。例如,巴黎左岸起初并不是什么文创空间,也并非为了某种商

业目的专门打造的一个区域。而是因为这里独特的高等学府、艺术机构、咖啡馆等,成为文化人士聚集的公共领域,为巴黎文化创新提供了显著活力。武汉要注重改善重商业化、产业化的文化开发模式,以提升文化创意园区的品质与文化内涵为宗旨,为创新营造更为宽松的环境。

(四) 推动传统媒体与新媒体深度融合,提升武汉城市品牌形象的传播效应

1. 传统媒体与新媒体平台双向并举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不是取代关系,而是迭代关系;不是谁主谁次,而是此长彼长;不是谁强谁弱,而是优势互补。^①要推动武汉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深度融合,更好地传播武汉城市品牌形象,既要充分发挥传统主流媒体的公信力、引导力,又要大力利用移动数字媒体的多元性、交互性优势,使武汉城市品牌形象朝着社交化、可视化方向发展。武汉传统媒体必须加强与短视频平台的合作,比如武汉市各级政府部门和《长江日报》、武汉电视台、《武汉晚报》等传统媒体在抖音、快手、小红书等创建自己的账号,有目的地推出各种小视频,生动反映武汉的地域特色、风土人情,让人足不出户就能了解形象而生动的武汉。

还应该加强武汉政府部门和文化机构的自媒体建设,使武汉市民通过发帖、评论等手段表达意见和诉求,政府部门和文化机构也能够及时了解民意,推进与市民的双向互动,使武汉城市文化持续动态发展。加快构建各种微信公众号平台,根据不同的受众群体,推送定制化的传播内容,实现精准传播,从而提高城市品牌形象的传播效果。

2. 利用新媒体传播数字武汉新形象

武汉的高校和科研单位众多、智力密集,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在全国都处于前列,拥有如此高层次文化水平的群体,再加上当前新媒体发展的潮流势不可挡,武汉完全可以将自身朝着有智慧、强大科技感的城市形象定位,打造数字武汉。数字武汉作为时下前卫的品牌类型,与旅游型品牌、经济型品牌等形象不一样,它既能集中反映武汉的核心文化价值,又便于它在同类型城市中脱颖而出。要打造“数字武汉”的城市品牌形象,需要将数字化设计、网络化传播和新媒体传播密切结合起来,把数字化设计积极融入各大门户网站,还必须融入微博、微信、抖音、快手等手机软件的界面中。在这个方面,政府要起到主动的引领作用,重点是要利用新媒体的优势完善线上公共服务体系。

3. 整合多元传播主体协力传播

要建构和传播城市的品牌形象,政府是最重要的组织者和领导者,要充分发挥政府的引领作用。武汉政府需要立足武汉实际,认真规划武汉城市品牌形象的传播,定期筹划宣传重点和热点,引导市民积极参与塑造和推广良好的武汉城市形象。同时,还因为数字媒体传播主体的复杂性,政府需加强对新媒体平台的监管,通过制定和实施相关法律法规,明确责任和任务,厘清边界。

要激发公众参与城市品牌形象传播的积极性,使之成为城市形象传播的主力军。移动数字媒体的出现,给公众的信息传播能力带来了革命性的变革。移动数字化时代,“人人皆能当主播”,公众摇身一变就能成为生产、发布、接受信息的主体。从公众这里发出的传播内容,提供的是个体观察视角,比官方正规

^① 习近平:《加快推动媒体融合发展构建全媒体传播格局》,《奋斗》2019年第6期。

的叙事框架更具人情味,是人们了解这座城市文化的另一维度。比如,当今的网络名人均自带流量,利用网络名人、“网红”参观走访武汉,对武汉的本土文化进行推介,从公众的视角来讲述武汉故事,也可以起到促进武汉城市品牌形象传播的重要作用。另外,公众本身既是城市的主人,又是城市的动态名片,其中的每一个人也是城市形象的代表。要提升武汉的城市品牌形象,还要引导武汉市民加强自身修养,形成良好的精神面貌。

基金项目:2021年度武汉研究院课题“新阶段提升武汉文化实力与竞争力对策研究”(课题编号:IWHS20212020)。

作者简介:

李小波,江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武汉城市职业学院职业教育与乡村振兴研究所所长。

(责任编辑:陈雯)

冯天瑜先生

中华文化史研究成就纵横谈

——致程涛平先生的信

王超逸

编者按：壬寅年冬末，冯天瑜先生不幸离世，学界同悲。冯先生多年挚友王超逸接程涛平信，得此消息，不禁洒泪。借回复程涛平信，王超逸先生系统回顾了冯先生在中华文化史、中国史学史上的研究成就和学术贡献，以兹纪念。

不久前涛平兄告诉我，冯天瑜先生在疫情期间不幸去世了。虽然此期间接二连三地得到不少老专家、老学者不幸离开我们的消息，但是当听到冯先生也走了的消息后，我还是感到很突然，心里很难过。

涛平兄在信中说：

不敢相信冯天瑜老师突然离世！冯天瑜是武汉大学的资深教授，著作等身，是名副其实的学术泰斗。我与冯老师于1974年相识，时值评法批儒。冯天瑜写得比冯友兰好，由此我通过友人引荐拜访冯老师，结下友谊。20世纪80年代起我担任《江汉论坛》杂志的历史编辑，与经常投稿的冯老师来往密切。您在前信中还曾提到，诸学者中，我见过面的只有庞朴，那是1984年5月1日我在北京政协礼堂参加《历史研究》首届优秀论文奖颁奖时见到的。1987年我完成博士论文后，蒙冯老师高度评价，亲为作序，广为宣传。2010年起撰写《楚国通史》，冯老师提醒，人生无常，不要等到全书几百万字写完才联系出版，应该分阶段完稿即出，由此我改成《先楚史》《春秋楚史》《战国楚史》三部，写出一部出版一部。冯老师还特意向武汉出版社书面推荐《先楚史》。《先楚史》的出版，冯老师居功伟矣。回想我的成长，每一步都与冯老师的帮助息息相关，每思及此，怎不涕零！

涛平兄的回忆也引起了我的漫长的回忆。

几天以来，我一直在思考关于冯先生在其学术园地的创新、独到贡献和地位。

昨天，我外出刚回京，到家后，就小心地找出了冯先生主编的《中华文化辞典》（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版，2010年第2版）。回忆起来，还是弟在外省挂职时从那里买的，时间是2014年9月12日。您告诉我，你们交往始于1974年，这样算来，距我读到冯先生主编的辞典相距了40年。现在，“文化”“国学”已经成为挂在社会各阶层人士嘴边的一句口头语，具有网络热词的性质，时尚时髦。似乎茶余饭后嘴

边不说文化、国学,就不文化、不国学。

时间上溯到20世纪80年代初中期。那时,“文化热”刚刚形成苗头,稍有兴起之势,但还没有形成气候,更没有“国学热”这个概念。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展开和深入,大陆各地掀起了各类文化研究、中外文化比较研究、比较方法论研究的热潮。文化研究、对传统文化的反思与再估计、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传统与现代、中西体用的关系等时代的理论问题成为研讨的焦点。那时,冯天瑜、李泽厚、庞朴、汤一介、包遵信先生成为开启和引领这个时代思潮和不同流派的领军人物。由鲁军先生首倡,梁漱溟先生领衔,冯友兰、张岱年、季羨林、任继愈、周一良、金克木、厉以宁、汤一介、庞朴诸先生领导成立了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大陆第一家书院——中国文化书院。时间是1984年。书院的教学科研架构是中外文化比较,思维方法和治学方法是比较方法论。由鲁军、李中华请教冯友兰先生共同确定的书院宗旨是:“通过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和教学活动,继承和发扬中国的优秀文化遗产,通过对海外文化的介绍、研究及国际性学术交流活动,提高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水平,促进中国文化的现代化。”

1987年,书院决定招收第一批中外文化比较理论研究生学员。该班学科架设是15个专业,分别以15门课程为发轫。它们是:(1)中国文化概论,(2)日本文化概论,(3)印度文化概论,(4)西方文化概论,(5)文化学概论,(6)马克思主义文化学,(7)比较哲学,(8)比较文学,(9)比较美学,(10)比较法学,(11)比较史学,(12)比较宗教学,(13)比较教育学,(14)比较伦理学,(15)比较方法论。

作为第一批研究生课程,理应有“文化学概论”(或“文化学原理”)和“中华文化史”专业。但是,遗憾的是,书院并没有拿出这两门基础教材。同学们都在翘首盼望着。但是,直到本届研究生学员毕业,同学们也没有读到!

为什么?

文化学研究在大陆沉寂30多年。大陆教育模式受苏联教育模式的裹挟和影响,认为那是西方教育理论和模式。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以后,接续深化而来的就是传统文化、西方文化、马克思主义与现代化问题的讨论。

这是一个时代的大命题。

时代的问题意识,鲜明地抛给了这个时代的学人。

那时,若以小学功力的深浅为标志,辅以时序演化的标志,可以说分了五代人,且这五代人都置身其中。以梁漱溟、冯友兰先生为一代,以汤一介、庞朴先生为一代,以冯天瑜先生为一代,以鲁军、李中华先生为一代,我是在第五代。

世界儒学大会于2010年、2011年,分别颁授“孔子文化奖——世界儒学研究杰出人物”予庞朴先生、汤一介先生。在会议主席团的评述中说,庞、汤二位是继梁漱溟、冯友兰之后,大陆深具传统文化学养的最末两位。之后就是新一代学人唱主角。这样说来,冯天瑜先生整整代表和领军了一个学人代际。

回顾20世纪80年代中期,有两件大事,四大流派。两件大事是:1984年,经中央决策者拍板,中国大陆地区成立了第一家学术团队——中国文化书院;1986年元月初,由复旦大学在上海主办了“首届国际中国文化学术讨论会”。

四大文化流派是:(1)中国文化书院——“传统文化派”,(2)“走向未来”丛书——“科学派”,(3)“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人文派”,(4)京外派——“高校派”(以武大、复旦大学学者为代表)。至20世

纪90年代,其中的“科学派”“人文派”两派云流星散,不见踪迹,而“传统文化派”“高校派”厚积薄发,生机勃勃。

对于这期间发生的两件大事,冯先生都是积极的助推者。上海召开的国际会议,级别极高,邀选专家和收录论文极严。大会共收到论文论纲45篇,其中11篇是外国学者的论著,有23位中外学者做了报告。会议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周谷城主持。在此次会议上,冯先生提交了论文《中国古文化的特质》。该文后被收录进论文集《中国传统文化的再估计——首届国际中国文化学术讨论会(1986年)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

论文后来刊发于《光明日报》(1986年2月17日第3版),题目改为《中国古文化的“土壤分析”》。刊载时内容做了精练压缩。再后来,该文被选入了“中外比较文化教学丛书”之一《中国文化概论》中的《参考资料》一章。该章节共选了20位学人的论文,冯先生占20位中的一席。现在看来,当初(1986年)冯先生的论文就是以“文化通论”的视角立论。

当时他就立下了旨归,摆开了阵势。该文透出了以下信息:(1)埋下伏笔—定义“文化”概念—定义“元典”概念,(2)中西比较的视野,(3)“史”的自觉、“史”家眼光,“史”的规划,(4)宏观与微观结合,(5)“通几”与“质测”结合,(6)最终形成个人学案的风格。

可以看出,他全局在胸,目贯始终,为后来构架其史论结合的文化学体系和文化史学体系奠定下了坚实的基石。这应该说是冯天瑜氏理论的文化自觉和理论自觉期。由于时间和篇幅关系,在此文中,我对冯先生的家学、师承、地望、江山之助不做探讨分析。

他的文化自觉意识是与时代的问题意识、社会思潮合拍的。

上海首届国际会议的纪要中列出了会议讨论的七大具体问题和见解。同时,揭示了未来研究的五大问题和方向。七大具体问题和见解是:(一)中国文化的特征,(二)中国文化的结构,(三)中国文化的阶段,(四)中国文化中的儒学,(五)中国文化传统的总体估价,(六)中外文化交流问题,(七)中国文化世界化和世界文化中国化。未来研究的五大问题和方向是:(一)怎样保持和推进目前的研究势头,(二)怎样开拓文化研究的视野,(三)怎样深观文化传统的结构,(四)怎样寻求特异文化的历史模式,(五)怎样发展目标相同而风格各异的学派。

综合会议提出的十二大问题,一个核心问题是:学术研究本身的问题。即:知古不知今,知此不知彼,知中不知外,知专不知通,或者正好相反的现象。

一个当务之急是架构“文化学原理”和“中国文化史”。这是学术领域的巨大空白。这在当时是无法填补的空白。填补这一空白,回应时代问题,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的开端。冯先生在学术上不断钻研,获得不断丰收,正是在20世纪90年代的初中期。后人所惊异叹服的也是他的收获期。设若没有他的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文化自觉,则没有后来的“冯天瑜”学案。

由冯先生领衔合著的《中华文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是改革开放后出版最早的一部国别文化学通史。在这之后,我陆续见到了由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多卷本《中国文化史》,由敝校出版社出版的多卷本《中华文化史》。冯先生的“文化史”与后面几部“文化史”的不同之处,一是出版早,二是三人合著,有着鲜明的著者风格,独到的识见和观点;三是冯先生自立旨归,总其纲,提其要。冯先生在《序》中提纲挈领,纲举目张。

冯先生治学的起点是由生物学(自然科学)进入历史学,进而进入文化学。可以说,他是一位跨学科、

跨专业的复合型学人。他横跨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生命科学四大学科体系。首先他具有“通”和“博”的特点。以人文学科为例,我们都知道,作为人文学科的“文、史、哲”三大门类,各有短处,又各有长处。文史哲三个系的优缺点是:“哲学系”缺点是“空”,优点是高远;“历史系”缺点是“狭”,优点是精深;“文学系”缺点是“浅”,优点是广博。而冯先生是绝文史哲而去,从游戏规则而外,斜刺里呼啸而来。

冯先生由博到专,由专到博,出得来,进得去,融会贯通,转智成识,识见圆融。这颇与鲁迅早年的由矿物学、医学、生物学、化学而向以社会批评、文明批评为志业的文学家、文化学家、思想家的转型相类。他规避了“文、史、哲”三门学科的短处,也规避了社会科学的短处,而融会了它们的长处。这使他领衔的《中华文化史》超脱于诸专业史(思想史、哲学史、史学史、文学史)之上。

一般来说,一部传世的文化通史的形成,很难说由个人在一个时间节点上来完成,要之,至少需要以下五个前提条件:(1)中国近代以来数代人的学科学术积累;(2)文化学与文化学史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定义的探索与梳理,形成基本共识;(3)时代的问题意识,思想解放的宽度和力度,学术研究所必要的宽松环境条件;(4)中外文化交流的视野、参照;(5)学术群体、学术流派的形成、激荡。

在由冯天瑜先生主编的《中华文化辞典》附录《中国文化研究书目索引》中,据统计,在“中国文化通史”子目中,最早是1902年由日本学者中西牛郎所著《支那文明史论》(普通学堂室),到1947年陈安仁著《中国文化史》(商务印书馆)。之后,在中国大陆沉寂32年。直到1978年,大陆推出蔡尚思所著《中国文化史要论》(湖南教育出版社)。11年后,冯先生等推出《中华文化史》。

冯先生等著的《中华文化史》的诞生,看似偶然,实则必然。

据张梦阳先生分析,鲁迅创造的不朽典型——阿Q,也是经过中华民族思想先觉者数代的努力,特别是近代以来的民族觉醒,自我意识复苏,对本民族的自我精神弱点逐渐有了清醒的认识,又在五四文学革命的推动下,现代小说笔法在鲁迅手中趋于成熟时才在文坛诞生的。如果没有前人数代的努力与国内外时代环境的孕育,只靠鲁迅一人的努力,是绝不可能成功的。当然,鲁迅本人的特殊经历、素养与天才条件,还是起着内在的关键作用(引自张梦阳著《阿Q一百年——鲁迅文学的世界性精神探微》,商务印书馆,2022年5月第1版)。“冯天瑜”学案与“鲁迅”学案相类。

一般来说,拿出一部完备的文化史有“四难”:宽广难、精准难、晓达难、会通难。只有打通“四难”的痛点,其学说和著作才能立得起来。基于此,几代学人,都是做了铺路石、接力棒、火炬手,是历史的中间物。历史在等待一个人物的登场。这个人物不说时代条件和社会条件,只说他个人禀赋,他至少需要具备以下几个内在特点:(1)个人的天赋异禀;(2)个人的学术兴趣、爱好、习惯;(3)个人在学术坐标中的位次;(4)个人的学术起点、基础、积累;(5)个人在学术创造域、架构系统中的段位;(6)个人的创造力、创新力,在同时代中的世界位次评估;(7)当盖棺论定时,个人所可能遗留给世界的新的价值元素和价值系统。

以上所想、所念、所述,应该是“冯学学案”中的重要命题。在此,弟只是点题,它不是本文承载的任务,也不是今天我所要展开论述的。我希望后学,知今知师,厚今厚师,而不必舍近求远,舍师求圣求仙。道不远人,道在身边,圣在心中。

那么,冯天瑜——应运而生,应时而诞。

时势造英雄!——斯言诚哉!

那时,中国大陆几乎还没有关于“中国文化史”的学术专著出版。

进入21世纪初,后来由敝校四大教授主编的《中华文化史》(多卷本,北京大学出版社),老教授们只

是领衔挂个名,是出于后学多人之手,质量上未尽如人意。

20世纪80年代,最初,能读到的关于“文化学原理”之类的著作,只有梁漱溟、庞朴、汤一介、李中华、鲁军先生,美籍华人余英时、杜维明、成中英、林毓生先生,中国台湾地区钱穆、陈鼓应先生等几位学人的著作。

由此,历史性地确立了冯先生在中华文化史、中国史学史上,在大陆学苑中之泰山不移之地位。

苏秉琦先生曾为考古学的任务这样界定:“考古学的根本任务在于要对中国文化、文明的起源与发展,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发展,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作出正确回答。并以此为核心、框架,来系统复原中国历史的真实轮廓与发展脉络。为此,必须建立史论结合的、系统完整的史学理论体系。”考古学是文化学的基础。冯先生的事功与苏先生的治学鹤的是相通的。

冯先生走了,走在了壬寅年冬末小大寒之际。他走得洒脱、从容。他不寂寞。他实现了生命的最大价值。

因为疫情期间居家办公,我的案头没有冯著《中华文化史》《中华元典精神》,不能更多述及,我的忆述难免空疏。

我生有涯,而知无涯。说来有诸多文化理论问题困惑我多年,其中一个问题就是关于“内圣外王”的厘清和实证问题。在20世纪80年代,汤一介先生曾先后谈到这个问题。后来,汤先生又在另一篇论文中否定了自己的前述观点。之后,汤先生似乎又肯定了这个观点。我们班有的同学还与汤先生展开过书面讨论。那时,我也深切关注着这个问题,但是基于我的天资、天赋和我的阅历、经验,我并没有想深想透这个问题。多年以来,它一直作为一个悬疑,在我的心中绕旋。及至我研究了由冯先生领衔合著的《中华文化史》,对此问题才释然。仅举一例,以见冯先生的学问和思想对我的开窍和滋养之惠。

回顾我的学术成长道路,我的不少文化思想的形成、成熟、圆融,就是吸收了冯先生的诸多珍贵识见、思想后才坚定下来,从而确定下我自己的文化观。

今天我与兄交流,也是重点回望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热”的历程和时势。冯先生已成为一个时代的符号。“冯学学案”伴随着由冷学到热学,由隐学到显学,经由数代学人、几多流派碰撞、汇通,终于蔚成今天文化学、国学之大观。

可以说,冯先生探三代之源而究天人之际,承百代之流而察世界之变,会中外之学而成一家之言。

正如兄所言:“冯先生是名副其实的学术泰斗”——这是兄知人论世之论。

谨缀数语,与涛平兄同洒热泪。

谨撰一联:

举首南天,骐骥凌云,谨托黄鹤酬文胆。

作揖大江,君瑜天下,登高珞珈祭樱魂。

作者简介:

王超逸,北京大学当代企业文化研究所研究员。

(责任编辑:陶秀丽)

百年以来中国共产党 “二七”纪念的历史演进

卢 鹏 俞祖华

摘 要:百年以来中共“二七”纪念的主题随时代而不断变化。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围绕革命这一主题,借助“二七”纪念,明确革命对象、说明革命前途、阐述革命策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聚焦建设这一课题,肯定工人地位、动员国家建设;改革开放以来,改革成为时代潮流,中共通过“二七”纪念,推动现代化发展、提高工人技能和培育民众奋斗精神。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二七”纪念;历史演进

“二七”运动即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工人所掀起的反帝反封建运动,“充分显示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的顶点”^①。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到新中国成立后,再到改革开放以来,党始终注重利用“二七”这一政治符号,开展“二七”纪念活动,并不断结合时代,赋予“二七”纪念新的内涵,借助“二七”纪念,完成党在不同历史时期所要实现的目标和想要完成的任务。目前学界对于“二七”纪念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二七”纪念,对百年以来中国共产党“二七”纪念的历史演进方面的研究则略显单薄,值得深入挖掘。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革命化”的“二七”

“二七”爆发后,中共早期领导人陈独秀、瞿秋白等随即开展了“二七”纪念活动,奠定了其后中国共产党“二七”纪念范式。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二七”纪念,主要用来明确革命对象、说明革命前途和阐述革命策略,对动员各阶级民众投身革命事业、实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有着重要作用。

(一)明确革命对象

明确革命对象是谁,是进行革命动员的首要话题,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就决定了新民

^① 卢鹏、俞祖华:《全面抗战时期〈新华日报〉有关“二七”纪念的抗日话语研究》,《档案与建设》2022年第12期。

主义革命的对象必然是封建军阀和帝国主义。在国民革命时期,中共与国民党建立了联合战线,因此,直、皖、奉等北洋军阀代表着封建势力,支持封建军阀的英、美、日等国是帝国主义的主要代表。1924年,陈独秀在《向导》上发表纪念文章指出:“惨杀工人和卖国殃民的直系军阀”现正“勾结英美,仇视苏俄”,号召“速起革命”“促进国民革命的发展”。^①1925年,陈独秀又刊文说明了“中国国民革命之敌人——帝国主义者军阀及其走狗”,“压迫中国人民阻碍中国人民发展的帝国主义者与军阀,非革命是不能使他们屈服的”。^②

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成为“新军阀”和“反动派”,中国革命的对象指向国民党。1932年,周恩来在《红色中华》上发表纪念文章,指出“国民党军阀秉承帝国主义的意旨,已经在各处压迫工人反帝罢工,解散抗日救国会,屠杀反帝群众,禁止组织义勇军,解雇和压迫目前与日军作战的白军士兵”,动员民众开展革命战争,“促进投降帝国主义的国民党统治的最后死亡”。^③中共在“二七”纪念中指出了国民党将国家利益积极出卖给帝国主义的事实,并将其视为帝国主义的傀儡。

七七事变后,全面抗战爆发,中华民族与日本帝国主义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包含“二七”纪念在内的各种政治资源都被融入抗日的主题语境中,“二七”纪念逐渐成为团结抗战、反对日本侵略的重要武器。1938年,陕甘宁总工会发布“二七”纪念宣言号召:工人群众应以“抗战高于一切”为最高准则,以“抗日救国和共同创造民族独立民主自由民生幸福的新中国”为共同目标,“拥护国民政府蒋委员长,坚决抗战到底,并帮助军队抗战,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④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不顾人民反对,大举进攻中原解放区,中共借助“二七”纪念呼吁民众打倒国民党及其背后的美帝国主义。1947年2月7日,《解放日报》刊登社论指出:抗战虽然获得胜利,但“美国帝国主义却代替了日本帝国主义来灭亡中国,蒋介石代替了汪精卫来作出卖中国的汉奸”,“今天我们祖国最迫切的问题,是从美帝国主义魔掌中解放出来”,“建立反美帝反独裁的广泛的统一战线”。^⑤

(二)说明革命前途

说明革命的前途和目标,是纪念活动的题中之义。向工人及民众预设出革命的前途和方向,能够激发民众投身革命的热情,凝聚最大范围的革命力量。在封建军阀统治的中国内,工人及民众的权益很难得到保障,国民革命时期,工人及民众希望建立一个自身权益受保障的国家。1926年,罗章龙指出:国民革命时期,民众要求一个保护工农利益的国民革命政府。

1931年11月7日,党在江西瑞金举行了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建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划清了同国民党政权的界限,与国民党反动政府形成对峙。这一时期,党借助“二七”纪念所预设出的革命前途是在中国建立苏维埃政府。周恩来发表纪念文章指出,“广大的农民与一切劳苦群众”要“坚决的站在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共产党与苏维埃中央政府领导之下”,“争取苏维埃革命在全中国的胜

① 为人:《为“二七”纪念告国人》,《向导》1924年第53期。

② 独秀:《中国国民革命运动中工人的力量》,《向导》1925年第101期。

③ 周恩来:《今年的“二七”纪念与中国工人阶级的中心任务》,《红色中华“二七”增刊》1932年2月3日第2版。

④ 《陕甘宁边区总工会为“二七”十五周年纪念宣言》,《新中华报》1938年2月10日第1版。

⑤ 《中国工人阶级今天的任务——纪念“二七”二十四周年》,《解放日报》1947年2月7日第1版。

利”。^① 1933年,《红色中华》刊登“二七”纪念文章时指出:目前中国正存在两个政权,“一个是代表工农劳苦群众利益的苏维埃;一个是豪绅地主资本家的国民党政府。前者是日益发展和巩固,而后者则趋没落与死亡”^②。同年,《红色中华》又发表纪念文章并指出:只有苏维埃才是我们解放唯一的旗帜。

全面抗战时期,“新中国”作为革命前途的纪念话语屡次出现,构建出一个独立、自由、民主、幸福的新民主主义国家。1938年,《新华日报》刊发社论指出:全国民众应“为贯彻抗战到底争取最后胜利,创立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而奋斗”^③。同年,陕甘宁边区总工会发布“二七”纪念宣言,指出目前共同目标是“创造民族独立民主自由民生幸福的新中国”^④。1943年,《新华日报》刊文指出:“全中国老百姓都希望把中国改造一下,要一个人权有保障,民权自由的新中国。”^⑤

解放战争时期,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即将胜利的关头,中共借助“二七”纪念向民众说明新中国建立宗旨。1947年,《新华日报》刊登社论指出:“中国人民斗争的道路,一直是为着争得一个独立、自由、民主、和平、幸福而繁荣的新中国,在这个新中国的土地上,人民的一切权利,能够得到充分的保障,再不过那种饥饿、痛苦、流浪和煎熬的生活。”^⑥

(三) 阐述革命策略

革命策略对于革命是否成功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往往能够左右革命形势的发展,决定革命目标是否能实现。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的两大“法宝”,同时也是在革命进程中应采取的策略和方针。

中共自成立以来,始终注重发挥各阶级民众团结的力量,号召国内外革命群众一致建立统一战线,“二七”纪念作为重要的政治资源,成为党宣传这一主张的重要媒介。1924年,陈独秀指出:全国民众应“与革命的先锋工人联成统一的战线,促进国民革命的发展,实现国民革命政府的成功”^⑦。1925年,瞿秋白指出,“中国共产党主张召集一切民主派的联合会议”,从而建立“反帝国主义的联合战线”^⑧。除了建立国内统一战线外,与世界各国工人的联合也是统一战线的应有之义。1925年,郑超麟指出:中国职工运动应“与国际职工运动革命潮流联合起来,与先进国无产阶级遥相呼应”^⑨。土地革命时期,苏联作为与中华苏维埃政权相同意识形态的国家,与苏联实现联合也异常重要。1932年,周恩来指出:在革命中“要巩固工农的联盟”,同时还“必须联合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尤其是无产阶级的国家——苏联,才能根本推翻帝国主义强盗及其走狗国民党的统治”^⑩。全面抗战时期,建立国内国际反法西斯战线是打倒日本侵略者的不二选择。1939年,张浩指出:要形成“以工农劳苦大众为基础”的统一战线,“巩固和扩大民族统一战线”,“赞助与拥护以国际无产阶级统一战线为基础的反战反法西斯蒂的和平战线,以便共同反对共同的

① 周恩来:《今年的“二七”纪念与中国工人阶级的中心任务》,《红色中华“二七”增刊》1932年2月3日第2版。

② 《纪念“二七”与我们的中心任务》,《红色中华》1933年2月7日第1版。

③ 《纪念“二七”要争取抗战胜利》,《新华日报》1938年2月7日第1版。

④ 《陕甘宁边区总工会为“二七”十五周年纪念宣言》,《新中华报》1938年2月10日第1版。

⑤ 阿卫:《纪念“二七”二十周年》,《新华日报》1943年2月6日第4版。

⑥ 熊复:《“二七”书感》,《新华日报》1947年2月7日第2版。

⑦ 为人:《为“二七”纪念告国人》,《向导》1924年第53期。

⑧ 秋白:《一九二三年之“二七”与一九二五年之“二七”》,《向导》1925年第101期。

⑨ 超麟:《“二七”纪念与国际职工运动》,《向导》1925年第101期。

⑩ 周恩来:《今年的“二七”纪念与中国工人阶级的中心任务》,《红色中华“二七”增刊》1932年2月3日第2版。

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及国际法西斯蒂军阀”。^①中共借助“二七”纪念更加深化了统一战线在中国革命中的作用,通过“二七”纪念向民众宣传了团结的力量。

大革命失败前,中共没有给予武装斗争足够的重视,没有建立一支自己掌握的武装力量,在“二七”纪念中也没有涉及武装斗争,对武装斗争的作用认识不足。大革命失败之后,中共通过总结经验教训,逐渐明白了开展武装斗争的必然性,武装斗争成为中国革命的重要斗争形式。1932年,周恩来指出:要“动员全中国群众,号召全中国群众自动武装起来”^②。1933年,《红色中华》刊登纪念文章,指出:“目前我们要集中一切力量为了战争,在扩大红军的运动中,我们必须特别加紧对于工人群众的动员,吸引大批的工人到红军中去”^③。在1933年的会昌“二七”纪念大会上,“县工联代表号召工人纪念‘二七’当红军去,加强红军中无产阶级的领导”^④。抗日战争时期,中共通过“二七”纪念,号召工人自觉建立游击队等抗日武装力量,呼吁民众加入抗日武装。1940年,邓发在“二七”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中说:“在抗战中平汉路、同津浦路、正太路等工人,为了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继续了过去精神加入游击队,破坏交通,同日本帝国主义进行坚决的斗争。”^⑤1944年,《新华日报》指出了目前各地工人正举行武装起义,建立了“平汉路工人游击队”“榆太游击支队”“同蒲路铁工自卫队”“太原工人自卫队”和“淄益博矿工武装队”等抗日武装。^⑥中共利用“二七”纪念,说明了武装斗争对革命胜利的重要作用,以及通过报刊介绍目前工人建立革命武装的情况,给全国工人及民众作一表率,呼吁广大民众加入武装斗争中去。

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建设化”的“二七”

新中国刚刚成立,经过长时间战火的洗礼,社会百般疮痍,进行国家建设、恢复发展成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时代主题。社会主义建设是包括工人阶级在内的全体劳动者的事业,需要广大工人参与建设,充分调动工人阶级的积极性、创造性、主动性。因此,这一时期的“二七”纪念聚焦于肯定工人地位、动员国家建设。

(一)肯定工人地位

要充分调动工人投身国家建设的积极性,首先要做的是肯定工人阶级在国家体系中的主体地位,阐述新国家的建设是为了工人自身及广大人民群众,不是之前为了大地主资本家服务的。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二七”纪念,中华全国总工会发布的关于纪念“二七”的通知中,明确指出了:“今年纪念‘二七’,与过去任何一年不同的特别重大的意义”,是“中国工人阶级不仅获得了‘二七’罢工所争取的一切民主权利,不再受任何人的压迫,而且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导阶级——新中国的主人翁”。^⑦新中国成立后的首个“二七”纪念日,中华全国总工会就对工人阶级的地位作了极高的评价,这对全体工人建设国家的热情是一种莫大的

① 张浩:《“二七”与抗战》,《新中华报》1940年2月7日第2、3版。

② 周恩来:《今年的“二七”纪念与中国工人阶级的中心任务》,《红色中华“二七”增刊》1932年2月3日第2版。

③ 《纪念“二七”与我们的中心任务》,《红色中华》1933年2月7日第1版。

④ 飘梨:《会昌示威群众二千余,二十八人当场入红军》,《红色中华》1933年2月16日第4版。

⑤ 《邓发同志在“二七”纪念大会上的报告》,《新中华报》1940年2月28日第5、6版。

⑥ 一鸣:《华北工友继承了“二七”传统》,《新华日报》1944年2月5日第4版。

⑦ 《中华全国总工会关于纪念“二七”的通知》,《人民日报》1950年1月29日第1版。

激励。1953年,《人民日报》在头版刊发了“二七”纪念三十周年的文章,指出:“中国的工人农民经历了无数的艰难困苦,终于战胜了内外反动派,建立了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人阶级已经不再是奴隶,而是国家的主人了”,“工人阶级成了国家政权中的领导力量,并且亲自掌握了国家经济”。^①

(二) 动员国家建设

新中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因此,工人阶级是国家建设的重要支柱,国家建设需要广大工人及劳动群众贡献力量和发挥创造性。新中国成立之后的“二七”纪念,注重激发工人阶级及群众的国家建设热情和主动参与精神。

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内战争尚未完全结束,又恰值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因此“二七”纪念动员工人参与国家建设的主要形式是开展生产竞赛,打倒美帝国主义。1950年,中华全国总工会发布关于纪念“二七”的通知,指出:目前阶段“恢复与发展生产又急不容缓,国家财政困难的时候,工人阶级要以吃苦耐劳的模范带头作用,领导并团结全国人民,帮助国家克服困难,发展生产,创造自己幸福的将来”^②。1951年2月9日,《人民日报》刊文指出:“工人阶级特别是铁路工人应该保持和发扬‘二七’的光荣传统,紧紧地跟着共产党,跟着毛主席走,展开爱国主义生产竞赛,在生产战线上打击美帝国主义。”^③抗美援朝和三大改造结束后,党借助“二七”纪念进行经济社会建设动员的方式,除了继续保持开展生产竞赛的传统之外,提倡节约也成为重要形式。1957年2月7日,武汉市各界代表和武汉市的“二七”老工人等在汉口铁路工人俱乐部举行集会纪念“二七”革命斗争三十四周年,谢滋群在会上发表讲话:工人阶级应该“用忘我的创造性的劳动,增加生产,厉行节约,把先烈们高举的红旗,胜利地举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④。同日,郑州市1200多名职工代表也在“二七”纪念堂集会,武蕴石和苑斌号召“全市职工发扬‘二七’革命斗争的光荣传统,勤俭办工厂,勤俭办企业,勤俭办一切事业,以推进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⑤。

三、改革开放以来:“改革化”的“二七”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社会发展进入了全新的时期,中国的改革发展离不开工人阶级及民众的力量,“二七”纪念在改革开放时期起到了推动现代化发展、提高工人劳动技能和培育民众奋斗精神的重要作用。

(一) 推动现代化发展

随着时代的发展,现代化成为各国的奋斗目标,科学技术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愈来愈高,在“四化”目标提出的背景下,号召工人及民众投身现代化建设,同时知识分子作为工人阶级的先进代表被纳入“二

① 《坚持工人运动的正确方针,为国家工业化而奋斗——纪念“二七”三十周年》,《人民日报》1953年2月7日第1版。

② 《中华全国总工会关于纪念“二七”的通知》,《人民日报》1950年1月29日第1版。

③ 柳荣:《纪念“二七”开展爱国主义生产竞赛》,《人民日报》1951年2月9日第2版。

④ 《发扬革命传统,勤俭建设祖国,武汉郑州人民集会纪念“二七”》,《人民日报》1957年2月8日第4版。

⑤ 《发扬革命传统,勤俭建设祖国,武汉郑州人民集会纪念“二七”》,《人民日报》1957年2月8日第4版。

七”纪念话语之中,作为推动社会发展的生力军。1983年,邓小平为“二七”六十周年题词:“中国工人阶级要发扬‘二七’革命传统,为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强国,为推进人类进步事业,而努力奋斗。”1983年2月7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刊发社论指出了“在民主革命时期,工人阶级尚且非常需要知识分子;今天,在以实现四化为战略目标的新的历史时期,工人阶级就更加需要知识分子。目前,我国知识分子已属于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成为四化建设的依靠力量”^①。1993年2月6日,江泽民和李鹏分别为“二七”罢工七十周年纪念日题词:“弘扬二七革命传统,争做四化建设先行”和“发扬二七革命光荣传统,做改革和建设的主力军”。^②同年,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在北京二七机车工厂召开了纪念大会,倪志福发表讲话称:“当代中国工人阶级的历史责任,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进一步巩固工农联盟,团结各族人民,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艰苦奋斗,开拓前进,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③倪志福的讲话除了肯定工人阶级在推进现代化建设中的主力军作用外,又更加详细地指出了当代工人阶级的具体责任和任务。1997年,江泽民在视察北京二七机车工厂时指出:“发扬二七革命传统,做跨世纪的火车头。”

时代迈进21世纪,党的十六大确立了小康社会的建成是这一时期党推进现代化建设的中心任务和主要课题,因此,“二七”纪念话语牢牢围绕动员工人及民众投身建成小康社会而展开。2003年,王兆国在全总召开的纪念“二七”八十周年座谈会上发表讲话指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集中体现了全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中国工人阶级自己的事业”,广大职工群众“要更加自觉地把思想认识统一到党中央的战略部署上来,把智慧和力量凝聚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上来”,“为完成十六大确定的各项任务而努力奋斗”。^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后,党的二十大确立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目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内的奋斗目标。2023年,中国中车在武汉举行纪念“二七”百年大会,林耀武在会上呼吁全国工人在实现个人理想价值的过程中,以实际行动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添砖加瓦,做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平凡英雄。人民网对这次纪念大会给予了高度评价:本次活动“更好地让红色基因在继承中焕发出新的时代价值,进一步激励广大员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奋勇前进”。

(二)提高工人劳动技能

改革开放后,党的工作中心已经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现经济快速增长是党开展一切工作的前提,除了开展生产竞赛和提倡节约生产之外,工人学习先进的生产技术被提上了日程。1983年2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指出:“要组织工人学科学、学文化、学技术”,“为人民创造更好更多的财富”。^⑤同时在改革的大环境下,动员工人阶级进行实践基础上的研究,来突破束缚发展的旧模式也是“二七”纪念的重要内容。1983年2月6日,党和国家在北京长辛店集会纪念“二七”大罢工六十周年,倪志福号召“中国工

① 《让“二七”革命传统在新时期发扬光大》,《人民日报》1983年2月7日第1版。

② 李年贵、王清宪:《首都集会纪念“二七”大罢工70周年》,《人民日报》1993年2月7日第1版。

③ 李年贵、王清宪:《首都集会纪念“二七”大罢工70周年》,《人民日报》1993年2月7日第1版。

④ 王兆国:《在纪念“二七”革命斗争八十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国工运》2003年第3期。

⑤ 《让“二七”革命传统在新时期发扬光大》,《人民日报》1983年2月7日第1版。

人阶级要站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最前列,在新的历史使命面前,继承和发扬‘二七’革命精神,破除束缚生产力发展的老框框、老套套、老作风;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总结新经验,破旧创新、立志改革,努力开创现代中国工人运动的新局面”^①。

(三) 培育民众奋斗精神

精神是一个国家最深沉、最浓厚的力量,社会发展建设离不开精神的引领和导向,革命精神是我们党从成立以来迈入新时代不可或缺的精神来源,“二七”作为中共领导下的反帝反封建革命运动,有着深厚的革命传统,是进行革命精神培育的重要红色资源。党借助“二七”这一红色资源,来传承和培育革命精神,鼓舞着我们从胜利走向更大胜利。

首先,宣传和挖掘“二七精神”是传承和培育革命精神的首要环节。1983年2月7日,《人民日报》头版刊登社论,将“二七精神”概括为“英勇斗争、不怕牺牲的共产主义精神”和“大义凛然、视死如归的革命气节和崇高品德”。^②2003年,王兆国在纪念大会上指出“二七”斗争的宝贵品格为:“彻底的革命精神、高度的组织纪律性和强大的战斗力。”^③2021年,中共郑州市委组织专家学者将“二七精神”提炼为“千里同轨、万众一心的团结精神”、“坚定信念、追求真理的创新精神”、“顽强拼搏、勇为先锋的斗争精神”和“忠诚为民、不怕牺牲的奉献精神”。^④综上,我们能够看出,对“二七精神”内涵的挖掘和阐释越加符合时代的特点。2021年,习近平在建党百年大会上提出了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这一系统概念,“二七精神”作为中国革命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将其纳入这一精神谱系中,成为更好挖掘和传承“二七精神”的重要课题。在“二七”运动百年纪念前夕,中国社会科学院举办了“二七精神”课题座谈会,指出:“‘二七精神’是应当大力弘扬的红色文化”,“将其纳入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可以说正当其时、正当其用”。对于“二七精神”和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关系这一问题,笔者认为“二七”作为中国工运史及革命史上重大的历史事件,对中国革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同时诞生了伟大的“二七精神”,这一精神成为中国革命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建党初期直至当代,党始终注重宣传这一精神,在党的百年奋斗历程中起到了重要的精神激励作用,鼓舞着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取得历史性成就,因此,将其纳入精神谱系中是应有之举,但是应当指出的是目前缺乏对“二七精神”的顶层提炼,使之纳入精神谱系的进程变得缓慢,在这也应该说明的是,对于提炼“二七精神”不应局限于当时,在党的整个百年“二七”纪念的历史演进中,始终注重发掘其时代内涵,为党在每个历史时期的任务和目标所服务,所以我们在挖掘“二七精神”时,应结合时代特点,发掘其时代精神,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建设和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实现服务。

其次,纪念建筑是传承革命精神、保存人类记忆的“装置”,能够让重大历史事件的精神在当代继续焕发光彩、传承延续。如,1986年,武汉二七纪念馆新馆在江岸“二七”先烈流血牺牲的地方落成;1999年,武汉市在纪念“二七”革命斗争76周年时迁建落成二七烈士纪念碑;2023年,在武汉纪念“二七”百年大会上,落成了林祥谦烈士的铜像。改革开放以来,纪念仪式作为“党和政府主导的缅怀历史、宣扬理念和

① 《发扬“二七”传统争当改革先锋》,《人民日报》1983年2月7日第1版。

② 《让“二七”革命传统在新时期发扬光大》,《人民日报》1983年2月7日第1版。

③ 王兆国:《在纪念“二七”革命斗争八十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国工运》2003年第3期。

④ 李红霞、杨波:《新时代“二七精神”的传承和研究》,《中共郑州市委党校学报》2021年第4期。

彰显价值的程序化活动”^①,能够融情于众,潜移默化地对参与群众进行情绪感化,“二七”纪念大会选择召开的地点绝大部分是“二七”运动发生地和“二七”纪念场所。如1979年,在北京二七机车工厂举行纪念大会,郑州“二七”老工人和职工在“二七”纪念堂举行“二七”大罢工五十六周年大会;1993年,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在北京二七机车工厂召开纪念大会;2013年,在武昌洪山施洋烈士陵园和原江岸站林祥谦烈士塑像前,青年代表开展祭扫活动;2023年,“二七”纪念百年大会分别在北京长辛店二七纪念馆和武汉中车长江公司二七红色教育基地举行。“二七”纪念建筑成了重要的纪念符号,承载了“二七”的重大历史意义,是人民群众红色旅游的重要景点和开展纪念大会的重要场所,能够唤起人们心中的敬仰之情,自觉传承“二七”的奋斗精神。

四、结语

中国共产党“二七”纪念在凸显反帝反封建斗争精神总基调的同时,不断根据不同的发展阶段调整纪念的议题与重点,体现了弘扬革命传统与追踪时代精神的有机统一,又体现出其与时俱进的政治品格和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的思想。在不同历史时期,中共“二七”纪念活动总会围绕着此时期特定的历史任务,将“二七”纪念当作宣传政治思想的重要载体,根据不同的历史时期建构起相对应的纪念活动,对中共革命理念的宣传以及社会动员起到巨大的促进作用。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社科学术社团主题学术活动项目“文本、诠释与传播: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人的中华民族复兴话语研究(1921—2021)”(项目编号:20STA032);国家社科基金社科学术社团主题学术活动项目“传承与创新: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1921—2021)”(项目编号:21STA011)。

作者简介:

卢鹏,鲁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共党史党建;

俞祖华,鲁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万人计划”领军人才,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中宣部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思想史。

(责任编辑:周阳)

^① 江先锋:《国家纪念仪式在历史虚无主义批判中的价值功能》,《湖北行政学院学报》2022年第4期。